

FROM SOUL TO MIND

[美] 爱德华·S·里德 著 李丽 译

# 从灵魂到心理

心理学的产生,从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到威廉·詹姆士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FROM SOUL TO MIND

[美] 爱德华·S·里德 著 李丽 译

# 从灵魂到心理

心理学的产生,从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到威廉·詹姆士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HB47/10



\*200063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灵魂到心理:心理学的产生,从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到威廉·詹姆士/(美)里德著;李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7

ISBN 7-108-01537-4

I . 从… II . ①里…②李… III . 心理学史-研究  
IV . B8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41 号

© 1997 by Edward S. Reed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张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 数** 218 千字 **图字** 01-2000-0085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8.50 元

## 译者前言

# 独辟蹊径的徘徊者

历史一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隐藏着真实：它并不依赖厚重的时光幕布来遮掩和阻挡，而是以不可穷举的歧路使人类逐渐彷徨和迷失在无数种可能性之中。没有什么能够制止人类在时光的迷宫中执著地行走，但每迈出一步你都不知道将离事实更近还是更远。

这是历史学家的痛苦，也是他们的幸运。

心理学的历史也不例外。

不乏幽默感的心理学史家们说：心理学有一个很漫长的过去，却只有一个很短暂的历史。通常人们一方面认为心理学的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对于灵魂的穿凿附会，另一方面又断定心理学是在19世纪末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使这两个极端相互统一起来的关键是人们认为心理学一直是依附于哲学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们可以按哲学的历史把心理学的历史追溯到远古，同时又可以把对于作为独立学科的心理学的研究局限在一个相对狭小的时间范围之内。

我们不妨对心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事件和

与之相关的思想做一个简要和肤浅的归纳：

● 17世纪初，笛卡儿提出了身心二元论的观点，认为心和身具有两种不同的本质，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它们在人的有机体中能够相互作用。

● 17世纪中叶，出现了以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联想主义心理学，认为一切复杂的心理活动都可以还原为感觉印象的联系。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贝克莱、休谟以及后来的哈特利、李德和穆勒父子等都是联想主义的代表人物。联想主义把联想分为同时性和相继性两类，其中，相继联想是由于记忆作用产生的。从联想的形成规律看，有临近、对比和相似联想的区分。苏格兰学派是其中的一个派别，他们自称根据常识立论，又称常识学派，他们反对休谟的不可知论，而坚信上帝、灵魂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人可以直接认识外物。

● 18世纪后期，生理学的研究在德国取得了重大进展，许多著名的生理学家如缪勒、赫尔姆霍茨、费希纳和黑灵等都对心理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黑格尔和康德在哲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科学的进步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到了19世纪后期，构造心理学在德国逐渐兴起，主张心理学应以意识或意识经验为研究对象，心理学家的任务在于分析意识的内容，查明意识的组成元素和构造原理，因而又被称为元素心理学或原子论心理学。冯特早期的研究带有构造主义倾向，而对构造主义充分的表述则是由他的学

生铁钦纳完成的。构造主义在早期的心理学体系中是最严密的体系，它使得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开始建立起来。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第一个实验心理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正式诞生。

● 19世纪后期，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人类的传统思想带来了又一次冲击。詹姆士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机能心理学刚好与构造主义形成了对立。机能主义主张心理学的目的不在于把心理分解为一些元素，而是要研究心理适应环境的机能作用。到20世纪20年代，机能主义成为美国心理学中主导的势力。

● 兴起于20世纪初的格式塔心理学是与构造主义相对立的另一个大学派，它以韦特海默尔、考夫卡和克勒为代表人物，认为人的每一种经验都是一个整体，不能简单地从其组成部分来加以说明，整体总是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

● 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发展了起来。精神分析从医治人的心理障碍着手，重视探索人的动机和行为的根源，从而弥补了传统心理学的不足。精神分析心理学认为人的重要行为表现是一个人自己意识不到的动机和内心冲突的结果，从而对意识与无意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至今，心理学中门派林立的局面仍没有多大改观，从20世纪上半叶的只强调刺激和反应而回避心理机制的行为主义到20世纪中后期的强调人的潜能与价值的人本主义以及将人看成是与计算机相类似的信息加工系统的认知主义，不同时期在不同思潮的影响下，心理学

在朝着不同的方向迈进。

如果我们按照上述归纳来认识心理学的历史，我们将面对一个清晰而完整的景象。然而清晰和完整并不就是真实和全面，至少不完全是或者不总是。对于另外一些心理学史家来说，也许迷宫一般令人捉摸不定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才是让他们痛苦又带给他们幸运和快乐的历史。他们宁愿在一个陌生而崭新的荆棘之路上徘徊，也不愿轻易臣服于那些权威和定论。

于是有了这样一本书，它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并对另外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给出了出人意料的诠释，它的名字就是《从灵魂到心理》。

与传统观点恰恰相反，里德认为现代哲学是在 19 世纪末从心理学中独立出来的。他甚至还提出心理学的产生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研究范围不断变窄的过程，心理学正是将其研究的对象从“灵魂”转变为“心理”，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被承认为一门科学。

里德对他的同行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心理学史家回避了一个本应成为他们重要课题的问题：解释各种与心理学有关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正是这种批判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到了一些本来隐藏在为传统心理学史家们所热衷的不同流派的思想背后的东西——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宗教势力的影响、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非学术斗争和方方面面可能有关的因素。

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心理学权威的名字之外，他更多地提

到了伊拉斯马斯·达尔文、雪莱、玛丽·雪莱、歌德、海涅、乔治·艾略特和刘易斯等诗人和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对心理的见解，以及他们在普及心理学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关注了费希纳对心理物理学的贡献，而且揭示了费希纳思想的自然形而上学本质。他在著作中不仅涉及了心理学、哲学、宗教、文学、生理学以及唯灵论对神秘现象的研究，而且提到了大量在以往的心理学史中从未被提到过的人物。里德的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充分了解心理学思想从联想主义向构造主义发展的全过程。

毫无疑问，《从灵魂到心理》是一本有争议的书。许多读者尤其是专家可能不会赞同里德的观点，甚至提出有力的批驳。然而里德的观点是否就是真理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本书最值得借鉴之处是里德独到的视角与开阔的思路。正是由于里德采用了新的视角，才揭示出 19 世纪一些鲜为现代人所知的、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与事件，他正是以这些新发现为基础才能够提出新观点：其中有关潜在心理学、经典形而上学、心理学的科学化历程以及对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的诠释都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很有新意和启发性。

科学研究的创新就是通过新视角来产生新发现，从而提出新观点来实现的。美国的《图书馆杂志》提到“……里德将改变我们思索近 250 年的方式”。我们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拓宽思路、开阔视野。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从事心理学、哲学研究的人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从事文学研究、宗教研究的人也会从中受益匪浅。



非常感谢本书的编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鼓励与帮助。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对翻译工作的支持。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如有疏漏之处,谨请大家指正。

李 丽

2000年10月

如果科学家在我们的生活情况里和日常印象里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变革，诗人就会立刻兴奋起来。他不仅在那些一般的间接影响中紧跟着科学家，而且将与科学家并肩携手，深入到科学本身的对象中间去。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sup>①</sup>

---

<sup>①</sup> 译文引自《西方文论选》下卷，p. 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 前 言

ix

学习心理学的学生常常会质疑，为什么一些小说家和充满创造性的作家所表现出的对人类心灵的深刻洞察总是被那些所谓的科学心理学家们熟视无睹。的确，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普鲁斯特都给了我们许多有关人类的心灵的描述。这个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学习心理学的学生的想像，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现代心理学与现代小说的发展在时间上惊人的同步性。在 19 世纪晚期，现代文化的这两个重要的部分出现了，而且在 20 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心理学方面表现为实验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人数的巨增，而在文学方面则体现为小说至今仍在西方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在 19 世纪早期，心理问题更多地是在雪莱和华兹华斯的诗歌中而不是在司各特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被探讨的。在同一时期，为数极少的探究心理问题的人可能是物理学家或生理学家而不是所谓的心理学家，当然，那时根本就没有临床心理学家。

学生们对于科学心理学家为何要回避创造性作家的见地的上述困惑可以引出一个更加直截了当的问题：19 世纪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使得科学与文学彻底分道扬镳。是什么历史变迁使得一些人被认作是心理学家而不是作家，而另一些

人被认作是作家而不是心理学家?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心理学史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现代心理学理论和展开心理学工作的社会制度都是在这一分离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对于这一问题,以往的文献一直令人吃惊地保持着沉默。

在心理学史及相关的哲学史中的这种无益的沉默,很大程度缘于一般科学史尤其是心理学史中的诸多禁忌。这些禁忌将使科学史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分割开,无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文化的出现——尽管这种现代文化是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密切联系着的。

《从灵魂到心理》一书试图给予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以一个全新的诠释。我认为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的心理学是由什么构成的。大多数科学史著作作用很大的篇幅介绍理论家,却对实验家(experimentalist)匆匆带过。这种偏见使得以往的著作很轻易地认为“科学心理学”是从数世纪的“纯粹思索”中产生的——当然在这种偏见下,人们也不会去证明这种观点的真实性;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心理学史家回避了一个本应成为他们重要课题的问题:解释各种与心理学有关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心理学史家经常故意忽略一些前人的错误。例如 L. 伽伐尼<sup>①</sup>和 A. 伏特<sup>②</sup>在一般的心理学史著作中被当作是对神

---

① 伽伐尼, L. (1737—1798 年), 意大利生理学家。他发现了所谓的“动物电”, 开创了电生理学的研究。电流计(galvanometer)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

② 伏特, A.C. (1745—1827 年), 意大利物理学家, 在电学研究方面有很多重要发现。电压的基本国际单位就是用他的姓氏命名的。

经传导的电学基础有重要发现的生理学家,而不是所谓“生命力”(vital force)和“精神力”(mental force)本质的研究者。这违背了事实,伽伐尼和伏特从未期望成为生理学家,他们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一术语。他们都不认为他们所发现的东西是我们通常意义中的电,他们也都没有任何与神经传导概念有关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研究电与“生命力”之间的关系。由于忽略了伽伐尼和伏特的真正思想(并且对他们的观点作出了背离时代背景的错误诠释),现代历史搞得我们不可能理解19世纪上半叶的力(生命的和心理的,同时也是电的和热的)这一概念的作用,也很难理解有关动物磁、动物电、动物热、麦斯美术<sup>①</sup>和颅相学<sup>②</sup>的那些理论与首次郑重其事地将观念的联想(association of ideas)“生理化”(physiologize)的尝试之间的密切联系,除非我们克服了科学史家的那种不情愿研究现代科学思维中的“边缘”元素的想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心理学的成长历程,我们决不能忽略“成为一名心理学家”的这种职业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直至1900年,职业心理学家还为数极少,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心理学已位于最大的学科专业的行列中。在研究早期的历史时,我们毫不奇怪地发现医生、学者、教士、作家和巫医等,各种现在看来与心理学毫不相关的人都在积极地从事心理学活动。

---

① 麦斯美术是催眠术的前身。由 F. A. 麦斯美创立,主要通过“动物磁性”来对病人进行治疗。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② 颅相学是一种根据初期的神经解剖学和对人的心理能力的观察而形成的脑功能定位论。19世纪初,由维也纳医生 F. J. 加尔和他的学生 J. C. 斯帕兹海姆创立。

然而心理学史家的眼光在搜索他们的焦点时却极少能够超出狭小的特定群体——主要是哲学史中的经典的“心理神学家”，再加上生理学史中的“神经生理学家”。不论是克尔凯戈尔<sup>①</sup>还是库姆兄弟<sup>②</sup>（他们既是颇相学家又是新教的牧师），如果从这种狭隘的角度出发，都没有机会被包括进去。只看到很少的历史人物而对其他所有人视而不见，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此要提到的 19 世纪早期最重要的心理学家却是一位医生和诗人——伊拉斯马斯·达尔文<sup>③</sup>。学习文学的学生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却在心理学史和哲学史中鲜为人知。我希望通过本书的描述恢复老达尔文在心理科学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20 世纪后期科学史编纂法的进步并不能为我们这些试图修订心理学史的人们提供多大帮助。至少是在英语世界中，心理学史一直过分强调了“内在性”和“现实性”。于是，心理学史和其他通常的科学史一样，苦于大都使用现代的术语来叙述以往的东西。不幸的是，对这种做法提出反对意见的“外在性”的心理学史家更多是在提出新问题，而不是去解决已有的问题。

---

① 克尔凯戈尔，S.（1813—1855 年），德国对 20 世纪的存在主义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提出了“主观性即真理”的命题。著有《非此即彼》、《最后的非科学预言》等。

② 库姆兄弟：库姆，G.（1788—1858 年），著有《颇相学论文集》、《颇相学的元素》等。库姆，A.（1797—1847 年）。

③ 伊拉斯马斯·达尔文（1731—1802 年），英国医生。查理斯·达尔文的祖父。他是位自由思想家，擅长写诗，曾发明多种器械。著有《动物学，或有机体生命规律》等。

根据我的理解，外在主义者认为心理学史应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相通。我们应该研究在一个特定时代的科学家是如何与那个时代的社会力量和制度相联系的。例如，伊拉斯马斯·达尔文与早期的企业家约瑟夫·韦奇伍德<sup>①</sup>之间的友谊毫无疑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是外在主义者必须还是内在主义者，因为科学的争论常常关系到对事实和实验的解释。约瑟夫·普里斯特利<sup>②</sup>，他也与达尔文和韦奇伍德熟识，却不像达尔文那样接受安东尼·拉瓦锡<sup>③</sup>有关氧气的理论，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无论外在主义还是内在主义都不能单独地写出令人满意的科学史。我们应该弄明白那个分离出我们称为氧气的东西的人（普里斯特利，尽管氧气这一术语出自达尔文）为什么却不承认这种物质的存在，这时我们就必须不仅要了解普里斯特利的思想，还要了解他的社会地位。对外在主义和内在主义的两分法是错误且有害的。心理学史家必须拓展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和方向。看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外在性的改写来替代已有的内在性的心理学史，这种做法不能使我们的理解深化。xii

罗伯特·惠特(1711—1766年)的职业生涯提示了我们为什么必须了解一名科学家的职业背景。惠特是物理学家，执教于爱丁堡大学著名的医学院，他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与权威

---

① 韦奇伍德，J. (1730—1795年)，英国陶器制造者。他效仿古风，发明了无釉黑陶器，同时他还热心社会福利事业。

② 普里斯特利，J. (1733—1804年)，英国化学家和教士。他以研究气体的化学特征和发现氧气最为著名。

③ 拉瓦锡，A. (1743—1794年)，法国化学家。他否定了早期的“燃素说”，是现代化学的创始人。著有《化学基本教程》、《物理学与化学概论》等。

的同僚（卡仑<sup>①</sup>家族）以及后来臭名卓著的罗伯特·布朗不同。惠特与别的医生不同，他是一位睿智的实验家，在他众多的发现中最重要的是脊椎动物脊髓反射的基本机制。依据这些实验，惠特提出了刺激（*stimulus*）的观点并发明了这个术语，用来指物理能量（光、热、机械能、电）对神经的短时作用。惠特认为神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有关刺激的印象传到脊髓，在那里有机体以某种方式“感知”刺激并且开始反应过程。惠特所强调的对神经系统进行刺激的观点，成为以后所有生理学研究的基础，对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惠特的重要突破却从来没有得到内在主义历史学家的认可，因为尽管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些生理机制，但却用他称为脊髓的“有感觉原理（*sentient principle*）”（他明确地指出是一种从属性的灵魂）这个术语来进行解释——该观点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心理学中被放弃了。而外在主义历史学家也一直没有对惠特在历史中的地位重新估价。事实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严格地讲，一名外在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可能承认一位早期的思想家的贡献可能被忽视或曲解，因为，  
xiv 严格的外在主义者认为他或她自己是在追踪科学体系中的力量和权威的真实展现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对于爱丁堡学派，谁是权威以及它对其他学派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于是，外在主义者把惠特看作是从属性的人物。我认为惠特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不为人所知的。在外在主义者看来，这句话是

---

① 卡仑（1710—1790 年），英国医生。他提出了神经系统在健康和疾病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矛盾的：没有人能够默默无闻却具有影响力。

写《从灵魂到心理》一书的想法始于大约 20 年前，当时我正在探究惠特的影响，越来越对历史学家不能真正尽职而感到沮丧，对惠特在历史中的位置感到困惑。一次又一次，我发现 19 世纪的心理学家在重述惠特的观点时使用的是心理一词而不是用灵魂（这才是他的原话）。事实上，查里斯·谢灵顿<sup>①</sup>作为现代反射理论的提出者，除了语言表达方式之外，几乎在所有问题中都紧紧地追随着惠特的观点，他得到了公认，但其中相当多的工作是惠特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经完成的。（我并不是说谢灵顿盗窃了惠特的成果，他自己创造性的工作是最为重要的。）

惠特认识到脊髓的感觉冲动是通过有感觉原理被感知的，然后选择性地和适应性地以特定方式收缩肌肉作出反应。根据惠特，真正的灵魂（位于大脑中）自身可以产生等量的感觉冲动，从而激活身体。而谢灵顿认为，传到脊髓的感觉冲动与脊髓进行“交流”，与其他的信号接触，这一过程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对输出信号的选择，使得特定肌肉收缩。根据谢灵顿的理论，心理（位于大脑中）能够选择性激活和抑制同样的信号，从而使得机体运动（或停止运动）。惠特的类似于灵魂的有感觉原理就这样被谢灵顿的类似于电报的交流系统所代替，进一步讲，实现被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理所取代。 xv

我想知道，为什么脊髓反射的理论需要将灵魂换成心理才能得到公认？惠特在 18 世纪 40 年代的实验就已经清楚而

---

<sup>①</sup> 谢灵顿，C. S.（1857—1962 年），英国神经生理学家。他由于在研究神经系统功能上的杰出成就，与 E. D. 阿德里安同获 193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明确地发现了脊髓反射的基本现象，在 18 世纪 50 年代惠特还就这一问题与 A·冯·哈勒尔<sup>①</sup>进行过讨论。可是，这项工作直至 1900 年左右谢灵顿进行了言语上的修改之后才被广泛地理解和接受。看上去微小的用词的改变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呢？为什么科学家和后来的科学史家表现得如此毫无办法去从惠特的实验细节中“读通”他的理论词汇呢？尤其令人深思的是这些实验一直被人们奉为经典。

所有这些问题使我想了很多，不仅仅是谢灵顿和惠特（我还要回到他们的问题上）。我对 19 世纪人们接受早期心理学观点的情况了解得越多，我的好奇心也就越强。19 世纪思想家将他们的研究领域变窄的普遍倾向尤其令我震惊，他们拒绝像早期的理论家惠特和伊拉斯马斯·达尔文那样涉猎广泛。除了少数重要的特例，1850 年以后的心理学家都在避免发掘他们研究工作的本体论上的意义；而且像戈斯塔夫·费希纳<sup>②</sup>那样在严肃地探讨本体论意义的人们，会发现他们本体论的论述被忽略了，他们研究工作的范围就这样被缩小了。《从灵魂到心理》一书将谈到这一焦点不断变窄的过程，还将谈到心理学如何与文学分离开来成为科学并且发明了现代的概念——心理(mind)——的过程。在我的两本相关的著作中，我曾经提出有关现代心理学如何克服狭窄化的建议。在 *Encountering the World: Toward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

---

① 哈勒尔，A. (1708—1777 年)，瑞士生物学家、解剖学家和诗人。著有《人体生理学原理》，分 8 卷出版，打开了现代神经学的大门。

② 费希纳，G. (1801—1887 年)，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发展了韦伯关于感觉阈限的思想，从而奠定了心理物理学的基础。他也是实验美学的奠基人。著有《心理物理学原理》。

(1996)一书中,我认为心理不是存在于大脑中,而是存在于机体与环境的关系之中。在另一本书 *The Necessity of Experience* (1996) 中,我提出要想把心理学从目前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必须对经验这个概念进行完善。在《从灵魂到心理》中,我要追踪这种限制背后的历史,从而发现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些原因以及在更宽泛的经验观念上拓展心理学的可能的方法。

我对惠特及其影响的研究受到德雷克塞尔大学研究基金 (Drexel University Research Grant) 的支持,有关 19 世纪心理学的书目的研究受到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教员研究基金 (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 faculty research fund) 的资助。我在写这本书时,得到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的资助。我感谢所有这些友善的帮助,没有他们是不会有《从灵魂到心理》这本书的。

我还要向为本书提出过建议和信息的同事致谢:感谢 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 的 Joel Eigen, Howard Kaye, Fred Owens; 感谢 Mike Montgomery 和 Rob Wozniak 对书目研究的指导;感谢 Sherry Anders 担当了研究助手并准备了索引;还要感谢 Stuart Shanker 建议我把有关 19 世纪的一些思考写下来。在耶鲁大学出版社我得到了 Gladys Topkis、Susan Abel 和 Susan Laity 的很大帮助。我感谢他们睿智的编辑和热情的态度,使得本书及其作者都得到了提高。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探索心理学	1
第二章 不可能的科学	23
第三章 弗兰肯斯坦的科学	41
第四章 欧洲思想阵营的瓦解	65
第五章 短命的自然形而上学	87
第六章 1848:转折之年	117
第七章 三种无意识及其发展历程	135
第八章 对实证主义的崇拜	153
第九章 另一个达尔文	179
第十章 1879年:哲学如何从 心理学中产生出来	197
第十一章 威廉·詹姆士: 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	215
书目提要	237
索引	293

# 探索心理学

19世纪中叶的1850年2月12日，七名美国参议员——他们中有萨姆·休斯敦、亨利·克雷、丹尼尔·韦伯斯特——邀请了一位心理学家在华盛顿的议会大厦做报告。受邀的报告人正是宇宙神教的牧师J. B. 道兹（1795—1872年），他做了有关“电心理学”的一系列讲座。同年春天，道兹的演讲正式出版了，受到普遍的欢迎，并再版数次。同年秋天，又出了修订增补版。

道兹的讲座使我们这些现代的读者能够方便地看到19世纪心理学的缩影。道兹首先介绍目的论的观点，把“人”视为一种“智力进步的存在”，他一方面牢牢地把握已有的宗教真理，另一方面提出他所讲的心理学的科学，他确信心理学将在众学科中出类拔萃，因为它提供了对生活中最重要领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的洞悉。这种洞悉是不能从圣经或其他自然的宗教中得到的；它们来自优秀且牢固的科学的努力探索。在第二次讲座中，道兹自始至终都在介绍他的心理学是如何基于最近的并且与人类本质联系最紧密的科学——颅相学和麦斯美术而成型的。

道兹像19世纪大多数的科学的倡导者一样，认为科学倾

向在任何方面都绝不会反对宗教或贬低宗教。在 19 世纪,几乎所有的科学倡导者都错误地去解释现代科学如何是宗教的重要同盟。实际上,在道兹和大多数其他心理学家看来,心理学之所以能成为出类拔萃的科学,就是因为它是解释宗教的最有效的科学手段。道兹告诉他的听众,“大脑中有活着的精神,它就像全能的神,俯视和控制着……这一有组织的肉体所有的随意运动;当它的活力展现时,它不由自主地移动自己的力量,引起了所有生命的不随意活动。”

整个 19 世纪的前半叶,心理学被许多哲学家、神学家、受过教育的普通人认作是一门基础科学,是因为他们也像道兹一样,认为心理学是在日益科学化的现代世界上最适于保留宗教的科学。把人当成宇宙的微观世界而灵魂是它的主宰,这种比喻在那个世纪很有权威性。当时一些最“先进”和最“激进”的科学家都赞同使用科学来支持上帝是宇宙的主宰的观念。心理学是作为有关灵魂的科学因而在知识界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这门关于灵魂的科学也会时不时地考虑这样一些问题:这种有关灵魂的科学是否暗含着某种破坏宗教的思想的胚胎?尽管对正统观念的攻击很少(或者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的沉默),对异端思想的不安是很常见的。德国最出色的哲学家之一——鲁道夫·赫尔曼·洛采<sup>①</sup>(1817—1881 年)正中要害地指出:“天文学不断增长的远见卓识驱走了有关人们生活的大舞台与神密切联系的概念;而力学的进

---

<sup>①</sup> 洛采,R. H., 德国哲学家。他帮助创建了生理心理学。主张一切物体都是精神的,万物的交互作用都是无限实体(即上帝)的样态。著有《微观宇宙学》、《形而上学》、《德国美学史》等。

一步发展开始把世界解析得更小，从而威胁到人的微观世界。”

查理斯·达尔文批判了关于自然的神中心学说（见第九章），引来了反对他和他的学说的前所未有的论战。现代的读者非常有必要理解这场对达尔文观点的论战，它在那个世纪末相当成功地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中重新建立起神中心论世界观的许多重要内容。整个 19 世纪，即使在达尔文的工作得到广泛承认之后，心理学仍是从微观世界的角度来探讨问题，甚至那些与宗教的正统思想和统治阶层的精英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各种各样的心理学思想——唯灵论，颅相学，麦斯美术，也倾向于把自己归入特定的自然神论的行列。

1890 年的心理学与 1815 年的心理学的区别不仅仅是名称由道德哲学改为了心理学，更主要的是心理学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宗教观点。在那个世纪初，心理学被看成是有关灵魂的科学。到了那个世纪末，心理学已经或多或少地放弃了灵魂，而用心理取而代之。尽管如此，我想说的是，大多数心理学家仍期盼着这门有关心理的科学能够加固重要的宗教信念。

但是，对于 20 世纪末的读者来说，如果把这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仅仅看成是统治集团信念的辩护者而忽略他们是很危险的。在现代历史学家的观念里（他们往往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来撰写历史），一直倾向于忽略引发 19 世纪大量科学研究工作的宗教的差异，尤其是在心理学领域。事实上，19 世纪有关心理、身体和灵魂的“科学”讨论，是与有关这些问题的宗教争论分不开的——如果把它们分开，就犯了时代错误。19 世纪大多数的心理学思想产生在宗教对有关神或灵魂的特定

观念的调整过程中。

道兹的讲座是创造性的辩证论的极好例子。他的“电心理学”试图说明灵魂与身体之间的联系是电磁的。他在当时有关物理上的力可互相转换的新观点的含混暗示下，把麦斯美术(道兹称为动物磁性或动物电的研究)和颅相学中的观点与偶然的发现拼凑起来。他有几个讲座意在说明所有的疾病，无论是心理的还是物理的，都是由于身体内电力的不平衡导致的，其中对随意行为提出的解释——取材于电的形而上学(electrical metaphysics)，很快在生理心理学中得到公认。道兹认为，大脑中的精神活动创造或激发了电脉冲，这种电脉冲成为神经力；它反过来可以引起肌肉收缩，最终导致人的活动。在随后的40年中，无数的医生用电刺激他们的病人，使他们的肌肉收缩，以此来释放神经或生理的紧张，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治愈相当多的疾病。(威廉·詹姆士，他获得过医学的学位，就曾向他的妹妹爱丽斯建议进行这种电疗以改善她的“神经状况”，而且在他自己健康状况不佳时，也越来越多地依赖这种疗法。)这些临床程序引入后不久，德国的像戈斯塔夫·弗里奇和爱德华·希齐格那些研究者，还有后来英国的大卫·费里尔，都在用电刺激狗和灵长类动物的裸露的大脑，从而证明这种对中枢的刺激会引起动物身体的运动。在许多人看来，这些研究证明了思想至少部分程度是大脑的电活动。

但是，是心理在前还是大脑在前？是先有思想还是先有电脉冲？对于一个已经承认大脑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是不死灵魂的工具的人来说，这些发现证明了心理是基于并通过某种特殊的物质来活动的。这种灵魂对身体运用的教条在1848至1890年期间统治了欧洲的科学和医学思想——而那



时现代的实验心理学已骄傲地宣告它的诞生，这种情况在现代的读者看来会觉得很奇怪。所以，通常对现代实验心理学产生以及与它相联系的神经生理学原理的理解——尤其是那种认为这些领域中进步的思想家把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归于大脑的假设——是被严重误导的结果。

## 第一节 作为世俗神学的心理学

在 19 世纪末，积极地投身于创建和接受“新心理学”活动中的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并不认为新学科的宗旨或目标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常常反驳那种认为他们的工作有增进唯物主义倾向的指责。20 世纪认为新科学是宗教的敌人的观点使我们对现代心理学与自由的新教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视而不见。我们轻易地假设 19 世纪后期认为心理位于大脑的倾向是进入庸俗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垫脚石，而且，这一倾向与有关人的本质的宗教观念完全相反，或者至少与这些观念无关。但是，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首先，灵魂在位于大脑的同时还位于脊髓是不可能的。英格兰物理学家罗伯特·惠特在 18 世纪 40 年代就发现了脊髓反射，从这个立场出发，他提出了一个强大而有影响的论题：假设脊髓没有灵魂，它如何调节复杂的身体活动（呼吸、心跳、性活动等等）呢？除非认为脊髓中存在着灵魂，否则如何去解释在许多反射活动中的适应性表现呢？例如，动物可以通过擦除反射来用腿踢开皮肤上的跳蚤或扁虱之类的刺激物。灵魂或心理分布在脊椎甚至可能遍布全身的观点（不同

于灵魂被禁锢在头颅中的观点)与主流的心理学和生理学思想形成一种对立,这种对立至少持续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乔治·亨利·刘易斯<sup>①</sup>的著作的出现(参见第八章)。

有关灵魂分布各处的观点暗地里破坏了笛卡儿主义者对灵魂和身体的区分,尤其是笛卡儿主义的“心理只与大脑的状态有关系”的关键假设。对于19世纪的思想家来说,这种分布的灵魂的理论很危险地靠近世界的“动物性”方面,倾向于使灵魂无法与内脏区分开。(它似乎还暗示着即使是简单的动物也有灵魂,于是使人类作为上帝创造的无可争议的君主地位受到威胁。)当然,惠特的立场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都会引起激烈的反对。于是,“大脑主义者”,那些认为心理位于大脑中的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认为自己是灵魂的守卫者(就是说,他们在拯救被“自然化”了的灵魂),是对惠特派异端的攻击者,还是自由的新教将原罪与自我区分开的教义的捍卫者。新心理学强调真正的罪恶是与灵魂不同的外部力量,能够从外面腐蚀人的本性,但这不是人的内在本性,当然也不是不能根除的。

由于神学对新心理学的支持,许多北美早期的心理学报告发表在自由新教的期刊上,例如 *New Andover Review*。北美早期的最受尊敬的科学心理学家之一詹姆斯·马克·鲍德温<sup>②</sup>

---

① 刘易斯, G. H. (1817—1878年), 英国作家。曾为《大众百科全书》撰稿, 编辑过《领导者》, 创办了《双周刊》。主要著作有《西班牙戏剧》、《歌德的生平与著作》、《生活和心理问题》等。他结过婚, 有家庭, 从1854年起与乔治·艾略特同居。

② 鲍德温, J. M. (1861—1934年), 美国心理学家, 专长是儿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他是《心理学评论》的创始人兼主编, 还主编了《哲学与心理学词典》。

的著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 1887 年，他在 *Presbyterian Review* 中写道：“认为灵魂是自然的并不是说它是机械的，也不是说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法则是连续性的；恰恰相反，它说明自然是有智力的，思想的法则就是事物的法则。”三年以后，他公开针对新的“科学心理学”补充道：“它是唯灵论的而不是受益于科学进步的唯物主义的。”并不单单是美国人把科学心理学看成是灵魂世界观的捍卫者，德国重要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弗里德里奇·朗格<sup>①</sup>在 19 世纪 60 年代出版三卷本《唯物主义史》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新的生理心理学是如何破坏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尽管道兹的讲座比较简单化，但它们代表了心理学的真正发展趋势。事实上，我写本书的意图就是要说明这种趋势在整个 19 世纪后半叶占据了主导地位。简单地说，心理学之所以能成功地成为一门科学，主要是因为它捍卫了那些通常与自由新教神学有关联的关于人性的神学思想。在这些关于人性的思想中，真正的罪恶和非理性被认为是处于自我核心之外的。在科学领域内，在维护这种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战略性后退：早期盖伦<sup>②</sup>派认为的“灵魂是人格属性的平衡”的

---

① 朗格，F. A. (1828—1875 年)，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早期新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论工人问题》、《唯物主义史及其在目前的意义的批判》、《逻辑学研究》等。

② 盖伦(约 130—200 年)，古罗马医师，创立了医学知识与生物学知识的体系。他的学说在 2—16 世纪时期被奉为信条，对西方医学的影响很大，为医学中解剖学、生理学和诊断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他认为身体的构造和一切生理过程都有一定的目的性，并把机体内所进行的各种过程在无法解释时都归结为非物质力量的作用。

观念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不是笛卡儿主义的心理与身体对立的观念，而是一种新的二元论，由有意识的心理（真正的自我）和无意识的心理（受到灵魂“之外”的力的影响，包括身体）组成。

然而，有关这些发展过程的所有描述，都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口：这种战略性的防御究竟是针对谁的呢？为什么有必要发展有关无意识的理论——最初是电学的和磁学的理论，而后是皮层的和符号的理论——而这样的想法以前从未  
8 显得重要？为什么人们发现，整个 19 世纪，甚至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心理学家一直强烈反对那种认为他们的科学在人性问题上保留着对神学的敬意的观点？对心理学历史的现代解释却倾向于不提那些反对唯灵论的理论，然而正是这些理论刺激了这场有趣的防御行动，现代历史学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没有弄明白 19 世纪后期“新的科学心理学”是在捍卫关于现实的精神观点中产生的；实际上，这些历史学家常常把那些信奉宗教的并且倾向于唯灵论的人们误认为是唯物主义者。

## 第二节 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心理学

整个 19 世纪，令人尊敬的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都在反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但他们却很少提到对手的姓名和其真正的职位。1848 年的革命确实与这种理论风格有关。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使得贵族们惶恐不安，虽然他们仍统治着教堂和欧洲国家，却相应地赋予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和职业阶层

更多的权利。旧的政权与这些新成长起来的活跃分子之间形成暗中的联盟，以阻止由于神学教条的放松和政治活动的自由而导致的表面上来自于下层社会的“骚乱”与“暴动”。1848年随后的10年间，所谓的庸俗唯物主义者(vulgar materialists)在德国出现，在整个欧洲，实证主义运动正在积蓄力量，尽管它已与其创立者——奥古斯特·孔德的独特见解差距越来越大。路德维希·毕希纳<sup>①</sup>的唯物主义著作《力与物质》成为全欧洲的畅销书，但很快赫尔伯特·斯宾塞<sup>②</sup>的实证主义著作赢得了更高的声望。与此同时，几乎像这些发展的影子一样，“唯灵论”——降神会、与死者交谈、精神碰撞等诸如此类——在19世纪50年代也享有巨大声望。主流的宗教思想发现自己受到两类思想的亵渎——一类是唯物主义，另一类是杂乱的、狂热的唯灵论。

此时，主流的思想家常常攻击科学心理学的倡导者是无神论者，但只要粗粗地翻阅一下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这种指责是相当错误的。正是备受指责的斯宾塞提出了科学与宗教之间最终的“停战协议”：宗教着眼于宇宙中不可知的东西；科学则着眼于知识，不应该也不可能研究不可知的东西。尽管像斯宾塞那样的思想家被他们的对手标定为唯物主义者甚至是无神论者，但这仅仅是一种称呼而已。许多此类的唯物主

---

① 毕希纳，L. (1824—1899年)，德国医师，庸俗唯物主义代表人之一。他将意识当作物质的、实体的东西，认为人的聪明才智取决于营养的好坏。著有《力与物质》、《自然与精神》、《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主义》等。

② 斯宾塞，H. (1820—1903年)，英国进化论哲学家。著有9卷本的《综合哲学体系》，该书将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综合为一体。他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倡导者。

义者事实上是拒绝物质存在性的贝克莱主义者。那些拒绝放弃有关神创造甚至干预了自然或历史进程观点的思想家，肯定不会对已有的真理产生威胁，而可怜的毕希纳和他的几个同伴丢掉了他们的学术职位，只能归罪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对手们言过其辞。心理学史家和哲学史家至今还在可笑地重复着对早期心理学的这些古老的指责。真正的无神论者和激进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可不是斯宾塞那样的中间派，这些人的思想很少被世纪中叶自称为实证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人以及那些反对他们的更趋于主流思想的哲学家所公开提及。进一步说，许多对正统观念的最有力的指责不是来自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却是来自于唯灵论——他们所宣称的对灵魂世界的接触破坏了有组织的信仰和崇拜的结构体系。

让我们回到 1848 年以前的那段岁月，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令人迷惑的问题。在 1815 年至 1848 年期间，所有的欧洲国家 10 都有一种相当于官方哲学的东西，通过大学的讲台和教堂的讲道坛来进行传播，并由于受到警察和常常很严格的检查制度和检查活动的保护而得到加强。这些官方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哈布斯堡帝国<sup>①</sup>的部分地区）苏格兰“常识”理论<sup>②</sup>或（在某些德语地区）根植于康德著作并吸收了神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仿制品组成的。根据这些思想的

---

① 旧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1276—1918 年）。

② 苏格兰学派，18 世纪后半期至 19 世纪初英国的主要哲学流派之一。它反对 G. 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和 D. 休谟的怀疑论，坚持外部世界和心灵的真实存在，认为这是人心的构造所产生的共同信念，是人类的常识。因而又称常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 T. 李德和 D. 斯图亚特。

奠基人——苏格兰的托马斯·李德和东普鲁士的伊曼努尔·康德的观点,心理学决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事实上,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谈到的,这些思想家声称要挽救神圣的领域就得把心理学从科学中剔除。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在1815年以后,那些把康德和李德视为智慧的先驱者的思想家不仅提出了“关于心理的科学”,还用这种科学来维护他们的信仰!道兹的观点仅仅是官方思想家观点的发展,还有其他许多颇相学家和麦斯美术者也是这样。

这看上去越发令人迷惑不解。在19世纪后半叶,科学心理学家把自己视为自由新教人性观的倡导者,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什么呢?有人可能认为反对的是某种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无神论,但是我们似乎找不到这样一种软弱无力的理论的任何痕迹!读者们怎么可能相信会有这种事呢?在19世纪早期,“官方”心理学的继承者们不再像它的奠基者们那样反对无神论的攻击而捍卫灵魂,他们的心理学后来被重新组合并现代化而成为现代科学。但是,这些继承者几乎同样没有留下什么踪迹。

出现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20世纪的人很容易忘记在1848年以前的所有欧洲国家中大多数哲学和科学著作的出版必须得到教堂和国家的支持;在许多国家中,1848年以后仍是如此。激进的观点,即使是那些曾经被激烈地争 11  
论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可能被教授们公开讨论,因为至少在1848年以前,他们的讲座常会有秘密警察的光顾。而且,即使在1848年以后,要想出版有可能被误认成是在宽恕无神论或唯物主义的著作仍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但现代的读者倾向于对早期知识界中的这些重要事实视而不见。结果,我们有关

思想的历史只能是片面的——只是官方思想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那些官方思想的一些主要的推动力常常被隐藏起来，出于谨慎或审查制度或两种原因都有。

历史学家一旦遇到了重要哲学思潮没有明确地展示出来的情况，就会有一些相对直接的解决方法。本书采取的方法是简单地扩大对历史的考察范围。在19世纪并非所有的哲学和心理学工作，特别是心理学工作，是由专业人员完成的。乔治·刘易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我们该称他为记者，他也没有官方的学术职位，但在1850至1880年期间他为生理学知识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任何试图揭示1848年以前的激进思想的人，都必须去查找那些非官方的文献和不容易遭到审查的著作。这就意味着需要研究诗人和其他“有声望的”作家。

哲学史家和心理学史家对必须把柯勒律治<sup>①</sup>或巴尔扎克包括到他们的论述中可能会觉得别扭，但我别无选择。到1815年时，我们所谓的心理学原理还不存在，我们所谓的哲学原理也不存在。广为人知的心理学产生自哲学的信条是对于历史的胡说八道：作为历史学家和贝克莱主义者的大卫·休谟与一位现代的哲学教授之间在知识和历史方面的连贯性，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大于休谟与一位现代心理学教授之间的连贯性？大不列颠的情况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尽管J. 边沁<sup>②</sup>、詹姆

---

① 柯勒律治，S. T. (1772—1834年)，英国诗人、评论家。著有《古舟子咏》、《克里斯特贝尔》、《忽必烈汗》等。

② 边沁，J. (1748—1832年)，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以宣扬功利主义哲学最为著名。著有《政府论片断》、《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等。



斯·穆勒<sup>①</sup>、约翰·斯图亚特·穆勒<sup>②</sup>在任何正规的英国哲学史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拥有或渴望拥有学术职位。他们自认为是作家、诡辩家和思想家。而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大多数在19世纪前25年成长起来的自由的英国人一样，强调像卡莱尔<sup>③</sup>、柯勒律治、华兹华斯这些作家和诗人的哲学思想的价值。可是，现代的历史学家忽略了这些作家对哲学或科学思想的描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更为糟糕的是，仅仅根据世俗化的倾向就假设19世纪的科学甚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宗教，这完全是错误的。正如詹姆斯·希恩，一位出色的德国历史学家，最近写到的那样：“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19世纪是相对世俗化的年代，而大多数当时的人却相反，把宗教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问题……尽管存在着势不可当的世俗化的力量，但是19世纪的政治和文化仍弥漫着宗教氛围。”

只有通过品尝才能知道布丁的好坏，而想证明一个方法的好坏要看结果。所以，对于本书所使用的超乎寻常的拓宽知识范围的方法，我不仅要在有关方法的讨论中来证实，更要通过结果来验证。在我看来，有关心理学史的标准版本不仅是片面的（因为它只强调了“官方”的理论），更糟糕的是它还

---

① 穆勒，James，Stuart（1773—1836年），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父亲。他是功利主义的热心鼓吹者。著有《英属印度史》、《人类精神现象的分析》等。

② 穆勒，John，Stuart（1806—1873年），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著有《逻辑学体系》、《论自由》、《功利主义》、《关于宗教的三篇论文》等。

③ 卡莱尔，T.（1795—1881年），英国散文家。曾为《爱丁堡百科全书》撰写条目。著有《成衣匠里萨图斯》等。还撰写了有关法国革命和腓烈特大帝的著作。

具有误导性（因为那些思想范围受到限制的历史学家很难搞清推动官方立场变化的论点和异议）。我所要提出的新学说<sup>13</sup>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困惑逼出来的，这个学说也将表明避免大多数心理学史家的狭隘视点的价值。本书中所提出的新问题也会为我所采纳的观点而辩护。例如，我们将在对刘易斯的讨论中看到，直至 19 世纪 60 年代，“新”心理学仍有几条大道可以走：它可以与医学、生理学甚至科学的新闻记者联盟。然而，它却成为一门学院式的基于实验室研究的学科，并伴有一些临床应用。实际上，现代哲学正是迫于这种压力，才认为自己是一门学院式的基于逻辑的学科。要充分研究这些领域在历史中的产生过程，惟一的方法是将与现代心理学家形象一致的思想家的职业历程与那些不能被现代图式所容纳的思想家的职业历程进行对比。

### 第三节 一个心理学史的新学说

在以后的几章中将会提到我自己的学说，我将从重新建构早期历史出发，对拿破仑之后那个时代“官方的”欧洲哲学以及官方理论家主要反对的那些激进理论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官方理论是李德和康德工作的延续，这两位都曾在 18 世纪启蒙思想的框架中提出科学与宗教达成妥协的睿智方法。然而，这种妥协需要放弃一门有关人性的科学的生存权。康德和李德都相信，在现代世界中要挽救宗教，就必须表明心理学永远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样，灵魂就不会被进行科学的分析了。在很短的几年里，他们提出的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

停战就被破坏了。氧气是呼吸基础的发现（反驳了大脑是净化空气的器官的假设）以及 18 世纪电学的进展大大推动了神经生理学的发展。思想家们开始探究生命与感觉现象的电学和化学基础。康德和李德可能“证明了”没有人能够科学地研究人类，尽管如此，许多学者仍固执于此——旧的停战协议失效了，需要建立新的协议。 14

许多在 1790 年至 1815 年期间研究生命和心理本质的医生和自然哲学家发现，他们的观点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权威排斥。特别是涉及到人类灵魂的问题，这些观点或它们的倡导者可能会受到压制。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尽管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压制是在 1815 年维也纳议会的古老政权复辟以后才真正开始，但我觉得称之为“潜在心理学”（underground psychology）更为恰当。这种潜在心理学的第一位伟大代表就是伊拉斯马斯·达尔文——查理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可能是他那个年代最进步的非专业科学家；众多的贡献之一是他使用了氧气这一术语。他非常熟悉当时流行的电学理论，但他主要是通过带有散文注释的长诗来展示他的科学观点。作为林奈<sup>①</sup>作品的英文翻译家和颇受尊敬的医生，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对“神经”疾病很感兴趣，在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六和玛丽·安特瓦奈特被砍头之后的二十多年期间，他在作品中对有关人性的问题提出了激进的看法。

在老达尔文看来，所有的生命体，甚至是植物，都拥有感觉和体验。他在身体和神经中寻找一种微妙的液体或灵气作为

---

<sup>①</sup> 林奈，C.（1707—1778 年），瑞典植物学家。现代分类植物学的创始人。著有《植物自然系统》、《植物属志》、《植物种志》等。

这种感觉的物质基础,该观点的基础是他的朋友本杰明·富兰克林<sup>①</sup>很有影响的电的流动论。尽管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但是,当时盛行的教条是认为所有的心理状态取决于大脑中粒子的运动,他却是持反对意见的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像他之前的惠特一样,他赞成感觉现象的分布是更为广泛的,遍布整个身体。但与惠特不同的是,老达尔文拒绝使用宗教的语言“灵魂”来建立他的理论,这种差异决定了他的观点更容易被接受。整个欧洲都有人在读他的作品,一些写哥特式故事的流行作家同时在倡导和讥讽他的作品。这些有达尔文思想的哥特式的作品中,最著名的当属我们将在第三章讨论的玛丽·雪莱<sup>②</sup>的《弗兰肯斯坦》。

在欧洲开始反对法国大革命时,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关于生命和心理的激进观点也被他早期的支持者放弃。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开始批评他的诗歌和科学。然而达尔文的观点继续鼓舞了年轻一代科学家和作家,例如汉弗莱·戴维<sup>③</sup>和波西·雪莱。尤其是雪莱,他发展了达尔文的思想和方法。雪莱第一部主要的诗歌——《麦布女王》(虽然这本书遭禁,但它的各种各样的地下版本却很流行),在风格上大大超出了达尔

---

① 富兰克林,B.(1706—1790年),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证明了闪电与电是同一物质,提出建筑物要用避雷针保护。曾参与《独立宣言》的起草。

② 玛丽·雪莱(1797—1851年),英国作家。1814年与波西·雪莱私奔,两年后结婚。著有《弗兰肯斯坦: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还有游记和日记。1823年雪莱去世后,她编辑了雪莱的诗集和其他遗作。

③ 戴维,H.(1778—1829年),英国化学家。他研究了各种气体的挥发,发现了笑气的麻醉作用。他还发现用电解法可离析出化学元素。

文富有勇敢精神的小册子，但仍采用附注来大篇幅地讨论科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将看到雪莱关于爱的观点是试图对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心理学进行概括，因此他有力地反对了官方的理论。

而正统理论家们关心的是以下问题：如果生命、心理和感觉仅仅是器官的伴随物和动物体内流动的以太，那么上帝或灵魂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上帝仅仅是在组织用以感觉、思考和行动的物质，那么上帝如何确保这些生物将怎样去感受、思考和行动？如此来看上帝就显得不那么神圣。可是，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和波西·雪莱则认为我们行动的方式是我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由神决定的。他们俩探讨了宗教对这一成长过程的“不良影响”。进一步说，如果这种流动唯物主义(fluid materialism)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不就是说动物也有灵魂？或者像玛丽·雪莱(还有 E.T.A. 霍夫曼、爱伦·坡等其他一些人)后来所写的那样，一名科学家甚至可以用无生命的物质组成有生命的个体？相反，如果灵魂和精神仅仅是某种特殊的电磁以太，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物质的手段对它们施加影响(例如麦斯美<sup>①</sup>利用磁来引导“危机”和“磁睡眠”)？或者像心灵学家所声称的那样甚至可能与失散的灵魂取得联系？这种“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借用 M.H. 艾布拉姆斯的说法)产生于雪莱的小圈子中，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唯灵主义运动中才枝繁叶茂。理论家使用新的科学对几乎

---

① 麦斯美, F. A. (1734—1815年), 德国医师。主张动物磁性论。他是第一个对巫术进行科学研究的人, 他研究出的人工催眠称为“麦斯美术”。著有《磁疗学》、《动物磁性的发现》等。

每一个有关灵魂本质的正统假设提出质疑，而官方的理论家则通过探询这种潜在心理学中的无神论进行反驳。在 1815 年之后，任何试图以科学的形式出版类似于这种早期唯物主义心理学东西的人都将面临受禁、受调查甚至更糟的险境。

可是，官方的理论家不仅仅需要探讨这些达尔文主义理论家亵渎神灵的越轨之处，他们必须提出另外一种让人信服的观点。于是，在 1815 年之后，对“心理科学”的研究在整个欧洲盛行起来，并常常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现结合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理论的目标就是发现一种“主科学”（master science），它不仅允许对人类的心理进行分析，而且可以提出思维逻辑和道德规则。心理科学和道德科学盛行起来，同时还有各种逻辑学，许多逻辑学声称不仅是对思维的研究，而且是正确思维的导引。所有这些得到正式出版的理论一致认为心理活动位于大脑皮层，而且断言人类的经验始于那里所产生的简单感觉。复杂的心理活动是通过对那些经验的联想与同化来获得的——如果心理不遵循正确的联想路径，就会产生思想或行为的偏离。

尽管这种哲学强调大脑皮层的作用，但是一些生理学家仍对脊神经能否有感觉存有疑问。在这种背景下，关于脊髓结构的“贝尔—马让迪规律”迅速成功。查理斯·贝尔<sup>①</sup>于 1811 年和弗朗索瓦·马让迪<sup>②</sup>于 19 世纪 20 年代提出了脊髓

---

① 贝尔，C.（1774—1842 年），英国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他在神经病学上有所发现，区分了大脑中的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他还研究了枪伤和脊神经的功能。

② 马让迪，F.（1783—1855 年），法国生理学家和内科医生。他研究了神经生理学和静脉，第一个进行了人体过敏反应实验，发现了脊神经的功能差异以及药物对抗体的作用。

的背侧是感觉(输入)的一侧,而脊髓的腹侧是运动(输出)的一侧。这一观点很快发展为大脑接受和解释脊髓的输入,并且下达命令将所需的输出传送回脊髓。这样,心理仍是位于大脑的——在约翰内斯·缪勒<sup>①</sup>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生理学元素》一书中总结了大量的事实并支持了这一论断;而且这些看法成为了整个世纪最有影响的生理学背景。

新的生理学就是这样显而易见地避开了通常的物质是否具有感觉或思维特性的问题。例如,缪勒支持“生命力”和“心理能量”,或者说是独立于物质的力,尽管后来的研究发现它们与脑的某些部分在空间上是一致的。这种科学心理学把心理生命放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就可以与那种认为人类灵魂创造于自然之外的观点保持一致。上帝可能给人类创造了大脑,从而使得人类有了与灵魂这种非物质的范畴打交道的特殊能力;这种观点在当时甚为流行——特别是当你反对它时,就好比胆敢在强有力的宗教和神职权威的脸上飞旋爬行的苍蝇一样令人厌恶。这种有关心理与大脑的立场,将心理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至少统治了1848年以前的欧洲官方的思想,而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那个世纪末。

灵魂位于大脑的观点却不能解释,我们的身体或大脑周围的所有事物似乎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或控制它们都存在。例如,尽管心理学的规律直接产自缪勒的生理学,然而它很快就发现了生理学理论中的问题。早期的生理学家试图测

---

① 缪勒,J.(1801—1858年),德国生物学家。他著的《人体生物学手册》首次系统地吧物理学、化学以及比较解剖学的方法运用于生理学研究。他曾提出“感官特殊能力说”,认为感觉性质取决于感觉器官内部的特殊能力,而不取决于客观刺激的性质。

量物理能量变化与心理能量变化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很轻地刺激感官或身体的一部分,来观察这个刺激能否被觉察;再进一步加强刺激,观察它能否被觉察;如此进行下去。显然,这种方法可以发现许多阈下的(感觉不到的)刺激,但是能够记录的仅仅是单个的刺激,糟糕的是不同的实验情境会造成阈限的改变,包括实验中同一刺激的重复次数。然而,这些阈下刺激似乎在一些情况下也可以被觉察,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然那不是大脑中有意识的部分,否则这些刺激就不是阈下刺激了。那么,是什么察觉到了这些阈下刺激呢?在同一时期,那些研究睡眠障碍、麦斯美术和酒精对行为的影响的医生对病人在这些状态下可以无意识地觉察深感困惑。喊一个人的名字把他从睡梦中唤醒,他醒来后怎么可能不知道有人喊过他的名字呢?

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手们实质上创立的是笛卡儿主义二元论的变式。例如,缪勒自认为部分地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这些理论家认为心理是一种特殊的东19西,是由大脑中的观念(意识状态)组成的,而世上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仅仅是运动着的物质。1848年以后,这种二元论的不足之处在所有的阈下现象中暴露出来。但是,这些现象对于像老达尔文和波西·雪莱这样的作家来说是构不成问题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通常的物质而不是人脑中的特殊物质具有着感觉能力。他们认为人类的经验之门是向世界的众多方面敞开,而不是像那些认定心理位于大脑的教条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紧闭着——官方的理论家将世界的诸方面与灵魂分隔开。正像我将力图说明的那样,在19世纪的后半叶,“新心理学”的支持者们于是就需要一种有关无意识的特殊理论来使得有意识



的心理保持一定的纯洁。的确,在 19 世纪 60 年代,涌现出了大量有关无意识的理论,几乎所有这类理论或是在反对潜在心理学的唯物主义,或是在反对唯灵论的观点,或是同时反对这两种观点。

新心理学家提出的无意识感觉和加工似乎在支持日益增长的有关人类灵魂的“自由”观念。尽管从定义上说,不能通过内省的方法来研究无意识加工,但是无意识加工是理论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甚至经典的内省实验心理学也在探索无意识加工。同样,尽管无意识加工不能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它们的生理变化可能是可观察到的,但是变化所掩盖的感觉或思想是无法观察到的),经典的现代生理心理学家们却仍在对其妄加推断。事实上,几乎所有 1860 至 1890 年间自诩为“新”心理学家的那些人都忠诚于科学中的某种实证主义方法学,但这种科研方法应自始至终参照可变的现象。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新心理学家竟然基于原则上无法观察到的无意识感觉和加工来建立他们对人类心理的基本看法!

两位世纪之交的最著名的心理学家认识到了新心理学的不一致性与不充分性。西格蒙·弗洛伊德和威廉·詹姆士发现新心理学对笛卡儿主义思想的改动是把人类经验的组成局限为少量的皮层对刺激的反应。因而其余的人类存在或者是无意识感觉或者是某种思想(用无意识加工对无意识感觉进行解释的结果)。根据这种新心理学,心理永远是理性的,尽管非理性的躯体和无意识感觉会对其产生干扰。弗洛伊德本人愿意承认这种对心理的看法对“正常的”情况下的心理学来说可能是正确的(见他的《梦的解析》),但他不肯用如此受限制的心理学来解释所有人类的动机和心理状态,因为其中

许多情况在自由新教的道德看来并不是“正常的”。

詹姆士比弗洛伊德走得更远。他一直公开反对意识与无意识的两分法，这是由于他强烈反对皮层主义者的基本假设——构成所谓感觉的东西是处于人类经验的中心。所有新心理学家理论的核心特征是认为感觉是短暂的、片段的和准确的，而詹姆士却在强调即便是简单的感觉也是复杂的、交错的、流动的和动态的。尽管詹姆士常常被看作是美国新心理学的  
21 主要奠基人，但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他自认为是对这一学派思想以及自由新教中的灵魂观念最深刻而最主要的批驳者。本书将通过回顾詹姆士对新心理学富有洞察力的批驳来作为结论，并讨论他对人性所作出的重新思考。

## 不可能的科学

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紧接其后的那段时间，欧洲人普遍认为心理学不可能成为科学。这不是几个落后的理论家的立场，而是最优秀的学术思想家深思熟虑后提出的观点。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学和哲学，大都产生于这种观点在表面看来是褻渎的和唯物的心理学的攻击下发生反转的过程中。

这一时期人们使用的术语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洛克时代，英语中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和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依次大致指代我们现代所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18世纪中期，许多其他的术语也被用来指代整个“道德哲学”或它的一部分，例如拉丁词 *psychologia*（既指经验的又指理性的），拟希腊语 *pneumatology*（物灵学）。在苏格兰哲学中，智慧力（*intellectual powers*）和心理活动力（*active power of the mind*）这两个术语比较流行，而 *pneumatology* 一词偶尔用来指代有关灵魂的科学。但是到了世纪之交时，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相当多地用来指代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学（尽管道德哲学的说法在当时仍是通用的）。在1815年，波西·雪莱写道：“形而上学一词长期以来被用来指代对心理现象的

研究,尽管从语源上来看,用这个词来表示关于心理的科学很欠妥当,但也不好采用其他的词。”(雪莱把康德称为“心理学家”,而不是我们常说的哲学家。)在随后的十年,苏格兰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sup>①</sup>提到形而上学一词是一个“问题词汇”,因为没有人能够给它一个准确的解释,尽管它显而易见与灵魂有着密切的关系。十年之后,在19世纪30年代末,年轻的查理斯·达尔文也用形而上学一词作为他用来记录心理学研究和著述的笔记本的标题。再晚些时候,在1848年之后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形而上学才成为一个负性的词来指最深奥晦涩的思想。所以,读者必须仔细地注意讨论“形而上学”的时代,才不会曲解这个词的意思。

当大革命横扫法国时,学术理论家却在认为形而上学(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不能以物理学或化学同样的方式成为一门经验科学。这种普遍观点得到两位重要人物的支持,他们位于欧洲大陆的两端:东普鲁士的伊努埃尔·康德和苏格兰的托马斯·李德<sup>②</sup>。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位是1789至1830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他们有关心理学的观点被广泛传授、分析和讨论。我把在他们影响下所产生的观点称为经典的欧洲形而上学(traditional European metaphysics)。正如我以前所提到的,康德或李德都没有提出过经典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经典形而上

---

① 麦金托什,J.(1765—1832年),英国法学家、历史学家。著有《自然法和万国公法》、《论道德哲学的进展》、《1688年英国革命史》(未完成)等。

② 李德,T.(1710—1796年),英国哲学家。他是反对休谟的怀疑论的苏格兰学派的领袖。著有《论人的智力》、《论人的积极力量》等。

学至少褒奖了一种形式的科学心理学；虽然如此，部分由于李德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的影响才出现了这一系列的观点。

## 第一节 李德和康德

李德和康德都不反对心理学研究——相反，这二位都对心理学原理深感兴趣，并且积极从事研究工作。然而，他们俩<sup>24</sup>都有充分的理由来抨击任何把心理学视为一门科学的设想。康德和李德把牛顿力学视作经验科学的楷模，他们认为真正科学的本质是提出符合经验上的可限定规则并且表达出精确的因果关系模式的解释。康德和李德假设这些规则可以用数学的方式进行表达，探寻这些规律的方法就是控制实验（可能还混有观察和建立模型这两种方法，例如天文学）。

康德认为，有关人类心理或灵魂本质的众多说法是不可能通过上述方式科学地评定的。德国当时很盛行的“理性心理学”声称能够证明像“灵魂是不可分割的并且简单的”这类命题，康德对此进行了批驳。他在《纯粹理性的批判》中用一个悖论彻底批驳了那种认为灵魂可以通过相当的理性力量来维持的观点。在他的“人类学”中，康德提倡心理学的一种自然历史模型，使用观察技术来描述不同的人 and 民族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在不同情境中是如何反应的。康德的“批判”是一种新的原理或方法，目的是铲除任何将形而上学扩展到这种观察程序之外的借口。

李德对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攻击与康德在根源上不

同,但在结果上相似。李德反对笛卡儿主义和洛克<sup>①</sup>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假设——观念是身体状态的皮层印象,他反对那些试图基于感觉印象来解释有意义的心理状态的理论。李德认为,心理能力,例如感知外部物体的能力(李德认为这是心理力量的核心),不能被解释为由于物理刺激影响了身体或心理而造成的结果。他力图表明所有这样的解释或是违背了精确的因果关系的概念,或是科学性不够充分,或是两种情况都有。比方说,光对视网膜的作用是一种因果关系,而对光的感觉(视觉)是另一种因果关系,对物体的视知觉则是第三种。通常的观点(源自笛卡儿并且通过洛克等哲学家的工作得到传播)声称是第一种因果关系引起了第二种,而第二种又引起了第三种。正如我们今天所见的那样,这是对范畴的混淆——因为物理刺激不能作为引起心理状态的精确原因,感觉的(无目的的)状态也不是知觉的(有目的的)状态的成因。

李德和康德在许多方面是有共识的。他俩都认为牛顿式的科学是所有科学的极好楷模。这样看来,心理学要想成为科学,心理学家就得表明富有意义的人类经验仅仅是事物和运动的函数——就像牛顿说明行星的运动以及彩虹的颜色是由物体运动的不同模式造成的那样。李德和康德不仅怀疑这样来解释经验能否实现,而且认为这样一门科学在基本观点上会缺乏连贯性。他们确信在这种科学中暗含有把人类当作某种机器人的想法,对此非常担忧。

---

<sup>①</sup> 洛克, J. (1632—1704年), 英国哲学家。他反对天赋观念说, 认为心灵是一块白板, 后天获得的经验是认识的源泉。著有《人类理解论》、《政府论》、《教育漫话》等。

李德反对将心理学视为一门科学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把真实的人类信念或经验简化为事物或运动——所谓心理中的刺激印象，就必须把所有对心理之外事物的知觉简化为心理的内部状态。但是，对外部事物的知觉与拥有这些感觉不是同一回事。尽管我把花园中的玫瑰花知觉为美丽的东西，但我仅仅感觉到它的触觉、颜色和气味。笛卡儿主义的心理学家认为，有关玫瑰花是客观物体的信念和感觉印象导致知觉的信念，都来自于刺激对大脑的物理作用以及心理中形成的与之相关的主观印象。而晚些时候的英国哲学家詹姆斯·斯特林<sup>①</sup>写道：“皮肤对荆棘一无所知，它知道的是擦伤。”李德解释到，对于擦伤的研究可以被简化为原因和结果，就像任何优秀的牛顿式的科学那样简化为物体和运动。那么，研究如何感受这种擦伤就是对物理原因所导致的心理结果的研究。然而，研究荆棘以及我们对它们持有的信念——或者说对所有知觉到的物体的信念——并不能简化为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的分析。

李德并不反对区分刺激、感觉和知觉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相反，正是李德使这三个概念具有现代的意义，并且由此引发了19世纪许多相关的争论。李德认为不可能解释这三种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尤其反对那些试图对感觉作假设性的因果描述的理论家从事解释知觉信念的工作。毕竟，当一个人感觉到擦伤时，有许多东西可能引起擦伤，一个小刺，特别是玫瑰花丛中的一个小刺，仅仅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无

---

<sup>①</sup> 斯特林，J. H. (1820—1909年)，英国哲学家。曾任外科医生，后致力于黑格尔和康德哲学的研究和介绍。著有《黑格尔的秘密》、《哲学和神学》、《康德教本》等。译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

论如何，感觉到擦伤是不能等同于知道存在有一个小刺。然而正如李德指出的那样，许多心理学理论家能够进行工作完全是因为他们秘密地且错误地用认识（knowing）来代替了感受（feeling）。后来的威廉·詹姆士指出这一类的错误是心理学家的错误。

李德看来，心理学的终极事实是目的论的：上帝这样安排了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来接受特定的刺激，于是我们的身体感受到特定的感觉而我们的心理则形成特定的知觉信念。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同样有趣的是，李德认为我们各种有生命的、有意识的特性之间的关系也是神发明来帮我们适应神的其余创造的。像康德一样，李德认为还是需要描述性的心理学来阐明自我对世界适应的模式，但他甚至否认存在实验性的并且基于因果关系的心理科学的可能性。

## 第二节 经典的形而上学

如果经验是心理中的基本观念，并且如果一个人可以区分感觉数据与知觉信念，那么李德的结论将是不可动摇的。这样，一门研究因果关系的实验性科学就可能得到发展以用来研究感觉印象的形成——但这门学科却无法与知觉信念的研究相联系。有关刺激或我们对刺激的心理反应的实验研究至多只能是我们理解知觉信念的外缘。但是，如果经验不是被局限在心理之中，情况又会怎样？如果知觉信念独立于感觉印象（当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信念或意识的来源时），情况又会怎样呢？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年轻的柯勒律治还



有雪莱都在思考对李德的框架作出这样的改变。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唯物主义的潜在心理学潮流，李德和康德之后的下一代官方哲学家感到不得不宣称这二位理论家所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部分地因为李德和康德之后的这些理论成为了 1815 年至 1848 年期间整个欧洲的讲坛上以及专业职位中的既定的学说，我将其称为经典形而上学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经典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常被轻蔑地称为官能心理学 (faculty psychology)。它的观点是说上帝把人类心理塑造成许多不同的器官或官能，每种官能都有自己的活动模式。在多数情况下——甚至可能在所有情况下，官能需要通过物质的刺激、物质的过程或同时通过这两方面显现出来。李德所谓的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上帝通过怎样的安排使得感觉印象上升为知觉信念被转化成为这样的学说，即认为每种官能体现了一种上帝赋予的心理与物理过程之间的关联——也就是物理感觉与心理知觉之间的关联。

颅相学的创始人弗朗兹·约瑟夫·加尔<sup>①</sup>至少在 1810 年以后就是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开展工作的。他构想心理可分成从记忆、推理到贪婪、自爱等许多器官或能力。他把大脑认作是心理的工具：人格不同的人的大脑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这是因为特定心理力量的活动会引起物理器官及其形状的改变。相应地，大脑生长的差异会引起头盖骨的形状及形态的微小改变，而研究这种现象的细心的学生就能从头盖骨上发现这种变化。这样，有名的“颅相学中的隆起”

---

① 加尔, F. J. (1758—1828 年), 德国解剖学家。他提出人的才能和本性与大脑的特定区域有联系的理论, 是颅相学的创始人。

(phrenological bumps)就是心理活动的间接征候,而大脑的大小变化则是心理活动的直接征候(就像一名健身者的衣服变得宽松了是他锻炼成果的间接征候,而他胸部发达则是直接征候)。进一步说,精心的自我控制可能使人改变所有这些心理器官中力量的平衡,从而逐渐改变人的头颅的形状。加尔的颅相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李德一派的,因为他也像李德一样怀疑能否这样来研究心理状态。然而,加尔显然比李德更愿意探讨物理状态(头脑状态)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可能关联。而所有其他的人似乎也喜欢探究这些不可能的东西。的确,康德和李德可能是仅有的两位坚持认为不可能揭示物质与心理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家。

29 后来的许多思想家,甚至包括那些强烈反对颅相学的人,仍然在使用这种来自经典形而上学的相关联的研究框架。因为经典形而上学不允许进行因果关系的研究,所以许多19世纪心理—大脑的理论继续沿着相关研究的路线前进。在探讨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同种族之间在心理结构上的差异时,常常根据的是这些群体成员所表现出的物理特质的差异。“放荡的”生活方式的结果,例如服食鸦片和过度饮酒,也在这种框架下开始得到研究的。

李德和康德对心理学揭示因果关系的批判就是这样被克服了,这种批判主要用来与那些反对经典形而上学的人们进行辩驳,而极少用来指责经典形而上学本身。唯物主义者总是可以被指责为试图给那些不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的事情以因果关系的解释。但19世纪早期的各种流行的官能心理学(通常称作道德哲学,有时甚至称作道德科学)却极少受到这样的指责。

李德曾批判过观念的联想学说的各种说法。这一学说坚持知觉信念是感觉的函数——就是说，观念是来自不同感觉状态的印象相联系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建立相似的感觉数据之间联系的一种机械规律可能足以解释如何从感觉印象上升为知觉。根据这个理论，对一个小刺的知觉可能是对一系列的擦伤(感觉)以及其前因后果的联想。到18世纪80年代，联想主义早已成为心理学思想中的主要倾向，但李德却指出联想主义的思想是空洞的。所谓的联想的机械规律不能解释那些可排除不适当的感觉并将适当的感觉引导到一起的知觉信念。想一想你亲身经历中的一些小事，比如颜色斑点、光的散射以及一些视觉运动中的错觉。联想的机械原理——例如接近性或连续性——几乎无法用来解释人如何感受完整的视觉世界。两个接近的颜色斑点可能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物体，而且可能参与不同的事件。当有六位舞蹈演员在你面前表演“天鹅湖”时，你是根据什么机械原则来对视觉数据进行联想，以区分这六位芭蕾舞演员并跟踪其中每一个的动作？你又怎样来说出哪一个感觉是来自哪一个舞蹈演员的？李德认为正是知觉帮助我们正确地对感觉进行划分和联想，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这恰恰是联想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尽管李德的观点很有力度，但是苏格兰学派的下一个时代的哲学家——托马斯·布朗<sup>①</sup>和杜伽尔德·斯图亚特<sup>②</sup>——基本上接受了

30

---

① 布朗，T. (1778—1820年)，英国哲学家。苏格兰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心理或灵魂是统一的，反对英国经验主义者提出的心理只能由经验所构成的观点。著有《人类心理哲学讲义》等。

② 斯图亚特，D. (1753—1828年)，英国哲学家。他受李德的影响，成为了苏格兰学派的领袖。著有《人类思想哲学原理》等。

联想主义而忽视或误解了李德的反面意见。

### 第三节 维克多·库赞：

#### 经典形而上学主义者的一个典范

维克多·库赞<sup>①</sup>的职业生涯揭示出了 19 世纪初期经典欧洲形而上学的许多特点。库赞是处于不断修正中的苏格兰通俗哲学的倡导者，他主要通过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以及美洲。在保守的后拿破仑时期法国政治的沉浮荣辱中，库赞逐渐成为梯也尔的教育大臣，从而对下一个时代法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更为巨大和直接的影响。

- 31 整个启蒙时代，甚至到拿破仑时代，法国心理学一直是洛克思想的阵地——就是李德所批评的那种思想。例如，在 18 世纪中期，孔迪雅克<sup>②</sup>认为人的心理充斥的只有来自感觉的观念以及那些观念的微弱的影像或记忆痕迹。他声称所有复杂的思维、情感和信念都必须采用观念联想的术语来进行解释。部分由于康德的影响，有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曼-德-比朗<sup>③</sup>开始发展与孔迪雅克以及其追随者的观点相反的经典形而上学理论，他成为 19 世纪意念学派 (*idéologues*) 中的一员。意念学派自称感觉数据本身不能累积；它们需要借助对

---

① 库赞，V. (1792—1867 年)，法国哲学家。著有《哲学札记》、《论真美善》等，体现出他的折衷主义哲学思想。

② 孔迪雅克，E. (1715—1780 年)，法国哲学家。他认为所有知识的基础都是感觉。著有《论人类知识的起源》、《感觉论》等。

③ 曼-德-比朗 (1766—1824 年)，生平不详。

外部世界的积极注意才能聚集在一起。比朗更进一步地强调了人除了拥有注意和观念之外，还拥有意志。他开始更多地把意识等同于意志，而不是等同于感觉输入，这一要点得到了后来的法国思想家的强烈赞同。保罗·鲁瓦耶-科拉尔<sup>①</sup>是曼-德-比朗的最早追随者，尽管他在18世纪90年代当过波旁王朝的间谍，但他在1811年成为了巴黎的哲学教授。鲁瓦耶-科拉尔基于李德、斯图亚特和其他苏格兰学派的理论，也吸取了曼-德-比朗的一些观点，提出了“知觉哲学”(philosophy of perception)。正是鲁瓦耶-科拉尔给库赞带来了他第一次职业的变迁。

库赞于1813年开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其后一直在那里执教。但是，在1815年，鲁瓦耶-科拉尔有些令人吃惊地选择了显然毫无准备的库赞来接替他在巴黎大学的讲席，库赞在那里工作到1820年。在那个时期，库赞对德国理想主义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对弗里德里奇·谢林<sup>②</sup>和G. F. 黑格尔的著作很有兴趣，他拜访了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德语国家的思想家。他所谓的折衷主义就这样诞生了，他试图以此整合所有以往哲学中的精华。(为什么在库赞渴望寻求苏格兰哲学与黑格尔观点之间的联系的同时，杜伽尔德·斯图亚特却完全被黑格尔的观点挫败？这是一个有趣的且尚未解决的问题。)

1820年发生的贝里公爵暗杀事件引起了遍及法国的紧张

---

① 保罗·鲁瓦耶-科拉尔，P. (1763—1843年)，法国哲学家。法国王朝复辟时期(1814—1830年)教条主义(doctrinaires)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孔迪雅克的感觉论，提倡英国李德所创立的苏格兰学派哲学。

② 谢林，F. (1775—1854年)，德国哲学家。早年受费希特和康德的影响，对浪漫主义有重要贡献。最重要的著作是《先验唯心论体系》。

状态，巴黎高级师范学院被关闭了。在随后的八年中，库赞像18世纪的学者那样，不得不到贵族家庭去做家庭教师。他还蒙受了1824年被普鲁士当作法国间谍逮捕的耻辱（黑格尔帮助他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在1828年，库赞才回到了巴黎大学的讲坛，并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之后，成为了议员和院士。

库赞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教育家。他关于哲学史的著述也像他的朋友黑格尔的著述那样广泛，影响了人们对于哲学观点的演化过程的思维方式。库赞和黑格尔都把现代哲学看成是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之间的一种辩证的论战。在库赞之前，这种将欧洲大陆的思想与英国思想进行对比的尝试会被认为是头脑有问题。而在此之后，大多数哲学史的教材都追随了黑格尔和库赞的观点，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重新注意与此相反的一些观点。

库赞攻击从孔迪雅克到意念学派的法国洛克主义思想，他的批判让我们想起李德的批判。李德坚持，洛克主义者（实质上是笛卡儿主义者）“观念的路线”（way of ideas）会导致唯物主义。洛克主义者认为心理状态就是有关物理原因导致的33 效果的观念（物理原因就是刺激以及它们在身体和大脑中留下的印象），而库赞则认为，这种看法除非被狄德罗<sup>①</sup>或者更差些的霍尔巴赫<sup>②</sup>给出了那种唯物主义的解释，否则是毫无意义的。就库赞而言，观念最好是被禁锢在头颅中，在那里就

---

① 狄德罗，D.（1713—1784年），法国哲学家、美学家。他是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

② 霍尔巴赫（1723—1789年），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自然的体系》、《自然政治》、《社会的体系》、《普遍道德学》、《揭穿基督教》、《神圣的瘟疫》等。

可以毫无危险地认为它们是非物质的；任何对经验或知觉作更广解释的企图都必须被驳斥。库赞就这样把贝克莱主义或休谟的现象主义与唯物主义等同起来，这种解释在现代的学习哲学的学生看来是惊人的愚钝。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这种混淆仍很流行，例如贝克莱主义者T. H. 赫胥黎<sup>①</sup>竟然因为他的“唯物主义”而遭到广泛地攻击。

库赞在关于18世纪哲学的讲座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他的《心理学的元素》一书中也提到过，该书与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文集》展开了非常时髦的一章一章式的论战。尽管库赞在名义上赞同李德对洛克的批评，但他像每个其他的经典形而上学主义者一样，不能完整而连贯地阐述李德思想与洛克认识论的不同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库赞对李德关于知觉为何与感觉相互区分且相互独立的理论所进行的解释性补充。李德曾反对将引起感觉的物理印象与心理印象混淆在一起；因为那种做法虽然看起来好像在批评那种认为观念仅仅位于大脑皮层的观点，但它却为某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开辟了途径。由于库赞没有很好地理解李德的观点，因而使库赞所进行的补充显得更加软弱无力并且使他对李德的解释也歪曲了。

库赞把李德理论中知觉这个通常概念转变成一种几乎神秘的有关现实的直觉观念（汉密尔顿<sup>②</sup>、曼塞尔<sup>③</sup>等以后将要

---

① 赫胥黎，T. H. (1825—1895年)，英国生物学家。第一流的达尔文主义解释者。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等。

② 汉密尔顿，W. (1730—1803年)，英国外交家和考古学家。曾致力于庞培古城的发掘，对火山进行过研究，还撰写了有关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物的文章多篇。

③ 曼塞尔，生平不详。

讨论的人物同意了库赞的观点)。对李德来说,因为上帝塑造了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使得我们能够知觉周围的事物并利用它们,所以知觉是可能的。而对库赞来说,是由于上帝赐予了智慧或者推理的心理力量,这种心理力量可直接获取普遍性原理,知觉才成为可能。在反驳洛克对狂热(enthousiasm)的批评(《人类理解论文集》, book 4, sec. 19)时,库赞赞扬了苏格兰学派的哲学(或者说是他所认为的苏格兰学派的哲学),他说:“通过推理对真理自发的直觉,是尽可能独立于人格和感官、归纳和演绎的。”照库赞的说法,通常意义上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就变成了 19 世纪正统权威的狂热的直觉。在李德看来,对外部世界的知觉是与感官密切相连的,且基于经验而不是推理的;但库赞却顾及了宗教和道德正统说法,将对外部世界的知觉扭曲成通向真理的准神秘的通道(quasi-mystical access)。这就是库赞最大的贡献,1848 年以后唯灵论在整个世界的散布反映出这一点。

## 第四节 经典形而上学的兴起

经典形而上学——康德和李德认为它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费希特<sup>①</sup>和许多德语世界的人们发展了后康德主义对灵魂力量的分类法,并开始探究灵魂的机制。在法国,李德对鲁瓦耶-科拉尔的影响

---

<sup>①</sup> 费希特, J. G. (1762—1814 年), 德国哲学家。著有《试对一切启示的批判》、《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知识学引论第一篇》、《知识学引论第二篇》、《论学者的使命》、《论人的使命》等。



响以及康德对曼-德-比朗的影响甚至在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前就击溃了洛克的心理学。法国版本的通俗哲学是从拿破仑以及重新上台的统治者的摧残下逃生的少数学说之一。此时,杜伽尔德·斯图亚特在苏格兰的影响还很大(在欧洲大陆也是如此)。这种经典形而上学或官能心理学成为整个欧洲——巴黎、那不勒斯、维也纳——以及遥远的哈佛学院的哲学课程的特征;它在19世纪20年代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占据了显著位置。在欧洲,有关心理活动观点的讨论就像在1815至1830年以铁腕来统治欧洲各国的反动力量之间进行的讨论一样内容广泛而且争论激烈。<sup>35</sup>

无论在哪里,学生们都被告知人类的心理不仅拥有知觉的力量,而且拥有直觉的力量,而这些直觉的力量使我们可以通达伟大的宗教道德真理。这种心理科学(所谓的道德哲学或心理哲学)与正统学说以及维持整个欧洲古老政权的文化影响紧密联合在一起。在美洲,它与惟一神教派和共和政体以及正统的新教和联邦制度联合在一起。尽管它的门徒们使用了来自于李德和康德的词汇和概念,但是这种新的心理科学——我所说的经典形而上学——却与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所设想的心理学相距甚远。

1830年之后,支持经典形而上学的统一战线,在新的哲学立场、特别是生理学的发展以及对神经和心理的实验分析的发展的影响下开始动摇。无论如何,应该感谢库赞的折衷思想以及大不列颠新一代苏格兰学派思想家的努力,直到1848年,经典形而上学仍然具有活力。尽管在别的问题上争议颇多,但是讲法语的、讲德语的以及讲英语的经典形而上学的支持者都渐渐赞同库赞的直觉主义在心理学理论中占有一

席之地，尽管它是一种会使康德和李德感到不安的貌似神圣的先验论。不仅如此，这种直觉心理学在相当多作家那里找到了归宿：右翼的黑格尔学派，库赞和他的法国追随者，英国的威廉·休厄尔<sup>①</sup>，威廉·汉密尔顿以及遍布不列颠和美国的许多追随者。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本不涉及与库赞的直觉主义有相关内容的道德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教科书。

约翰·阿伯克龙比<sup>②</sup>的《对智力力量与真理的发现的研究》(*Inquiries Concerning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ruth*)是一本有代表性的教科书。这本由医生执笔的心理学教科书首次出版于1830年，而后再版数次，在美国至少有两个盗印版。这本书被用作大学的教科书，尤其是在美国。非常有趣的是阿伯克龙比在书中试图忠诚于李德却没有做到，这是因为他热中于批判某些(没有明确指出的)思想家的唯物主义。

阿伯克龙比与许多其他的经典形而上学主义者不同，他更为有力地支持了李德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攻击：“心理不能与自然界的任何事物相比较，它受其创造者所赐而拥有感知外部事物的力量；然而它感知外部事物的方式却是超出我们的理解力的。”(第25页)尽管阿伯克龙比提到对心理的自然主义解释超出我们的理解力，但他毕竟提出了与库赞或杜伽尔德·斯图亚特稍有不同的看法。他的出发点是主流

---

① 休厄尔, W. (1794—1866年), 英国学者。曾在剑桥担任过矿物学教授和道德神学教授。著有《归纳科学史》、《伦理学要义》, 以及论述潮汐、电和磁的著作。

② 阿伯克龙比, J. (1780—1884年), 英国医生、哲学家。

的笛卡儿原则，即物质是特性——固体性、延展性、可分割性——的组合，而且这些特性可以被感官感知。在另一方面，心理具有思维和意志的特性，它们是由内部感官（阿伯克龙比将其等同于意识）来觉察的。接下来，他回顾了杜伽尔德·斯图亚特曾应用物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来摧毁心理学中的唯物主义。阿伯克龙比与斯图亚特一样，委婉地提到 18 世纪的拉古萨科学家兼牧师 R. 博斯科维克<sup>①</sup>的工作。博斯科维克，后来被称为物理学中的场论的奠基人，表明牛顿式的理论可以根据一个假设重新建构，这种假设认为根本没有物质存在，而世界最小的“元素”是无限小的相互排斥的点。37

斯图亚特曾把博斯科维克的这一理论当成拐棍来攻击唯物主义者，而阿伯克龙比——尽管他否认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的联系——也急切地沿着这条路追随他，他引用了斯图亚特的说法：“我们所知的所有真理中，心理的存在是最可以肯定的。甚至贝克莱有关物质不存在的理论体系也比认为宇宙中只有物质存在的观点更容易被想像到。”（第 30 页）看来，尽管李德提出的我们不能了解心理的物理本质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认识到唯物主义者对心理物质本质的看法却是错误的——甚至比理想主义者错得更严重！作出这种推断的伎俩就是毫无保留地接受阿伯克龙比对意识或内部感觉的陈述，却批评对其他感觉的陈述。阿伯克龙比坚持认为我们能够知道在大脑与心理之间有“奇妙的联系”，而我们却无法了

---

① 博斯科维克，R.（1711—1787 年），克罗地亚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对光学，特别是消失色差的实验研究，有一定成果。他提出“动力原子论”，认为特殊力的中心，即绝对不可分的、没有延展性的、散布在无限空间中的点是物质的、第一性的元素。著有《自然力的统一规律的自然哲学理论》等。

解这种联系的本质；我们最好给这种观点打上折扣。因为尽管阿伯克龙比谨慎地试图正确地把握李德的观点，但他像所有的经典形而上学主义者一样，为了克服“无法想像的”“宇宙中除了物质之外一无所有”的理论而最终支持了某种理想主义的科学心理学，虽然阿伯克龙比及其他大多数经典形而上学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是这种理论的倡导者。

经典形而上学有着不一致和不合逻辑之处——正如康德和李德所警告的那样——但它足以起到支撑正统宗教观点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内部感觉的特殊处理及其带来的困扰仍在折磨着 20 世纪后期的哲学。

## 弗兰肯斯坦的科学

尽管梅特涅亲王<sup>①</sup>和他的同伙努力从事反动活动，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铲除有关社会的本质与个体心理学的进步思想。虽然大多数学院设置的课程和教科书仍追随着李德式的或康德式的心理学，就是我所说的经典形而上学，但与此同时，以流动唯物主义(fluid materialism)为普遍特征的非学院式的另一种心理学<sup>②</sup>(alternative psychology)也在广为流传。它根植于富兰克林的电的双向流动理论，以及麦斯美的动物磁性理论、伽伐尼和伏特竞相提出的有关动物组织电现象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一些思想家逐渐地设想对电的理解——或者可能是神经中某种其他的微小流体——会揭开生命和心理的秘密。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可能是这种唯物主义心理学最早的倡导者，而他却受到了围攻，首先是康德，然后英国权威组织

---

① 梅特涅，K. (1773—1859年)，奥地利政治家。1809年被任命为奥地利外交部长。曾在维也纳议会中起重要作用。

② 这里是指与正统的官方心理学相对立的主要由伊拉斯马斯·达尔文提出的一种心理学。为了强调它与官方心理学的区别，特译作另一种心理学。在本书中，这种心理学有时还被称作潜在心理学(underground psychology)。

的暴徒将他逐出国门。正是普里斯特利将联想主义（取自于大卫·哈特利<sup>①</sup>的工作）置入唯物主义心理学的中心，并开创了心理学和生理学领域中探寻神经过程和神经通路之间的联想的传统。但是联想主义就是联想主义。普里斯特利的联想主义提出观念的联想是心理活动中的主要力量，这种观点与从洛克延续下来的传统主流思想是高度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普里斯特利强调哈特利的观念联想的观点而不强调他把神经振动作为联想的基础的观点是在为**39**主流心理学服务。（在普里斯特利编辑的哈特利的著作中，有关神经振动的所有讨论都被删掉了。）尽管经典形而上学主义者有许多不一致的意见，但是他们普遍都赞同普里斯特利的这种不惜牺牲对神经机制的研究而强调观念的联想的做法。观念的联想看似对心理学很有用，但如果观念的集中实际上是由神经系统中的物理机制所决定的话，那一定是一种可怕的机制。伊拉斯马斯·达尔文作为普里斯特利的**朋友和同事，却没有追随普里斯特利的想法，他利用了18世纪90年代可能获得的最先进的科学信息，试图更新哈特利的生理心理学。**

## 第一节 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另一种心理学

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动物学》（第一版出现于

---

<sup>①</sup> 哈特利，D.（1705—1757年），英国哲学家、医生和心理学家。他把心理学与生理学密切结合起来，提出了感觉与概念系统互相联系的理论，成为从休谟到穆勒和斯宾塞的联想主义的组成部分。著有《对人、其结构、职责及期望的观察》。

1792—1794年,但随后有许多版本在整个欧洲发行)开创了真正的另一种心理学,后来随着他的诗歌《自然天堂》(1803)而得到普及。在《动物学》中,达尔文把观念定义为我们感官中纤维的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的模式。在书后的附录中,他进一步指出那种认为观念仅仅是心理事件而不是日常本性的一部分的理论完全是一种神话故事。达尔文不仅受过医学的专门训练,而且是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他的科学的特点具有一种不要做无意义事情的态度,甚至他那富有英雄精神的诗句也表现出这种态度。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革新与他对观念的新定义有关。他认为思想所中介的物质是相关神经纤维的运动。心理并不需  
40  
要先与感情或感觉接触然后再形成观念;进一步说,心理就是身体以及它所感觉到的一切。如果观念是所有体验到的感觉(不仅仅是身体感觉的皮层印象),那么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有大量的不同观念。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心理概念与传统的灵魂理论不同,它允许心理多元化,心理甚至可以像身体那样自身还可以分割。达尔文乐于接受联想的规律(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学原则),但他认为联想受制于身体机制而不是观念本身,当然更不是神圣的灵魂。他揭穿了所有这样那样的“神话故事”,致力于说明怎样根据疾病对身体状况的破坏性影响,包括对神经联想的破坏性影响,来对疾病进行分类。他认为大多数疾病都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饮食、锻炼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治愈——尤其对妇女来说,还包括足够的非强制性的性交。在当时这是相当进步的医学见解。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没有谈到原罪。正统思想的卫士们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对老达尔文提到与未提到的内容都进行了道貌岸然的

攻击。

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理论暗含着那种认为我们的观念(心理状态)的起因是不可知的主张,于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恐惧。年轻的托马斯·布朗(下一章我们要讨论他的深思熟虑的工作)在他颇受欢迎的《对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动物学〉的观察》(1787, p. xx)一书中痛击了流动唯物主义。他写道:“唯物主义体系主要是以一种信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这种认为我们熟识因果关系的本质的信念却是毫无根据的。”虽然唯物主义者和心理主义的反对者都认可原始感觉的存在,可是“心理主义者知道自己忽略了引发观念的东西<sup>41</sup>的本质……与此相反,唯物主义者则坚持自己不仅仅意识到观念还意识到引发观念的东西的本质。”用李德的话说就是:我们感觉到刺痛但知觉的却是小刺——假设我们可以直接意识到被刺痛的感觉而且仅仅推断出小刺的存在。当然,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是什么引发了我们的观念,那么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时间只能是短暂的——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一些19世纪“新的”并且表面上科学的心理学,却是为了维护间接知觉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李德坚持认为我们可以直接地知觉观念的起因,他曾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可能去科学地分析这种能力。19世纪科学心理学家则坚持认为我们不能直接知觉我们观念的起因,但竟然提倡对这些起因进行科学的分析。

即便普里斯特利意义上的观念的联想能够得到心理学的接纳,达尔文的那种强调身体和能量的唯物主义的联想也很可能不被接纳。威廉·布莱克<sup>①</sup>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1793)一书中借恶魔之口说出了一些达尔文思想的东西,



例如：

1. 人类不具有与灵魂不同的躯体，因为身体就是可以通过5种感官来分辨事物的灵魂的一部分，身体就是此时灵魂的主要入口。

2. 能量是惟一的生命，它来自身体；而推理则处于能量的边界或能量的外围。

3. 能量是外部的、能使人愉悦的东西。

布莱克，伟大的唯信仰论者，赞赏这些观点并痛恨那种认为“上帝将因人类追随他的能量而让人类永远苦痛”的正统思想。但在那个年代，极少再有其他人追随这样的异端思想。

老达尔文的流动唯物主义有四点主要的意义威胁到已建立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在达尔文理论的背景下谈论灵魂，像布莱克以及一些后来的浪漫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灵魂遍布全身。然而，这一假设首先意味着尽管灵魂可能具有物理上的连贯性但它却缺乏心理的统一性，其次这意味着甚至于内脏的感觉都可以得到与理性思维同样的待遇。在正统的思想家看来，达尔文的理论无法清楚地将身体的色欲与理想的爱区分开来，于是整个已建立起的心理状态的等级结构受到了威胁，这第三点意味着他的理论有抹杀动物与人类之区别的危险。实际上，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像他更为著名的孙子一样，倾向于强调动物与人的连续性（尤其在他最后

---

① 布莱克，W. (1757—1827年)，英国诗人、彩画家、版画家和神秘主义者。著有《诗的素描》、《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洛斯之歌》等。

一部著作《自然天堂》中)。第四点,这一理论没有为心理活动留出自己独有的领域。所有的思想都通过我们的感觉和反应体现出来;这样,似乎没有给不灭的灵魂留下空间。他使得人们甚至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立场上,认为大脑仅仅是灵魂内部的情感和思想的物理工具,因为只有承认思维的全部对象是心理事件,而不是达尔文的理论中所说的神经的状态,才能够站回到以前的立场上。

要确定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观点在欧洲传播的范围有多广是比较困难的。在拿破仑时代的期刊文献中,甚至在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德语的文献中,他的名字都经常被提及。他的传记作家,戴斯蒙德·金-海莱(Desmond King-Hele)可能过高地评价达尔文为19世纪初期欧洲最伟大的科学知识分子——但是,那时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谁曾是达尔文的对手?甚至在法国也难以找出谁可以真正和他竞争。虽然在现代人的眼里他的形象有些模糊了,但却不应因此而忽视达尔文的流动唯物主义,在最低意义上说,它是1789至1815年期间主要的生理学与心理学理论之一。

- 43 我确信是由于形式上的特殊性才导致了达尔文对后来的心理学的影响受到忽视。在1815年之后,达尔文思想的反对者谨慎地不提他的名字或著作。而且,因为没有主流思想家采纳他的观点,在数世纪中,他仅仅是匿名攻击的对象,至少“官方思想家”是这样做的。然而,到了那个世纪中叶,可以清晰地看到达尔文思想以这样的模式得到了最终的接受:所有达尔文有关无意识的概念而不是有关意识的概念……被认为是正确的。他对事实的阐述以及他的思想就这样被驯服了;如果这些思想不用于有意识的心理,它们就不会影响到灵魂。

但是尽管我这里谈到了达尔文的另一种心理学被接纳或同化的过程,但我所使用的术语可能会引起误解。总的看来,特别在 1815 年之后,整个欧洲教会和政府的官场上都是在全力攻击他的理论。这不仅仅是一场观念的战争。如果一个人想维护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思想,就不可能在欧洲或美国得到一个教授的职位。1815 年之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出版这样的观点是要受到监禁的。因而,在介绍极少数达尔文思想拥护者的所作所为之前,有必要谈一下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 第二节 禁止心理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

拿破仑败北之后,政府和宗教的权威们(常常是同一批人,就是那些几乎总是勾结在一起的官僚们)极力阻止与老达尔文的观点相像的那类思想的传播。检查制度、告密者以及非常活跃的警察势力在 1815 至 1830 年期间的各个欧洲国家 44 中司空见惯。权威们要破坏泛神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些权威所有假定的敌人——以及与之相随的流动唯物主义。一些历史学家曾认为有关颅相学和麦斯美术的新兴科学尤其受到攻击。我坚持认为这些思想之所以受到怀疑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流动唯物主义有相似之处。当第二代麦斯美术者放弃了麦斯美所认为的物理的(磁的)力量是麦斯美现象的根源的观点,当第二代颅相学者提出了中庸的先天论,并与经典形而上学的本能与直觉的观点结合起来,这些理论家和他们的观点即便没有成为精英们的论据,也得到了广泛接受。而对于

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学说的继承者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

与麦斯美术者或颅相学者相反，那些提倡在自然科学的框架中研究生命和心理的人却遭到了指控，甚至在当时最自由的大不列颠也是如此。这种压制最重要的例证之一便是威廉·劳伦斯<sup>①</sup>，一位出色却激进的外科医生（他很快成为煽动性的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的编辑，而后当他逐渐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时，成为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外科医生）。劳伦斯是 F. X. J. 比夏<sup>②</sup>的追随者，比夏认为对电和其他物理力量的研究将最终揭示神经结构和心理功能之间的联系，从而产生一种有关灵魂的自然科学。劳伦斯相信这就意味着疯狂不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如果可以治疗的话，也只能通过道德说服的方法），而是一种心理的疾病，就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通过医疗就可能治愈。在 1819 年，劳伦斯写出了一本著作来阐释他的观点——《有关生理学、动物学以及人类自然历史的演讲》。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本书被宣布为亵渎了神灵，而且遭到了大规模的攻击。医学机关中的领导人物要求皇家医学院强制劳伦斯放弃所宣称的对神灵的亵渎并离开教职。劳伦斯收回了这本书，而且丢掉了他的讲师职务。

几年以后，《有关生理学、动物学以及人类自然历史的演讲》一书的盗印本开始出现。1822 年，劳伦斯试图以法律手段阻止他们的出版。在著名的审判中，艾尔顿主教发现劳伦斯

---

① 劳伦斯，W.（1783—1867 年），生平不详。

② 比夏（1771—1802 年），法国医生、生理学家。他是组织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著有《生命与死亡的研究》、《普通解剖学》、《描述解剖学专论》等。

在这一问题上毫无发言权，因为英国的法律不保护那些责难圣经的人。最后，至少出现了9种盗印本（亵渎神灵的医书在当时比普通的医书要好卖得多）。

后来与《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结婚的波西·雪莱，也是威廉·劳伦斯的病人之一，由于政府对其著作的压制面临着更糟的问题。1813年雪莱印刷并发行了250本他第一首伟大的浪漫主义诗歌《麦布女王》。在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诗歌及其理论的影响下，这首诗也有附加的散文注释，这些注释相当于一系列有关共和制、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心理学这些遭到禁止的主题的论文。年轻的诗人写道：“每一粒原子在整体上和在部分上都具有知觉能力。”波西·雪莱公开认为应把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对待，而且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是探寻因果规律的科学；“如果必然性的原则是错误的话，人类的心理就不再是科学的合理对象；离开了原因我们将无从期待结果。”而李德和康德曾使用这一论据来攻击科学心理学并维护人类的自由，雪莱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门真正的心理学会认识到动机仅仅是一些复杂的原因，因果规律是可以辨别出来的。他说，在那些行为看似没有缘由的地方，“这是那些我们还不熟悉的原因所造成的结果”。他指出科学心理学要“给已建立起的道德观念带来伟大的变革……宇宙中无善恶之分，而我们之所以如此区分事件，是与我们自己的存在方式有关。”

雪莱总是能够犀利地看到他的哲学观点所暗含的意义。尤其是，他乐于强调这种道德心理学将亵渎婚姻的神圣而使得离婚合法化——明确地阐释这一意义不仅惹恼了正统的读者还影响了他自己的行为。婚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根本不

是天定的，“[它的]价值是通过它所能带来的快乐感觉的数量来评估的……两性之间的联系在如此长的时间被神化了，[仅仅]是因为它有利于群体的舒适，在它的弊大于利时，自然地就该断开。”

这些观点冒犯了知识界和宗教权威。把婚姻视为两个个体自愿的结合就像违背神命的政府和圣礼一样罪不可赦。但是雪莱用他所有的作品来提出甚至更为激进的观点，即这种自愿的结合要比官方的结婚典礼更为神圣。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H. 海涅在他的《赛拉芬》的第七部分也提出了类似的异端的观点：

在这座山崖之上  
我们要依据第三部  
圣约建立我们的教堂；  
痛苦已完全结束。

多年来迷惑我们的二元，  
这已经不成问题；  
令人讨厌的肉体痛苦  
到头来也已终止。

47

你听到上帝在黑暗的海里  
用无数声音谈话？  
你看到我们头顶上面的  
上帝的无数光华？

神圣的上帝存在于光中，  
也存在于黑暗里；  
上帝就是存在的一切，  
他在我们的亲吻里。

(钱春绮译)

而雪莱的思想则超出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意象，他对人类所有的日常活动感兴趣，而不仅仅是爱或者性。他对科学和医学钻研很深，在达尔文的引导下，他确信饮食与健康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联系。正是出于这一缘由，许多雪莱对心理学含义的深刻讨论中会涉及到他的素食主义，《麦布女王》的注释中也有大量的篇幅在解释这种观点。雪莱像 40 年之后的费尔巴哈<sup>①</sup>以及其他德国唯物主义者那样，认为食物的摄入是一个人的身体结构中的关键成分，恰当的饮食不仅是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基础，而且也是形成具有受教育以及创造世界的能力的进步个性的基础。哲学史家常常带着讽刺的意味提到费尔巴哈极端的唯物主义，即用他的话描述为“man ist was man isst”（我们就是我们所吃的东西）——但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理解一下这种整个 19 世纪中期广为流传的说法而不是取笑它。

雪莱的《麦布女王》被指控含有煽动性和亵渎神灵的诽谤，遭到禁止。英国政府派出间谍跟踪他和他的朋友们，阅读他来往的书信，雪莱最后不得不选择自己离开他所见到的那个无情残暴的国

---

<sup>①</sup> 费尔巴哈，L. (1804—1872 年)，德国哲学家，无神论者。著有《论死与不死》、《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对莱布尼兹哲学的叙述、分析和判断》、《从人本学观点论上帝、自由和不死》等。

家过起了流亡生活。他想方设法使《麦布女王》中的一部分得到出版以宣扬他的观点，但未能成功。像劳伦斯的书一样，<sup>48</sup> 盗印本开始出现了，其中包括理查德·卡利尔<sup>①</sup>所出的一个版本；卡利尔是一名重要的工人阶级的出版商，他一直为出版自由而奋战。尽管遭到了更多次的禁止发行与随时会有的审判，这本书仍然随处可见。《麦布女王》很快成为宪章运动者的经典。许多修鞋匠和皮匠从雪莱的著作以及他所引用的霍尔巴赫、伏尔泰、德朗蒙德、伊拉斯马斯·达尔文以及斯宾诺莎的思想中获取到自己的哲学观点。而此时，雪莱仍在提炼和发展他的观点。

看来，经典形而上学主义者与心理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倡导者之间的论战是不平等的。前者可以出版著作、教授课程以及拥有教授职位，而后者却面临着被指控、被监禁、失去职位以及被放逐的危险。1848年之后唯物主义观点在整个欧洲的迅速成功和繁荣，表明那些像雪莱和老达尔文那样的观点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与讨论，超出当时的出版物所描述的情形——尤其是得到出版的哲学著作，它们倾向于迎合学院和教会那令人尊敬的标准。哲学史家需要更多了解激进的医生和诗人的想法，当然也包括那些鞋匠。然而，这样做的确很难，由于警察间谍和告密者的肆虐使得即使在私人的来往信件中也不敢表达非正统的思想，因此在正式出版物中能找到的这些思想家的想法是非常少的。

---

<sup>①</sup> 卡利尔，R. (1790—1843年)，英国记者和激进的改革家。作为潘恩的信徒，1817年他在伦敦四处出售被禁的刊物《黑矮子》。著有《政治祷文》等。



这里将要提到一个在思想史上需要严肃考察的例证。很多人相信 19 世纪斯宾诺莎<sup>①</sup>思想的重新得到重视——主要是由于它与泛神论以及心身统一有关——是起因于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像费尔巴哈和大卫·斯特劳斯<sup>②</sup>那样的“左翼黑格尔主义者”所发起的神学讨论。实际上，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的 G. H. 刘易斯，才是在 19 世纪的英国首先正式地撰写有关斯宾诺莎的文章的人；玛丽安·埃文斯<sup>③</sup>未能出版的《伦理学》的译本紧随其后。（埃文斯后来与刘易斯住在一起，此后她以乔治·艾略特为名字出版书籍）。在本书第八章中，我们会谈到刘易斯于 19 世纪 30 年代通过 L. 亨特<sup>④</sup>参加了一群艺术家的讨论，在讨论中他才听说到了斯宾诺莎。而 L. 亨特则是流亡中的雪莱在英国主要的文学联络人，并且知道雪莱正在翻译斯宾诺莎的论著（*Tractatus*）。斯宾诺莎的观点，可能通过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心理学的诠释，或许在到达大众读者或保守的牛津和剑桥以前就影响到了伦敦的哲学观点。

---

① 斯宾诺莎，B.（1632—1677 年），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神学政治学论》、《伦理学》、《理智改进论》等。

② 斯特劳斯，D. F.（1808—1874 年），德国神学家。著有《耶稣传》、《基督教信仰理论》等。

③ 埃文斯，M.（1819—1880 年），英国作家。笔名为乔治·艾略特。1849 年她开始为《威斯敏斯特评论》撰稿。曾与刘易斯同居至他去世。著有《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房》、《织工马南》、《米德尔马奇》等。

④ 亨特，L.（1784—1859 年），英国评论家、诗人。雪莱的好友。曾编辑过《检察者》、《自由者》、《指示者》、《闲谈者》、《利·亨特伦敦日报》。著有长诗《里米尼的故事》等。

### 第三节 《弗兰肯斯坦》中的心理学

现代读者了解心理学潜在的历史的途径之一就是科幻故事。科学史家和哲学史家通常不使用故事和小说作为材料来描绘观念的传播过程。但是当所有其他的资料确实不充分时,这种方法仍是可以尝试的。

那个年代,在关于某些心理学或哲学的题材上,科幻作者与教授、医生及其他官方的理论家相比,能够出版更为大胆的言论。例如,E.T.A. 霍夫曼的小说《跳蚤师傅》。尽管书中包含有直接取自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思想,却于1822年在柏林得到了出版。在这个故事中,跳蚤师傅(他并非偶然地来自跳蚤共和国)造出了一架奇妙的显微镜,这样使得故事中的英雄佩雷格里纳斯·泰斯(Peregrinus Tyss)能够看到人们头脑中的细微之处,他能够直接从其神经的活动读出人们的思想。霍夫曼对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进行编造从而创造了许多奇异的扭曲和变化。在显微镜下,佩雷格里纳斯“看见了奇怪的血管和神经网络,而且注意到当人们情绪激昂地谈论艺术和学识时……他们的血管和神经并没有深入到大脑的凹处,而是向后蜷曲,以至于无法清晰地辨别出他们的思想。他把这些观察结果告诉了跳蚤师傅,跳蚤师傅……指出佩雷格里纳斯误认成思想的东西仅仅是一些词汇,这些词汇徒劳地在努力成为思想。”

因为霍夫曼曾敢于在这部令人愉悦的小说的手稿中取笑了一位柏林的法官,所以普鲁士警察没收了他的手稿。这本

书还没有得到出版，霍夫曼就去世了，但他的遗孀在 1822 年得到了许可将它付印——这本科幻小说去掉了对法官的讽刺却完整地保留了达尔文心理学的思想。如果这些思想采用非科幻的形式表达出来，是肯定得不到正式出版的——就像威廉·劳伦斯和波西·雪莱所做出的失败的尝试那样。

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通过她的小说《弗兰肯斯坦》讨论了有关心身关系以及道德发展的本质的观点，当时如果不是采用科幻小说的形式，这些观点是不可能公开出版的。如今学习她作品的学生普遍认识到，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在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去世以及其观点受到压制的数十年之后，《弗兰肯斯坦》为我们提供了洞悉伊拉斯马斯·达尔文追随者的思想窗口。《弗兰肯斯坦》在 1818 年出了第一版，玛丽·雪莱写这部小说的主要原因就是尝试思考达尔文心理学的含义。波西·雪莱在此书第一版的前言中写到，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实际上已经设想到创造像弗兰肯斯坦那样的怪人的可能性；而且玛丽·雪莱在此书的第三版（1831 年）的前言中介绍了她创作这本著名的小说的起因是她与丈夫、拜伦进行的一次讲故事比赛，并且再次提到是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作品 51 为她提供了许多灵感，使她产生了重新激活死亡的细胞而做出一个活生生的怪人的基本想法。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一位追随老达尔文足迹的科学家，他说道：“我被引导来研究这种衰老的原因和进程”（即活细胞的衰老），这种研究帮助他成功地“发现了世代交迭以及生命的根源”。然而，不仅仅是生命科学可以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心理学也是如此。玛丽·雪莱在对弗兰肯斯坦的怪人如何被自己的创造者抛弃进行描述时，谨慎地追随了哈

特利和达尔文的思想，展现了心理发展的历程。这个生物刚开始时说道，“毫无差别的观念占据了我的心；所有的一切都很混乱。”让这个生物感到困惑的是令他不知所措的一堆感觉。但是，其中一些感觉比其他的一些更能使他感到愉快，而且这些感觉占据了生物的心理。当这个生物亲眼偷看到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时，他产生了最有力的感觉：看到年迈的父亲为女儿演奏乐曲，这个生物“体验到了一种具有特殊的、无上的原始状态的感觉：这是痛苦与快乐的混合物，是以前从未体验到的。”玛丽·雪莱就是这样发掘出了潜在心理学中注定是最有争议的观点：即感情与观念之间的联系要比观念的起源或意义更为重要。如果心理活动是通过这种快乐主义的联想来组织的话，哪怕只是部分地这样，我们不灭的灵魂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玛丽·雪莱利用当时的流动唯物主义来说明语言和道德都产生于较弱的情感与那些来自于社会的强有力的感觉之间的联想。怪人说道：“我知觉到他们所说的词语会给倾听者的心理和面容有时带来快乐或痛苦、有时带来微笑或悲伤。这的确是一门庄严的科学，我热切地渴望熟知它。”熟知52的过程是通过这个生物建立熟悉物体以及人的名字与其指代物的联系来实现的。玛丽·雪莱像她的良师哈特利与达尔文一样，并没有努力说明这么一个经验仅仅局限于感觉的生物是如何知觉像一张痛苦的面孔这类事物的含义。她明白甚至最简单的物体或人可能具有很多名字（例如一个男孩子在家里，可能被叫做费里克斯，也可能被叫做哥哥或儿子），但这并不妨碍她坚信声音与感觉之间扑朔迷离的联系总是可以形成的。并且玛丽·雪莱还认识到，从原则上看一些联想不是在任何条

件下都能形成的：怪人发现了它能够听到一些词的声音，例如“好的、最亲爱的、不幸的”这样的词，但是他“并没有掌握这些词的指代关系”。后来的联想主义者对于此类问题也愁眉不展。

唯物主义心理学家认为要理解这些词汇必须具有关于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体验。这就是 19 世纪经验论心理学与先天论心理学的巨大冲突的发端。根据通常的形而上学，好坏、正误的知识不是基于经验的，当然也不是基于痛苦和愉快的感觉；与此相反，正如库赞、曼 - 德 - 比朗、斯图亚特这些人所写到的那样，我们每个人对于正误都有直接的直觉理解。然而，这些后来的思想家忽略了李德的有关“道德感”的看法缺乏连贯性的警告——就是说对好坏的理解是不能单独由感官实现而是需要一种额外的判断形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德本人提出了道德是来自经验的观点（他说过道德判断和道德知觉是依赖于跟 [上帝所赋予的] 直觉的行为标准相结合的经验）。尽管这一观点影响到了美国的思想家，特别是托马斯·杰斐逊，但是在 19 世纪的欧洲，这种思想已经被抛弃，甚至苏格蘭学派的后继者也抛弃了这一观点。他们采用的替代品则是经典形而上学所说的理解正误是先天的、直觉的。

尽管主流的形而上学主义者躲开了李德的经验主义伦理学，但唯物主义者很清楚其中的原因并在《弗兰肯斯坦》的故事中讲了出来。如果道德评价是来自经验的话，那么某些联想的重复模式可能会造就道德怪物——这些人从那些我们其他人认为是罪恶的行为中得到快感。最初，怪人的经验主要来自于阅读历史书籍，他感到“我心中升起了追求美德厌恶恶习的极大的热情”，正如怪人所解释的那样，这些词语应该理

解为“仅仅与快乐和痛苦有关联”。因此，当人们无法忍耐他的容貌，并且他的创造者也认为他非常可怕时，他产生出了倒转的道德观：损害人类的事情会解除他最深处的痛苦，因而也就表示着最大的快乐。

当代批评家憎恶玛丽·雪莱书中的这种观点，攻击她宣扬了错误的道德以及非道德的立场。《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的一位作者写道：“我们的胃口像我们的判断一样，讨厌这类作品；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这部作品就越糟糕——它毫无行为、礼貌或道德的教益。一位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的客体并且不认为人类拥有(经典形而上学者所说的)神圣的灵魂的心理学家就可能描绘出一幅玛丽·雪莱小说中的那种心理和道德发展的可怕景象。”唯物主义心理学威胁到了社会的道德构架。

#### 54 第四节 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与性爱经验

《弗兰肯斯坦》中的怪人很好地体现了 M.H. 艾布拉姆斯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natural supernaturalism)的观点。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和玛丽·雪莱都相信灵魂是各种力量和特性的群集——这些特性包括从基本的生命力(例如呼吸)到心理倾向(情感和思想)整个范围。我记得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醒大家反对把这种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应用到心理学中。在康德提及其对手名字的很少的几页之一中，他攻击了普里斯特利提出的身体与灵魂平等的学说。

然而，普里斯特利关于物质的灵魂的学说仅仅处于自然

主义的边缘。他的许多观点(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提出是为了符合他自己独有的惟一神论的基督教思想。普里斯特利认为原始的基督教(在基督教被尼西亚的信条“破坏”之前)是惟一神论的,而不是三位一体的,并且认为耶稣有关复活的诺言就是身体的复活。普里斯特利断言,上帝具有将人类的组成成分重新组装的能力,甚至在坟墓被破坏之后,上帝仍能如此。

尽管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创造怪人的程序可能建立在普里斯特利的异端观点之上,但是玛丽·雪莱以及她之前的伊拉斯马斯·达尔文都没有介入到有关复活的神学争论中。他们对基督教的“神话故事”中有关不灭的灵魂的观点不感兴趣。与普里斯特利的神学理论不同,玛丽·雪莱关心的问题完全是自然的,简而言之就是现代心理学中的感觉:一个新生的机体是通过什么样的自然过程来获得一个灵魂——情感、思想以及有关正误的知识?

弗兰肯斯坦的怪人非常想要的一种东西就是自己的同类。当怪人获得了思考和表达的能力之后,就要求弗兰肯斯坦为他创造一个配偶。情节的发展再一次回应了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主题思想,即性爱不仅仅是种族繁衍的基础而且是建立与他人和世界相统一、相和谐的所有心理情感的焦点。

在这一背景下,戴斯蒙德·金-海莱作为伊拉斯马斯·达尔文思想的最准确的注释者,提到了“器官快乐”(organic happiness)。这种快乐之所以是器官的快乐,是因为至少在达尔文——还有雪莱夫妇——看来,任何被分到两性的器官系统应该具有同竞争与合作、不和谐与和谐相适应的一组情感。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由于在诗歌中“人格化”植物的两性

生活而名声不佳。然而,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达尔文明显的人格化仅仅是为了表明他的观点,即性爱的情感对所有生物的心理演化都具有根本的意义。

从这些达尔文的思想源泉中,波西·雪莱似乎发展出了物质灵魂的观点,这种灵魂的每一种经验都是性爱的(erotic),正如 erotic 一词原始的希腊语本义所示的那样。在希腊语中区分了两类爱,本能爱(eros)与邻人爱(agape),在基督教来临之后这种区分用得更广。邻人爱与神恩联系在一起,是上帝对我们所有人的慈祥的爱,不论我们是否值得他这样做。本能爱则是那种激发灵魂去探索外部世界并通过外部事物完善自身的爱。本能爱驱动自我去探索事物中的美德,由于这些美德正是自我所缺乏的,因而可以融洽地整合到自我中去(看来,上帝并不需要本能爱)。对自然的超自然主义者来说——与新柏拉图主义者相反——这种探索和整合的过程是物理的;就像电或磁那样,通过以太来实现。

雪莱早期成熟的诗歌之一《阿拉斯特》就是关于经验的本质的思索,它表达出了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器官快乐的观点或者所谓的对于世界的性爱的观点。年轻的雪莱把世上所有的东西都视为爱的可能的对象,也是经验和想像的合适的对象。像达尔文一样,他把人类对别人的同情视为“引力”(gravity),它使得我们的社会按照一定的方向运行。像达尔文一样,他把性爱(不仅仅是性交的动作,而是包括所有与其联想在一起的情感和思想)作为性爱经验中的精髓。《阿拉斯特》是这样开始的(II. 1—4):

陆地,海洋,天空,亲爱的弟兄们!



要是我们伟大的母亲赋予了我  
些微自然的灵性，使我能感到  
你们的爱情，并能把我的爱情相报。

后来(II. 651—653)雪莱提到了“那总是与自然的变化起共鸣的/诗人的血液也逐渐衰退”。(查良铮译)

有关本能爱的希腊的理论是在柏拉图的《论文集》中提出来的，这段话雪莱 1818 年翻译出来为己所用，也就是《弗兰肯斯坦》得到出版的同一年。此后，人们在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式的观点与达尔文式的观点的混合物，正如《含羞草》(II. 74—78)中这几行诗所描述的那样：

因为含羞草没有鲜艳的花束，  
色彩和芬芳也不是它的天赋；  
它爱得像神一般，内心充裕，  
它渴望着它所不具有的美丽！

波西·雪莱的心理学就是这样试图将经验以及知识与爱连到一起。爱是推动我们去完善我们尚未完善的自我的动力，尚未完善的自我既包括我们尚未完善的心理，也包括我们尚未完善的身体和性欲。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和雪莱提出的不是 57  
由上帝之手推动着的一个类似于钟表的牛顿式的宇宙而是本能爱所激发的物质世界，这种爱带来了对知识的渴求以及繁衍生息的愿望。

《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第四版在许多方面代表了雪莱理想中的完美境界，即将达尔文的流动唯物主义与他自己的关

于经验的性爱的观点结合在一起(II. 400—411):

人是许多灵魂合成的一个灵魂，  
支配自然该是它天赋的特性，  
一切都互相交流像江河连接海洋；  
有了爱生活便变得美丽；  
劳动、痛苦、忧愁全换了情绪  
在人生青绿树丛中快乐地徜徉！

他的意志，尽管有卑鄙的欲情、荒荡的娱乐、自私的  
烦恼和责任，  
不受约束，又有一种威力使人服从，  
却像一条驾着长风的巨艇，爱  
掌着舵，惊涛骇浪都不敢撒野，  
震撼着人生的边岸，走上它的征程。

(邵洵美译)

如今，许多人会觉得通过阅读像《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诗歌并发现其中蕴藏着的有关经验的理论是有一定难度的。在这些人看来诗歌不该是能找到关于生活或经验的理论的地方。他们宁愿相信所有那些自然的爱都完全是比喻，或者说仅仅是伪装。

然而，我认为不应当如此看待像雪莱夫妇那样的作家，他们不仅仅在提出自己的心理学理论时严肃认真，而且把这些理论视为科学理论。他们以故事或诗歌的形式写出来自己观点时的那种谨慎的态度，戳穿了把这些观点仅仅设想为一些

随随便便的比喻的谎言。有理由认为伊拉斯马斯·达尔文通过散文来发表他的科学观点为波西·雪莱树立了榜样，激励他采取同样的做法。而且尽管玛丽·雪莱采用哥特式的小说的形式写出她的观点，她那种阐述严肃的哲学和科学问题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可以说《弗兰肯斯坦》的心理学是诗歌式的、性爱的和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然而，它毫无成功的机会，因为不能毫无障碍地四处宣扬这样的学说。玛丽·雪莱很明智地为这种心理学披上了哥特式故事的外衣（并因此发明了科幻小说）。她对一个公认为堕落了之生物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尽管还存在有那些敌意的评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她用来建立她的道德场景的科学心理学却被忽略了，因为读者——甚至批评家——倾向于注意故事情节却不分析其心理学基础。

波西·雪莱的工作以及其有关性爱经验的观点的命运就更糟了。出于种种原因，当雪莱的诗歌于19世纪40年代末最终出版时，玛丽·雪莱对雪莱的许多诗歌做了大刀阔斧的编辑。而那时，诗歌已不再被当作发布科学观点的工具。在巴尔扎克，甚至司汤达的作品中，也能够发现流动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这些观点仍不能以严格的科学形式出现。

雪莱在他的关于灵魂的伟大诗篇 *Epipsychidion* (II. 169—173) 中写道：

假如爱心狭窄，思想拘牵，  
假如生活单调而困倦，  
精神只创造一种物体或形象，

那爱就走进了永恒的墓园。

(赵建芬 王维国译)

在他没有完成的“*Treatise on Morals*”一诗中，雪莱强调了这样  
59 一种思想：“自私的人与高尚的人的惟一区别在于前者的想像  
力局限于狭窄的范围里，而后者却包容了可理解的全部。在  
这个意义上说，智慧和美德是不可分割的、彼此依赖的整  
体。”而替代雪莱的灵魂科学并统治了19世纪的心理科学却  
陷入了雪莱所说的狭小的范围中，并且与他所设想的综合的  
科学相似甚少。

## 欧洲思想阵营的瓦解

经典形而上学尽管得到权威们的支持，但它是一种不稳定的心理学理论。这种不稳定性来自其倡导者的美好愿望，他们希望对心理的工作方式作出一些有意义的解释——尽管官方理论要求他们声明：由于灵魂不是一种自然的实体，所以无法真正地分析灵魂。像斯图亚特和阿伯克龙比那样的思想家坚持认为对心理与自然的关系的任何分析都是“超出人类官能所及的”。然而与此同时，这些人在著作中坚持认为对心理的唯物主义描述是错误的，并且认为能够证明其错误所在。但是在下此种断语之时，他们却忽略了自己陈述中的关键性的官能本身所具有的限制性。

### 第一节 先天论的产生

1820年以后，联想心理学理论出现繁荣，其背景是人们试图将经典形而上学的一些方面自然化。特别是联想主义者不满足于那些他们视为表面而泛泛的有关人类心理的“规律”和“素质”的论断。他们想用如今我们称之为“心理机械论”的

理论来替代这些论断。杜伽尔德·斯图亚特及其早期的学生詹姆士·穆勒对心理学状况的不同评论很好地体现出这种冲突。在斯图亚特的《欧洲文字复兴以来关于形而上学哲学、伦理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的发展的普遍观点》(Dissertation Exhibiting a General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Metaphysical, Ethic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Since the Revival of Letters in Europe) (1819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版的前言)中,他极力维护经典形而上学。例如,在谈到约翰·格雷戈里有关给医生的建议的文章时,斯图亚特解释道:格雷戈里正确地强调了“心理与身体相统一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影响的规律”。然而,他进一步警告到“仅仅是一些规律在控制着心身之间的统一……这些规律应当是哲学的兴趣所在;至于所有那些与统一得以实现的方式相关的假设,最聪明的作者”(p.425)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假设是不能够进行科学分析的。斯图亚特真的相信学生们会接受这些有关规律或规则的一般性论述,而不去努力发现规律背后的因果关系吗?

伟大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医生罗伯特·惠特(1710—1766年)——他的理论似乎影响了19世纪的许多理论——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大篇幅地讨论了在斯图亚特的方法学结论下的神经生理学:他认为有关神经如何支撑着心理活动的假设是毫无根据、缺乏科学性的,人们只能提出有关控制心身联系的模式的规律。惠特讨论了关于这些关系(即单纯的概念或对客体的记忆可以像客体自身那样产生同样的身体反应)的实例:例如,一个人在想到珍馐美味时会流口水,同真地吃到那些食物时完全一样。惠特批评了那些自称为牛顿式的生理学家(他心中所指的是乔治·切恩、斯蒂文·黑尔斯、威

廉·波特菲尔德以及大卫·哈特利),这些人在当时提出了心理加工活动需要生理加工的辅助的假设。后来,李德用同一论点抨击了洛克、贝克莱以及休谟:他们提出了由刺激引起的感觉印象是原因而感觉状态是结果的假设。<sup>62</sup>

惠特和李德的论断被 19 世纪早期的唯物主义者轻易地放弃了,这些唯物主义者采用的是心身关系中显而易见的假设:物质的变化引起了心理的变化。然而,由于 19 世纪 40 年代之前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公然宣扬唯物主义,因而,也就无怪乎许多对经典形而上学的非唯物主义的批评在当时统治着心理学,这些批评中大多有意识地表达了正统的宗教或伦理观点。

## 第二节 哲学的耻辱

经典形而上学对康德和李德反对科学心理学的论述进行批评的特殊方式之一就是创造出一种新的感觉。康德提到“哲学的耻辱”(scandal of philosophy)(请注意:康德所说的哲学从意义上说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而不是现代哲学),即不能证实外部世界的存在。李德被迫回避对这一问题的证实,而仅仅断言科学应基于有关客体存在性的似真的假设。康德比李德走得更远,他在寻找如何发现能够证实外部客体存在的证据,最终提出了他的先验论观点作为这类证据的一种替代品。康德认为,时空是充满了因果互动的经验世界,要想证明其存在就必须假定先验的人类灵魂参与了这些现象的建构过程(即灵魂本身是时空之外的一种实体——因而就处

于所有知识和经验之外——参与了时空的创建)。于是，康德自称是一个先验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经验的理想主义者。现象世界，就是经验世界，是我们能够经历的惟一的世界，只要假定有先验的活动的灵魂，就能证明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康德采用了先验的理想主义来回答证实外部世界的存在性的问题。尽管极少有人追随他的这种做法，但是许多人追随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陈述。在整个欧洲，康德的“哲学的耻辱”在拿破仑时代就被理解成如下的形式：要想对心理学持科学的态度，就得成为“感觉主义者”（sensationist），即着眼于分析“感官所获得的感觉印象”（用当时的话来说）。19世纪早期，大家普遍认可科学心理学必须如此。尽管康德曾批评这种观点是如何有误导性——就像李德曾更为清晰地阐述过的那样——但是，他们的批评没什么影响力。这里的“耻辱”是指没有人能够表明有关外部世界——真实的客体——的知识是如何单单通过感觉印象就能获得。因为至今仍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相信它的确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试图揭掉这一“耻辱”的尝试曾一次次地进行，但得到的仅仅是一些教训。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可能算是来自乔治·贝克莱的思想深刻的《视觉新论》。1709年，这个年轻的爱尔兰人通过该书在知识界为自己树立了名声，在书中他反复强调视觉（他称为观念或有时称为最小感觉）全都是像光点和色点那样的东西。因此，视觉本身不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关固态客体的认识（眼睛只能看到色块，而看不到玫瑰花）。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他断言“触觉教会了视觉”（touch teaches vision）——换句话说，只有将视觉与触觉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获得有



关外部世界的知识。

这一理论很快流行起来，而且至今仍被广泛地传授和承认。然而，只要提一个问题就可以揭示出它的不连贯性：触觉是什么？因为假定了视觉中传输的仅仅是光感，所以视觉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外部世界。但是，那种假定的可以来帮助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触觉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贝克莱自己也知道——在1710年问世的《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继续谈到这个问题——触觉并不比视觉能够提供更多的有关固态的、延展性的外部世界的信息。触觉使我们能够判断热或冷、平滑或粗糙。即使触觉与对光线和颜色的感觉结合在一起，也不足以组成一个真实的外部客体。S. 约翰逊<sup>①</sup>可以很容易地“反驳”贝克莱，但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反驳有关颜色和质地的具体的感觉联想——贝克莱也是如此。最后，贝克莱利用他的“触觉教会了视觉”的论断作为阶石提出了外部客体不存在的学说。正是由于贝克莱的非唯物主义以及约翰逊对非唯物主义的常识性反驳的延续——并且这两者之间并无交叉点——导致了康德所说的“哲学的耻辱”。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发明一种新的感觉，这种感觉恰巧可以接受固体性和外在性的感觉印象。有几位思想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拓宽了这种观点。托马斯·布朗可能是其中最早也最有影响的一位。

---

<sup>①</sup> 约翰逊，S. (1709—1784年)，英国辞典编纂家、评论家和诗人。编纂了《英语辞典》。编辑了道学主义期刊《漫谈者》。著有散文《拉塞勒斯》、《诗人传》等。

### 第三节 托马斯·布朗发明了肌肉感觉

1812年托马斯·布朗继承了杜伽尔德·斯图亚特在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的教授席位。布朗曾通过批评那些并不流行的理论来树立起他作为一名青年学者的形象。那时，休谟还不为苏格兰的精英们接受，布朗却维护了休谟有关因果关系的理论，（正确地）修改了它的语言和论证，认为经过他正确解释的休谟的理论提供了抵挡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唯物主义心理学以及对于颅相学的唯物主义解释的壁垒。在19岁那年，布朗由于言辞激烈的《对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动物学之观察》（1798）一书而名噪一时，他在书中提到知觉经验为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些变化模式，而不是原因及结果，就像休谟所说的那样。布朗在前言中写道：“唯物主义体系主要发源于毫无根基的信念，即我们熟悉因果关系的本质……唯物主义者[特别是伊拉斯马斯·达尔文，错误地]坚持认为意识到的不仅仅是观念，意识到的还有引发观念的东西的本质。”

布朗的演讲中很好地总结了她的哲学，他的演讲笔记《人类心理的哲学》（1820）在他死后才出版，却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广为流传（布朗更愿意将其精力用来写那些不怎么样的诗歌）。尽管布朗通常被历史学家归到李德的追随者的行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公开指出他与李德在哲学立场上的分歧。布朗并不像李德那样认为我们知觉到的是外部客体本身。相反，他认定李德的那种有关外部知觉的学说与可怕

的唯物主义没什么两样。“很显然……感觉的真正对象不是遥远的客体，而是那些径直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体，——是光线本身，而不是将光线撒向我们的太阳……将遥远的太阳作为参照物……是我们智慧中[知觉之外]的另一种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联想规律或引示（suggestion）规律……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规律，我们短暂的感觉相对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而在李德看来，感觉的对象永远是遥远的客体，并且我们的感觉与我们的知觉完全不同；引示或联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感觉转变为知觉的。在布朗来看，凭这一点就可以把李德归入唯物主义者的行列。布朗把李德认为会导致心理学中的混淆和不一致的因素作为他对心理进行描述的出发点——即假设感觉印象是我们知觉外部世界的基础。

布朗的感觉主义的含义之一，就是说小孩子仅仅基于感觉就可以学会将自我与非自我区分开来。一名李德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婴儿学会将自我与非自我分离的过程中虽然涉及到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基于李德所提出的甚至婴儿也能够知觉外部事物的假设。但在布朗看来，婴儿不能知觉外部事物，而只能有一些感觉印象。正是出于这一点，布朗超出了所有其他的人，为19世纪的心理学留下了一个中心问题，也是康德所谓的“哲学的耻辱”的一个自然主义的翻版：婴儿如何把物体知觉为在自我之外并独立于自我的？并且他是如何仅仅基于感觉就能做到这样的？布朗解释道：“在最初的短暂时期，自我与感觉并没有分开——心理中没有形成任何命题，不会有我感觉到、或者我意识到一种感觉这类命题；但是在那时，情感和感受到的自我是完全相同的。”布朗明白一旦人们接受了感觉主义，就会显而易见地推论出在儿童时期“我们对

身体结构的理解像我们对物质的宇宙的了解一样少得可怜”。幸运的是，“我们的肌肉结构不仅仅是活生生的会运动的机械装置，它也是一种真正的感官。当我毫无阻碍地移动手臂时，我会意识到某种感觉；当由于外部物体的出现而使得手臂的移动受到阻碍时，我会意识到一种不同的感觉”，这种不同的感觉仅仅是部分地由触觉而产生的。上述两种感觉差异的其他成分就是肌肉感觉，通过肌肉这种感官我们产生了

67 固体性的感觉——如果没有肌肉感觉，触觉就只有感觉痛苦或愉快了。触觉不能教会视觉来认识外部世界（甚至贝克莱也知道这一点！），但是肌肉感觉却可能来完成这一工作。布朗认为引起肌肉感觉有三种身体原因：敏捷性或与之相反的情性；运动范围的不同；收缩的或大或小的数量。这些如何帮助我们来认识外部世界呢？对于布朗——并且对于随后的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的几乎每一位理论家来说，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阻碍和延展的主观感觉是与某些这类身体状态相联系着的。（为什么这种基于对阻碍和延展的感觉知识的学说会在英国出现并且当帝国主义统治刚开始时在欧洲许多地方占主导地位？探讨这一问题是很有诱惑力的。我还是让读者们自己思索产生这种联系的原因吧。）

布朗认为那些服从于贝克莱的“触觉教会了视觉”的观点的思想家都错了——尽管贝克莱自己反驳自己的文章，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仍有人服从这种观点。通过对触觉的仔细分析，布朗认为触觉不能提供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事实上，布朗赞许地引用贝克莱来说明我们相当习惯于将触觉印象与“外界”的观念联想到一起（就是贝克莱所说的我们对视觉印象所进行的联想），以至于需要伟大的分析能力才能把真正的

触觉与联想区分开。

布朗认为应把真正的感觉印象与其所共生的联想区分开来，他用这种区分来说明所有我们对于阻碍和延展的印象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皮肤，而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布朗观点的第一部分认为仅仅是由于我们具有肌肉感觉，我们的心理才能够知晓我们身体的状况：“这种肌肉感觉由于受到较强感觉的影响，我们几乎无法注意到，但当我们去注意它时，它会相当有力地推动我们，这种感觉独立于视觉与触觉之外，并且对我们身体的整体及其不同部分的位置相当敏感。”布朗坚持像平滑或粗糙那样的感觉通常被归为触觉，而实际上却是我们在物体表面上活动时受到的不同阻碍形成的感觉。 68

布朗观点的第二部分则是说触觉为我们提供的有关延展或形状（他称为图形）的信息是不一致的。“假如心理确实能够知道其外在的肉体组织的一个部分被一个方形物体所压迫，或者有另一个方形在压迫着那个组织，困难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毫无疑问，心理就会具有那种延展的基本认识，也就是我们所寻找的心理的本原。”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怎样才能知道某个东西就是方形（或其他任何形状）。在回答我们如何认识形状的问题时，布朗使用了一系列推理，几乎 19 世纪每一位主要的心理学家都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在引用着他的说法：

婴儿首次伸出胳膊，此时他对外物还一无所知，仅仅是出自一种本能或类似于一种本能——这种运动会伴随某种感觉，他成百上千次地这样运动手臂，肌肉活动中会有同样的感觉过程。在重复的过程中，他体验到了这种直

觉的命题所包含的真理,在他未来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将成为他所有预期的来源与所有活动的先导——这个简单的命题会作为前提,从而带来结果。可能当他再一次伸出胳膊时,却不再感到已习惯了的过程,而出现了某个他所面对的客体产生的阻碍,这种感觉与以往的感觉非常不同,因为他只能完成通常活动的一半,如果他像以往那样继续用力的话,就会逐渐感到越来越痛。因而,我们有根据假定这种不同的感觉让这位小推理者感到震惊;因为在他的早期活动中,同样的前提总是预示着同样的结果……对任何坚信同样前提带来同样结果的人来说,不同的结果必然意味着存在不同的前提……然而,对自身一无所知的婴儿意识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差别;因此,阻碍的感觉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未知的事物,这个事物是他自我之外的原因所产生的。

那些熟悉康德理论细节知识的人会注意到布朗在此处将康德的一个基本观点自然化了:空间知识可能基于感觉印象的时间连续性。康德借助理解的先验结构来解释时间向空间的转换,布朗却与他不同。于是,布朗成为众多理论家中第一个认为婴儿的心理具有复杂的逻辑能力的人(自布朗之后,婴儿逐渐被视为小推理者)。例如,布朗在他后来的讨论中继续强调婴儿就是某种逻辑学家。他迫使我们记住尽管婴儿可能没有能力说出推理中的术语,但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婴儿不能完成复杂的理性的操作。此时,他引用了老达尔文的诗《植物园》第3章第5节:

于是——当母亲俯身端详他俊俏的面庞，  
欢喜地将她的乳儿搂在臂中；——  
那无邪的掠夺者眼睛晶晶亮，占有了  
她温柔的怀抱和爱意殷殷的语调，  
咧着嘴寻找滋养身心的玉液源头，  
把手四处摸索，微笑了，开始了吮吮。

布朗认为即使在这种条件下，“许多推理过程仍在进行，这些过程如果让亚里士多德自己亲自看看，他也会发现它们是严格逻辑的典范。”在老达尔文看来是知觉经验的东西，布朗却把它们弄成了逻辑与感觉印象的混合物；布朗是19世纪众多心理学家中第一位把知觉看成是通过肌肉来进行的推理。

#### 第四节 肌肉感觉的含义

肌肉感觉的假设是用来解决哲学的耻辱的自然化变式的一种尝试。但是，肌肉感觉的策略并不能提供一种令人鼓舞的新解释来说明我们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它却隐含着许多危险的意义，这些含义是逐渐被发现的。

肌肉感觉最危险的含义就是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发明一种新的感觉。我们毫无办法来判断阻碍究竟是一种肌肉感觉还是一种皮肤的感觉。布朗的论断尽管有启发性，却与他所执著的心理省内省方法不相符。很简单，我们不能从肌肉那里获得内省感觉。布朗自己承认我们把阻碍感受为一种触

71 觉——他认为这是来自于一种没有被注意到的联想过程的错误归因。显而易见，人们可能会问布朗是怎么注意到我们通常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呢？为什么他相信这种错误归因不是来自他内省的毫无根据的论断呢？！可能的答案就是，在分析不同感觉的身体原因时，认为阻碍来自肌肉比认为来自皮肤似乎更合理些。情况可能是这样吧，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这种说法并且按照这种方法坚持做下去，就会把感官生理学作为一门客观的科学，而对内省方法的运用则要严加限制——而这却正是布朗所不希望的。（19世纪中的确有一些人在沿着这条路线前进。这种思想方法的结果发现了肌肉中确实存在着感受器——但我们似乎并不能意识到这些感受器的信号。）

对于像布朗这样的内省主义者来说，去实现客观主义者的目标是一件糟透了的事情，但更糟的还在后头。布朗声称来自肌肉感觉的印象并不能真正感受到，甚至婴儿也如此；而他却声称这些感觉印象会成为逻辑论断中的前提。但是如果重要的感觉材料不能够以纯粹的形式进入意识，就不能“通过严格的逻辑”来进行思考，这样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无意识心理来对这些材料进行登录和推理；并且甚至婴儿也必须具有这种强有力的无意识心理。然而贝克莱等感觉主义者早就发展出一个相当简明、甚至相当雅致的解释来说明知识来源于两个因素——感觉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联想——而布朗和后来的思想家至少还得再加上无意识印象（对贝克莱或严格的内省主义者来说它是不可能存在的）和无意识推理或思考。

这似乎就是这种新的感觉要付出的高昂代价。为了彻底



弄清一种感觉对于我们思想的意义却混淆了感觉印象和思想 72  
本来的意义,这样做是否值得?并且,这些问题对于任何曾仔细思考过李德的劝告的人来说都是可以预想到的,李德早就说过将心理学建立在感觉印象之上是一种灾难。可能很令人吃惊,甚至布朗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已有所醒悟,但是极少有心理学家去追溯李德(或康德),却有许多人全力以赴地去蹚这未知而危险的浑水。

## 第五节 心理运动理论

布朗将联想主义、感觉主义以及修改过的经验主义混在一起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成为 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多数英国心理学的主要特征(也包括德国,尽管程度要轻些)。布朗的一些令人质疑的发明创造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就成为无可指责的教条。感觉印象必须作为知觉和知识的基础;通过某种先天的(无意识的)心理能力,学习被视为我们获得大多数知觉和知识的基础;典型的学习包括对感觉印象的复杂联想——这些布朗发明创造的观点统治了大部分 19 世纪的心理思想。

另外,所谓布朗的知觉运动理论(借助 20 世纪的术语)成为后来有关空间知觉思想和认知思想的基础。尽管李德曾认为(对外物的)知觉是与感觉(对感觉状态的认识)完全不同的心理过程。

布朗公然放弃李德所进行的区分而宣扬他的信条,即肌肉运动感觉是我们所有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基础。在布朗之 73

后,大多数 19 世纪的思想家将李德对感觉与知觉之间的区分做了非常不同的理解:通过联想、记忆以及像逻辑判断之类的过程,感觉能够被转化为知觉。事实上,布朗断言“知觉……仅仅是某种源自更一般的心理原则的联想和干扰的结果……的另外一个名称。”本质上,他想取消知觉,他用知觉来指代感觉联想之外的一种心理状态的特殊类型或一种可列举的心理过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采纳了布朗的立场,却没有想到会对以后心理学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布朗不得不否认知觉是一个真正不同的心理过程,因为至少李德曾使用这个术语并认为世界的主要信息来源是知觉而不是感觉、联想或干扰。对布朗来说,知觉的意义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因而必须抛弃。在布朗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大多数学生在学习知觉时追随了布朗的思想,认为李德称为知觉的心理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存在的。

某些感受被我们认做是外部物质的成因。感受本身在最初被激活时,用术语来说就是感觉,当它们后来指代外部的成因时,就被命名为知觉了,因而知觉仅仅是在最初的感觉之外增加了这种参照关系。但是对参照物自身来说,有没有知觉这种新的名称有什么关系呢?参照物本身引示着某个扩展到产生了阻碍的物体,它以前的出现曾引起了注意并产生了特定感觉,现在它又再一次被提到了。

74 布朗进一步澄清这种“引示”包括了任何感觉(视觉、触觉、听觉等等)与肌肉感觉——我们活动受到阻碍时的感

觉——的联想，以至于这种知觉（对外物的知识）离开了肌肉感觉就不可能产生。“那么，只有一种类型的感觉〔肌肉感觉〕，可以说明李德所说的知觉，不是特定心理器官的操作，而仅仅是记忆或联想产生的引示。”布朗进一步谈到甚至阻碍的感觉也不是李德意义上的知觉，而是一种对肌肉运动起因的外在性的本能信念。

詹姆斯·穆勒编纂、组织并扩展了布朗的理论。（在解释布朗的理论时，我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就是布朗的理论似乎是清晰的并有组织的，但事实上这些思想都被埋藏在布朗的那些糟糕的用紫色墨水写出的散文的字里行间。）老穆勒还提出了联想的几条规律，并且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感觉融合（a fused sensation），他认为感觉融合是指两种或更多种感觉之间的联想通过重复或加强，能够被感觉为一种单一的感觉。他将感觉融合这个概念用到对外部事物的知觉的许多情形中，例如，他认为对外物的鲜明的视觉认识就是基于视觉与肌肉感觉、触觉的融合。

正如我曾强调过的那样，这种肌肉感觉最令人惊讶的就是我们似乎从未意识到它们。与嗅觉和视觉不同，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感受到布朗和穆勒认为我们具有的那种感觉。詹姆斯·穆勒表明休息、不舒服以及伸懒腰时的感觉就是肌肉感觉的例证，但他也知道“身体的一些部分在连续地激烈运动，例如心脏，而这种运动引起的感觉我们似乎根本无法意识到。”但是，这些感觉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可以用习惯性不注意来解释这些意识不到的情况。到了1869年，当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编辑出版他父亲的著作时，还提到“有关……无法感受到的感觉的……矛盾”，注意到所有后来的联

想主义心理学中的这一重要的不一致性。假定我们所有的知识是来自感觉,假定感觉就是感受的最简单形式,假定感受就是简单的心理(意识)状态。即便如此,联想主义要想解释感觉如何成为知觉,还需要假设大量感觉不受到注意。这对于肌肉感觉和视觉以及其他感觉都适用;例如,我们极少能够意识到与可视的相对位置的变化以及光源位置的变化所引起物体色调的变化,尽管这些感觉被假定为我们看到物体颜色的先决条件。

如果假设我们具有无法意识到的感受,为什么不可以再往前进一步呢?在推、拉以及光点和触点这些感受之外,我们就不能具有那些可以直接提供事物的信息的感受吗?布朗同时代的两位理论家就是沿着这种思路来发展他们的观点:法国的曼-德-比朗(1766—1824年)和德国的叔本华(1788—1860年)。尽管出发点不同,这两位思想家都认为我们能够直接意识到我们的意志努力。就是说,叔本华和曼-德-比朗认为我们在肌肉感觉印象之外具有着努力和尝试的感受。这种感受被假定是灵魂对它的努力的直接理解。与此同时,一个影响广泛且颇受欢迎的学派“先觉主义”(illuminism)(部分地来自E.斯韦登博格<sup>①</sup>的教海)坚持认为个体具有对他们灵魂的直接意识,可能甚至对灵魂中的神性也有直接意识。曼-德-比朗和叔本华的一些作品似乎也含有着类似的先觉论的思想,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在1848年之前影响甚微,

---

① 斯韦登博格,E.(1688—1772年),瑞典神秘主义者和科学家。奇异的梦境使他相信自己能直接与灵界来往。著有《哲学和矿物学著作集》、《天国秘闻》、《新耶路撒冷》等。

1848年以后，随着人们对唯灵论兴趣的增长，这二位思想家<sup>76</sup>才名声大振。尽管在19世纪前半叶人们明显地对这种有关努力感的理论不感兴趣，然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肌肉感觉被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努力感遮掩起来，甚至在那些被认为是穆勒的联想主义理论中也是如此。

亚历山大·贝恩<sup>①</sup>被视为追随穆勒父子的典型的联想主义者，但他对知觉和意志提出了更多基于经验论的解释，这些在詹姆斯·斯图亚特·穆勒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并且，贝恩对努力感(the sense of effort)的强调同他对肌肉感觉的强调一样多或者更多，这样就把布朗的理论和穆勒的理论修改成与现代的知觉运动理论相似的东西了。贝恩对动物和婴儿的自发性活动印象深刻，贝恩关注的不是他们对感觉印象、肌肉或者其他东西的感受性。他可能是惠特之后第一位强调通常运动中肌肉的整体活动以及括约肌的收缩是心理上一个重要事实的证据的科学家，这个重要事实就是——连续的、多水平的运动构成动物生活的基础部分。

贝恩所提出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觉运动理论，强调了知觉本身要依赖于以前的运动而不是仅仅依赖以前的肌肉感觉。只有我们运动了才会出现肌肉感觉；因为有了这些肌肉感觉，我们才能知觉到外物。这里使用了一个犯了时代错误的术语，因为对贝恩来说，肌肉感觉指的是由反应过程产生

---

① 贝恩，A. (1818—1903年)，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在1876年创办了刊物《心理》(Mind)。他的心理学是牢固建立在生理学的基础上的，因而探求通过观念的联想的生理理论来阐明心理活动。

的感觉。除了布朗所说的肌肉感觉可以为我们提供阻碍的信息之外，贝恩提出了另外两类与运动有关的感受：努力感（指注意过程中的心理努力）和肌肉收缩率感（一种注意过程中身体的努力）。在贝恩的知觉运动理论中，他提出信念的概念。对贝恩来说，信念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还是活动的准备状态。事实上，信念就是人们准备进行活动的基础。贝恩的心理学就是这样为实用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位重要的心理运动理论家是 W. B. 卡彭特<sup>①</sup>（1813—1885 年）。卡彭特是一位出色的比较解剖学家，他也是“哲学解剖学家”罗伯特·格朗特<sup>②</sup>的学生，因为他对惟一神论的信仰，在 1844 年他被免去了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教职。1844 年，他还被大家怀疑写了《创造的痕迹》（*The Vestiges of Creation*）——一本默默无闻的有关进化论的小册子——他不得不进行否认。（后来，他与这个小册子的真正作者罗伯特·钱伯斯<sup>③</sup>，一位苏格兰的博物学者，成为了好朋友。）卡彭特明确地把他在神经心理学领域中的工作视为对加尔有关脑和心理科学的观点进行的现代化与改进。卡彭特像大多数严肃的颅相学家那样，是一位强壮的道德领域的十字军战士（他在反对饮酒的战役中起到了特殊作用），但他又与颅相学家不同，他追随的是哈特利（惟一神论的英雄）的思想而不是苏格兰哲

---

① 卡彭特，英国生物学家。他曾参加了一次深海考察（1868—1871），对有孔虫（一种单细胞生物）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

② 格朗特，R.（1779—1832 年），英国诗人。

③ 钱伯斯（1807—1871 年），英国学者。他著作甚丰，但大都匿名发表在期刊上。著有《爱丁堡的传统》、《漫步爱丁堡》、《从最早开始至今的苏格兰历史》等。

学(长老制的英雄)的思想。当一些早期的作家(例如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和詹姆斯·穆勒)强调将哈特利的联想主义为今所用之时,卡彭特在试图将哈特利理论的其他内容,特别是他的意志和道德判断的观点,引入到19世纪中期的科学中。他有关心理的最重要的著述是《心理生理学》(1874)。这本书是在他早期的(非常受欢迎的)另一本书《人类生理学原理》中有关同一主题的几个长章节的基础上扩充起来的,而《人类生理学原理》这本书在19世纪40及50年代曾经再版多次。从许多方面来看,卡彭特只能算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甚至偶尔称自己的工作为生理形而上学,而且他强调“个性”及其形成是心理学的中心问题,这种做法是在加尔、斯帕兹海姆、库姆的著作中都曾提到过的,并且与哈特利的观点一致。

当贝恩在认识论中应用心理运动理论时,卡彭特则在试图将它用到本体论中。他认为“宇宙中所有的物理力都直接体现了神的心理力。”洛采曾将上帝对宇宙的创造与我们灵魂对心理的“微宇宙”的控制进行类比。卡彭特与此类似,他在思考“自然力之间的相关”时,发现了有趣的平行性,即我们的活动经验是我们所有关于力量或形式的观点的来源。他写道:“在我看来很有趣,能够发现两类论点——一个来自于物理的力、生命力和心理力的关联中……另一个来自我们主观的意识”同时发生作用(《心理生理学》pp.693—696;参见pp.10—14)。

卡彭特通过意志的概念发现了神与我们的灵魂之间的重要的平行性。尽管上帝能够接受整个宇宙的信息并且必须基于全部有关的信息来采取行动(如果上帝真是全能的话),但是这些信息却不能决定上帝的行为。对于我们的灵魂或意志

来说,也是同样的,尽管它们能够接受全部有关的信息,但他们的行为却可能独立于输入的感觉印象。卡彭特同贝恩一样,认为活动本身就可能产生新的感觉印象,但他又与贝恩不同,卡彭特将那些被简单地激活了的脊髓或大脑的神经通路中类似反射的感觉印象与在活动之前必然的、有意识的思考时的感觉印象进行了区分。卡彭特坚持认为后者就是自由动作(*free action*)时的情况。尽管卡彭特强调自由动作,但他还注意到了许多不需要这种思考就可以“自动”(卡彭特引入这个词来代替哈特利的“第二不随意动作”)完成的习惯性动作。卡彭特提到,正如上帝设定宇宙在大部分时间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我们的心理允许我们的身体在许多情况下基于“无意识的大脑活动”而自动地活动。我们的一些习惯动作明显地具有类似反射的皮层和无意识机制。尽管卡彭特将这种观点的来源归于托马斯·莱科克<sup>①</sup>,但他明确地将这些机制称为皮层反射。

## 第六节 皮层反射以及经典形而上学的结束

卡彭特对皮层反射这一概念的应用是不同寻常的并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用这个概念解释了布雷德<sup>②</sup>的催眠术的结果以及现在所说的分离状态(*dissociated states*)的其他一些情况。如果催眠师能够改变人们有意识的注意,或者是引

---

① 托马斯·莱科克,生平不详。

② 布雷德,J.(?1795—1860年),英国外科医生和催眠术研究者。



起这种有意识注意的放松，那么他们就可能改变习惯化的皮层反射，这些反射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被激活的。根据这种观点，催眠状态就是一种自动且无意识的皮层活动控制着有意识的思考和行动的状态。催眠师可能让一个人相信在面前的一个物体就是一个苹果，但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洋葱。并且，当恰当的自动过程被真正激活时，被催眠者可能真的去咬这个“苹果”，尽管在通常有意识的状态下，她决不会这样做。卡彭特在这里区分了两种他所谓的意念动作。在第一种意念动作中，观念是能够意识到的并能够自由地思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随意运动；在第二种意念动作中，观念来自于思考之外的某种东西，却可以引发皮层反射并产生随后的行为。卡彭特指出第二种意念动作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当时很时髦的“心灵”现象，例如处于精神恍惚状态的人能够回答来自其他灵魂的信息。这样，布朗所说的“引示”变成了卡彭特的“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概念：一些人特别容易产生第二种意念动作，并且他们自己就能够按无意识中的观念来行动，或者在催眠师的作用下用行动将这些观念表现出来。英国第一部侦探小说，W. 柯林斯<sup>①</sup>的《月亮宝石》，就利用了受暗示性理论来创造其核心的神秘事件；受暗示性理论还对从夏尔科<sup>②</sup>和比奈<sup>③</sup>到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经典心理分析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80

① 柯林斯，W. (1824—1889年)，英国小说家。著有《白衣女人》、《月亮宝石》等。

② 夏尔科，J. (1825—1893年)，法国病理学家，神经病学创始人之一。他在萨尔佩特里埃尔医院时，弗洛伊德是他的学生。他在研究慢性病和神经疾病方面有很大贡献，并使催眠术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③ 比奈，A. (1857—1911年)，法国心理学家，智力测验的创始人。

在 19 世纪 40 年代,经典形而上学消亡了。即使那些宣称支持内省主义的人也不再相信可以通过内省的方法来建构一门有关灵魂的科学。事实上,许多宣扬内省主义的人在自己的工作中却背叛了这种思想。而且,大家普遍相信要理解灵魂就必须采用一些更为自然主义的方法和理论。这些理论并不是唯物主义的理论——那些令人尊敬的理论家是不会提出这种东西的!——而是有关灵魂的自然主义理论。它包含了旧的内省主义的方法,但又超出了这些方法。肌肉感觉和努力感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是无法得到完全理解的。还有,要理解意志的含义至少需要了解意志力量的自然背景,例如贝恩的著作提到的自然背景,还需要了解对意志涣散的解释,例如卡彭特等人对醉酒、梦和催眠的解释。

## 短命的自然形而上学

1815年至1830年期间统治西方世界的经典形而上学并不是突然让位于一种甚至多种理论的。实际上这是思想家们在逐步地将经典理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清除掉的过程。如果理论家们宣称的对新感觉的认识是正确的话，无论这种新感觉是肌肉感觉还是努力感，那么许多有关认识外部世界的不可能性的经典说法则可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这些经典说法所依据的对我们感觉经验的编造还不够充分。并且许多以前针对联想主义的批评也失去了目标，因为如今的联想主义理论已经包括了与肌肉努力感觉有关的联想。可见，对经典形而上学的批评触及到了它在认识论上的以及心理学上的假设。

与此相应，还有一些思想家从本体论的角度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样做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挑战者会被指责为唯物主义者或者是无神论者。事实上，有几个挑战者的确受到这样的攻击，许多人还被指责为“斯宾诺莎主义者”（当时的正统人士仍用这种称呼来指那些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而且这种称呼常常会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不管怎样，经典的观点在下面这个问题上颇受怀疑：一旦发现了心理状态与

身体状态之间的系统性的联系，那么有关心理生活拥有身体基础的假设看起来就应是恰当的，尽管正统人士禁止这种假设。

82 在讲道坛与诵经台上被宣讲的经典形而上学的不足之处在于传统思想家抵制把心理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大多数经典形而上学主义者并不像康德和李德那样否认（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学可能会成为科学，但他们也没有积极地去实现心理学的科学化。恰恰相反，在 19 世纪早期的大多数有影响的理论家认为心理哲学和道德哲学（英国）、心理学（psychologie）（法国）、物灵学（pneumatology）（苏格兰）或形而上学（这种原则当时在整个欧洲仍被如此称呼）是不同于自然哲学（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才被称为自然科学或物理学）的。

正统权威的这一点放松——心理学可能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不是一种必然性的错误，而仅仅是事实上的错误——为那些如今已默默无闻的一代思想家敞开了思想的大门。尽管 19 世纪晚期心理学被看成是有关心理的科学（或者甚至是有关行为的科学），但是心理学第一次朝这个方向转变却是由那些希望创立一门有关灵魂的自然科学的思想家所推动的。这个阶段在我们如今的后实证主义时代看来意义不大，但是在 1815 年至 1848 年期间最重要的理论家们却在沿着这个方向把形而上学自然化，试图科学地研究灵魂。

## 第一节 将形而上学自然化

这些思想家大都被这样一种基本观点所鼓舞，即灵魂是

作为自然中的某种力而存在的(与康德或李德的说法相反)。通常这种力具有特定的身体或心理表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麦斯美的“动物磁性”，他发现了动物磁性具有不同寻常的磁力变化以及特定的心理表现(用他的术语称为磁睡眠<sup>83</sup> (magnetic sleep)和磁危机(magnetic crisis))。然而，早在1815年，他的学生A. M. J. 皮塞居<sup>①</sup>就声称动物磁主要是一种心理力(我们将称其为受暗示性)，反对麦斯美对磁睡眠的物理学解释。

这个时期物理学理论比较混乱，从富兰克林的电的双向流动理论到19世纪20年代安培和法拉第的工作，使人们很轻易断言“自然”力会影响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电力、磁力、热和重力都已被认做是自然力，而且它们彼此之间有着某种关系，但当时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知识上不确定性的背景，人们有可能设想灵魂的活动也许是基于这些力之间的某种关系。尽管到了19世纪中叶力的转化理论才得到证实和确认，但是当时已有许多理论家——其中有奥斯忒<sup>②</sup>、谢林和伊拉斯马斯·达尔文——设想有可能电、磁、热、光和其他力实际上是一种或两种基本力的变形。实验和讨论在数年之后才证实了这个想像。

在这种背景下可以得到两点结论：第一，灵魂状态很可能与一种尚未发现的物理力或其他形式的力有关系；第二，当时有关这种力的理论还不足以解释可能被提出的许多重要问

---

① 皮塞居，生平不详。

② 奥斯忒，H. C. (1777—1851年)，丹麦物理学家。他发现了电流引起的磁效应。著有《关于电效应的实验》等。

题。伊拉斯马斯·达尔文把像创造怪人那样的事件判断为“不是不可能的”，不仅仅年轻的玛丽·雪莱有这样的想法，整个欧洲的思想家们也都能对此表示理解。但是，许多思想家是因为坚信存在着那种物理的力才相信这种看法的，而老达  
84 尔文却忽略了这种看法在现实上的可能性，即通过某种心理力或精神力来更好地解释生活以及心理，甚至可能因此对关于自然的新理论有所贡献。

从这些刚刚出现的思想的角度来看，经典形而上学缺失了与力有关的心理概念——这种力与牛顿动力学出于一样的模式，但却与牛顿动力学并不相同。意志最有可能是一种心理力。至少有3位重要的思想家——第四章中曾提到过的曼-德-比朗、叔本华以及弗里德里奇·赫尔巴特<sup>①</sup>——认为意志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关自身力量的直接的、内省的证据。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存在某种生命力，或者是所有活组织中固有的一般性的力，或者是神经系统中的更特殊一点的力。这种神经能力或神经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J. 缪勒（1801—1858年）提出的，但是缪勒在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非常有影响的神经生理学教科书中支持了这种神经力的观点，并且辨别出一些与意志有关的神经力以及另外一些与感觉力量有关的神经力。缪勒用“特殊神经能力”（用斜体进行强调是我所加上的）来指与不同的神经通路相联系的不同种类的心理力。具

---

<sup>①</sup> 赫尔巴特，J. F.（1776—1841年），德国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他的形而上学强调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现实”。从而产生一种拒绝天赋观念和固有思想的心理学。并以此形成了他的教育理论基础，竭力主张研究教育应成为大学的一门课程。

有讽刺意味的是，缪勒的学生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却是第一批提出能量守恒理论的人，赫尔姆霍茨很快将用他的发现来讨论心理力的问题，认为他老师的这些心爱的观点不符合事实。然而，赫尔姆霍茨和其他人虽然放弃了缪勒有关心理力的本体论，但他们却坚持不同的心理状态基于不同的心理力的解释！于是甚至到了19世纪后期，不同感觉状态之间的差异（例如，看到颜色与听到声音之间的差异）通常被解释为不同神经能力作用的结果——甚至赫尔姆霍茨也这样解释，尽管这种说法的含义与缪勒的意图不同，而且事实上也几乎没人相信神经能力是以自主的心理力的形式存在的。85

尽管这些研究灵魂的自然科学家可以形成单一的思想派别，但是我把他们统称为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natural metaphysicians）可能会更便利一些，因为所有这些人，包括那些最有影响的科学家，都是从经典形而上学到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之间的过渡人物。有关灵魂的自然科学的观点仅仅存在了十年或二十年，自然守恒的发现和实证主义的崛起（与这件事不无关系）使得自然形而上学支撑不下去了。然而，在其短暂生命中，它提出了几个有着很大直接和间接影响的观点——由于这些观点遭到的攻击才产生了这些影响。这些观点包括：

- 心理中具有某种内在的力或力量（意志？）
- 观念本身可能也有一些这种力（赫尔巴特）
- 心理力帮助组织现象世界（或者甚至实体世界）
- 内省可以反映出“力的作用”的结果，但它既是必不可少的又是不充分的：说它是必不可少的是因为心理力用其他方法观察不到；说它是不充分的是因为正是内省引发我们去

怀疑是什么引起了最初的力的活动。

自然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个观点对那些自诩为生理心理学家或实验心理学家的下一代人影响最大。

## 86 第二节 三位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

为了对这些观点做出简明扼要的介绍，我选择了三位比较著名的灵魂科学家来进行说明。第一位是叔本华，他通常被归为哲学家；第二位是J. 缪勒，一位生理学家；第三位是古斯塔夫·费希纳，一位心理学家。这三位思想家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对经典形而上学的共识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另外的本体论。在对这三位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的思想做简明的回顾之后，我将更为深入地讨论可能最有影响的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R.H. 洛采的著作。

叔本华是格坦斯克的一个小康商人之家的继承人，他的母亲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但他却不能与母亲很好相处。他一生都是积极的亲英派（每天都要读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他肯定要比同时代的德国人更加了解英语国家的哲学发展趋向。尽管叔本华知道布朗试图通过“肌肉感觉”来修正康德的认识论，但他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康德（或许是他惟一真正尊敬的现代哲学家）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叔本华倒转了布朗知觉理论。布朗假定肌肉感觉可以为我们提供材料去推知阻碍运动的外部世界，而叔本华却认为我们可以直接认识到我们的努力（即我们的意志，我们认识到的既不是意志作用的结果，也不是对意志作用结果的抵



制),这种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周围发生的事情。

叔本华与康德不同,他坚决否认超自然的实体论。他认为我们的自我意识可以直接进入真正的实体本身。像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和布朗(以及后来的贝恩以及韦特海姆·冯特)等人认为是一种努力感的东西,叔本华却不把它当作是一种形式的感觉经验,而把它当成对实体世界的直接知识。尽管这种知识是直接的、个人的,但它受到实体世界现实的制约。叔本华将这种自我或本体的存在称为意志(will),尽管他知道这个词仅仅是作为经验的意志一词的隐喻性意义。事实上,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在1819年就出版了,但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他不断增添了许多内容,在这本书中,叔本华明确承认不可能确定你的意志与我的意志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还是一个东西,也不可能确定整个宇宙中是否不止存在一个意志。87

尽管我们意志的直接经验是有限的,但是意志所反映的我们对现象世界的经验是无限的,这使得叔本华可以洞察意志的分布和意志的本质。在《论自然中的意志》(1836)一书中,叔本华从植物和动物的解剖和行为上找到了意志的证据。当我们观察别人或动物的行为时,我们能够推知——感谢我们对自己的意志的内在性认识——这种行为背后存在的力量或力。进一步说,因为叔本华把生物的发展也看成是一种活动,所以他把其他生物的解剖结构也看成是这些隐藏着的力量存在的证据。林奈学派的植物学家发现了花的性器官存在很大差异,叔本华认为这就说明了像植物那样的存在所具有的本体的意志,可以通过特别不同的解剖结构来自我展示。叔本华解释到,许许多多的行为形式,特别是攻击行为和性行为,

应该被认作是本体意志的表象 (representation)。叔本华还提出了在西方人看来很新颖的美学理论, 尽管印度人对这种观点早已熟知。他的美学的基本观点认为许多艺术是在人们想失去意志的愿望下产生的, 人们想放弃所有的个性和特殊存在而去发现一种普遍的、柏拉图式的观点: 伟大的艺术可以帮助我们丢弃各自的意志, 使我们进入到世界的意志中去。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意志是真实的, 所有的心理和行为仅仅是其中的表象, 不存在自由意志, 因为这种纯粹的现象不具有成为事物发展原因的力量。我们可能自己感到自发地选择了某个动作, 但这是一种错觉。叔本华是一位夸张的休谟主义者, 他认为逻辑推理永远是欲求的奴隶, 大脑这种器官之所以能形成, 主要是为了实现意志的繁殖功能。叔本华还认为他的本体论“解释”了人格为什么似乎是先天的。在叔本华看来, 人格是特定意志 (或世界意志的特定方面) 在现象上的表象, 因而它必须始终如一地反映本体上的存在。

尽管叔本华投入很多精力在从事写作并且他的著作思路清晰, 但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无闻的, 他的非正统思想并没有遭到攻击。直到 1852 年, C. 福特拉格才在他的德国哲学史中用一章的篇幅来介绍叔本华, 进而引发了在一期《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 中对叔本华的讨论, 《威斯敏斯特评论》当时的编辑是玛丽安·埃文斯。正是出于这些原因, 1853 年英国出版界才把叔本华列入了欧洲的知识分子的行列, 而且叔本华独具悲观色彩的本体论在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变得非常重要了, 其重要性不亚于 20 年前黑格尔的客观理想主义。

尽管人们是突然地对叔本华的理论产生出强烈的兴趣的，但很少有人攻击叔本华的哲学。《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思想丰富的评论员却仍禁不住要攻击叔本华的理论。这位评论员理解叔本华的理论并且谈到：“从康德主义的一贯思想以及高级牧师德拉姆<sup>①</sup>和佩利<sup>②</sup>的物理神学来看，叔本华的理论荒谬得可爱，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将因果律不合法地扩展到了其适用范围之外的客体上”——就是这样一位评论员也无法漠视叔本华的主要观点。他在结尾处提出了严正警告：“那些将我们的评论理解成接纳这样一种过度悲观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完全误解了我们的意思。”叔本华是“平和的、古怪的和大胆的，让我们再增加一点，他是可怕的。”这位评论员补充道：“我们仅仅希望看到在现代德国的哲学家中出现具有同样力量、理解力、天才和博学的人才，他能够更多地注重我们自己的感受和判断，而不是像叔本华那样厌恶人类的法兰克福圣人。”许多人在尝试去实现这个愿望，特别是那些与现代心理学的崛起有密切联系的人，例如赫尔姆霍茨和冯特。

并不是所有批评经典形而上学的人都像叔本华那样坦率。19世纪早期最有效力和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J. 缪勒，就一直比较保守。缪勒的观点是从他学生时代的观点一直延续下来的。但缪勒可能碰到了科学家所能碰到的最奇怪的倒霉事：他的观点被他的学生们忽略了，他的学生极少用其中的术语来讨论这些观点（特别是赫尔姆霍茨和爱米尔·杜布瓦-

① 德拉姆，生平不详。

② 佩利，W. (1743—1805年)，英国神学家。著有《霍莉·波利内》、《自然神学，或上帝存在的证据和象征》等。

雷蒙<sup>①</sup>)。

缪勒的生理学独一无二地将德国最好的自然哲学与缪勒自己对斯宾诺莎的理解组合在一起。尽管缪勒公开指责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但还不清楚这是他故意与斯宾诺莎疏远还是仅仅反映了一位斯宾诺莎主义者遇到的麻烦。在任何情况下，缪勒影响巨大的《现代生理学手册》(1834—1840)中的许多哲学思想都反映了他谨慎地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的某些说法吸收到19世纪的生命科学中去了。(心理学史家通常认为缪勒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但仔细阅读他的著作之后就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

缪勒对心理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的特殊能力学说：每种感觉神经产生自己独特的(主观)感觉。缪勒把他的学说看成是对斯宾诺莎所说的知觉观念是我们身体状态的心理反映的观点的更新。仅仅因为我们的神经是物质的，而且是由其他物质的原因引起了神经活动，所以我们通过神经获得的特定观念能够组成关于世界的经验：“我们感官进行知觉的中介物仅仅是那些引起神经活动并被作为感觉而感知的特殊状态……但是因为神经……是物质的躯体结构……它们构成了感觉中枢，外部的原因会引起它们变化，这不仅是它们自身情况的变化，还有外部躯体情况的特点和变化。这样通过每种不同感官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是不同的，与神经

---

① 杜布瓦-雷蒙，E. (1818—1896年)，德国生理学家，实验生理学的先驱。他主要研究动物电，发现了杜布瓦定律：电流的有效刺激不在于电流的强度，而在于电流变化的速度。著有《动物电研究》、《自然界认识限度》、《七大世界之谜》等。

的性质或能量有关。”缪勒像雪莱（缪勒从未读过雪莱的作品）和斯宾诺莎（他的著作缪勒和雪莱都读过）一样，相信每种自然变化都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结果，如果人们有充足的知识，就可以由结果来推知原因。缪勒认为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神经系统这样的能力，即在认识外部世界时能够感知自身状态的能力。感受内部状态的（内部指向性的）能力就是感觉（与李德所说的感觉意思相同），这体现了缪勒所说的特殊能力学说；认识外部世界（外部指向性）的能力就是知觉，缪勒认为知觉是基于感觉的。

缪勒与李德和康德不同，他认为只要我们弄清其中的力就可以解释如何从感觉中产生知觉。一旦我们知道每个感觉神经中发生了哪种心理变化，我们就能够假设这些变化是如何被解释为特定原因引起的结果，于是就可以提出有关这些变化的知识是如何构成有关事物发生原因的知识的假设。在叔本华的《四种根源》（*Fourfold root*）（1817）中有非常相似的理论，更久远些的笛卡儿的《光学》（1637）中也有非常相似的观点，但是我还不清楚缪勒是否直接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影响。不幸的是，大多数对缪勒的著作进行注释的人追随了赫尔姆霍茨，对缪勒的著作产生了误解，从而认为特殊的神经能量仅仅是神经的物理状态。在这个问题上，缪勒（像斯宾诺莎那样）阐述得相当清楚：他的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物理上的差异是如何等同于心理上的差异，并如何表现为心理上的差异。缪勒希望他的特殊能力学说被理解成是关于心理感觉与物理上的力之间的特定差异的学说。

缪勒不同于叔本华和笛卡儿之处在于他坚持认为神经系统——以及所有生命物质——展现的不是物理的力，而是一

种活力原则(vital principle)。缪勒相信,这种活力原则的活动方式不同于通常的物体,事实上它的活动会导致通常的物体以物理或化学规律无法解释的方式来活动。缪勒是一位非常坚定的活力论者,他否认弗里德里奇·韦勒<sup>①</sup>的发现,他认为“然而,尿很少被认为是一种有机物,它是动物身体的分泌物,而不是动物身体的组成成分……它不具有有机元素可能具有的特点。”

92 奇怪的是,缪勒对其活力要素的态度却不同于康德对自己所提出的本体论假设的态度。缪勒认为尽管人们可以描述与活力要素有关的现象,但是却几乎无法了解活力要素的活动规律:

活力要素和心理要素能否从大脑出发经过神经的中介而达到精液或胚胎;血液中是否有处于潜伏状态的心理;是否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具有这样一种状态,……还是只在大脑中活动,大脑就是它活动的工具……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答……[然而]对于意识、想像、思维、意愿、意志以及热情这些活动来说,大脑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尽管产生观念、思想等的要素在孕育着的胚胎中处于潜伏状态,但是直到这个胚胎中形成了完整的大脑结构以后,这些心理要素才能够自由活动,才会出现观念、思想和意志。

---

① 韦勒,F.(1800—1882年),德国化学家。其工作标志着有机化学的转折点。他曾分离出铝和铍,发现碳酸钙。1829年,首次用氰酸氨合成尿素成功,此系由无机物合成有机化合物的创举。

作为后来人，我们可以看到缪勒在生理学中提出的活力要素——就像康德在心理学中提出的图式一样——不仅无助于科学思想，反而限制了科学发展。缪勒对于活力要素和心理力的假设并没有带来新的发现，它致使人们减少了对神经通道与特定心理状态联系的简单模式的理论探讨。然而，缪勒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他的心理力的概念被放弃之后，他提出的解释性的图式仍被广泛采用。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经典形而上学是有许多材料可以用来反驳缪勒的。例如，缪勒对随意运动的很有名的解释：<sup>93</sup>“所有位于中央一端的运动神经的初级纤维在大脑中伸展开来以接受意志的影响，我们可能将它们进行比较，因为它们心理的器官中一个挨着一个排列着，就像钢琴的琴键一样，我们的思想就在上面演奏或敲击。”不光康德和李德，甚至托马斯·布朗都可能会被缪勒提出这种观点时的从容吓得面色苍白，因为缪勒不仅仅将心理空间化了，而且将它定位到了空间中的某个特定区域。如果非物质的意志能够在空间游荡并对神经键盘上不同的区域进行定位，为什么它不能直接在脊髓或者甚至肌肉上“演奏”呢？

缪勒认为一旦思想敲击到了大脑中的“键”，就会引起传出神经中的“流动或振动”，进而引起肌肉的运动。缪勒还认为，思想的反复活动会引起振动通路的反复活动，这样就会形成与习惯相联系的某种自动性。这种观点（哈特利和伊拉斯马斯·达尔文曾更自然地提出过这种观点）在被贝恩采纳了之后就成为了心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这种观点完全依赖那种钢琴的琴键式的荒谬比喻，就像日常生活中的苍蝇一

样讨厌。事实上,缪勒、贝恩等人就是把学习弹钢琴作为例子来说明对音乐观念或乐句的重复就会形成习惯,这种习惯不单单是行为习惯,还在有关的神经通路中形成习惯。引用缪勒的话说“同一些纤维引起的活动的频率越高,它们的活动就越容易。”然而,这正是错误所在:钢琴家演奏的动作与初学弹钢琴的人的动作非常不同,他们采用的姿势和击键方式完全不同,钢琴家的动作非常流畅,通常有不同的动作过程,显然很少丢失音符。相似地,钢琴家在学习新曲子时会减少动作量,并且去掉姿态动作。因而,如果重复音乐观念和动作就会使最初的肌肉运动方式更容易出现的话,那么初学者的迟疑、晦涩的演奏就会变得更加迟疑和晦涩,而钢琴家对新曲子所做的尝试性演奏,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尝试性的行为。

缪勒的理论将技能行为意义上的习惯与神经通路中的习惯性动作混为一谈了。然而,它们完全是两回事。当我们第一次作出某个动作时——无论我们是否擅长该动作,无论我们是即兴演奏的音乐家还是学习音乐的学生——总会有许多多余的动作、迟疑以及错误地估计时间。对这样一些不适当的动作的重复是如何产生我们最终看到的流畅而熟练的动作呢?缪勒假设,当我们练习某个动作时,神经通路只记录动作流畅的部分,这样重复就会产生熟练的动作了。大多数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心理学家,从亚历山大·贝恩和威廉·詹姆士到B. F. 斯金纳<sup>①</sup>和让·皮亚杰,都追随了他的这一

---

<sup>①</sup> 斯金纳, B. F. (1904—1990年),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 是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主张心理学应描述环境和有机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他致力于行为分析, 创立了操作条件反射并提出了条件反射的强化联结理论。著有《语言行为》、《华尔登Ⅱ》、《超越自由和尊严》等。



论断,然而,这个理论是靠不住的。除非神经系统在获取技能之前就能知道,哪条神经通路与协调的动作相联系,哪条神经通路与不好的动作相联系,练习——仅仅进行重复——是不能产生流畅的动作或者能使动作流畅的神经通路。如果我们想了解对那些不大好的动作进行重复是如何产生协调的动作的,我们就必须知道习惯动作(以及其背后的神经控制)是如何通过练习而发生改变的。

J. 缪勒这位科学家对概念的革新——特殊神经能力假说以及像琴键一样运动假说——在他的本体论观点臭名昭著之后仍对后来的思想产生了相当长时间的影响。叔本华则与缪勒不同,尽管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知识如今显然过了时,但<sup>95</sup>他的形而上学观点却一直有影响,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家提出的形而上学理论中。古斯塔夫·费希纳(1801—1887年)则是第三种情况:他的主要工作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但他自己认为是忙忙碌碌的工作中的小事却在如今被当作是重要的革新。

费希纳像缪勒一样,提出的也是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形而上学。但是,缪勒强调的是斯宾诺莎的准泛神论,而费希纳则强调斯宾诺莎有关物质的观点,特别是他的心身“两方面”(dual aspect)理论。费希纳将这种两方面的形而上学与一种泛化了的原子论结合在一起,特别提出了可以表明电力和心理力都是如何由原子构成的。费希纳认为现代物理的世界观仅仅说明了宇宙的一边——机械的方面,在那里原子依据物理原理相互作用。然而宇宙的另一边也存在着——主观的、生命的方面,就是心理原子的活动。费希纳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有些极端,提出了“白天观点”(能够知道生命和心理)和“夜晚观

点”(不能知道生命和心理)。

根据费希纳有关实体的白天观点,归纳科学从字面上看颠倒了科学研究的顺序。科学应该从实体中最有组织的那部分现象入手,然后向后探寻最简单的部分以及最小的简单结构。费希纳受到了跟磁学有关的整体的类似场的现象的影响,提出了一种作为盖亚假设(Gaia hypothesis)的先驱的假设,他认为处于首位的是“宇宙生物”(cosmorganic)组织(由单子构成的地球——甚至宇宙),第二位的是有机物,第三位的是无机物。费希纳像缪勒和叔本华一样,认为这些组织是通过力联在一起——尽管他倾向于认为这些力是单子内部具有的,或者至少是实体的某个水平所具有的。

96 费希纳在他的能量说与机体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感觉阈限。他的理论和实验都是基于E. H. 韦伯<sup>①</sup>的研究,而韦伯是他在莱比锡大学里的良师益友。韦伯曾经研究过我们现在所说的最小可觉差(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简称jnd),他认为jnd是一个分数。如果你拿着10克重的物体,我再加上1克重的物体时,你很可能注意不到这种变化。但是,如果你拿着10克重的物体,我再加上10克重的物体时,你就很可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因此,感觉印象的最小可觉差不是一个绝对的值,而是一个分数。韦伯通过实验发现,韦伯分数是一个常数,可以用新增的刺激量与原

---

<sup>①</sup> 韦伯,E. H. (1795—1878年),德国生理学家、心理物理学家。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韦伯定律,他发现人在用手比较两个重量,刚能感觉到它们之间有差别时,两个重量之差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即最小可觉差),它随重量的变化而变化,并与原来重量的比是一个常数(即韦伯分数)。

有的刺激量的比值来表示。费希纳将公式 1 作为韦伯分数的更普遍的表达方法,这里  $\Sigma$  代表原有刺激的值,  $\Delta$  代表刺激的变化:

$$1. \Delta\Sigma/\Sigma = V(\text{这里 } V \text{ 是一个常数})$$

费希纳认为感觉变化与物理变化之间有着某种固定的关系。于是,如果  $S$  代表感觉的数量(假定这是由刺激值之和所引起的),  $\Delta S$  表示感觉数量的变化,那么  $\Delta S$  也将是  $C$  的一个函数。费希纳假定这些变化—— $\Delta S$  和  $\Delta\Sigma$ ——都是能够觉察到的差异,这样他整合出了感觉值与韦伯分数的关系,写出了下面的公式:

$$2. S = C \log_e \Sigma + k(\text{这里 } k \text{ 是一个求和得到的常数, } C \text{ 是一个常数})$$

因为无法通过经验的手段得到  $k$  的值,费希纳根据阈限水平(即它的感觉数量被定义为 0)时刺激的总和把这个公式重新改写为:

$$k = -C \log_e \Sigma_{\text{阈限}}$$

97

然后,将  $k$  值代入公式 2,费希纳写道:

$$3. S = C \log_e (\Sigma_j / \Sigma_{\text{阈限}})$$

总而言之,就是说当刺激( $\sum j$ )大于0(换句话说,刺激处于阈限以上)时,感觉就表示出了与jnd的“距离”的比率。这种比率不是线性的,而是对数关系。即在刺激的绝对值较小时,刺激值的小的变化就可能引起注意;而当刺激的绝对值较大时,同样小的变化可能得不到注意。于是刺激就会受到自身以外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心理意义。如果我在安静的图书馆里对你说悄悄话,你能听得见,如果我是在狂风暴雨中对你说悄悄话,你就可能听不到了。

费希纳对jnd所作的解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费希纳问道,一个人拿着10克重的物体,再加上1克重的物体,这时对1克物体的感觉标记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1克的物体是能够引起注意的,但是我们还知道1克是低于jnd的——费希纳所说的“阈下的”(below threshold),我们要觉察到感觉上的变化就需要 $\Delta$ 超过某个特定的值(换句话说,已经拿着了一定重量的物体)。费希纳可能受到了赫尔巴特(他相信所有的心理元素都是力)的影响,认为对阈下刺激的这种感觉印象是作为世界心理(a world mind)的一部分而存在着,只有当它们超过了所必需的量时,人们才会认识到它们。

费希纳的心理学常常被看成是用数学函数(这里的公式3所示的非线性函数)把自然世界与心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sup>98</sup>理论,但这种看法却忽略了费希纳的本体论。他不仅想把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联系起来,而且想把白天观点与夜晚观点联系起来。他以为自己不但有证据支持他所谓的世界灵魂的存在,而且有证据支持个体单元附属于更大、更广泛的实体的观点。费希纳认为,就像单个的刺激的意义要取决于其他刺

激构成的背景那样，个人的感觉的意义也取决于它们发生时的背景。

费希纳在莱比锡大学做物理学教授时提出了这种倒转了的原子论观点。在缪勒、费希纳和洛采等人的著作中提出的原子论以及那些假想的力，仅仅是物理学潮流中的一小部分。当新一代物理学家成长起来时——赫尔姆霍茨、赫兹以及杜布瓦-雷蒙是他们的先锋，这些可以看成是科学实证主义者的物理学家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心理学和物理学中的原子论和动力学概念(力的理论)。冯特和其他一些比较有自己风格的实验心理学家并没有放弃费希纳的两方面理论——相反，他们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理论。然而，第一代有自己体系的实验心理学家却不采纳他们前辈的自体论。他们强烈反对哈特利、伊拉斯马斯·达尔文、赫尔巴特、费希纳和洛采的动力理论和原子论。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心理学家提出越来越多的有关无意识的理论；然而同样是这些人又在声称希望心理学成为一门与现象密切相联的科学，反对早期心理学家毫无根据的自体论。结果，物理的实证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迫使心理学家放弃心理的实证主义，结果妨碍了心理学家采纳有关无意识心理状态和过程的假设。这些理论家宣称自己立足于现象，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却提出了<sup>99</sup>无意识(无法观察的)过程，一些思想家也是如此(布伦塔诺<sup>①</sup>就很值得注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一致性并没有阻

---

① 布伦塔诺，F. (1838—1917年)，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提出“意向存在”的理论，其特征是心理现象中存在着“心理对客体的指向性”。著有《从经验的立场看心理学》等。

碍自然形而上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变。

### 第三节 R.H. 洛采： 最后一位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

经典形而上学的消亡有两点原因：第一，从学术制度角度来说，它不能适应整个欧洲日益增长的学术分工与分化，1848年之后，这种分工与分化就在缓慢发展之中，1871年以后，其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下一章将讨论这个问题）。第二，随着专业化和世俗化的进程，曾经对库赞、斯图亚特等人或者默默地或者公开地产生影响的权威及直觉论都不复存在了。最后，在专业精英中，不可知论代替了先验论，科学实证主义也代替了经典形而上学。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的纯粹形式一直坚持物质的真正本质——灵魂或神，是不可知的。从这一点来看，应该将科学实证主义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区分开来，甚至还要与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区分开来，因为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比那些不可知论者具有更多的先验的知识——斯宾塞曾不恰当地将先验的说成是不可知的。

在19世纪后半叶，科学实证主义允许在不与宗教学说直接冲突的条件下对科学活动进行解释，因而获得了成功。这种意识形态很适合当时的欧洲，那时的欧洲基于教会的学院仍是主导，但是也越来越多地信赖科学的进步。然而，科学实证主义更适合维持物理学与宗教的正统学说之间的和解，对于维持生物学或者特别是心理科学与主流的宗教信念之间的

和解就不那么适合了。

像马赫<sup>①</sup>和 H. 赫兹<sup>②</sup>那样的实证主义物理学家否认科学能够对任何物理的力的本质提供解释。他们认为物理学应当被理解为仅仅是一门对自然现象进行数学描述的科学，而不是去讨论力或物质的真正本质。这样的观点的确会在科学与宗教之间达成和解，当用同样的实证主义来解释心理学时情况就不同了。心理物理学发现了物理状态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例如，韦伯分数——可以用数学的形式来表达。根据实证主义的解释，尽管心理物理学不能揭示心理状态或物理状态的真正本质，但是心理物理学却对心理状态与物理状态之间的限定关系进行了研究——例如，费希纳将韦伯分数扩展成描述感觉活动的心理物理函数，于是许多人就会认为心理物理规律的发现侵入了宗教领域。

下面提到的查里斯·达尔文就很能说明问题。科学实证主义者(包括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认为达尔文的结果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对上帝的信念。实证主义者用他们的不可知论来解释达尔文的结果。他们问道，人们怎么可能知道自然选择这一术语中就没有隐藏的或作为先验的原因的神？达尔文反复地批驳这一论断，并阐述了充分的理由。他主要的理论基础就是批判目的论式的生物学，特别是上帝设计了生物的

---

① 马赫, E. (1838—1916年), 奥地利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的心物“二元论”, 提出要克服这种对立, 建立统一的、一元论的宇宙结构。著有《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感觉分析》、《认识与谬误》等。

② 赫兹, H. (1857—1894年), 德国物理学家。从事电磁波的研究。频率的国际基本单位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

观点。达尔文对神创论持严肃的科学态度。他与实证主义者不同，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外而无法证实。<sup>101</sup>相反，他努力去确定哪些自然现象与神创论的假设一致，哪些自然现象与神创论假设相反却可以通过自己的自然选择学说来进行预测。结果达尔文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神创论缺乏证据，而自然选择理论则受到已有证据的大力支持。

达尔文反对神创论的最出色的讨论可以在他的《家养动物和植物的变异》一文的结论中找到，达尔文反驳了著名的植物学家（也是达尔文的朋友）A. 格雷<sup>①</sup>的比较成熟的神创论假设。格雷提出即使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来实现的，神的创造也可以通过改变或控制基因的变异来起作用。变异不是随机产生的，神可能将变异引向特定的方向，从而使动物和植物预先具有了对恶劣的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达尔文和格雷并不认为这种假设触及到了不可知的上帝的活动就是无法接受的，尽管科学实证主义者时不时地会有此种观点。相反，他们对有引导的变异这个假设的意义进行了仔细研究，达尔文发现根据这个假设所作出的预测都不符合事实。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达尔文和格雷都是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甚至希望把有关神的假设通过自然的方法加以验证，而不愿意接受实证主义对什么是可以接受的科学假设的严格限制。

我们将在第九章继续深入讨论达尔文的观点。那个时代的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同达尔文一样，致力于发现脑的状态如何引起心理状态的变化，或者心理状态如何引起脑的状态

---

<sup>①</sup> 格雷，A.（1810—1888年），美国植物学家。著有《北美植物志》、《美国北部植物学手册》等。



的变化。J. 缪勒的特殊神经能力说就是前者的一个例子，而他提出灵魂在运动皮层的活动就像在钢琴的键盘上弹奏一样的观点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达尔文可以说明上帝不能像人们设计钟表那样来设计动物。难道心理学家就不能表明灵魂不能像人们搬东西那样来让身体移动？R. H. 洛采就试着这样做，他是对缪勒批评最严厉的人之一。然而，尽管洛采批评缪勒，他却不能使自己摆脱心理学中的目的论思想，甚至无法摆脱世界中有神的活动的信念。从许多方面来看，洛采只是一位过渡性的人物，他想发展一门有关灵魂的自然科学，但这项工作却是不可能完成的。

说洛采是一位过渡性人物还有第二点含义。尽管他确实成为了一位职业学术人员，但他不是专家。他首先受到的是医学训练，然后在莱比锡大学追随两位心理物理学的奠基人，韦伯和费希纳，进行研究工作。19世纪40年代早期，他在莱比锡大学教授过医学和哲学，还做过费希纳的医生，帮助这位老先生克服了瘵病状的视盲症。1844年，洛采受邀到哥廷根大学接替赫尔巴特的哲学教席，1881他受邀去柏林，但不久就去世了。他在19世纪40年代通过生理学研究攻击了缪勒的活力论，在19世纪50年代，采取了与最终获得成功的实验心理学家非常不同的立场来批驳刚刚出现的唯物主义。

洛采对活力论的批驳是直截了当的。这种依赖特殊的能量或力的观点会阻碍我们探索，而鼓励那种草率的思考。在此，洛采借助了韦伯和费希纳对科学的定义（主要基于物理学）：科学确定的是与现象有关的数量规律。不存在“生命力”，只有特殊且有趣的生命现象，我们可以分析这些现象并

归纳出符合自然法则的结构。

103 说到这里,洛采的论证看起来并无独特之处,尽管他是最早以此来反对缪勒以及他所谓的谢林主义或浪漫主义生物学的人之一。然而,他的下一步思想就与众不同了,可以在他1852年出版的《医学心理学》中看到对这种思想的总结。洛采在该书中提到了心身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心理和物质都可以看成是力的集合而不是实体产生的现象。洛采指出力的变化作用到我们身上(例如,出现阻碍)使我们相信存在着物质,并且他认为也是由于某种力的变化使我们相信心理状态的存在。后来,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洛采又进一步指出:“在灵魂产生的效果可以通过肉体的运动来测得的时刻[仅仅在那些时刻],我们可能……把灵魂说成是有限的东西。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抹杀灵魂的非物质性;身体,也不是先化作物质再……产生作用;而是根据它们作用的程度可以把它们称为具有一定数量的物质。”这就是典型的19世纪实证主义的倒置:因为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只能通过事物对我们的作用结果(现象)来了解事物,这些事物就必须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力。

洛采理论提到灵魂时不时地具有数量,尽管这种理论没有被大家接受,但是他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推论确实获得了公认并继续影响心理学理论。这就是洛采所提出的“部位记号”(local sign)概念。洛采从他的灵魂理论出发认为灵魂不受神经系统的空间结构影响,而只受到神经系统中某个特定的点的活动强度的影响。洛采在缪勒更早提出的定位说的基础上认为,就像缪勒所说的那样,不同皮层区域的活动会引起不同的心理状态,(例如,皮层中某个区域的活动会引起视觉,而另

一个区域则引起听觉)。但灵魂只能知道这些活动的强度、位置以及在这一位置上强度的变化。正像缪勒曾说过的那样，灵魂不能直觉地知道不同强度的神经活动的空间模式。(如果灵魂能够直觉地知道这种活动模式，那么灵魂就必然占据空间，但这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只有物质才占据空间。)对活动位置的知识就是心理状态的“部位记号”，这种知识与有关该心理状态的强度的知识以及所有强度变化的知识共存着。我们曾经看到像苏格兰的托马斯·布朗那样的联想主义者也提出过类似的论断，认为灵魂激起肌肉的活动会提供身体位置的信息，这种信息与感觉输入联在一起。但洛采的理论不是联想主义理论(虽然洛采认为灵魂可以引起先天的联想，但可以将这个意义排除在外)，它着眼于皮层活动，而不是布朗或贝恩理论中的反应—引起—感觉活动的循环。还有，联想主义者认为一系列的感觉才提供有关位置的信息，而洛采则认为部位记号是单个感觉所固有的。洛采还强调这里所发生的心理加工都是无意识的，因而阻断了人们对这些观点的内省分析。

自从洛采提出这种观点之后，各种各样形式的部位记号理论(一些理论比洛采的理论更具有联想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对感官生理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洛采基于他的灵魂理论对缪勒提出的其他批评也逐渐产生影响，但比部位记号理论的影响要小多了。在他的主要著作《微观宇宙学》中，洛采试图驳斥那种把灵魂看成身体里的上帝这种目的论观点(vol. 1, p. 285), 尽管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目的论的影响:

当我们神采奕奕地将身体比作一条船而把灵魂比作

舵手时,我们在自欺欺人。因为舵手知道,至少可能知道,他将引航的船的构造……而灵魂却不具有这种相对完善的对机械工作原理的知识,相反,它更像一位从属的工人,这位工人知道的是如何转动绞盘……但他并不知道能够生产完整产品的机械的任何内部传动过程。

洛采公开指责缪勒将运动皮层与钢琴琴键之间所作的类比,他补充道:灵魂(或心理)不大可能知道音符是什么,也不大知道不同音符所对应的琴键位置。灵魂“对这些音符的相对位置一无所知,它并不知道它作出的特定动作会弹奏出哪个音符”。令人震惊的是,这一重要论断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最近在讨论运动控制问题时,才被发掘出来。

洛采继续进行论证,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灵魂可能具有哪些有关运动的知识,洛采提出这个问题就预料到了会出现詹姆士的理论,即运动的愿望来自于对运动的记忆。“我们弯曲手臂,并没有给有关的每一个神经以特殊的推动力,而是刷新了我们自己在类似情境中所经历的感觉的影像。”(《微观宇宙学》)。于是,在洛采看来,灵魂可以在自己内部进行活动,唤起记忆或注意到一个部位记号,但它不能对身体起作用。灵魂的内部活动仅仅会引起相关身体的运动。他在这里提及的内容是界于莱布尼兹的预定和谐说与詹姆士的念动动作学说之间。在某些方面,灵魂自己的活动可以引起适当的身体活动;动作的观念引起了身体的动作。灵魂“并不是自己完成这种动作的,而是一种它并不知道的生命机制在执行它的命令”(《微观宇宙学》)。灵魂还能够了解身体对刺激的反

应模式，这得归功于部位记号说：即使在身体独自活动的时候，灵魂也能够得知活动所引起的不同部位变化，并记录那些与特定运动相联系的感受。

因而，洛采可以被看成是导致心理科学两个非常不同的发展方向的根源。一方面，研究运动和感觉生理学的人们这时开始探索与局部身体活动有联系的神经通路的位置。他们并不关心身体在进行活动时灵魂是否有产生运动的愿望或对这种运动的知觉，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研究纯粹的身体的真实情况。关于对皮层进行局部电刺激是如何引起特定运动模式的研究是在试图探讨“生命机制”怎样将心理上的原因转化为身体上的效果方面的好榜样。研究者们追随了洛采的观点，将皮层的活动等同于灵魂的“命令”的假设仍然成立，尽管在这种实验模式下不会再对那种命令的心理内容有什么疑问了，因为此时皮层的活动就是实验者进行刺激的结果。然而，这种主体无法知晓的情况下所引起的肌肉收缩的输出模式可能会具有什么样的心理内容呢？这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另一方面，意念性行为的研究者们分析心理活动的模式，提出有关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例如，什么引起了固定观念或它所伴随着的强制行为？）他们并不考虑这种活动的神经生理学基础。洛采对临床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的影响看来是相当大的，尽管这种影响不大为人所知。

#### 第四节 自然形而上学和实验心理学

107

尽管 19 世纪中期创建一门有关灵魂的科学的伟大尝试

彻底失败了，尽管我们今天通常把这些尝试看成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自然主义的或科学的体系，但是这些尝试的确对后来的实验心理学的奠基者们有着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德国许多自称为实验心理学家的人们都将自然形而上学的一些元素吸纳到自己的工作中。

后来的科学心理学家即便是在他们的实验活动中也受益于自然形而上学。费希纳对韦伯的测量技术的扩展使得心理物理学成为心理学内部的重要分支。可是，费希纳利用这些技术方法的目的是要提出关于灵魂本质以及感觉本体的理论，而后来的心理学家们却是注重实验设计、测量以及所映射的刺激与反应的关系的准确性。

洛采总结了早期有关反射活动的研究，其中包括他与爱德华·普夫吕格尔<sup>①</sup>就脊神经是不是感觉神经这一问题的争论，此总结大大地鼓舞了后来的经验主义研究者们。然而，除了刘易斯之外，其他后来的生理心理学家们却将自己的研究内容限定为分析反射的刺激—反应模式，而不再像早期研究者那样兴致勃勃地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有关感觉或灵魂的理论。这样，雪莱所说的涉及范围很广的科学被缩小到了实证主义的狭窄范围里了。

事实上，有一位学习自然形而上学的学生在验证老师的理论的同时，也引起了实验心理学中的重要革新之一。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他，这位学生就是赫尔姆霍茨，他对老师缪勒提出的神经中具有特殊能力的理论非常怀疑，该理论的特征

---

<sup>①</sup> 普夫吕格尔，E.（1829—1910年），德国生理学家。他把神经系统看成是有机体的基本力量。他认为反射是目的性的，对机体特别有用。

之一就是提到了心理状态的即时传导。于是，赫尔姆霍茨开始着手研究神经信号的传导速率。这种研究方法产生之后，其他心理学家——冯特以及他在莱比锡大学的学生们、还有荷兰的 F. 唐德斯<sup>①</sup>——就发明出了测量思维的一些部分加工过程的时间进程的方法。概括地总结如下：在赫尔姆霍茨确定了神经活动的速率之后，心理学家就可以测量认知任务（例如选择正确答案）的整个持续时间，然后“减去”神经传导时间，从而推导出剩余的时间是心理加工所用的时间，而不是神经加工所用的时间。于是，新一代的实验心理学家再一次对测量感兴趣，而对验证思维的本质或提出有关心理或灵魂的理论不感兴趣。然而后来，实证主义倾向的评论家却看不到仅仅是因为在自然形而上学的框架下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具有形而上学上的意义，人们是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的——才使得实验心理学的雏形出现了。

在实证主义者的推动下，自然形而上学的主要理论构想被剔除了，自然形而上学被转变为实验心理学。尽管人们忽略掉了早期思想家的主要构想，但他们提出的概念、甚至一些实验程序都被保留了下来。虽然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承认——不得不承认——他们提出的心理、灵魂、感觉和意志的概念都是理论上的概念，但是此后，那些受到实证主义鼓舞的实验家们却常常虚假地提出他们的概念是描述性的且与那些探讨灵魂或心理本质的理论没有什么关系。

---

<sup>①</sup> 唐德斯，F. C. (1818—1889年)，荷兰医生。他开创了反应时实验方法，提出了三种反应时——简单反应时、选择反应时和辨别反应时——来测量不同心理加工的时间进程。





## 1848: 转折之年

19世纪40年代知识的变革是相当迅速而显著的，但是与这10年中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革相比，仍相差甚远。这些年间交通和通信的发展是造就现代欧洲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铁路、跨洋航运、电报、邮局以及现代道路已经在各处修建并得到广泛使用。工业革命已经改变了英国和比利时的面貌，其他地方也已经开始改变。许多城市正经历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现代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改革）开始得到讨论，甚至得到补充完善。这些改革使得随后的30年间，包括处于第二和第三阶层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国家官僚机构中的专业人员的数目有了扩大的可能性。

1848至1849年期间，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遍布欧洲的革命运动都没有达到所要达到的目标。历史学家J. 布卢姆这样写道：“民主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同样的轻视。”（《开端》（*In the Beginning*））。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群众运动。尽管各处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但是许多地方不得不实施政治和社会改革。

尽管欧洲各处都没能建立起新的民主制度，但是革命仍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1848至1849年期间要求民主的人民 110

起义最终失败了，但这也减少了许多统治者对被推翻的恐惧。整个欧洲，统治阶层轻而易举地迅速镇压了革命。进一步说，1848年革命的实际效果是增强了旧的统治阶层与新兴的中产阶级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对知识界的活动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坦率地说，神学作为统一学术观点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受到怀疑，让位于主要基于经济的世界观，甚至是知识观。宪章运动之后的英国、逐渐崛起的普鲁士以及处于第二帝国时代的法国都前所未有地需要大量的商人、银行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正像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曾经指出的那样，1848年以后，在欧洲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城市中，流行的是进化论的思想，而不再是革命思想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很少受到传统的宗教正统思想的束缚，竟提出了欧洲人是位于进化过程的顶端的思想。

这种现代的、实证主义的并且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观点是经过几十年才发展出来的。革命并没有带来一个具有普遍文化自由的时期；然而，即便是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保守势力也是逐渐逐渐地——非常缓慢地——被削弱的。在英国，尽管没有发生革命，但是政府仍将宣扬成立一个共和国的人判以重罪。从H. 泰纳<sup>①</sup>的经历中可以看到第二帝国的知识分子并无自由，而时代的变迁却带来了变化。泰纳1848至1851年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尽管他在班里名列前茅，但由于他的论文维护了斯宾诺莎的心身关系的主张，因而没有取得学位。

111 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泰纳成为了受人尊敬的思想家，而

---

<sup>①</sup> 泰纳，H.（1828—1893年），法国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曾试图用纯描述性和准科学的术语解释品质和艺术的美。著有《当代法国的由来》等。

且斯宾诺莎有关心身问题的观点也成为了欧洲最广为人知的理论之一。

要理解 19 世纪下半叶科学心理学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必须仔细追寻更普遍的文化变革的踪迹。知识的变革并不总是与社会或制度的变革平行,然而仍需把这两种变革放在一起考察。部分地由于大学和知识分子职业本质上的主要变化,才把心理学和哲学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学科。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可以从更为“专业的”角度来研究知识问题,并且可以通过公开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研究以前敏感的形而上学问题。

## 第一节 1848 年以后的官方心理学 与非官方心理学

在第四章中我们曾看到,以经典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官方心理学到 1848 年时已濒临灭亡。只要把 1840 年前后整个欧洲大陆支持经典形而上学的最著名的人物列出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弗里德里克·布特韦克、维克多·库赞、伊努埃尔·费希特、威廉·汉密尔顿、泰奥多尔·茹弗鲁瓦和威廉·休厄尔。除了专家之外,有谁听说过这些名字或者了解他们所代表的观点?赫尔伯特·施纳德尔在他的《1831 至 1933 年的德国哲学》一书中写道:“1831 年,霍乱使黑格尔丧命,也使得 A. 叔本华离开了柏林,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1831 年还标志着一些至今仍有直接影响的当时的哲学思想要素从大学中分离出来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克尔凯戈尔、尼采——他 112

们都没有像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那样做过哲学教授。”

这样，即便在说德语的城市和国家中（在 1848 年还不存在现代的德国），尽管这里的大学比其他地方都要多，但官方的思想也不再像非官方思想那样具有推动力。同时，普遍的文化变革——职业数目的增加、新的学术协会和期刊的出现、更好的通信和交通——帮助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了解到了官方思想的局限性。

直到 19 世纪末，随着英国理想主义、德国新康德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的兴起，由大学和教会来传播的官方思想才又重新起到一些领导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心理学确实产生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哲学那时还没有从 19 世纪中期的混乱中摆脱出来。现代科学心理学在知识领域及制度相当混乱的时期找到了成功的起点，并且像我们将要谈到的那样，在建立学科体系方面常常比现代哲学领先一步。

## 第二节 催眠术的起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19 世纪 40 年代官方的哲学学派在学院和教会之外影响甚微，而非官方思想却在蓬勃发展。从政治上看，这是一个沸腾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时期。这还是一个对麦斯美术和颅相学研究存有相当大争议的时期。许多像道兹那样的思想家在努力把这二者统一起来。他们着手以麦斯美术、颅相学或二者的统一来替代经典形而上学学派。像 1848 年的革命一样，这种尝试开始没多久就偏离了其

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对知识界有显著影响。

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证明了动物磁性和麦斯美术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基于心理学过程来实现的。早在1834年,容-施蒂林(J. Jung - Stilling)在《物灵学理论》(*Theory of Pneumatology*)一书中曾提出动物磁性证实了灵魂实质上以力的形式存在(因而他将书如此命名)。容-施蒂林的观点是自然形而上学的变式,因为他把灵魂当成是不灭的精神,“神圣的活气”,而不是用基础材料构成的。

约翰·埃利奥特森(1791—1868年)在他颇受欢迎的教科书《人类生理学》中(1835)反驳了容-施蒂林的观点,维护了对麦斯美术的唯物主义看法。埃利奥特森是颅相学和动物磁性的拥护者,他也是对动物磁性进行创新的人之一,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把动物磁性用作麻醉剂和止痛剂。19世纪30年代,埃利奥特森在伦敦大学学院拥有医学教授席位,但是1838年他因为一桩牵扯到两个帮他演示磁的妹妹的丑闻而被迫终止对病人进行催眠。埃利奥特森放弃了他的职位。尽管他不再受到官方的宠爱,但仍相当受欢迎,他一直是一位成功的私人开业医生(他为像狄更斯那样的学术权威们治病,并和他们交朋友,他把狄更斯训练成了一位出色的能够对物体进行磁化的人)。此时,埃利奥特森这位性格坚强的医生继续从事他本来的专业工作,并没有受到官方反对者的攻击。埃利奥特森还创办了一个期刊——*Zoist: A Journal of Cerebral Physiology and Mesmerism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Human Welfare* (1843—1856),这个期刊成为了社会改革者竞相投稿的杂志之一。

有趣的是,尽管埃利奥特森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他在颅

114 相学中仍遇到了一些麻烦。他试图创办颅—磁学会，但没有得到伦敦主要的颅相学家的支持——许多人，例如非常有影响的乔治·库姆（1788—1858年），还是支持经典形而上学的。颅相学家如此轻视麦斯美术，是因为它看起来是基于物质的力的，例如动物磁性。而埃利奥特森坚持认为麦斯美术是一种基于物质的科学实体来进行的医疗活动，使得麦斯美术者与颅相学家两群人无法达成真正的和解。

埃利奥特森相信磁睡眠中的病人似乎感觉不到疼，即使是在外科手术中也无痛感，证实了动物磁力的物理现实性。然而，同是在19世纪40年代，詹姆斯·布雷德（1795—1860年）等人却在将控制实验引入到麦斯美术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催眠中没有物理过程。即使麦斯美术作为手术中的麻醉剂时，催眠状态仍是心理过程，而不是未知的物理力的作用结果。布雷德使用了神经催眠术（*neurypnotism*）这个术语来命名这种心理过程，后来又称作催眠术（*hypnotism*）。布雷德对这些心理力量进行分析，使大家注意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受暗示性和强迫思维现象。他认为催眠术将成为治疗非物理原因导致的疾病的重要工具。

尽管布雷德本人带有一些自然形而上学色彩，因为他试图用神经生理学理论来进行他的心理分析，但他对动物磁性物理基础的成功批判预示了19世纪中期唯灵论再获新生。布雷德已经表明假设的物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过程。但他并没有否认催眠状态这一现象，例如心理作用可以产生麻醉的效果。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被假定由物理力引起的现象  
115 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呢？睡眠状态、心理恍惚、甚至醉酒状态是否可以看成是精神作用于物质而不是其他方式产生的效

果？19世纪50年代以后，降神会、精神碰撞等一些活动的迅速扩展与布雷德的工作可能并无直接关系，但是，他的工作确实可以用唯灵论这种反对唯物主义的思想来解释。不幸的是，唯灵论的这个话题在本书中我只能简单地提一下，主要是提醒读者注意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 and 明显的知识倾向有着一定的重要性。唯灵论作为科学世界观——无论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有多么奇怪，但在A. R. 华莱士<sup>①</sup>和柯南道尔<sup>②</sup>这些人看来，唯灵论就是代表了这样的意义——对其进行恰当的分析需要写整整一本书。

### 第三节 意志、物质和心理学

由于成功地从心理学角度对动物磁性提出了解释，19世纪中期的心理学理论研究主题也因而有所偏移。经典形而上学倾向于把认识问题作为心理研究的中心，而19世纪中期的心理学家们却将意志的研究放到了前沿和核心位置。对许多思想家来说，催眠术取代了动物磁性；就是说，人们不再认为是一些物理过程导致了磁睡眠时的生理状态，取而代之的是认为一个人可以控制另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在一些人看来，

---

① 华莱士，A. R. (1823—1913年)，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者。与C. 达尔文共同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人。著有《论控制新物种发生的规律》、《论变种极大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等。

② 柯南道尔爵士(1859—1930年)，英国作家，福尔摩斯的塑造者。著有《血字的研究》、《歇洛克·福尔摩斯探案》、《怀特公司》、《南非战争》等。他晚年改信唯灵论。

心理不仅比身体更有力量，而且催眠师可以将自己的心理相当直接地强加到被催眠者的心理中。

这种新观点对知识界最主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使早期的意志理论获得了新生。A. 叔本华的理论曾不受重视，但 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却在整个欧洲引起广泛争论。与此相似，曾只为少数人所知的曼 - 德 - 比朗的理论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成了很有影响的理论，至少在法国是这样的。叔本华和曼 - 德 - 比朗都强调意志先于知识，他俩——特别是叔本华——还强调当我们锻炼意志时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隐藏在我们有意识的心理之外。

像托马斯·布朗或詹姆士·穆勒那样的理论家，把意志仅仅看成是一个观念与一个动作之间的联接，他们认为总是有可能观察到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并且这些意志对我们的活动有重要的影响力。例如，当我们把伸手抓东西的观念看成是一种意志的话，它就可以被假定为引起伸手和抓东西这两个动作的原因。他们假设这些作为意志的观念像其他所有观念一样，是通过经验获得的；通过感觉观念群之间的联想来实现。

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这种理论发生了微妙但却意义重大的变化。赫尔伯特·斯宾塞(1820—1903 年)和亚历山大·贝恩提出了意志是第一性的，动作是第二性的，知识是第三性的。这些理论家追随了托马斯·布朗思想的一个侧面，认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念——早期理论家把这种观念称为感觉观念——来自于动作受到的任何阻碍。如果我们伸手去抓东西，这时有东西阻碍了手臂的运动，那么这种东西一定是外部物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些基于意志的理论和那



些来自自然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互相补充，共同培育出第一代德国实验心理学家。

尤其是 W. 冯特 (1832—1920 年)，这种唯意志论的英国联想主义心理学对他影响很大。冯特像那些英国理论家一样以心理的自主动作作为他的心理学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他吸收了洛采的用心理元素来解释反射和动物行为的思想（就是说，心理原子需要意志或者某种心理努力才能联合在一起）。他吸收了费希纳的控制条件下的心理实验和测量的思想。这样，冯特的心理学既是实验心理学也是内省心理学。进一步说，冯特总是一方面根据他的心理原子理论，另一方面根据他把意志看成是一种整合力的理论，来解释内省状态。

于是，这些自称为新实验心理学家的人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解决以前理论家所面临的形而上学问题，例如心身关系问题。新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一部分来自早期实验心理学的控制条件下的内省所提供的“现象”，另一部分则是来自生理实验室中发现的现象。而这种策略在伟大的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的工作中就已经出色地体现出来了，年轻的冯特曾跟随赫尔姆霍茨进行研究工作。

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赫尔姆霍茨进行了大量有关视觉和听觉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写成了两本对知觉研究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书：《乐音感觉论》(1864) 以及《生理光学手册》(1867)。这两本书的模式相同：首先对听觉(声波能量)或视觉(光能)进行细致的物理分析，然后进行原子式的生理分析以获取假定的那些感觉所具有的心理元素(例如，我们对乐音或光的感受)，最后把对这种知觉实验的内省解释当作是对这些元素的整合——常常说成是通过无意识心理过程完成的整

合。赫尔姆霍茨对意志或心理活动的依赖要比冯特小得多，  
118 但仍相当努力地对其进行研究。内省极少反映出赫尔姆霍茨  
从生理分析中得到的假定的感觉元素，于是赫尔姆霍茨认为  
心理可以无意识地整合或修正这些元素。这就是他著名的无  
意识概括学说，更为大家所熟知的说法是无意识推理。然而，  
有些问题还是很令人挠头的，例如如何解释我们可以通过平  
面的网膜像来看到三维世界，对于这些问题，赫尔姆霍茨也只  
好直接借助于斯宾塞和贝恩所提出的意志受到阻碍的过程。

#### 第四节 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

结果，新心理学提出了一种新的二元论。在笛卡儿的二元论中，心理状态总是并且必然是可以意识到的。这样就不可能有无意识推理，因为推理的定义告诉我们它是一种心理活动，而根据笛卡儿的二元论，我们应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活动。于是，赫尔姆霍茨、冯特等一些新派心理学家将心理活动重新定义，把那些无法观察的方面也包括进去了。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各种各样关于心理活动的假设都很容易被细致的内省所反驳，所以他们不得不去解释这些反驳为什么不能成为问题，否则的话他们只好或者完全放弃内省，或者承认自己错了。除了把意志作为一种心理力突出强调之外，新心理学家还使研究工作进入了对无意识心理的广泛探究的时期——一种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心理活动的新的二元论。

但是，无意识状态的存在得到最终的普遍承认却导致了  
对心理世界的三分法，一种三元论，而不是二元论。现在包括

了有意识心理、无意识心理和身体三个部分了。至于公认的有意识心理与身体的区别，在许多方面仅仅重复了正统的笛卡儿主义思想：有意识心理总是处在活动和思考状态；而身体仅仅是具有生理结构的机械。那么，无意识心理又是什么呢？它肯定与身体有关，但它的活动方式又不同于机械；在某些方面，它似乎可以思考或具有意志，但是尽管它在思考或产生意愿，但是甚至“它的主人”对所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

19世纪后期对无意识心理最流行的解释之一是说它既不是纯粹(有意识的)心理的，也不是纯粹(机械的)身体的，而是灵魂。在我们这些现代人听来，这些就好像特别辩护那样牵强附会，但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如此见解很大程度得益于我们的后见之明。

想一想无意识心理的一些基本现象：睡眠、受暗示而产生的催眠状态、无意向的活动或疏忽；再想想那些很盛行的降神会、精神恍惚和其他一些唯灵论者的活动，也都与无意识心理关系密切。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无意识与灵魂存在着密切联系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一种很怪诞的观点认为，我们的灵魂比我们自身要稍大一些，这样它们就具有了通常生命所不具有的思想和能力，这种观点使得人们有可能相信，在意识改变情况下出现的精神恍惚以及其他状态中，会发生先知、心灵感应和其他超常力量。

冯特等“新派心理学家”仅仅想证明心理的存在并且建立一门研究心理活动的科学。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提到无意识概念时小心翼翼。相反，唯灵论者，还有后来的像F. 迈尔斯(1843—1901年)以及威廉·詹姆士那些研究精神的人，却想证明灵魂的存在，并建立一门研究灵魂活动的科学。他们把

无意识状态看成是一条可行的研究途径。结果，“强调心理的”心理学家想尽可能从心理中去掉雪莱所说的有关性的经验，而把这部分放到身体中去。他们倾向于把无意识的功能局限于习惯和记忆中，只研究那些带来身体变化的无意识的功能。与此相反，灵魂心理学家则把无意识看成是完整的自我的一部分，包含有后来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夜晚心理状态(nighttime psychological states)——不仅仅是新生的主流心理学家所研究的白天的心理状态(daylight psychological states)。

## 第五节 从形而上学到实证主义

19世纪中期，灵魂心理学的倡导者们倾向于同正统的新教结合，而不与后来的詹姆士或弗洛伊德提出的异端学说扯在一起。通过动物磁性来进行催眠的成功以及唯灵论的复生使许多基督教的思想家深受鼓舞，他们努力使库赞的精神直觉是心理基础的理论重获新生。基于外部知觉的科学可能会揭示出一个机械的世界——情况也似乎如此——而富有思想性的心理学科学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真理，因为心理学关注的是像直觉、无意识状态、恍惚状态等等一些奇怪的现象。

伦敦形而上学学会(1868—1880年)——最初称作形而上学与心理学学会——就是这种情形的很好例证。这个学会由J. 诺尔斯(《十九世纪》的编辑)、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主教等人创办，包括有神职人员(曼宁大主教)和科学家(托马斯·H. 赫胥黎、威廉·B. 卡彭特、威廉·K. 克利福德<sup>①</sup>)，其目的是要成为讨论一些当时看似虚无缥缈的问题的俱乐部。俱乐

部的规章里提到了这样一些论题：灵魂的非物质性、奇迹的本质、祈祷的力量、上帝的人格和良心的本质。这可能是严肃的科学家们最后一次参加有关基督教信仰或教义的讨论，然而 121 基督教思想就是以这些想像出来的现象为基础的：复活、奇迹、不灭性以及有效的祈祷。

这个组织中许多基督教徒支持一种形式的自然形而上学。例如，大主教曼宁相信良心的存在证明了我们的灵魂可以与上帝沟通。威廉·卡彭特（我们曾提到过他，他是虔诚的惟一神论者，还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认为自然力之间的转换证明心理创造了宇宙。当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徒谈论这些神秘东西的证据时，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却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解决这些问题。托马斯·赫胥黎认为随着生理学的进展，将最终回答出甚至那种类似什么是直觉和良心的本原的问题——这种解答就可以除掉现象中的神秘成分。

赫胥黎同这个组织中其他科学家一样——那时几乎所有欧洲或美洲的科学家都如此——不是唯物主义者。他从两个方向出发来讨论问题：一个是外部的科学现象（即生理学研究结果），而另一个则是内省现象（例如，我们对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信念）。他倾向于认为大多数（或者说全部）通过内省表现出来的现象都可以证明是由外部现象导致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仍是一位现象主义者，认为真实的东西就是现象。灵魂（或无意识）不是真实的，那因为它并不是现象世界中的一部分。

---

① 克利福德，W. K. (1845—1879年)，英国数学家。他在投影几何、非欧几何和科学哲学方面写有论著，尤以发展了八元数理论而著称。

这种由科学家提出的泛现象主义观点通常被贴上实证主义的标签。从 1870 至 1890 年,这种定义不很明确的实证主义  
122 统治着欧洲的知识界。然而,在把这种类型的实证主义应用到心理学时,它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就暴露出来了。外在主义者(生理学家)通过对行为和心理的分析提出所有心理状态都是由先前的原因导致的。而内省分析却揭示出自由的直觉以及自主心理状态。二者似乎无法调和。

像冯特等一些实验心理学家则不考虑二者能否调和,而是去着手发现测量外部现象与内省现象之间的冲突的方法。例如,反应时研究就是要测量人在作出心理决策时所用的精确时间。然而,这是另一种实证主义了——不考虑心理是什么而仅仅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并且进行测量。对人的心理现象的分析不再是对有意识的心理内容的描述;而是意味着要以内省得到的材料为基础,对无意识心理的状态和加工过程进行假设和推理分析。

显然,新心理学所进行的几乎所有的革新都很接近上一代学术工作者对新心理学的设想。另外,即便是新心理学家在实验方面的创新——这显然是他们最强调的来源——也似乎都来自上一代人。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些革新大都可以归入我所说的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的那群人的思想中。

新心理学主要的工作领域是:1)研究反射的功能;2)反应时实验,这种研究通常以反射及其时间进程研究为基础来推论心理过程;3)心理物理学研究。有关反射的基本实验工作是由一些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来完成的,例如德语世界中的  
123 的缪勒、英国的 M. 霍尔。反应时实验最初被缪勒的学生用来反驳他所提出的神经力的概念,这种实验主要是对神经传导

速度的精确测量,其次是指那些通过排除神经传导时间而“求出”心理事件(注意、决策)的持续时间的实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心理物理学则是费希纳在扩展自然形而上学的尝试中提出来的。

冯特,这位名义上的新心理学奠基人,很大胆地采用了这三种实验范式。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却不同于缪勒、或者甚至洛采。他回避了自然形而上学视为核心的本体论问题。在冯特看来,实验的目的是帮助描述,而不是验证关于心理本质的假设,在描述性实验中准确和测量起着关键作用。冯特并不反对那些一般性的问题,但他倾向于把这些问题划到实验心理学之外的研究领域中。

然而,尽管冯特在方法学上锐意创新,但他仍无法使他的心理学摆脱掉自然形而上学的影子。他一生始终把意志视为一种无法观察到的起组织作用的力。(人们可以观察到意志作用的效果,却无法在活动过程中观察到意志本身。)统觉——观察者积极关注并对感觉进行组织的过程——虽然是冯特理论的核心概念,但却非常难于进行深入研究。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新一代的思想家们倾向于把冯特与费希纳和洛采并列在一起。例如 R. B. 培里<sup>①</sup>在《近代哲学》(*Philosophy of the Recent Past*) (1926) 一书中把冯特称为精神现实主义者 (spiritual realist) ——主要是根据冯特有关意志的观点——把冯特与洛采、费希纳甚至爱德华·冯·哈特曼<sup>②</sup>并列在一

---

① 培里, R. B. (1876—1957年), 美国哲学家。新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之一。著有《新实在论》文集、《现代哲学的趋势》、《价值的一般理论》等。

② 哈特曼, E. (1842—1906年), 德国哲学家。他主张宇宙的本体是“无意识”, 而理性和意志皆为无意识的表现形式。著有《无意识的哲学》、《哲学体系概论》等。

起。后来,随着心理学家逐渐回避了有关心理、灵魂和自然的  
124 本体论问题,他们从更为实证主义的角度对冯特的思想进行  
解释,强调他的实验过程,而忽略掉他的许多理论解释,大家  
过分地关注他的学生爱德华·B. 铁钦纳<sup>①</sup>所做的特别说明,  
而铁钦纳自己曾试图创立完全由实证主义实验心理学家组成  
的学派。直到最近 20 年,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史家才对冯特思  
想体系的复杂性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 第六节 心理学、逻辑学以及关于科学的科学

由于物理实体和心理实体的地位存在着不确定性,因而  
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思考科学自身的本质问题。当时技术迅  
猛地更新也促使人们进行这种思考。

早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威廉·休厄尔和约翰·斯图  
亚特·穆勒就在争论科学的构成问题。穆勒的《逻辑》(1843)  
所研究的不仅仅是推理,它还是一篇有关科学的本质的论文  
——也包括社会科学。部分出于穆勒的影响,19 世纪 50 年代  
开始,德国新康德主义重获新生,并且在随后的 20 年中成为  
主流思想。新康德主义者很钦佩穆勒能够提出这种有关科学  
的问题,但是在方法学上他们却与穆勒不同。

一些 19 世纪中期的著作中,康德的“批评”方法被解释成

---

① 铁钦纳, E. B. (1867—1927 年), 美国心理学家。他出生于英国, 是构造心理学的主要代表。著有《心理学大纲》、《心理学教科书》、《初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实验手册》等。



为呼唤一门有关科学的科学，这门科学能告诉我们如何将真正的知识和获取真理的方法与谬误和混淆区分开来。这种科学哲学(erkennntislehre)迫使许多流行的实证主义思潮改变了形式，成为一种技术哲学(technical philosophy)。技术哲学的倡导者们逐渐把他们自己归入科学家的行列，其中一些人无疑希望把哲学本身也转变为关于科学的科学。弗利德里奇·A. 朗格(1828—1875年)在1858年写道：“我的逻辑学是计算概率，我的伦理学是道德形态，我的心理学是建立在生理学的基础上的；总而言之，我尽量在精确科学的范围内来进行操作研究。心理学这门‘科学’很大程度是在闲聊和自欺欺人，对它的批评可以成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续篇，我很想写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朗格写的这本书就是《唯物主义史》(1865—1866)，该书在许多方面都像康德的续篇。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我们会感到惊奇，因为朗格在大篇幅地攻击唯物主义：朗格指责唯物主义者在混淆是非和瞎扯，而不是指责唯灵论者或经典形而上学主义者。朗格提出了新康德主义辩证法而不再应和杜伽尔德·斯图亚特的思想！朗格通过新康德主义的科学哲学表明了19世纪50年代所谓的庸俗唯物主义者的思想是无法得到证实的。

然而，我们在前面讨论约翰·阿伯克龙比和杜伽尔德·斯图亚特时提到，这些唯物主义思想也是无法证伪的，朗格应该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康德在他《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关思维二律悖反的部分就提到了这种观点。康德的分析表明，在概念真正出现矛盾的地方——例如无意识心理状态——总是可能证明一个论断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这不是证据的问

题，而是思维的混乱。康德本人从未提出一种类似科学程序的东西来避免这种二律背反，如果他知道他批判的方法被变成了一种科学程序，成为一门发现科学的科学，他一定会嗤之以鼻的。但像朗格那样的新康德主义者却很少受到这种局限，他们进而提出了（新康德主义）哲学就是关于科学的科学。

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后，哲学专业化运动以及科学哲学的崛起运动影响很大。哲学家们希望建立一门非实验性的科学——一种以分析和概念为基础的批判——不仅仅采纳了新康德主义的理性观点，还以刚刚出现的符号逻辑作为工具。G. 弗雷格<sup>①</sup>和查理斯·皮尔斯<sup>②</sup>这些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没什么影响的人，此时成为了刚刚产生的新哲学的主要代表。在下一章中，我将概括地介绍实证主义与自然形而上学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导致了两门新学科的建立：心理学和哲学。

---

① 弗雷格，G.（1848—1923年），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被誉为现代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创始人。著有《概念演算——一种按算术语言构成的纯思维的符号语言》、《算术基础——对数概念的逻辑数学研究》、《算术的基本规律》等。

② 皮尔斯，C.（1834—1914年），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现代形式逻辑学和关系逻辑学的先驱。他创建的“实效主义”（pragmatism）哲学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有所不同。

## 三种无意识及其发展历程

无意识心理过程的观点，或者甚至把无意识视为一种存在的观点，无疑都源自弗洛伊德。19世纪，许多思想家在思考无意识本质的问题。然而，浪漫主义的无意识既是本体论的观点，也是心理学的观点——特别是对德国文学影响很大的谢林的观点和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的观点。在一个比较晦涩的理论中，许多浪漫主义者将电磁学中的物理力(一些流[fluid]?)等同于非理性的愿望以及模糊的感受，例如那种与自然相统一的感受或者渴望独一无二和性满足的感受。尽管叔本华憎恶谢林和费希特，但是他为了从本体论角度回应非理性主义也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肉体欲望的理论，这种非理性主义被一些人看作是康德哲学的继承者。

哲学家、投机的物理学家、医生以及研究麦斯美术和动物磁性的人们都声称能够解释无意识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于是，深受教会影响的哲学教授们对科学心理学的想法感到恐惧还有什么值得奇怪呢？一些像对人类本质进行科学研究那样看似很遥远的事情——尤其是那些着眼于我们的物理化身和肉身实体的科学——对性和我们的动物性的强调似乎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经典形而上学反复强调内省是推动心

128 理哲学或道德哲学的惟一安全的方法，从而划定了冷静的科学与令人不安的思索之间的界限。生理学方法的使用，尽管我们今天把它们看成是真正的进步心理学的前驱，但是当时却被等同于那些有关人类灵魂的非理性本质的令人忧虑不安的观点。

## 第一节 从研究心理到分析无意识

1815至1830年期间的主流心理学理论曾认为，存在着有意识的单个的灵魂，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来自灵魂。能够证明心理和道德现象的存在及本质的证据来自内省。然而，即便是内省也会提出一些有关上帝是如何机智而灵巧地创造灵魂的问题。梦以及醉酒现象显而易见地表明心理可能离开灵魂而在黑暗的小路徜徉。并且，对精神病人的社会认识已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对心理健康的界定也越来越关注，这些发展也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问题。还有，如果麦斯美术中不含有物理的中介，那是不是意味着那些像受暗示性之类的心理力比我们的灵魂力量更强大？如果上帝赋予我们每人一个灵魂，那么催眠师是如何控制着另一个人的思想、意志和行为的呢？

在19世纪中期，为了解释我们今天所谓的无意识心理状态，至少出现了三种彼此独立的思潮。它们是：1)超自然主义；2)自然主义理论；3)有关无意识心理的理论。在超自然主义思想中，无意识继续被当成一种本体，并常常与康德所说的本体世界联系在一起——隐藏在日常的现象世界背后的一种超现实的世界。我把这种无意识称为超自然无意识。根据这种理

论,那些缺乏意识的意志行为,或者甚至与有意识的思想相反的行为,被看成是由无法观察到的力引发的。这种观点认为,无意识不属于科学所能进行解释的那部分世界——不属于康德所说的现象世界——而是本体世界。然而,另外一群理论家并不认为无意识与其他心理现象存在质的差异,尽管仍有一些思想家妄图发明出假想的自然力来解释无意识,例如动物磁性以及通过神秘的“自然(Odilic)力”<sup>①</sup>来解释所有形式的精神恍惚的理论。

我称为自然无意识的理论思潮有两个分支。关于自然无意识的第一类理论着眼于无意识观念或心理状态:尽管内省不能发现这种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可以通过对曾出现过的心理状态的内省来推知的。例如,当某人呼唤我们的名字来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我们可能想不起来曾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名字,但却会无意识地记下了呼唤我们名字时所发出的声音。关于自然无意识的第二类理论则认为与有意识的心理完全分隔开的整个无意识心理的存在是可以推知的。将这两类自然无意识的理论进行对比是有重要意义的。例如,赫尔巴特就假设我们有许多无意识观念,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出现代的阈限的概念,他还采用韦伯和费希纳优秀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当无意识观念进入意识时所发生的情况。但是赫尔巴特只能看到有意识的观念;却并不相信存在着整个的无意识心理或者部分存在着无意识心理。他对于费希纳所声称的“世界灵魂”可以认识所有的阈下感觉以及后来心理学家对无

---

① 德国化学家 Baron von Reichenbach (1788—1869 年),为了说明磁力、化学作用、催眠现象等而假定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力。

意识心理状态作出的杂乱推测一定会有反感。

我把第三种理论思潮称为无意识心理理论，它与前面介绍130 的两种思潮差别非常大。尽管早在17世纪末莱布尼兹<sup>①</sup>就已经提出了类似有关无意识观念的理论，尽管许多思想家曾试图提出存在着有一部分灵魂很难进入到理性的意识中，但是，所有这些早期的理论都把无意识当作是与有意识灵魂相对立的一种存在。特别是，这些理论家倾向于把有意识灵魂看成是基督教中的理性灵魂，而无意识则是非理性的，当然也无法进行理性思维。事实上，当理论家们发现无意识表现出理性活动时，他们就一致地把这种理性活动归到上帝的心理中去，而不认为是每个人的心理活动的结果。

我们曾经提到，在18世纪50年代，惠特提出过在脊神经中的“敏感的灵魂”能够感受有害刺激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移开机体可能面临的危险（他头脑中想的是那种去除了大脑但脊髓仍保持完整的青蛙，能够踢开放在它皮肤上的在酸中浸泡过的纸）。但惠特强调这种灵魂与我们能意识到的理性灵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理性的灵魂能够感受并思考许多不同的东西。而惠特的“敏感的灵魂”能做的所有事情则都是上帝安排好的，用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并维持机体各部分的和谐。比惠特早半个多世纪的马勒伯朗士<sup>②</sup>认为无意识

---

① 莱布尼兹，G. W. (1646—1716年)，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为光学、力学、统计学、逻辑学及概率论都作出过创造性贡献。他还是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哲学体系通常称为单子论或“预定和谐系统”。著有《形而上学谈话》、《人类理智新论》、《神正论》、《单子论》等。

② 马勒伯朗士(1638—1715年)，法国学者和哲学家。天主教神甫。他把天主教的理性变为人的一切活动的惟一的真正“原因”。著有《论自然和恩赐》、《论道德》等。

现象事实上就是上帝思考的例证，而不是个体在进行思考。惠特认为上帝通过无意识感受赐予脊神经将刺激与反应联系在一起的能力，而马勒伯朗士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上帝通过我们的身体来进行的感受和行动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

1830年以后，无意识被认为或者是一种超自然的力，或者是非理性力量的一种自然来源；当理性的却无意识的动作发生时，这些动作被看成是个体的行为，而不是造物主的行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假设在个体中存在着无意识心理，这种无意识心理的活动至少有一部分是理性的，他的观点使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得不作出这样一种假设以挽救他父亲所拥护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并且他自己也希望以这种联想主义心理学作为所有社会理论的基础。这样，从历史上看小穆勒就有些滑稽了，因为他一方面是心理学中内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伟大拥护者，但他同时又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激进的有关无意识心理的理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 第二节 逻辑无意识

穆勒有关无意识心理的理论影响巨大，这个理论来自他创新性的想法，即无意识心理的活动遵循着同有意识心理一样的心理规则。为了纪念穆勒的《逻辑》一书，我们就把这个学说称为逻辑无意识(logic unconscious)。穆勒在《逻辑》(1843)一书中开始对心理力量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一些无意识心

理过程与推论和判断的过程相同，至少很相似。虽然莱布尼兹、惠特等人表明我们可能具有无意识的感受或知觉——当然穆勒本人也认为我们会有一些自己没有注意到的感受和知觉，穆勒却进一步认为在我们的无意识心理内部也有理性的智力活动。（在此之前曾考虑这种无意识逻辑活动的可能性的理论家只有一位——马勒伯朗士，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他把无意识的理性认作是上帝活动的证据，而不认为那是个体心理活动的结果。）

在小穆勒的著作中之所以会出现逻辑无意识，是因为他正在两个分隔来的阵地上为维护联想主义心理学而奋战着。他一方面致力于维护和发展他父亲的联想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建立与联想主义心理学相一致的普遍的逻辑理论。尽管历史学家倾向于把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意识推理”学说看成是德国人提出来的（特别是赫尔姆霍茨和冯特的研究工作），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穆勒的《逻辑》才是这种学说的真正来源，我们知道赫尔姆霍茨、冯特等出色的德国心理学家都读过这本书。（也有可能，这些德国心理学家也读过穆勒为维护联想主义而反对 S. 贝利所写的著作，此书最初与《逻辑》同时出版，1859 年又重印了一次。）

逻辑无意识的倡导者常常追溯一些早期的观点，尤其是莱布尼兹的微觉（*petites perceptions*）观念，从中获取灵感来进行思考。但是，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的，因为莱布尼兹的观点并没有考虑到无意识感受与无意识推论之间的差异——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但并不总是为大家所接受的）非理性无意识观点与理性无意识的激进观点之间的差异。

穆勒为了写好他的逻辑学著作，必须面对联想主义心理



学内部所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他的认识论逻辑背景使得他必须明确指出他所假定的我们对真理的知识的来源。《逻辑》中的一段文字,在刚刚成书时就写在那里了,但历经了八个版本都没有本质的变化,这段话在引论的第四部分:“我 133 们通过两种方式来认识真理:一些真理是可以直接认识的,并且能够认识到它们;另一些真理则是通过其他已知的真理为中介才能得到认识的。前者就是直觉或意识的主题;而后者则是推理的主题。”穆勒着眼于真理如何得到认识,从而改变了联想主义认识论中感觉的地位。在哈特利、孔迪亚克、詹姆士·穆勒等人看来,我们所说的感觉是所有知识的基础,其中也包括对真理的认识,并没有明确区分对意识状态下的真理的感觉与对其他真理的感觉,而对其他真理的感觉也就是小穆勒所说的推理。于是,穆勒以后的联想主义者不得不为这些通过推理得来的真理作出解释,因为对这些真理的解释是不同于对直觉(感觉)真理的解释的。

穆勒在此进行的区分所产生的影响对心理学非常重要。如果把穆勒的区分作为理论的基础,那么在对任何心理过程进行解释时首先要做的是发现被试可能有的各种直觉。只有把这些直觉列出一张完整的清单,才能确定其他推理性的知识都是根据这些直觉推导出来的——或者是错误或者是正确的推理。这样,穆勒把感觉变成了一种与逻辑论断中的前提相像的东西了。贝克莱的最小感觉(minimum sensibles)的概念中已经预示出穆勒后来的这种区分,贝克莱认为这种最小感觉是一种分类语言——但贝克莱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成是穆勒所说的真理和推理的问题。在穆勒看来,逻辑研究的就是从已知的真理进行

的推理。这就是穆勒的心理主义的来源，他坚信逻辑学不能够脱离感觉和知觉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而成为独立的特殊学科。

在穆勒之前，联想主义者们假定感觉是存在的，感觉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观念，包括正确的观念和错误的观念。在早期的联想主义者们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到“感觉”与对真理的  
134 “直觉”之间的必然联系。一些理论家相信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固定的先天感觉，但是在穆勒对直觉和推理的区分得到公认之后，意识中的这些先天成分才具有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意义。

穆勒将感觉与推理区分开的谨慎的尝试主要是为了回应苏格兰的常识心理学家以及他们对直觉的强调，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愿意把这种直觉称为意识（虽然不大情愿，穆勒也以类似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术语）。但是这也引起了一个重要的倒转：在托马斯·李德的认识论中，直觉的真理是与感觉不同的。李德创立了感觉与知觉之间的区分，这样他很可能将真理归到知觉中，而不是归到感觉（或者用穆勒的术语说就是直觉）。简而言之，我对红颜色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李德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我把红玫瑰当作存在着的客体（它碰巧看起来是红色的）而进行的知觉是否是真的。李德认为在意识中正确的东西不仅包括我对玫瑰花的知觉，也包括我还可能有的对颜色或气味的所有感觉。可见，在19世纪30年代穆勒对逻辑进行研究时，对两种意识的区分以及对感觉和知觉的区分还是相当混乱的。威廉·汉密尔顿，苏格兰哲学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倡导者，就从未理解李德的观点，他提出了许多次级的和辅助性的定义和区分，结果把问题搞得

更加混乱（参看他为李德的著作进行编辑时所作的大量注释）。穆勒把一些本应该被看成是有意识真理的东西弄混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汉密尔顿和托马斯·布朗的思想与他父亲的联想主义思想清晰地对比。

结果，穆勒所进行的区分被强加到李德的理论中。尽管李德坚持没有人能够解释从感觉到知觉的过渡，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把知觉看成是以感觉（也就是穆勒所说的直觉）为基础进行的推理的结果。赫尔姆霍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加强了这种观点。赫尔姆霍茨在小穆勒的影响下，把感觉看成是先天的心理直觉，认为对知觉的研究包括确认和分析通过这种先天的心理直觉来进行的各种各样无意识心理判断（*unbewußte Schlüsse*）。这种判断得到的结论就构成了知觉。根据这种观点——该观点过去和现在都很受欢迎，知觉中的先天论强调感觉的“完整性”：观察者不需要对感觉进行推理就能够理解世界。与此相反，知觉中的经验主义则坚持个体可以通过经验学会去建立正确的且习得的无意识判断模式。赫尔姆霍茨式的经验主义统治了知觉理论长达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60年代詹姆斯·吉布森和埃利诺·吉布森<sup>①</sup>的研究工作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

① 詹姆斯·吉布森（1904—1977年），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埃利诺·吉布森是他的妻子。他们俩在图形后效、深度知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尤以创立生态学理论而知名。他们认为知觉是一种直接经验，它的一切信息由外界物体的光学特性所提供。他们反对知觉的信息加工或推理理论。

### 第三节 穆勒与贝利

在这种背景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驳斥 S. 贝利<sup>①</sup>对贝克莱的批评就显得很有意义了,因为这是经验主义和先天论之间的传统对立的最早表现。事实上,由于贝利追随的是李德的思想,并不接受穆勒对感觉和知觉所进行的新区分,因而我们能够看出知觉理论中经验主义和先天论之间的现代的  
136 对立就是由穆勒所进行的新区分而创造出来的。穆勒一完成《逻辑》(1842—1843)一书,就开始写批评贝利的文章,显然,他很高兴能有机会对意识和推理中的基本问题重新进行思考。然而,贝利不同于其他 19 世纪的常识心理学家,他真正理解了李德对感觉和知觉(尽管贝利采用的是一个变更了的术语)进行的区分。因而看看穆勒如何回答这位李德主义者对他的基本假设的攻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贝利像李德一样,认为“对外在性(outness)[平面之外的第三个维度]的知觉是视觉或触觉的组成成分”;他还认为“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离开了对不同距离的知觉,这些触觉和肌肉感觉无法感觉到,”就像李德所说的我们无法解释与感觉相伴在一起的知觉(对客体的信念)一样。在贝利看来,对第三个维度的知觉就是真理,但它既不是来自直觉的真理也不是根据直觉进行判断和推理而得到的真理。像李德曾提示过的那样,它

---

① 贝利,S.(1791—1870年),英国政治学家、哲学家。著有《有关观点的形成与发表等的论文集》、《对贝克莱视觉理论的评书》、《推理理论》等。

是来自知觉的真理。然而,穆勒一直没有理解贝利的想法,他与贝利进行论战,试图让贝利对他所面临的难题能有一知半解,而这些却不是贝利遇到的难题:我们对三维的固体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或者是直觉的(基于感觉),或者是以感觉为基础的推理。

贝利以李德的思想为出发点,进一步抨击了贝克莱的视觉理论,像孔迪雅克和詹姆士·穆勒那样的联想主义者们曾为那个理论提供解释。那个理论假定视觉与触觉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以视觉手段就可以获得对距离的知觉,或者似乎可以获得这种知觉。贝利直截了当地进行了抨击:1)假定感觉(视觉、触觉或其他感觉)不含有外在性信息,那么外在性就不可能是这些感觉通过联想而产生的。贝利特别指出,当我们从不同的距离来触摸物体时,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触觉,也会有对外在性的知觉;然而,当我们从不同距离来看一个物体时,无论怎样努力,触觉都无法进入意识之中。2)如果有理由假定触觉包含有深度和外在性信息,而且触觉“教会了”视觉这些信息,为什么视觉本身就不能具有外在性信息,并且教会了触觉去认识外在性呢(就像詹姆士后来提到的那样)?而且,在环顾四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表明外在性的或者与视觉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触觉,我们只是看到了外在性。对外在性的观察是基本心理学事实,即不是对非空间的直觉进行的推理,它本身也不是某种直觉。 137

穆勒对贝利的批评始自对感觉与知觉的区分。穆勒认为:“视觉最初能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光和颜色,以及光与颜色的特定组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消息。”穆勒之所以从这里入手是因为光和颜色(视觉)是可以直觉到的真理——前提

——穆勒相信它们是所有认识的基础。然而，贝利并不需要与穆勒相同的出发点，并曾预料要遭到这种批评，他指出穆勒所声称的我们“最初看到”的东西或者说是我们称为视觉的东西，是缺乏经验证据的。他写道：“可以确定我们是通过射入眼睛的光线来看到物体的，但同样确定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朝上或朝向侧面的光线本身：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物体”。而穆勒所谓视觉中的直觉真理的证据则来自他对眼睛的生理光学分析，而不是来自对人们所看到的东西的经验研究——至多，只有那些学习几何和光学的人才会看到光线。看来，穆勒这位经验主义者，也必须牺牲某些经验主义的东西以拯救他的新联想主义。

138 穆勒以视觉的直觉部分为出发点，进一步作出论证：存在有两种视觉，最初的（直觉的）视觉和获得的（推理的）视觉。这里又向穆勒的知觉理论靠近了一步，显而易见地又一次突出了他在《逻辑》一书中提到的想法：

通过眼睛获得的信息含有两种成分——感觉和对这些感觉进行的推理：感觉仅仅包括排列方式不同的一些颜色以及颜色的变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推理得来的，这种推理是由智慧来完成的，眼睛并不能做到；如果在通常的使用中，我们把这种推理看成是眼睛的功能，那就必须说明眼睛最初并不能进行这种推理，它必须通过所获取的另外一种力量来完成这种推理——眼睛所利用的力量是来自推理器官或推论器官的。

熟悉了穆勒的知觉理论也无法消除其论断中的新奇和怪

诞；按照穆勒的说法，我们不可能通过内省或意识来认识到眼睛的最初力量，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永远不仅仅是光线、颜色及其变化。这样，穆勒就可以假定知觉系统的最初力量可以起到两种互相对立的作用：第一，因为这种力量可以为观察者提供基本的直觉真理，那么可以假定观察者以它为基础建立对世界的认识；第二，因为这种力量与复杂的联想和推理联系在一起，那么可以假定它是无法加以直接观察的。而在贝利等李德主义者看来，单单从定义上就要求通过内省能够认识感觉或直觉真理。穆勒在他的《逻辑》一书的开始部分似乎也采用了这种定义。但是，为了适应他的知觉理论，穆勒放弃了这种最初的原则而是提出感觉只能通过推理来得到认识。后来，穆勒在他的《汉密尔顿的哲学的考察》(1865)一书中，竟139采用了 W.B. 卡彭特的术语无意识思考 (*unconscious cerebration*)，并且公开表示他依赖生理学“事实”来说明视觉以及其他感觉形式的基础。

穆勒批评贝利在区分“眼睛直接看到的东西与眼睛通过推理的方式得到的东西”时粗心大意，这看起来有些滑稽。如果穆勒所说的是正确的，那么眼睛就不能直接认识任何事情，因为只有通过推理，我们才能够认识甚至是基本的视直觉。穆勒对贝利的其他批评在坚持不懈地表明，贝利在应该使用判断或推理的地方错误地使用了知觉这个词才引出了这么多问题。但事实上，此处却是穆勒在制造问题，因为他拒不承认贝利作为理论基础的概念上的区分。贝利在意识中反复地寻找证据——穆勒等人认为他应该如此——寻找那些能够作为贝克莱、布朗和穆勒父子所说的深层知觉的來源的视觉和触觉。贝利无法找到这种证据，因而他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他

们的理论是错误的。

穆勒对感觉和知觉的解释中的非对称性很重要，在包含无意识推理概念的知觉理论中仍能看到这种非对称性。根据这些知觉理论，知觉是以感觉为证据得到的结果，感觉是构建所有意识现象的基本单元。然而，不仅普通人无法直接认识到这些基本单元，就是科学家们也无法做到。尽管这些理论家认为，在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中，我们自动地且无意识地进行联想和推论，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无法认识到感觉的直觉或前提，而只能认识到知觉结果。如果这样的话，研究感觉的科学家们  
140 必须以心理数据为基础进行一系列推论才能够发现“基本的”感觉是什么，而普通人则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的基本感觉。

穆勒就按照这种相当不寻常的逻辑来回应贝利，提出意识证据与知觉研究毫无关联！至少根据穆勒的定义，触觉和视觉的最初直觉通常情况下是不能进入到意识中的。但这正是贝利的第二个论断的切入点。贝利反复问道，如果触觉和视觉中都不含有外在性信息，那么触觉和视觉之间的联想是如何产生出有关外在性的信息的？在这一点上，穆勒事实上是同意贝利的观点的，于是他急急忙忙地进行补充，认为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纯粹的联想过程，而是与推理或判断过程更为相似的过程。穆勒在此采用了他的化学类比，认为将几种化学物质放在一起常常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物质，就像氢气和氧气合成在一起会形成一种液体——水那样。视觉与触觉组合在一起——根据穆勒，这两种感觉都不含有距离信息——或许可能会产生出对外在性的知觉。

然而，穆勒思想中的不可靠之处逃不出他的对手贝利的眼睛——同样也逃不出他的支持者赫尔姆霍茨的眼睛。在此，



穆勒认为可以通过感觉内部特性的组合,甚至通过这些组合所产生出的一些特性,来解释知觉过程,例如我们如何认识三维世界。然而,穆勒能用来支持他的论断的证据却微乎其微;而且与他自己曾说过的方法相反,他拒绝使用内省证据作为证实那些假定的基本主观直觉特性的方式,而去依赖物理学、几何学和生理学中的证据!

#### 第四节 无意识的成就

141

有趣的是,尽管贝利的批评很有力,但在历史上却作用甚微,比起苏格兰常识学派面对联想主义、现象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攻击进行的反抗,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由于苏格兰学派不愿意支持几乎任何形式的无意识心理过程,并且偏好最狭隘的内省方法,使得这个学派注定要走向灭亡,尽管逻辑无意识的倡导者们也未见得有着靠得住的证据。到19世纪60年代,每个人都希望能有无意识理论,或者看上去如此。大家普遍认为,如果不涉及无意识推理,就不可能对知觉进行一致的联想主义的解释。于是,在短短20年间,逻辑无意识的观点从一种激进的变革转变成为主流理论中的核心壁垒——新心理学中的许多不同学派都觉得这种观点有些益处。这种逻辑无意识理论的反对者只有两类人:提出本体无意识理论的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以及坚信超自然无意识的唯灵论者们。对叔本华的再次广泛关注,以及冯·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一书的火爆(19世纪后半叶最畅销的德文哲学书),还有唯灵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盛行,这些都是干瘪的、学术性强的新联想主

义的强大对手。

只有那些坚持基于感觉主义和联想主义的心理学的人们，才会觉得穆勒提出的逻辑无意识具有解释性。因为只有联想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直觉或推理（用穆勒的  
142 话说），而令他们尴尬的是无法明确指出作为所有推理的前提的直觉，于是提出了逻辑无意识来修补这种不一致性。可见，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心理学中最时髦的无意识概念实际上是解释性最差的概念了。

新心理学家们并不欢迎逻辑无意识的反对者们——他们只能这样做，因为这些人对这门新学科中基本的解释问题的策略持怀疑态度。超自然无意识和本体无意识都无法在新心理学中占上一席之地。冯特和赫尔姆霍茨——甚至詹姆士——都讨厌叔本华和冯·哈特曼，而且他们明确地表示出这种态度。有趣的是，刚刚兴起的自由新教神学也不肯容纳这两种更冒进的无意识。叔本华和冯·哈特曼曾反复强调一种观点，即存在着自然灵魂可以直通上帝的大脑，但这种观点一直被主流的基督教思想家们嘲笑为“头脑发热”。至于那种超自然灵魂的观点，虽然 19 世纪中期的一些开业医生、唯灵论者以及麦斯美主义者提倡这种观点，认为固有的无意识（并且隐藏着邪恶的）自我存在于许多人内部，但是主流的欧洲思想也憎恶这种观点。仅仅在 20 世纪来临之后，随着弗洛伊德的工作和詹姆士对宗教转变的研究逐渐被大家重视，这两种关于无意识的更不可琢磨的理论才在心理学内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然而，不同的理论家却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穆勒的粗劣的思想。一方面，他的逻辑无意识成为泰纳以及冯·哈

特曼那些作家的原材料,更不要说尼采了,他们使非理性的或者说超自然的无意识理论重获新生。在尼采之前, E. S. 达拉斯<sup>①</sup>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 1866)一书中就首次系统地考虑了这种非理性无意识心理的力量而提出有关艺术和文学的理论,认为一种隐藏着的自我常常引导艺术家进行创作。另一方面,第一代自诩为新心理学家的人们,例如冯特,回避了这种本体无意识,因为本体无意识含有隐藏着的灵魂,他们努力发展穆勒的思想,研究在意识之外发生的准-逻辑心理过程(*quasi-logical psychological process*)。这些实验心理学家用心理实验和反应时实验来从经验上解决穆勒无法研究的问题——感觉中直觉知识确切的基本特性。通过将训练有素的内省和对刺激严密的实验控制结合在一起的方法,研究者们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例如颜色或空间视觉中哪些部分是先天的(感觉的),哪些部分是获得的(知觉的)。然而,逻辑无意识概念中的不一致性很快就显露出来,表现在新心理学家们对视觉基础是什么的争论过程中。尽管19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研究知觉的人物——赫尔姆霍茨、马赫和 E. 黑灵<sup>②</sup>都参与到这场争论中,但争论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经典实验心理学核心概念的不一致性就证明了这一点。

---

① 达拉斯, E. S. (1828—1879年), 英国文学家。

② 黑灵, H. E. (1866—1948年), 德国生理学家。实验生理心理学的先驱。曾对颜色视觉进行过深入研究。著有《对哲学的贡献》、《双目视觉理论》、《眼睛的运动和空间感觉》、《心理物理学法则》等。



## 对实证主义的崇拜

通常认为,实验心理学是在 1879 年诞生的,因为这一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具有丰富研究成果的实验心理学实验室。然而这个纪念日会让人产生误解。我们曾提到过,冯特(还有 1879 年之后的十年间的其他一些人)的理论和实验方法,联想主义者们和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们早就提出过。尽管如此,19 世纪 70 年代晚期的确标志着心理学两个重要的转折。第一是学术制度:1879 年之后,“严格的”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在科学院中开展起来,那些在实验室中工作并讲授课程的教授们在从事着这些研究。第二个转折是知识内容:早先一代心理学所关注的理论问题,特别是那些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们所关注的理论问题,逐渐被搁置一边,心理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范围缩小,常常局限于测量问题。

1879 年之后的新心理学与雪莱的梦想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它倾向于仅仅关注心理现象——用经典的联想主义的方式来解释,此处的现象就是经验原子。新心理学家们把对灵魂或自我的研究搁置到一边,认为它们超出了科学心理学研究的范围。冯特等人仍部分地坚持以前的自然形而上学,认为更宽泛的问题应由哲学家、语言学家或人类学家来研究(例

如,冯特的《民俗心理学》)。然而,新一代心理学家已经产生,甚至在冯特的学生中产生出来,他们认为那些老问题根本就不真实的,因为这些问题无法包含在范围缩小了的心理现象之中。

## 第一节 G.H. 刘易斯:过渡性人物

G.H. 刘易斯(1817—1878年)的职业生涯从三个方面反映出,在1848年之后的30年间,确定心理学这门学科边界的困难。第一,刘易斯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大量的著作来自于严谨的研究。刘易斯努力整合当时的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发展趋势,就像贝恩曾在他更为大家所知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刘易斯的特殊贡献在于表明了如何将当时的德国生理学研究成果与英国的进化论和联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第二,刘易斯是一位著作丰富并且有影响力的大众化作家。整个欧洲,人们在读他写的心理学教科书。俄国的伊万·谢切诺夫<sup>①</sup>和伊万·巴甫洛夫将他们决定成为科学心理学家的原因部分地归为受到刘易斯的《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的影响。刘易斯为歌德写的传记很受欢迎,而且他的《传记体哲学史》(*Biogra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为几代说英语的读者介绍了近期的德国和法国思想,包括黑格尔和孔德的思想。第三,

---

<sup>①</sup> 谢切诺夫, I. (1829—1905年), 俄国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俄罗斯现代心理学的先驱。他提出了大脑反射理论, 为巴甫洛夫的研究开拓了道路。著有《脑的反射》、《谁来研究和如何研究心理学》、《思想要素》等。

尽管刘易斯与学术界有着重要的接触，然而他自己却不是其中的一员，而是以写作和编辑来谋生的独立学者。这样，他的职业生涯不仅表明了 19 世纪中期的一位独立的科学家能够在科学上有多大进步，也描绘出学术制度在将科学心理学推入到学院式研究中的影响力。

尽管刘易斯在 19 世纪中期的哲学和心理学中起了关键作用，然而在当今的哲学史中却见不到他的名字，在心理学史中他的名字也仅仅出现在注脚里。E. G. 波林<sup>①</sup>仅仅将刘易斯一笔带过，只提到他是比斯宾塞影响要小的一位持进化论思想的联想主义者。近期的一些心理学史或者回应了波林的说法，或者干脆不提刘易斯的名字。然而，斯宾塞曾经谈到，是刘易斯引发了他对哲学和心理学的兴趣（而众所周知，斯宾塞从来不提他所受到的任何形式的思想上的帮助），所以注意一下刘易斯的贡献还是很有益处的。

在评价刘易斯的重要性时，人们会遇到的一个难点，就是 1848 至 1879 年期间的学术界按照现代学术制度的界定来看有些古怪。刘易斯既不是教授也不是教师。这位颇有影响的生理学家仅仅是一位业余的实验家（但是他却根据李比希的想法进行过实验工作，这好像与我们所说的业余工作者也不大相符）。实际上，刘易斯像斯宾塞一样，主要从事的是新闻杂志业的工作。他不仅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众多的学术杂志的撰稿人，而且是几种重要期刊的编辑和创办者，包括

---

<sup>①</sup> 波林, E. G. (1886—1968 年), 美国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他是《美国心理学杂志》的编辑和创建者之一。著有《实验心理学史》、《实验心理学史中的感觉和知觉》、《心理学的实用教科书》、《历史、科学和心理学》等。

《领导者》(Leader)、《威斯敏斯特评论》以及《双周刊》(Fortnightly Review)。他颇具影响力的建议影响了《自然》、《大脑》和《心理》三种杂志的创办,这是英国最早的三种重要学术期刊。

刘易斯兴趣广泛,他对戏剧、文学和传记、以及科学和哲学确有贡献。刘易斯的职业生涯为我们提供了窥视当时知识界的窗口,而当时的知识界完全不同于19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知识界。他的著作无法直接归入某个单独的学科。这里有一条基本原则:哲学史家和心理学史家不能假定他们所研究的学科的界定是或曾经是清晰的,而且当然也不应该把现代对这些学科的界定强加到他们所研究的领域的历史中去。

147 刘易斯是英国最早谈论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哲学家之一。刘易斯对斯宾诺莎产生兴趣的过程,也反映出把书面资料当成表达知识的主要手段的危险性。在19世纪30年代末,那时刘易斯还是一位热心的演员和新闻工作者,常常与6个思想相似的人到霍尔本(Holborn)的红狮子广场的一个酒吧聚会。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不是主流的学术人员。其中一个,J. P. 格雷夫斯,是一位神秘的解剖学家和教育改革者,他影响了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的一些创办人。另一位成员是个鞋匠,还有一位是典型的思想自由的书店老板。更重要的一点,有一位名叫科恩的熟练的表匠也经常光顾这间酒吧,科恩支持与他具有同样宗教信仰的斯宾诺莎的哲学。科恩和俱乐部其他人一起,逐字逐句地研究《伦理学》,而当时在英国这片土地上或欧洲其他地方的学院里,出于特定原因,是没有人教授这门课程的——也不可能有人去这样做!刘易斯热切地参与



其间，因为他曾从 L. 亨特那里听说过斯宾诺莎，亨特那时充当了许多青年作家的导师。我们曾提到过，亨特是通过雪莱以及他的私人译作才知道斯宾诺莎的。刘易斯还搜集斯宾诺莎作品集，并开始翻译《伦理学》，然而这项翻译工作半途而废了。最后，1843 年，他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斯宾诺莎的文章，这是在 19 世纪的英国第一次明确地维护和评价了斯宾诺莎。刘易斯特别强调了斯宾诺莎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对心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精神和肉体仅仅是自我的两个方面，而灵魂则是我们对肉体的“观念”。如果每种身体活动都会产生一系列感受，就像肌肉感觉理论所说的那样，那么所有这些感受的全部联想的集合——我们对身体活动的感觉观念——可以看成是自我的核心。

刘易斯 1842 年参观了巴黎，在那里遇到了库赞和孔德，又一次激发了他把欧洲观点富有成效地传播到英国。在一年之内，刘易斯出版了对实证主义热情洋溢的介绍，并与贝恩和 148 小穆勒讨论了翻译孔德的大作《实证主义哲学教程》的问题。（尽管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但十年之后，刘易斯在安排出版 H. 马蒂诺所编辑的重要的孔德著作中仍发挥了影响力。）此时（1842—1846），穆勒本人与孔德交往密切，认为他自己的著作《逻辑》也表达了与实证主义哲学相似的内容。1842 至 1843 年间，穆勒与孔德之间有大量书信往来，而他们主要讨论的问题是颅相学能否作为研究心理的科学方法，大概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说明不能够把当前的学科界定应用到一个世纪之前。

1846 年，刘易斯又一次拜访了孔德，这时孔德挚爱的克洛蒂尔德·德·沃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刘易斯可能是第一位

转变成实证主义者的英国孔德主义者——他关注孔德学说的实用的部分,也就是他开始称作实证主义的学说,而不是去关注孔德本人以及他越来越古怪的思想。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孔德及其最亲近的门徒开始把他的哲学当成一种新的宗教信条,把孔德当成了教皇,而把他的情妇当成圣母玛利亚的替身。刘易斯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发展最重要的结果是使整个欧洲的实证主义与孔德这个人拉开了距离,只是将他早期的哲学立场一般化为一种宽泛的科学世界观。刘易斯是这种孔德之后的实证主义态度的先锋,这种思想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统治了欧洲的知识界。

在 1845 和 1846 年期间,刘易斯的《传记体哲学史》第一版面世了,其中对德国哲学家,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和斯宾诺莎进行了讨论,这本书只能说是写给孔德的赞美诗。(结尾部分后来变得缓和些,转变成一般化的实证主义信条。)这本书在英语国家中受到了哲学教科书以前从未受到过的欢迎。因此,牛津的黑格尔主义者所声明的是他们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将德国哲学引入到英国(在柯勒律治的努力或多或少失败之后),这是错误的,尽管有关该问题的历史中许多人再三使用了那些人的声明。还有一点也很有趣,就是比 1848 年革命还早几年,刘易斯在这本广为流行的教科书中就支持了实证主义。

1848 年之后,刘易斯在一段时期里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性杂志中,他和 L. 亨特的儿子桑顿一起创办了《领导者》。在这种背景下,刘易斯开始介绍赫尔伯特·斯宾塞的著作,稍后介绍了他终身同伴(他早已成婚)乔治·艾略特的著作。甚至在所有这些活动之余,刘易斯还能找到时间做第三件将欧洲思

想传播到英国的伟大工作：《歌德的生平及著作》(1854)，第一部有关歌德的内容全面的传记。在对歌德的著作作出简要介绍之外，刘易斯用很有意义的一章篇幅来介绍歌德的科学工作，最完整地回顾了歌德数年来多方面的努力工作。

刘易斯可能是受到了歌德的鼓舞，在随后的几年间他开始写作一系列颇受欢迎的生理心理学著作。这些书，特别是非常受欢迎的《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1859—1860)，提出了毕希纳或雅各布·莫勒朔特<sup>①</sup>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种日常生活中的唯物主义生理学，却回避了他们反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并且，刘易斯的实证主义视角使他能够一方面对像吃饭那样的日常生理活动如何伴随有感觉和感受的问题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另一方面却仅仅关注他确认是事实的东西：感受与生理过程和身体活动的关联。刘易斯创造出的这种半斯宾诺莎、半实证主义的心理生理学是他的主要贡献。19世纪尚未结束，这一立场已经主导了整个欧洲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界。新的心理学观点假定心理和身体是同一事物——一个体的神经系统的两个方面。事实上，刘易斯创造了两个术语 *neurosis* (神经[症])、*psychosis* (精神[症])，分别指神经活动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的感受。(这两个词是在本世纪才获得了后来的医学上的含义。)刘易斯不同于自然形而上学主义者，也不同于冯特及新心理学家们，他把心理定位于整个神经系统，而不仅仅在大脑中。他不再把自我或意志看成是进入现象世界的先验的实体；相反，他把神经和精神看成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现象。

---

<sup>①</sup> 莫勒朔特，J. (Moleschott)，生平不详。

1864至1865年期间，刘易斯重返新闻界，编辑新杂志《双周刊》。该杂志成为了发表科学、政治和哲学领域中自由的实证主义思想的阵地，很有影响力，一些像托马斯·赫胥黎、赫尔伯特·斯宾塞、约翰·廷德耳<sup>①</sup>、亚历山大·贝恩、瓦尔特·白哲特<sup>②</sup>等作者都是很有特点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和心理学文章在这本“受欢迎”的杂志上发表出来，许多人读到了这些文章。由于刘易斯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短短两年之后，他不得不离开编辑的岗位，而那时，《威斯敏斯特评论》也已经办得很好了。刘易斯回到家中的实验室，决定要写一篇关于心身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文，对自己的实验以及自己的心理学新观点进行综述。

当主流实证主义者们对心理的泛反射(pan-reflex)理论越来越吹捧之时，刘易斯却持不同意见。早在19世纪50年代，莱科克和卡彭特就在提皮层反射。那种认为甚至我们的意识活动也常常是反射性的观点在整个欧洲都非常盛行。例如，在《安娜·卡列尼娜》(1877)的第一场中，渥伦斯基在欺骗自己的妻子时，“不正常的微笑”使他的企图暴露出来，他自己把这种微笑归为“大脑的反射活动”。而刘易斯承认有时甚至大脑皮层可以按反射的方式来活动。但他反对那种认为脊髓反射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主观感受的观点——用他自己的术语来说，就是缺乏精神。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反射活动包括主

---

① 廷德耳，J. (1820—1893年)，英国物理学家。他对磁学、光学、热学和冰川均有研究。著有《抗磁性及磁晶态作用研究》、《光的札记》、《辐射热领域分子物理学》、《阿尔卑斯山冰川》等。

② 白哲特，W. (1826—1877年)，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家。

观的精神活动和客观的神经活动这种说法正确的话，为什么不能说青蛙脊神经的反射活动也是如此的？在这个问题上，刘易斯的观点与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观点很接近，尽管我无法找到证据说明刘易斯读过老达尔文的著作。

然而，刘易斯却仔细读过惠特的书，他对惠特的许多实验进行了重复。刘易斯像这位苏格兰医生一样，发现脊髓反射不是机械不变的，而是在一定限度内，随刺激和动物处境变化而有适应性调整。刘易斯在《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中曾总结道，“大脑仅仅是心理的一个器官”，而脊髓中每个片段的活动就“像小的大脑”。在刘易斯和惠特看来，这就意味着脊髓中存在着某种感觉或感受，尽管这些感受无法到达有意识的大脑中。当赫胥黎和其他一些人提倡大脑像一台反射机器一样的观点使得在人类事物中主观性的重要程度大打折扣时，刘易斯以同样的观点来讨论动物王国中感受的普遍性以及动物身体内部感受的普遍性。就算实证主义者厌恶探讨心理本质的问题，可能这种争议还是不可避免的。一旦认可存在着两个“现象系列”（神经活动和精神活动），那么它俩之间的关联方式至少有两种，也可能有更多种。主流实证主义者着眼于脊髓活动缺乏主观意识而把它们看成是纯粹的神经现象—— 152

然而像我们曾提到的那样，实证主义者们却自己推论出了无意识皮层事件的存在。刘易斯仅仅是将同样的推理以一致的方式用到了脊髓反射中，从而认为脊髓中存在某种无意识感受。

刘易斯相信心理有三种水平：系统意识（例如，肌肉感觉——对躯体的模糊的、一般化的感觉）；感觉意识；理性意识或思维意识。他认为自己的实验证明了脊髓至少含有前面两种

意识。为了倡导这种学说,刘易斯写了多卷本的书《生命和心理问题》(1874—1879)。在这部书中,赫胥黎及其他人用来说明动物们都是自动控制的机器的证据,被刘易斯原封不动地拿来——根据他提出的所谓精神具有多种水平的不同立场,来反驳这种观点。

《生命和心理问题》相当有权威性,它不仅试图对有关心理学的各种各样的思路进行审视,而且提出特定的研究计划作为最有希望的可追随的研究路线。这部书分为三个部分:应用于心理学的一般科学哲学(《信条的基础》[*Foundations of a Creed*], 2卷本);从刘易斯的双重角度研究心理与大脑的关系(《心理的物体基础》[*The Physical Basis of Mind*]);对一般心理学概述,介绍了其范围与限定(《心理学研究》, 2卷本)。刘易斯未能在生前完成最后一部分;而是由乔治·艾略特对他的手稿进行了编辑并交付出版。

《生命和心理问题》这部书表明了英国人能够像德国人那样写出有关哲学的、经验的、生理学的心理学的多卷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可能洛采的《微观宇宙学》在研究的广度和概念上与刘易斯的著作最接近,而刘易斯的著作在生理学问题上的阐述比洛采更准确。)从许多方面看,刘易斯著作中所预见的发展趋势在 20 世纪最近几十年兴起的认知科学中才展现出来:他强调从当前(生理学或心理学)研究中选择成果来帮助进行哲学研究,而不是去建构心理模型或理论。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刘易斯常常指出那些已知信息无法解决问题的地方,就是他确信能够找到答案的地方。可能甚至有些令人惊奇,在刘易斯那一代人中,只有他同时强调心理的生理和社会基础。他固执地坚持对心理学进行的物理上的解释——总

的说来，他赞成这样做——如果不考虑相应的影响心理形成的社会因素，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刘易斯在《生命和心理问题》一书中特意用重要的一章来介绍康德，把康德主义认识论看成是先天论的心理学中的特例。这种看法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作家和心理学家中相当普遍，但却与19世纪德国人对康德的理解相距甚远，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刘易斯是否是这种看法的主要来源。

《生命和心理问题》第三部分中的2卷书，也就是《心理学研究》，代表的是一个未完成的更大的项目。这个项目的范围——就是刘易斯所设定的心理学的范围——是不同寻常的。他从心理状态的分类入手（就像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中所进行的分类），接下去讨论神经状态与心理状态的平行性，试图发展出一些感觉规律（就像费希纳和冯特曾尝试的那样）。他甚至更进一步尝试对那些与作为信号的感受（feeling-in-sign）相对立的自身感受（feeling-in-themselves）进行科学的解释或提出逻辑规则。显然，刘易斯高估了自己，我们将他1879年出版的《生命和心理问题》与G. 弗雷格同年出版的《概念演算》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后者使现代逻辑学成为了一门关于符号的科学（见第十章）。

尽管《生命和心理问题》一书篇幅相当长，但仍忽略了许多问题。刘易斯似乎对欧洲大陆新兴的实验心理学潮流无动154  
于衷。他与费希纳、冯特相当熟，特别是他曾赞许地引用了冯特的一些著作。但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冯特的哲学立场，而不是他的实验工作。此处，刘易斯不如布伦塔诺有预见性——布伦塔诺是另一部重要著作《实验心理学》（1874）的作者——他注意到了冯特的重要性，只是对冯特的内部观察这个概念存

有疑义。刘易斯(像洛采一样)更偏向是一位生理学家,而不是实验心理学家。更多的时候,他在家中广泛分析脊髓反射的功能,而不是去思考韦伯分数的问题或者去列出内省与内部观察之间的差异。

刘易斯的工作得到出版时,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了。专业化进程越来越快,并且与大学和实验室联合成为了继续前进的必由之路。尽管关于动物是自动控制的机器的理论以及刘易斯的新惠特主义理论都有自己的证据,但是在新的专业人员看来只有自动机理论更合适一些,因为他们希望生理学和心理学能够被认可为物理科学。刘易斯活到了刚好看到了新的专业心理学的崛起。1876年《心理》杂志出版,一年之后《大脑》杂志也出版了(这两种杂志的出版商都找到刘易斯寻求建议和帮助)。此时,冯特的实验室已经相当活跃了,甚至遥远的美国也建立起心理学实验室,在霍普金斯大学,皮尔斯进行着有关色调的心理物理学研究,而威廉·詹姆士正在哈佛大学演示青蛙反射和其他一些内容。对日常生活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正在被日益增多的专家们所抛弃,每个专家只关注人类心理问题中的一个片段:实验心理学家着眼于感觉和反应时;实验生理学家在分析反射通路;医学心理学家进行着对癔病、癫痫以及中风的研究。刘易斯去世后,专业化的倾向更快了,因为他留下了一笔钱在剑桥大学的生理学系按德国模式建立了学习基金——这笔遗赠大大刺激了随后20年中英国还原论生理学的发展。但出乎他的预料,对脊髓功能进行机械分析(并与大脑和心理的双重性解释结合在一起)的最伟大的倡导者,查理斯·谢灵顿,就是在刘易斯遗赠下进行研究工作的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理学家之一。



看来，刘易斯本人对英国生理学研究专业化过程的影响是把他最终评定为一位过渡性或边缘性的思想家的一个主要因素。他的有关身体和心理是相关联的两方面的实证主义非常盛行，成为了实验心理学家与生理心理学家的某种交汇点。但他进一步的论断则被忽略了：两方面理论与那种认为神经活动出现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心理状态和过程的观点相一致——甚至可以表明这种观点。主流实证主义提出的逻辑无意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背景下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刘易斯提出的观点认为到处充满感觉的躯体具有许多自我无法通达或控制的感受，这种观点是无法被接受的，事实上没有经过严肃的考虑就被放到一边去了。并且，受到刘易斯鼓舞的实证主义者发现没有必要去考虑生理心理关联的意义，需要关心的应仅仅是测量的问题——这是实验室中进行研究的方式。况且无意识的感受是无法测量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新心理学家们都完全放弃心身关系的意义这个问题。年轻的威廉·詹姆士在回顾刘易斯的《生命和心理问题》一书的第一卷时，同时对刘易斯和他的反对者进行了批评：“事实上，仅仅说脊髓损伤的人的腿仍有感觉而他却无法感受，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希望了解的是腿是如何感受的，在进行感受时它们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仅仅当它们在器质上与大脑相连时它们的感受才能构成自我的一部分。”詹姆士并不是我们通常所接受的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者，他仅仅是想了解这些东西，然而他却注定是少数人之一——大多数新心理学家把实证主义看成是科学进步的黄金机会。

156

## 第二节 实证主义的盛行

在 19 世纪末,实证主义思想在整个欧洲非常盛行。每个人都是实证主义者,至少他们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即便是像弗洛伊德和胡塞尔<sup>①</sup>那样的不大可能是实证主义者的人们偶尔也自称为实证主义者。像赫胥黎和廷德耳那样的持自动论观点的人们是实证主义者,而认为这两位把神经系统搞得颠三倒四的刘易斯也是实证主义者。冯特严格坚持在实验心理学(但不是在其他领域中)中进行测量,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但冯特遇到的最有影响力的对手——詹姆士——也自称为实证主义者,尽管詹姆士认为测量的问题是科学心理学中最不重要的部分。这个称呼的过度使用自然会干扰历史学家对不同倾向进行分辨的能力。为了理解 19 世纪 80 年代,我觉得有必要在心理学中将实证主义者限定为那些倡导类似于刘易斯的身心两方面观点的的思想的理论家。这样的思想在新心理学的倡导者中极可能是最盛行的,那些大众化的作家尤其如此,李播<sup>②</sup>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有关英国和德国心理学的著作作为 19 世纪 70 年代的法国带去了实证主义的福音。同时,这

---

① 胡塞尔, E. (1859—1938 年), 德国哲学家, 现象学的创始人。他捍卫了哲学作为一门先验的学科而不同于心理学的观点。著有《逻辑研究》等。

② 李播, T. (1839—1916 年), 法国心理学家、哲学家。他是《哲学评论》的创始人和首任编辑。在心理学上, 受英国联想主义和冯特的实验心理学的影响。著有《心理的遗传》、《记忆障碍》、《意志病》、《个性病》、《情绪心理学》等。

些思想家把心理世界和物质世界看成是两类彼此分开的现象，二者能够通过生理和心理实验关联在一起。通过这些实验，不仅可以得到质的关联，例如一个特定的刺激与一个特定的感觉之间的关联（如一个特定的震动与一个特定的音调之间的关联），甚至可以得到更好的量的关联，例如选择反应时。但这些实证主义者中许多人超出了刘易斯的关联哲学，认为存在着足够的证据说明只有一类现象——与物质相联系的世界——具有因果功效。就是说，这些实证主义者中许多人也是某种物理主义者，否认心理状态具有因果功效。

赫胥黎在他有关动物自动论的演讲（1872）中使用的比喻（可能引自 S. 霍奇森<sup>①</sup>的《实用哲学》，1865）很好地把握了这种观点的本质：“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就像时钟的铃铛与机件之间的关系，而意识回应了铃铛受到撞击时发出的声音……大脑物质的分子变化立刻引发……各种意识状态……[但是]无法证明任何意识状态是肌体物质活动变化的成因。”

任何熟悉早期有关心身问题的争论的人，尤其是熟悉 17 世纪末的那些后来被休谟总结过的争论的人，都会注意到此处的错误。就像无法证明心理状态能引起身体状态一样，也无法证明身体状态能够引起心理状态，尽管赫胥黎等人认为有证据证明身体状态能够引起心理状态。一种身体状态，例如大脑中神经的一种状态，可能与心理状态相联系，例如感受、思想或梦，但是我们却偏偏无法说明是否是身体状态引起了心理状态。神经活动的变化如何能够成为引起新感受或梦

<sup>①</sup> 霍奇森，S.（1832—1912 年），英国哲学家。他持内在哲学观点，致力于意识内容的分析。著有《时间与空间》、《反省的哲学》、《经验的形而上学》等。

的原因呢？这里的难题是要试图去理解因果关系，而不是去  
158 理解心理和物质的相互作用。19世纪末的大多数思想家都认  
同身体状态与心理状态之间通过特定的规律或规则相关联。  
然而，相关并不能表明因果关系，我们也只能（像休谟那样）把  
所有的因果关系都简化为单纯的联想，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对  
身体具有因果作用的同时，身体对心理也有因果作用；或者我  
们满足于认为心理状态与身体状态彼此是平行的；我们无法  
提出别的观点。（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许多像赫胥黎那样的  
思想家想当然地把心理状态看成是意识状态，尽管此时人们  
已经开始对无意识心理状态产生了兴趣。）虽然像布伦塔诺、  
马赫和詹姆士那些思想家很快就指出了实证主义者所犯的哲  
学错误，但这也无法阻挡实证主义立场在心理学和各种科学  
中的盛行。

我认为广义的实证主义立场如此盛行有三点原因：它是  
进步思想；它是无神论思想；虽然受到批评家的公开指责，它  
仍是反唯物主义的思想。实证主义思想的进步可能是其中惟  
一可以归功于它的创立者——孔德——的原因。孔德坚持认  
为人类的进步是通过思想阶段来实现的：从神学到形而上学，  
再到实证主义，每个后续的阶段都是前面阶段基础上的进  
步。孔德还断言自然科学到达了实证主义阶段——它不再使  
用那些无法观察到的力来解释现象，神学中的术语也使用得  
很少了——但社会思想却滞后了。于是，实证主义就可以为社  
会科学的进步提供简单的框架：放弃形而上学问题。然而实  
证主义者们始终没有认识到他们自身的形而上学，例如身心  
两方面理论，并且坚决反对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建立在形而上  
学之上的。他们错误地却响亮地坚持认为以原子论为基础的

联想主义形而上学中所描述的一系列现象是简单的事实或者纯粹的现象，并不能表明更多的东西。他们竟然坚持实证主义科学只能建立在这些事实之上。实证主义者通过把自己的形而上学奉为科学，从而获得了特许去忽略其他人对实证主义假设提出的难题和疑问（他们把这些问题视为形而上学问题，因而不值得回答）。

另外，实证主义思想与唯物主义科学的传播方式不同，它对宗教并不构成威胁。实证主义拒绝根据神学来解释世界，常常被认为是反对宗教的。担忧实证主义是反宗教的在当时确实相当普遍，那时，保守的基督教仍试图在解释的问题上与科学一决高下。但随着自由新教神学的兴起，以及比利时的C. 麦西埃的新托马斯主义<sup>①</sup>的兴起，“进步的”基督教思想家逐渐接受了宗教与科学是两个独立领域的观点。在这个方面，自由的神学家与主流的实证主义者们的意见是统一的。例如，当赫尔伯特·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被不尊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教新教徒攻击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时，我们看看他的回答：“我不仅没有在任何地方表述过这种结论，而且我确定从这本书的大体意思中也无法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我与大多数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人们观点一致，即神的存在与否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

① 新托马斯主义是一个宗教哲学流派，主要为天主教教义提供哲学依据。它形成于19世纪末，是13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在当代的继续和发展。主要流行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德国和美洲大陆等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和地区。比利时的红衣大主教麦西埃是这种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后来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马里坦、吉尔松、夏尔丹，瑞士的波亨斯基等。

如果神学家都能够终止从科学上去“证明”自己的理论，那么实证主义者就可以通过让科学家相信宗教的假设是在科学所能验证的范围之外，从而与神学家们殊途同归。但是，弗洛伊德和达尔文却不肯遵守这种不可知论的休战协议，从而使他们成为了危险的思想家。

实证主义不仅在宗教方面采取不可知论，而且它还是反唯物主义的思想。这种反唯物主义思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参照了新的科学哲学——至少直到 20 世纪初，一直为大家误解了。事实上，威廉·詹姆士将 19 世纪 80 年代中大部分时间用来指责心理学中的实证主义运动是宿命论与唯物论的混合物，他把这种混合物称为心理的自动机理论。

柏林的杜布瓦-雷蒙、伦敦的赫胥黎和克利福德很好地表达出实证主义中的反唯物主义思想，这种反唯物主义不是来自身心两方面的形而上学，而是来自他们对特定的科学哲学思潮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朗格的《唯物主义史》首次清楚地表述了这种新的反唯物主义论断，在 19 世纪后期的三十多年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代自称是生理心理学家的人们试图认为生理状态决定心理状态，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令人惊讶地对有关因果关系的本质的哲学精髓很漠然。与此同时，新心理学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于坚持认为，总体来说，科学论述本质上是对许多系列的数据进行重述，是对现象进行重新描述。这样，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都同样把科学家通过观察和实验能够得到各种现象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而那种认为“大脑状态引起心理状态”的简单公式需要重新修正。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这个公式应读作“大脑状态所表现出的许多现象与心理状态所表现出的其他现象相关，这种相关

的方式使得大脑状态好像会引发心理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像赫胥黎所谓的大脑状态引发心理状态的论断不是关于物质的论断，而是有关现象的论断。例如，赫胥黎总是很谨慎地说明那些被生理学家描述为大脑状态的现象似乎会引发其他现象，例如心理状态或行为。赫胥黎对物质的看法与马赫和赫兹相同：科学家对现象所做的一系列观察。因而，19世纪80年代最受指责的“唯物主义者”——赫胥黎、廷德耳和克利福德——都只是这样或那样的现象主义者，而根本不是唯物主义者，这种提法虽然有些令人震惊，却是正确的。

实证主义潮流使一种泛现象主义的变式重获新生，这种思想的支持者们令人惊讶地默认了对所谓的基本现象的分析，即感觉的分析。于是，那些见解与兴趣不同的思想家们都同意所有科学的基础“数据”就是感觉。一时间，对感觉的分析似乎沿着小穆勒所勾画出的路线不断发展，但是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有许多理论家——特别是马赫、黑林、卡尔·斯通普夫<sup>①</sup>和詹姆士——与多数人的意见不同，开始质疑有关所有感觉都是简单的这一假设的经验基础（参见第十一章）。

虽然我们作为20世纪的人对各种现象主义很熟悉，但不应因此而忽略这种实证的现象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大约在1850年以前，知觉证据一直被科学家当成是表面的数值：石头在这里，这个仪表读数为这个数值。而此刻，即便是这样通常的观察也遭到怀疑，被简化为感觉主义者的“现象”：我通过

---

<sup>①</sup> 斯通普夫，C.（1848—1936年），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和音乐家。著有《音响心理学》、《论身和心》、《音乐的起源》、《哲学漫话和报告集》等。

感觉推论出石头在这里或仪表读数为这个数值。这种知识界的动向与把哲学看成是一种关于科学的科学——一种科学哲学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动向过去不具有、现在也不具有其他的原由。无论自然主义者还是实验家、甚至理论家,都无法从这种对观察的破坏中有所收获。即便是生理心理学——这种科学倡导感觉主义——也无法从这种怀疑的做法中受益。“我从我的感觉可以推出被试在听刺激 X”,这种说法对心理学能有什么帮助呢?

实证主义本身才是新实证的感觉主义的惟一受益者。如果对世界的所有认识都是在(小穆勒所说的)感觉基础上进行推论的结果,那么对心理状态的认识与对身体状态的认识刚好是同等的。我们甚至可以像推论物理现实那样推论自己的心理现实。斯宾诺莎所说的不可知的物质具有两大类特性,一类是心理的,另一类是物质的,这种观点被斯宾塞、刘易斯和赫胥黎所谓的具有两大类推论出的特性的现象世界所代替,这两大类推论出的特性中,一类是心理的,另一类是物质的。从这种新的视角来看,所有试图理解感觉真正是什么,或者试图理解什么导致意志的产生,或者试图探讨思维的本质是什么——这类自然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这些尝试都是受误导的结果。正如穆勒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一切或者是直觉到的,或者是推论出来的。在前面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到,直觉仅仅局限在简单的感觉中,直觉是如此简单和不真实,以至于无法观察到,于是整个世界中的其他一切都是推论出来的,无论是石头、动物、星星还是情感。

可见,在 19 世纪后期的思想中,小穆勒的逻辑无意识不仅是起关键作用的本体论,而且也是重要的认识论。他认为,



在现象“背后”，只有基本感觉以及推论出我们所认识的现象的那些准逻辑过程。穆勒和赫尔姆霍茨都认为，我们不能直接认识感觉，因为我们的经验产生了许多“自动的”且无意识的推论使得我们无法认清最初的感觉。因此，穆勒的直觉有可能成为斯宾塞所说的不可知的世界，或者冯·哈特曼的无意识：这部分宇宙我们猜想是存在的，但它却永远隐藏在现象的面纱下面。可见，世界逐渐可以被划分为两半了：现象世界和不可知的世界。 163

### 第三节 对世界的划分：

#### 杰凯尔医生与海德先生

于是，康德对本体与现象的区分在 19 世纪后半叶重获新生，并且具有了全新的含义。世界被认为可以划分为可知的与不可知的，可以划分为现象的与所有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可以划分为光明的与黑暗的。现象世界是可知的和理性的，是科学的素材。但是世界可能还包含着现象世界之外的另一部分……

1848 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欧洲世界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出现了新兴的专业精英——银行家、大律师、教授和医生，而另一方面，产业工人阶层却在体察着城市贫民窟中更加痛苦的生活。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并要求“把文明带到全世界”，而另一方面却是在文明的名义下进行着惨无人道的屠杀和掠夺。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这种分化的烙印。在阅读

狄更斯的讽刺小说《艰难时事》以及左拉的《萌芽》的过程中，读者已有的价值观会受到贫民窟中的居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令人不快的对比的冲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所有小说都包含有对生活在新城市中人们的心理分化的精彩描写。

然而这个时期的哲学文献却与文学作品完全不同，很少或几乎没有谈到这种分化。为了回顾这种状况，我们现在可以读一下克尔凯戈尔或尼采的大部分著作来了解人类心理的分歧——但这二位在 19 世纪末以前影响很小，即便到了 19 世纪最末期，他们产生的影响也主要是在学术领域之外。另外，心理病理学的文献，尤其在 1880 年之后的文献，确实反映出了这种二元性。第二自我(second self)的观点，特别是隐藏着、危险的那部分自我被广泛讨论。然而，这些工作大都来自唯灵论或与唯灵论联系密切的人们，因而只能在受人尊敬的学术圈的边缘徘徊；这些思想长期被忽略，直到最近才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可见，实证主义通过在冷静的、明亮的且可控制的现象世界中寻求解脱，并回避可能隐藏在其后的无序的、晦暗的且不可知的世界，而很好地适合了主流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的要求。

尽管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哲学家们很强调无意识在人类本质中所起的作用，但他们却令人惊讶地没有讨论我们今天认为与之关系最密切的问题——把无意识看作是非理性的来源，并且是把有意识的心理限制在外显世界之中的工具。我们曾经提到，新心理学家们或多或少地受制于他们所坚持着的穆勒式的感觉主义，从而提出了一种逻辑无意识。新心理学家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持谨慎态度来看待当时的医生、艺术家等人对不大理性的无意识所作的分析。罗伯特·路易

斯·斯蒂文森<sup>①</sup>的小说《杰凯尔医生与海德先生》(1889)是后维多利亚时期对于无意识的最尖刻的文学研究之一,简要地浏览一下这本书可能会帮我们了解非理性的无意识的重要之处。

斯蒂文森的故事是严谨地按照自外向内的顺序来写的,这样读者在听到杰凯尔本人的谈话之前,会先读到一些外部事件以及其他观察者的经历。大概其他的观察者比我们自身能更好地判断无意识动机——这会令那些认为所有的心理学都基于内省的人感到不安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海德先生在他的遗嘱公之于众之前一直没能为自己辩解。这样,按照良好的实证主义模式,读者可以看到两类事件之间的相关:杰凯尔医生喝了一剂药水与随后出现的那个个体——海德先生之间的相关,这位海德先生如此邪恶以至于普通的灵魂很难正视它。与此平行,读者还了解了杰凯尔医生早年的在闲散浪荡的生活方式与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之间进行的斗争——许多读者肯定对此很熟悉。一些读者可能会发现第二个相关之处:杰凯尔无法放弃“低级快乐”与他暴力型的身体之间的相关。很容易想见波西米亚的斯蒂文森编写这样一个故事部分地为了取笑那些令人尊敬的专家,他们偶尔在酒精、性欲和其他“社会无法接受的”快乐中放纵一下自己,却把这些活动进行保密,并且与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分开。

杰凯尔医生的证词出现在故事的高潮,分别推动了这两处相关事件的发展。读者看到了药水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杰

---

<sup>①</sup> 斯蒂文森,R. L.(1850—1894年),英国作家。著有《金银岛》、《绑架》、《巴伦特雷少爷》、《赫·米斯顿的韦尔》、《杰凯尔医生与海德先生》等。《杰凯尔医生与海德先生》又译为《化身博士》。

凯尔医生的自我的另一面——这一面沉溺于“低级快乐”之中。杰凯尔说他在寻找方法来把自我中低级的方面区分出来，使它们远离自己另一方面的积极向上的生活。但随着读者接下去听他的叙述就会发现，杰凯尔的低级自我一旦被允许展示自己的能量，就开始越来越多地要求杰凯尔的心理资源，不久就统治了他的整个生活。但很难知道杰凯尔对此理解到什么程度。斯蒂文森的天才使我们相信杰凯尔至少对这个过程有些察觉，但杰凯尔是否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这个问题却留给了读者自己去作出结论。

166 斯蒂文森的故事不仅观察敏锐，叙述精彩，而且还有许多地方值得说道。例如，可以认为斯蒂文森通过这个故事来分析酒精成瘾对人格的影响。然而，此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个体的两个“方面”相联系的那种惟一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转换(alternation)。杰凯尔医生告诉我们，他与海德只共享记忆，而不共享其他心理官能。他们两个中的每一个最初都忽视——后来蔑视——另一个的信念与品味。但这个故事说明了在态度上这样彻底的区分仍是不稳定的，而海德的偏好在杰凯尔的身上神出鬼没。于是，用新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一个系列的经验由于从中进行推论的不同可能发生分化。杰凯尔喜欢什么，海德就讨厌什么，反之亦然。就像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工人与老板可能会对同一系列的现象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那样，杰凯尔与海德在故事中同样用相互冲突的方式来看事情。

斯蒂文森从“分离”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灵魂，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及其对无意识的看法既有对立的地方，又有平行的地方。从表面上就完全可以观察到，被分离的两边中的每

一边看上去都是一系列连贯的现象。但故事中却很少提示或者根本没有提示杰凯尔医生“底下”可能隐藏着海德那样的动机，这些动机杰凯尔是意识不到的，却影响了他的行为和信念。这里，无意识被看成仅仅是新的、独立的另一方面的现象或是对现象的解释，假使能够看到的话就会发现，无意识就像意识到的心理一样。由此，可以想见一个人可能“含有”对可利用的经验的两种解释。甚至还可以想见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两个（或更多的）人，每个人对可利用的经验的反应与解释都是独立的。然而，随着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1900）和詹姆士的《宗教经验之种种》（1902）的出版，一种更为动态和隐蔽的无意识观点才流行起来。以 20 世纪的观点来看，无意识不再是独立的个人，而仅仅是对可利用的感觉数据的解释。根据较为现代一点的理论，无意识或是隐藏在现象背后（弗洛伊德）或是总处于意识的边缘（詹姆士）。詹姆士与弗洛伊德都认为无意识可能会在幕后影响个体的态度和信念。 167

可见，19 世纪后期，实证主义本身的表现是拒绝对某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考察。实证主义者们放弃了那种认为特定的一些愿望和态度可能隐藏在自我之外的观念——甚至把无意识推论的存在假设为以经验上的原子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副产物。新心理学家之所以倾向于拒绝弗洛伊德和詹姆士的观点，是因为这些新观点与经验上的原子论互不相容。那些提倡无意识动力学的心理学家们也渐渐地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新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方法：詹姆士、弗洛伊德、荣格等人对词汇联想方法很感兴趣，但他们不是去测量反应时，而是去窥视那些用内省或直接分析无法观察到的有意义的领域。由于新

实证主义心理学家在有关心理的本体论问题上存在的盲点，以及他们对机制感兴趣而对意义缺乏兴趣，使得他们不能接受这种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创新性的应用方式。众所周知，实证主义心理学对动力心理学持缄默的态度。但大家还不大知道，实证主义者拒绝进化论心理学，甚至拒绝查里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心理学，尽管达尔文毫无疑问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更早期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新实证主义心理学不能正确对待那些回避感觉原子论的心理学理论，上述事例证实了这种思想危害科学心理学的发展。

## 另一个达尔文

查理斯·达尔文是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孙子，尽管他是一位模范的科学家，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不能作为科学家学习的榜样。达尔文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单枪匹马地在多个领域取得了 19 世纪最伟大的进步，涉及了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到实验植物学和动物喂养等诸多领域——不仅这些，还有进化论和心理学。但是这位成就累累的人物只是独一无二的特例，他的方法和程序别人是无法仿效的。达尔文拥有足以自立的财富，他不必为谋生而工作，于是他可以把生命中宝贵的工作时间真正用到科学研究中去。尽管他有时是隐居的，但他早年的成功（来自在贝格尔 [beagle] 号上的海上旅行）使他渐渐成为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生物学界（由植物学家、地理学家等组成的团体，在英国首都聚会）的领头羊。达尔文由于具有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才能使自己处于一所与周围世界联系着的“看不见的学院”之中。与达尔文交往密切的人们中，许多是当时最出色的科学家。达尔文不仅具有优厚的社会背景，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广泛且深入的科学能力，加之 40 年极为艰苦的工作，种种因素和在一起，使得达尔文能够在一生中取得 19 世纪最伟大的

智慧成就之一——可以说他的成就无论在任何世纪中都是相当伟大的。

## 169 第一节 达尔文间接带来的革命

达尔文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他产生影响的方式中也反映了出来——他的影响几乎完全是间接的，他是通过著作或者其他科学家对他的著作进行的讨论来产生影响的。达尔文从未在大学中作过演讲，并且随着他的学术地位的上升，他参加的科学会议也越来越少，《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他也没在任何会议就此发言。可见，那个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从未公开演讲过他的进化论，甚至没有以课堂讲授的形式公开演讲过！从这个角度说，达尔文没有自己的学生，他只有支持者和追随者——其中许多人急急忙忙地想去填充由于他的腴腆而造成的公众认识上的真空。

缺乏得到达尔文真传的年轻的骨干生物学家，这对所谓的达尔文进化论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这使得那些对自然选择持动摇态度的思想家们无法突出出来，他们本该受到更多注意。达尔文著名的“斗犬”T. H. 赫胥黎，对达尔文有关物种的体系和本质的理论并不怎么认同（他曾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尽管赫尔伯特·斯宾塞被大家公认为是当时照亮了进化论的明灯，但通过回顾我们很容易发现，他的功绩应打上大大的折扣——因为他对达尔文理论几乎所有的细节都不大清楚。因此，《物种起源》出版之后，有关进化论的激烈争论倾向于越来越注重与进化有关的一般性问题，例如，特别是像人与



动物之间在进化上的连续性这样的问题，而避开对生物现象和过程进行具体或细致的讨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之后数十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却很少得到讨论，甚至在今天，除了极少数专家之外，仍不为人所知。这真是重大的损失，因为达尔文在这部著名的著作出版之后的23年中，把他每一分宝贵的能量都用在以天才的方式来扩展和验证他的理论上了。

达尔文在教诲学生上的失败还带来了另一方面的结果，就是没有给子孙后人留下有关达尔文成就的整体模式的清晰画卷。直到最近，即便是严肃的科学史家也把达尔文看成是那种令人困惑的自然主义者，通过仔细考察地层、植物和动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他的理论。但事实上，达尔文是欧洲科学中的最顽固的实验主义者之一，他经常通过自己的实验来追踪他的理论的细微之处的意义，并且鼓励其他人帮助他进行更深更广的研究。然而，因为他是一位独立的学者而且没有学生，以至于没有哪个学者能够熟悉达尔文的全部成就或者是把握其成就的范围。（乔治·J·罗马尼斯<sup>①</sup>或许可以看成是这条规律的一个例外：在某种程度上看，罗马尼斯是达尔文生命最后六年中的一位非正式的学生。）

于是，关于生命、行为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尽管充斥了对达尔文所产生的影响的讨论，但是这些历史通常是误导性的和

---

<sup>①</sup> 罗马尼斯，G. J. (1848—1894年)，英国比较心理学家。他是达尔文的好朋友。

曾出版过三部曲来论人类与动物的连续性，它们是《动物的智慧》、《动物的心理进化》、《人类的心理进化》。

不完整的。心理学史尤其如此。在心理学史中,达尔文被完全看成是一位对我们目前所研究的心理问题有过一些思考的理论家——主要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进化论(有关进化论问题,不仅仅是达尔文,许多思想家都分析过这个问题),而很少重点提及自然选择(这是达尔文对理解进化过程而作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在略好一些的历史中,会提到他对表情有浓厚兴趣,尽管这些书中并没有说明他的兴趣是来自验证其有关性别选择理论的意义需要,或者是来自细致地分析其新  
171 方法论的需要。实际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出版后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都用来从事与行为和心理直接有关的实验研究。尽管达尔文确定无疑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但是下面一段所提到的一些研究却在心理学史文献中从未讨论过——事实上,通常甚至不提这些研究!

达尔文的《家养动物和植物的变异》(1868)中许多内容与行为的遗传可能性有关,例如,在书中达尔文细致地注意到,养狗和养鸽子的人是如何在努力选择动物的行为特性。读者很自然地会去翻翻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以查看他对人类进化的看法,但是读者最好不要对其中另外几百页视而不见,因为那部分谈到了动物求偶和交配仪式的起源及功能,还有达尔文对动物行为和进化中社会互动效果的分析。《交叉繁殖与自我繁殖对植物的影响》(1876)中有几章对蜜蜂的行为进行了精细的实验。达尔文不仅研究了蜜蜂的空间定向,还研究了它们的捕食模式,他发现蜜蜂会根据花的不同以及与其他蜜蜂的竞争来变换它们的捕食方式。达尔文关于植物运动的三本书展示了他至少 20 年的辛苦工作以及成百上千个实验。总而言之,这些有关植物生理学的划时

代的著作导致了植物生长素等植物激素的发现。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蚯蚓的活动利于肥沃土壤的形成》(1881)中,达尔文报告了数十个有关蚯蚓感觉过程和掘洞行为的实验。

可见,达尔文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他的理论对“科学”心理学有所贡献,并且他的实践活动对实验心理学也有很大贡献<sup>172</sup>。然而尽管达尔文声名显赫,但他的这些贡献却不为大家所知。心理学史界的老前辈,E.G.波林曾经提到(《实验心理学史》):“英国大学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倡导实验心理学,结果造成了实验心理学在英国出现得要晚”。他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达尔文的努力工作(也包括刘易斯等人的努力工作),而所幸之处在于他仅仅是把大学作为科研的基地。但这种缺乏考虑的观点却再三地传播开来。

## 第二节 令人烦恼的达尔文先生

达尔文立足于自然选择提出的进化论毫无疑问是19世纪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最著名的——科学发展。正因为如此,在讨论那个年代的知识趋向时,进化论常常占据中心位置。但是,现代人在如何看待达尔文的问题上却遇到了困难,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认识到了他的贡献的深层含义。在当时这些含义还没有真正展示出来,尽管达尔文作为伟大的科学家既受到赞扬也受到指责,但他独到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了解,总体说来,他在短期和中期的影响力还不如斯宾塞大。正如我曾提到过的那样,这种状况的成因部分地缘于他作为独立的学者而处于特殊的地位。当然,达尔文工作不大被接

受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思想的革命性的本质。通常认为 19 世纪中期，产生进化论思想的背景已经成熟。这种看法有些道理——斯宾塞的早期进化思想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出现了，而 A. R. 华莱士在那个年代也独立提出了有关自然选择  
173 的理论。尽管我们不能过分贬低达尔文在进化论上的贡献，但是他的贡献却不仅仅是进化论；他更重要的贡献是以自然选择观点的意义为基础非常激烈地对有关自然和历史的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在 19 世纪中期，欧洲大多数严肃的思想家都渴望听到对自然和文明史的进步见解。那些通常由激进的思想家（例如，伊拉斯马斯·达尔文）提出的进步思想此时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广泛接受。人类是地球上最发达的动物，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而一些人（有钱的欧洲男人们）就更是出类拔萃了——有谁会怀疑这种想法呢？历史学家和传媒工作者同样在宣扬这种世界观，并且对那些胆敢反对由此产生的欧洲人对自己优越性的共识的人们——例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 1857 年印度大兵变的参与者——进行野蛮的种族主义攻击。达尔文的新理论完全支持了这种沙文主义倾向；如果理解正确的话，这个理论从当时所接受的意义上看并不进步。更糟的是，作为自然选择发动机的性放荡或者至少可以称为繁殖成功，工人阶级、农民或“本土”家庭比新兴的城市精英在这个特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达尔文的理论对神学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因为他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在解释物种的变化，达尔文迫不得已地去指责神学的生物学（这种生物学认为上帝才是世界的创造者）。许多早期提出进化论的理论家，例如《创造的遗迹》（1844）一书的

不知名的作者——这本书在颅相学家中间颇为流行——认为自己的观点能够与全能且仁慈的神创造了世界的观点彼此相容。斯宾塞当然也没有否认神的存在，尽管他所谓的不可知的神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仁慈的。达尔文的理论恰恰切入了这类思想的要害部位：达尔文似乎在说，如果上帝存在的话，<sup>174</sup>那么他一定是最坏的虐待狂，他对浪费和放荡的支持超出了有记载的历史上最糟的统治者的想像，并且表现出令人震惊的邪恶。19世纪中期人们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不安，因为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就无法回避掉这样的推论，即达尔文所勾画的宇宙中的任何上帝都会受到繁殖和性的困扰。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用聪明的委婉的说法来谈植物的生活和爱，曾给那个世纪之交的人们带去一丝快意，然而其孙子对“适应”的悲观见解却使许多思想健全的人们感到恐惧，他们无法相信在大多数人类情感、活动和制度中，性冲动起了因果的作用。

进一步说，小达尔文在抛弃了上帝的同时也抛弃了灵魂。其理论产生的一种后果就是科学兴趣的转移，科学兴趣远离了对非物质的原理（例如联想规律）的分析，而走向对变异和变异的遗传进行非常具体的考察，包括行为和知觉中的变异。达尔文明白这些变异本质上就是神经系统结构上的变异。在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当中，达尔文的发现是其中惟一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的。它几乎或完全没有反唯物主义论断，即便在实证主义版本中也如此。令人惊奇的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突出强调他研究的是进化的真正原因，但同时期欧洲所有主要的物理学家们都倾向于把规律看成是仅仅对现象作出的概括。达尔文无疑使用了实证主义手段，但即便如此，他的做法也与众不同。例如，他的泛生论

(pangenesis)规律(在《家养动物和植物的变异》一书中)是以大家所接受的实证主义方式对几个系列的现象进行总结而得到的,但是达尔文把这看成是极为痛苦的尝试,他把这个规律仅仅称为临时假设,并曾公开和私下里谈到他希望能发现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达尔文在无法让自己信服自己发现的是真正原因时,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事实上,他彻底病倒了。达尔文从未向实证主义世界观的诱惑低头。令人惊奇的是,他寻求对自然现象作出因果的解释的信念无论如何都不曾动摇过。

总的说来,19世纪的人们已经准备好接受进化论思想,但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准备接受达尔文提出的以自然选择方式来实现的进化论。进化论可以采用历史进步主义的形式出现,而显得“温顺”些,尤其是可以把人类和其他“好伙伴”视为处在发展的顶端。但达尔文的理论却不能用来证明这样愚蠢的看法。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精英对进化论的接受程度是有限的,他们把进化看成是神的某种计划,特别是如果说上帝曾计划过进步的过程,那么这种计划就会影响到19世纪文明的方式。并且,那种认为上帝曾安排人类演化出一个灵魂或仅仅是把灵魂灌输到特定的一些动物种系中的笼统的理论,也是可以与广义上的世界是进化的观点相一致。A. R. 华莱士曾和达尔文一样独自提出了对自然选择的看法,但他从不接受那种认为性选择在进化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最终在他对人类进化的解释中也就具有了神的色彩。达尔文曾在私下的书信往来和公开的发言中彬彬有礼却坚决地对华莱士提出了警告。

在试图毁掉达尔文的令人烦恼的自然选择理论而提倡一

种更通常意义上的进化观点的问题上，实证主义成为了主流思想的主要同盟。达尔文对真正原因坚贞不渝的兴趣使他成了实证主义的敌人。当有人向达尔文提出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假设时，他不是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把这些假设当成是与科学无关的东西而抛开，他却像验证其他假设那样验证这些假设。例如，伟大的美国植物学家（也是达尔文的朋友）A. 格雷提出了上帝并不是去创造不同的动物物种，而是通过引导动物和植物所进行的变异，从而也会同样出现某种类似的进化结果，达尔文把这种思想当作一种挑战。在《家养动物和植物的变异》一书中，达尔文始终在寻找证据来支持或反对格雷的假设，最后得出绝大多数证据反对这个假设（事实上，格雷也承认了这一点）的结论。然而，实证主义者可能还会说，由于达尔文对进化或变异的原因缺乏直接证据，他的理论仅仅是对现象的概括，还与其他解释留有空间。有趣的是，19世纪70年代的宗教思想家通常采用这种聪明的手段——就像在第六章中曾谈到过的形而上学协会的许多成员在进行讨论时的做法。斯宾塞式的进化论实证主义就极好地掩饰了达尔文的思想及其威胁。

### 第三节 达尔文在心理学上的成就

查理斯·达尔文同他的祖父一样，并不相信鬼怪故事。但他的确相信进化存在着连续性，这种观点认为全新的特性是进化过程中的例外。因此，他把心理特性——即心理状态——看成是自然的实体。他既不考虑这些特性的心理属性，也

177 不考虑其物理属性。例如，他把表情看成是特定的感受状态与身体特定的表现的混合物，这些身体表现在人类中还可以看成是脸部的表现。在《人与动物的表情》(1872)一书中，有一幅画画着一只猫在蹭一个人的腿，旁边的说明写着“处于慈爱心理状态中的猫”。这种说法被后来的心理学家——通常是行为主义者——批评为对动物进行了人格化。对于这种批评，如果达尔文还活着，他可以强烈地进行反驳。他可以说那种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慈爱这种心理状态的假设是人中心化的。他还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是不能独立在心理状态之外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认为社会化动物的心理状态会对同类产生因果作用——在社会化动物中，是否有一个成员处于愤怒或慈爱的心理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性选择和自然选择会有利于那些相对来说更擅长体察表情的意义的个体。(这种观点体现了在大自然中心理状态的因果功效，后来威廉·詹姆士以此作为了他的机能心理学的出发点。)

达尔文还相信在非常低等的动物、甚至植物中都能发现心理状态的存在。他并不认为这些简单的机体会复杂的心理操作，而只是就简单的机体对自己周围环境的觉察能力进行了日常研究。在那本有关蚯蚓的书中，他报告了所进行的大量检测蚯蚓的感觉能力的实验，例如，在其中一个实验中，他发现了蚯蚓对亮光敏感——在达尔文居住的地方，流传着人们对着蚯蚓吹巴松管和短笛的有趣故事。达尔文使用新制的碳弧光发现大多数蚯蚓在这种强光下会退后。于是，达尔文在思考蚯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注意力”(power of attention, 他本人就是这样写的)，进而又对实验进行了重复，这次使用的是正在交配的蚯蚓。那些正在交配的蚯蚓对强光毫无



反应,这些实验结果使得达尔文得出蚯蚓确实有“一点”注意力的结论。 178

达尔文对动物心理学的严谨研究以及他的进化论(从进化论出发,他把心理状态仅仅看成是机体的另一种自然特性)使得他不相信那种把动物看成是机器的实证主义见解。当1872年赫胥黎在英国科学进步协会的会议上作他的著名演讲“有关动物是自动机的假设”时,达尔文嘲笑了他朋友的观点,他说希望那个具有解剖刀之锐利智慧的富有批评性的老赫胥黎能对新赫胥黎的思想进行回顾和反驳。10年之后,在达尔文写给赫胥黎的最后一封信中,奄奄一息的他还嘲笑赫胥黎,说他希望世界上有更多“像你那样的自动机”。在达尔文的实验中,无论何时,只要他发现了明显的、机械的行为模式,他总要寻找与这些行为相伴随的心理状态,并利用心理状态来设定实验条件从而引起行为的改变。他对蜜蜂捕食(采蜜)行为的研究就是体现出这种方法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达尔文证明了蜜蜂能够学会认识不同种类的花,一旦它们学会认识了这些花,它们就会以一种固定的方式在其中采蜜。然而,达尔文并不认为蜜蜂这样做是出于某种机械的本能,他认为这种能力可以被称为空间认识(spatial awareness)。本能的动机可以驱使蜜蜂去采蜜,但它确实无法帮助蜜蜂飞过田野去找到花丛——达尔文写到,这个过程是需要一点智慧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达尔文发现了当数量庞大的一群蜜蜂在同一丛花中采蜜时,蜜蜂会放弃它们所习惯的采蜜方式,实际上,它们通过破坏花的基部的方式以接近花蜜。这种方式是选择的结果,因为可以节省这种蜜蜂的时间,并且可能浪费它们竞争对手的时间。蜜蜂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选择的益处,但是它 179

们显示出了对花、花的位置以及竞争者的认识,这些认识使得它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

## 第四节 另一位不被赏识的改革者： 道格拉斯·斯鲍尔丁

达尔文的某些思想缺乏影响力,是不是主要因为学术界没有注意到达尔文这位私人科学家,或是达尔文的思想不合他们的胃口?从历史分析来看,这种涉及到相互比较的问题总是很难回答。然而,历史上却出现了很有趣的平行性,一位重要的英国实验动物行为学家,达尔文同时代的人,如今他的工作已经被确认为是具有创新性的,但当时却几乎毫无影响。将道格拉斯·斯鲍尔丁(? 1840—1877年)的职业生涯与达尔文进行对比,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确定学术制度或意识形态因素是否在拒绝接受达尔文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斯鲍尔丁在许多方面与达尔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尔文是两个重要的英国资产阶级家庭的后代;而斯鲍尔丁则出身于贫苦的苏格兰工人家庭,他生在伦敦,但在亚伯丁长大,他最初的工作是修缮屋顶。他是自学成材的,而他显然也受到了亚历山大·贝恩的注意,贝恩曾安排斯鲍尔丁在1862年免费听自己的讲座。于是,斯鲍尔丁来到伦敦,获得了律师的资格,并开始接触一些伦敦知识界的精英,例如约翰·廷德耳,非正式地跟随他们学习。斯鲍尔丁在伦敦的工作是当教师和律师,但他染上了肺结核。他为改善健康状况而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去旅行,结果在阿维尼翁遇到了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他们俩成了挚交,通过穆勒,斯鲍尔丁认识了安伯利伯爵及伯爵夫人,他们想雇佣斯鲍尔丁做儿子的家庭教师。在这件事情中,斯鲍尔丁继续当律师直至1873年,而后他签约成为了弗兰克的家庭教师,弗兰克是安伯利夫妇的继承人,那时他有一个1岁大的弟弟,伯兰特·罗素<sup>①</sup>。安伯利夫人1874年死于白喉,不久之后,1876年1月安伯利伯爵也去世了。安伯利夫妇安排斯鲍尔丁做了弗兰克和伯兰特的监护人,但安伯利的父亲,罗素伯爵(前任首相),使他们的意愿破灭了。罗素伯爵坚决认定斯鲍尔丁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因而不是合适的监护人。斯鲍尔丁离开了英格兰,再也没有回去过,1877年他死于法国。

在斯鲍尔丁去做罗素家孩子的家庭教师的前一年以及他在瑞文斯克洛弗特(Ravenscroft)做家庭教师的两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动物本能行为的本质的实验,在今天看来,这些实验使心理学领域中方法和理论出现了彻底的转变。同达尔文的情况一样,他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在大学那种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情况恰恰相反,安伯利夫人临去世前一直担当斯鲍尔丁的研究助手,显而易见孩子们也参与其中了。在1874年6月,伯兰特·罗素的姐姐写给奶奶罗素夫人的信中提到了后来夺去她和她母亲生命的白喉:“非常感谢您给的娃娃和摇篮。我得了白喉躺在床上,我的嗓子很疼。斯鲍尔蒂<sup>②</sup>有两只兔子。斯鲍尔蒂的屋子里还有知更鸟和

---

① 罗素, B. (1872—1970年), 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20世纪分析哲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曾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数学纲要》、《意志与真理的探究》、《人的知识》等。

② 斯鲍尔丁的昵称。

一个蜂窝。”大多数科学史家也许要怀疑科学的进步会来自受雇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且一无所有的家庭教师的工作，然而斯鲍尔丁的情况确实如此。

斯鲍尔丁的创新之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在其先驱性的实验设计中，他对与行为有关的因素的分离和控制相当完美。例如，为了研究空间知觉是先天的还是习得的，他并不是去探寻逻辑符号或特殊的神经能力，而是找到了一些受精的鸡蛋。他耐心地等着这些蛋孵化，然后“移开一小块蛋壳，在[小鸡]睁开眼睛之前，在它们的头上罩上一个小罩……这些人类好奇心的小受害者们就在人精心设计的条件下被首次允许见到光线。”在剥夺这些小鸡视觉不同长短时间（长达几天）之后，斯鲍尔丁对这些小鸡对昆虫、玉米豆等的反应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测量和计时。斯鲍尔丁这种“感觉剥夺”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仍是该领域中最重要实验程序之一。

斯鲍尔丁通过自己细致和控制的实验程序，还发现了所谓的发展关键期。他注意到那些自出生就被剥夺了感觉的动物不仅可以很快学会使用这种感觉，“而且它们还能够很快忘掉——非常快——它们从未练习过使用这种感觉。”在出生之后一天里被剥夺了听力的小鸡，能够学会朝鸡妈妈跑去并听从鸡妈妈的呼唤（后来，人们把这称为印记 [imprinting]）。然而，一只在出生后十天里一直在无声世界中成长的小鸡，“对听到的一切置若罔闻”，尽管鸡妈妈不停地呼唤，也不能让这只小鸡跟随自己。

与达尔文不同，斯鲍尔丁尽自己的努力来发表他的工作。他在赫胥黎宣布动物是自动机的那次英国协会的会议（1872）上，发表了他对本能的研究，并且后来在《麦克米兰斯》

(*Macmillan's*)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他写了大量的书评,大多写给了《自然》杂志,他在许多文章中讨论了自己有关行为和心理的观点。斯鲍尔丁追随斯宾塞的生物学理论,但却不支持斯宾塞晚期的有关不可知事物的哲学。斯鲍尔丁在心理学上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即使当这些思想导致了他与贝恩疏远时,他仍坚持自己的思想。斯鲍尔丁用严谨的实验来维护斯宾塞 182 有关关系发展经历着进化历程的观点,而不是像斯宾塞那样仅仅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因此,在前面的引文中斯鲍尔丁在描述本能消失时使用了“忘掉”这个词,这看来是相当奇怪的事情。斯鲍尔丁相信他证明了小鸡生下来就具有某些种类的来自遗传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如果在出生之后不久没有被利用起来,就会被忘掉。

尽管斯鲍尔丁所处的职位使他无法吸引学生,但他的工作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工作受到了达尔文和穆勒的赞扬,而且 G. H. 刘易斯还在《自然》杂志上写了一篇题为“本能”的文章(1873, vol. 7, p. 437):“斯鲍尔丁先生对心理学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无疑这将激励大家的研究热情,并且会对那些至今仍包裹在形而上学的迷雾中的现象提供一些理性的解释。斯鲍尔丁先生不仅证实了自己是一位锐利的思想家,而且展现出他在实验设计方面的奇才,我们相当盼望他的研究将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刘易斯的评论看上去有理有据,甚至预见现代发展的前景,但他还是说错了。斯鲍尔丁的工作仅仅代表了在动物行为的实验研究中成功的独特的例子。到了 1890 年,他的研究工作还是为很多研究者所知的,詹姆士曾提到过“斯鲍尔丁关于本能的那篇优秀的文章”,但是此后不久,斯鲍尔丁的工

作和名声就渐渐沉寂了。大约在 1950 年之后的 10 年左右,他才被“重新发现”,是 J. B. S. 霍尔丹<sup>①</sup>最初重新发现了他的研究价值。

## 第五节 新心理学中非自然主义的灵魂

可能由于斯鲍尔丁像达尔文一样没有学生,所以他们的研究无法产生影响;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斯鲍尔丁的研究工作像达尔文的研究工作一样,不能与新心理学家们的  
183 正统假设相适应。达尔文的自然主义心理学使 19 世纪末期的主流思想家们感觉非常不舒服。值得严肃考虑的是,达尔文的研究工作无法与敏感的神学问题区分开。他的工作似乎拒绝了那种认为上帝是存在的或者人类具有不灭的灵魂的假设。而斯鲍尔丁有关遗传的实验则更进了一步,暗示着“先天观念”可能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仅仅是自然选择的另外一种结果。

可是,新心理学家所要探索的领域与达尔文对无脊椎动物行为的实验研究不同,与斯鲍尔丁对哺乳动物和飞虫的研究也不同。对感觉过程、反应时、或者甚至记忆和遗忘的实验分析最初看来很有可能产生出比达尔文和斯鲍尔丁的研究更有威胁的无神论结果,更直接威胁到有关人类本质的传统观点。然而,得感谢这些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伎俩,使得这些研究

---

<sup>①</sup> 霍尔丹, J. B. S. (1892—1964 年), 英国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以重视普及科学教育而闻名。

最终看起来能够与有关灵魂的信念互相接纳——新心理学是对心理的实验研究；它不会同时涉及任何有关灵魂的特殊学说。如果想不损坏彼此间这种脆弱的折衷协议，新科学是无法吸纳像达尔文和斯鲍尔丁那些试图使灵魂自然化（或者甚至是唯物化）的思想家们的。新心理学不是一门要对关于灵魂的学说进行证伪的学科，而是一门帮助思想家们回避那些有关灵魂本质的理论冲突的学科。这种倾向性不仅使新心理学很难吸收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而且使它与另一门有关心理的学科——逻辑学产生了冲突。





## 1879年：哲学如何从 心理学中产生出来

在1879年左右正值盛年的那一代心理学家，使该领域有所改观。实验心理学的实验室在德国所有的主要大学中如雨后天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逐渐地，学者们首次自称为心理学专家——尽管在很多时候，他们还自称为哲学家或生理学家。美国人特地涌到德国的实验室去学习，并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到19世纪90年代末，心理学活动的中心已经开始向美国转移。由于英国和法国的大学中不倡导研究工作，主要出于这一原因，结果导致这两个国家落在了后面。尽管法国的A.比奈和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sup>①</sup>都有重要贡献，但是他们却无法找到德国或美国为实验心理学家提供的那种良好的学术机制。

然而，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强调过，当时大家并不把这场运动看成是在创立一门与哲学不同的学科。当时的人们把

---

<sup>①</sup> 高尔顿，F.（1822—1911年），英国科学家和探险家。他对遗传和智力进行了研究，是心理测量的著名先驱之一。他还是优生学的创始人。著有《遗传天赋》等。

这场运动看成是哲学和生理学的某些分支重获新生而且发生了转变，而并不看成是产生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冯特虽自封为新心理学的领袖，在19世纪80年代，却用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逻辑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心理学史家们从来不提这些工作。威廉·詹姆士，1900年之前惟一一位可以和冯特在地位上相比较的美国心理学家，于19世纪70年代从哈佛的生理学系转到了哲学系，他教授的课程却是由经验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以及“纯哲学”课程混合而成的。李播是新心理学在法国的维护者，除了写过实验心理学方面的书之外，还写了有关神经科学和有关叔本华哲学的重要著作。C. 麦西埃，一位提倡新心理学的比利时人，在他提倡冯特的新心理学的同时，却提出了他的新托马斯主义。C. 罗伯逊<sup>①</sup>和詹姆斯·萨利<sup>②</sup>，这二位最该被称为新一代的思想家，但如今人们能记住的却是罗伯逊对霍布斯<sup>③</sup>的研究以及萨利对美学的研究。查理斯·皮尔斯，他似乎是第一位在美国进行心理物理实验的人，而在人们的记忆里，他是一位逻辑学的先驱、符号语义学理论家和哲学家。

1879年以后数十年中的那种认为科学心理学是从哲学中产生或分离出来的观点，是对历史资料的误解。这种被大众普遍接纳的说法的主要问题出自一个假设，即在1879年以

---

① 罗伯逊，C. (1842—1892年)，英国哲学家。曾对霍布斯进行过研究。著有《一般哲学要素》、《心理学要素》等。

② 詹姆斯·萨利，生平不详。

③ 霍布斯，T. (1588—1679年)，英国政治哲学家。他曾设想将几何学的方法推广到人与社会的综合科学中去。著有《利维坦》等。

前哲学就存在着了——这里指的是我们如今 20 世纪所谓哲学的东西。然而，很容易就可以表明这门与我们今天所谓的哲学相似的学科大约在 1900 年之前，无论作为学术制度或者甚至作为明确的学科门类都是不存在的。如今作为哲学家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那些思想家，1879 年的时候都不是在哲学系工作，相反，那些在哲学系工作的思想家，除了少数例外情况，都不再被现代人看成是哲学家。冯特是一位哲学教授，但今天人们在读他的著作时并不把他看成是哲学家；弗雷格是一位数学家；詹姆士在 1879 年至少名义上是一位生理学副教授；尼采却放弃了学术活动；马克思（已年迈且身体不佳）和恩格斯（尽管已年迈却仍很活跃）一直是独立学者的典型；皮尔斯为美国海岸警卫队工作，同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课，这份工作早就不存在了。这种模式最大的例外可以算是布伦塔诺了，1879 年时他在维也纳担任哲学教授。

1879 至 1900 年期间是知识界充满巨大变化、不安和转变的时期。回顾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大学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实验工作，并且在试图创立现代化的“专业化的”学科。早期那种把哲学当成是神学或历史学的补助学科的模式已经不再得到承认，哲学的苏格兰—美国模式也不能引导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一群哲学家开始追随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面向科学的世界观，这种思想有助于引发实验心理学的兴起。而另一群思想家则支持认识论的研究，导致科学哲学的出现，这种观点把哲学看成是一门有关科学的科学。强调认识论的这群人与倾向于实证主义的那群人在逻辑上就“心理主义”的问题产生了矛盾，于是逐渐地创立出一些特殊的领域——现象学和与符号逻辑相联系的分析哲学，几乎所有 20 世纪学术上的

哲学探讨都是基于这些领域。

因此,我们应当把 19 世纪后期的哲学看成是一个处于变迁状态的领域,从中出现了两门互不相同的 20 世纪的学科——心理学和哲学。就像现代心理学的根源除了有古老的哲学经典之外还有生理学和医学一样,现代哲学的根源在古老的哲学经典之外还有数学和逻辑学。再重申一次,认为心理学是一门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是不对的——这仅仅是一个实证主义的荒诞说法。在当时的世纪交替之时,科学心理学要比现代哲学建立得更完善一些。两本有助于界定后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现代哲学的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胡塞尔的《逻辑研究》——都是在世纪之交才出版的,恰好比“新”心理学的建立要晚一些。罗素和胡塞尔都希望他们的著作能够对所谓的“心理主义”提出致命的批驳,同时勾勒出能够复兴哲学工作的新的特殊方法的轮廓。

## 第一节 心理主义与逻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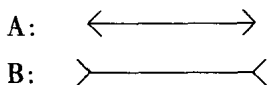
逻辑学中关于心理主义的争端,根植于穆勒的逻辑学理论中所提出的逻辑无意识的那部分内容。从许多方面来看,逻辑学和哲学中有关心理主义的争端可能与心理学和哲学中有关意识与无意识的争端是相平行的。

穆勒对直觉和推理的区分、以及同时提出的许多推理可能是无意识的论断,帮助了逻辑学从心理学中分离出来。以往认为,逻辑学是研究可以通过内省方法回忆的思维规律的科学,这种观点受到了无意识推理学说的破坏。一位支持无

意识推理理论的人可能会说，能够进入内省的思维模式只是可能存在的模式中的很少一部分，也就是说，可能是非常缺乏代表性的样本。因而逻辑学家的研究应包括通过内省可以得到的思维模式之外的更多的思维模式。

尽管穆勒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甚明了，但他的许多追随者却在发掘这种区分的意义。如果我们许多思想是无意识的话，那么自称基于内省来描述我们是如何思维的逻辑学就显得很不充分了。对这种反对意见的回答之一是提出逻辑学是有关思维的伦理学而不是有关思维的物理学。根据这种观点，逻辑学告诉我们的是应该如何去思考；它不仅是描述我们如何进行思考。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讨论过这种标准的逻辑学，但心理学中却忽视了这种观点。 188

新心理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对错觉提出了全新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大大地依赖了无意识推理。这种解释似乎解决了错觉最令人困惑的特性之一，就是在观察者知道这个“鬼把戏”之后错觉仍存在着。例如，下图所示的就是经典的缪勒—莱尔错觉：



尽管线段 A 与线段 B 等长，但我们所有人都会觉得 B 看起来比 A 要长些。而且，如果你用尺量一下两根线段，向自己证明它俩是等长的，这也无法改变这种错觉。A 与 B 等长的这一知识无法克服 B 更长些的这种知觉。

持无意识推理观点的理论家们，大多追随了影响巨大的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认为错觉对有意识思维的这种抗

拒是由习惯性的无意识推理造成的。在已有的经验与联想的基础上,我们建立起了特定的无意识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而这些无意识方式会抗拒意识所进行的修正。(附带着说一下,有关哪些经验会产生缪勒—莱尔错觉的问题仍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这种理论的弱点显而易见:如果说无意识是基于已有的经验的,那么通过再教育或者适当的早期训练怎么就不能使它们发生改变呢?然而,这一理论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仍相当流行,似乎经得住黑林和詹姆士所进行的严肃的批驳。与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问题相关的问题是,如果无意识推理能够并且常常导致错觉,那么无意识推理所建立起的思维模式就不能很好地代表思维的规律。无意识推理理论可能会产生出一门有关错觉的逻辑学而不是有关真理的逻辑学——至少尼采考虑过这种想法,而他似乎也吸取了赫尔姆霍茨理论的许多内容。

把逻辑学或者看成是有关思维的伦理学,或者看成是有关思维的物理学,这种逻辑学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逐渐导致了有关逻辑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新观点。19 世纪后半期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逻辑学可以作为一门研究思维的可能模式,而不是实际模式的学科。思维的模式不一定是个体的、实际的主观状态,而仅仅是潜在的主观状态,是能够想到的状态。逻辑学应研究这些可能性及其模式,而心理学则关注在人们实际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思考时所发生的情况。

1879 年之后,对逻辑学的这种看法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版本:弗雷格的有关抽象内容的逻辑学,以及他采用的通过概念描述来处理可能的思维的技术(后来成为了逻辑学中的符号代数);皮尔斯的有关相关性的逻辑学,以及他在处理潜在的

思维时所采用的符号语义学方法；最后是胡塞尔的早期现象学，以及他对思维与实际思考的明确区分，把思维看成是实际思考的本质。

创立一门独立的并且深奥的哲学学科，需要相应的方法上的创新。哲学家们为了接触到最新的、可利用的学术材料，就要表明他们拥有自己所独有的有价值的方法，可以取得研究成果。除非哲学家们能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与对实际的思维和主观状态的分析有所不同，否则的话，哲学会不断面临被心理学吞并的威胁。那样的话，逻辑学就会消失而有关推理的心理学则会获得胜利。很难知道当时人们对所面临的这种选择理解到怎样的程度。可以肯定的是，弗雷格、胡塞尔和皮尔斯都在有意识地创建一门新学科并发现新的方法，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内容充实的工作体系，并准确地详述了目标学科的范围和意义。然而，后来的少数思想家却不能按这些思想的原初形式来接纳它们。相反，有数十位思想家发现弗雷格、胡塞尔和皮尔斯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具有重要用途，却避开了他们的哲学立场。勿需多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哲学领域的学术活动中，这三位思想家所发明的方法占了统治地位——如我们所知，这些方法学上的创新在 20 世纪哲学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 第二节 逻辑学、心理学以及 弗雷格和皮尔斯所说的符号

现代逻辑学家所指的一级谓词演算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

由查里斯·皮尔斯和 G. 弗雷格各自独立发明的。弗雷格是一位数学家,而皮尔斯则是一位应用科学家,他后来靠着为各种各样的知识界的刊物撰稿维持着贫瘠的生活。然而,在 1880 年前后的短短几年间,皮尔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里拥有着—个稳定的职位,这使他能够和研究生们一起工作,并在《美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他的一些逻辑学研究成果(在他冒犯这本杂志的编辑之前)。这是皮尔斯一生中最后一次与学术发生联系;尽管如此,他在逻辑学领域中的出版物(仅仅是 191 他在逻辑学方面全部著述的极小一部分)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在罗素“发现”弗雷格之前,就已影响了下一代逻辑学家——其中包括 L. 勒温海姆、B. 罗素以及 E. 策梅洛。

皮尔斯和弗雷格所发明的逻辑系统就是想克服心理主义,并且引入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弗雷格一生中始终坚决反对心理主义。皮尔斯一旦按自己的意愿弄清了该如何去从事反对心理主义的逻辑学,就努力去建立一个有关心理学与逻辑学关系的理论,这是因为他不仅对推理过程感兴趣,而且对其中涉及的心理过程也非常感兴趣。我们用现代的说法可以认为弗雷格的兴趣集中在形式逻辑学方面,而皮尔斯的兴趣则包括了非形式逻辑学、科学逻辑学甚至科学过程中的心理学。

在弗雷格的著作中始终强调将逻辑学与对思维的分析区分开来。“逻辑学家的工作[就是]不断地与心理学进行斗争。”他的基本思想是,有关思维的研究必须独立在思维之外,超越它所有的主观方面。弗雷格将此称为思维的内容。“假使别人像我一样赞同我在毕达哥拉斯定理中提出的想法,那么这个定理就不属于我个人意识中的内容,我不是它



的主人；然而尽管如此，我可以知道它是对的。”在弗雷格看来，没有哪个心理学过程可以证明什么东西是对是错。判断的主观过程能够帮助发现真理，但是却不能建构一个真理。心理学为我们提供关于思维和判断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但是逻辑学则是推理性地解释独立于主观思维过程之外的过程，即思维的内容。逻辑学关注的是什么是真的，而不关注概念。

弗雷格在他的《算术基本规律》(part I, sec 18)中写道，<sup>192</sup>心理逻辑学家的最大错误在于假设非真实的和非客观的东西都是主观的。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感觉，那么这种说法就可能是对的，但弗雷格却持不同意见。弗雷格提到“客观这个范畴与真实这个范畴是有区别的”，或者说与外部世界中有什么东西是有区别的。非物理的客观性是指“在所有理性的存在 and 所有能够把握它们的存在看来都是同样的”东西。这就是弗雷格意义上的客观性，此处这个术语的意义不同于以往的使用。在弗雷格看来，外部(可知觉的)客体并不是客观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知觉者都把它们看成是同样的；心理状态也不是客观的。只有命题的内容，例如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内容，才是客观的。

可是，我们如何才能了解这个特殊的客观世界呢？我自己对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思考不能称为内容，因为这仅仅是我对内容的思考。而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时，它必须受到表达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的限制，这也是弗雷格所说的内容。

弗雷格知道这里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未阐述得如此清晰明了，他接下去就要讨论这一点。他提出逻辑学的目

标是寻找真理，而不是事实。弗雷格基于我们对数学发现的广泛共识，从这样的假设出发，即真理的王国是存在的，这是客观的王国，客观这个术语代表的是弗雷格所说的特殊意义。因为通常的语言和思维把客观内容弄模糊了，所以弗雷格发现需要创造一种技术在不破坏内容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表达和处理——逻辑符号。他将这种逻辑符号称为 *Begriffsschrift*。

皮尔斯对逻辑学和心理学所进行的区分与弗雷格几乎同样鲜明，但他没有采用弗雷格所说的客观内容王国的说法。皮尔斯像弗雷格一样，强调大家的共识似乎暗示着思维的内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思想家的。皮尔斯将一生中的多数时间用来寻找一种准确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种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者的想法，但他却无所收获。在了解了皮尔斯的境况之后，我们暂且将皮尔斯的现实主义的细节放在一边，先关注一下他的逻辑学理论。

早在 1869 年，皮尔斯就在讨论将逻辑学与心理学分离开：“三段论……的目的是要表达心理……这种关系仅仅就像有关同样事物的不同判断的关系。而且还应该补充一点，三段论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来自于形式逻辑的思想，而是来自于心理学。所有形式逻辑学家不得不说，能够用这样或那样形式的词来表达的事实是真实的，而那些以某种方式与大家的经验相联系的其他的事实也是真实的。”这段话令人敬服之处在于皮尔斯强调了逻辑学关注的是事实（弗雷格所说的客观内容）与内容的联系，而不是这些事实的表达方式或我们对它们的理解。

皮尔斯从这些想法出发，像弗雷格一样，认为逻辑学需要

针对命题内容的符号系统，而不是针对形式或主观解释的符号系统。皮尔斯本人至少建立了两套符号系统，一个是代数系统，而另一个则是基于维恩图的准几何系统。此处弗雷格和皮尔斯之间存在着重要分歧。弗雷格的逻辑符号是代数符号，目的在于帮助逻辑学家们避开所有那些通过他或她的“直觉”来评价符号的意义的需要。皮尔斯则相信受过训练的观察者能够认识到建构一个有效的推理的特定模式——就是说，受过良好教育的、直觉的、主观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寻找真理——他设计的符号系统就是要利用好这种能力。

皮尔斯认为，弗雷格的客观内容的现实性问题是人类观察者能够逐渐理解的东西。尽管皮尔斯百病缠身，但他仍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相信经过漫长的历程之后，思维的过程会与逻辑推理模式达到一致。在皮尔斯看来，推理是心理过程；它们标志着心理由一个判断向另一个判断过渡。并且，皮尔斯提到“逻辑学家的信念”，即所有这些“处理信念的”心理过程“经过漫长的历程，最终将会适应于某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同样的预定的结果。”在皮尔斯看来，逻辑符号会引导和修正我们“大脑的习惯”，使之与真理一致。弗雷格也会同意这一点——这正是皮尔斯进步的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暗含着人类的思维能够并将逐渐接近正确的推理。弗雷格显然相信受过良好训练的逻辑学家能够学会进行正确推理，学会表达甚至发现正确的推理。然而，他没有像皮尔斯走得那样远，皮尔斯似乎把思维内容的客观王国也看成是人类思维所要接近的目标。

### 第三节 从格式塔<sup>①</sup>到现象学

使皮尔斯和弗雷格深受鼓舞的对心理主义逻辑学的批驳并不只局限在逻辑学理论中。事实上，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中反映出的问题，似乎是新心理学事业面临的中心问题。如果对世界的认识只能来自感觉——就像心理学家在多数时候所认为的那样——那么，还可能有逻辑学、数学甚至科学知识吗？基于感觉的认识怎么能够支持绝对的确定性，例如数学中的证明呢？笛卡儿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声称上帝赋予了我们先天的知识——似乎无法与进化的观点协调在一起。于是，弗雷格、皮尔斯等人试图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将逻辑—数学知识与经验(基于感觉的)知识区分开来了。

在弗雷格和皮尔斯的同时期，对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解答。19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理论家在争论新心理学家对感觉以及感觉与认识的关系所做的解释。一些理论家们，像马赫和詹姆士，设法谈到过感觉，但却大大改换了这个术语本身的意义。其他的理论家，多数是布伦塔诺或与他有联系的学者的学生们(例如斯通普夫、迈农<sup>②</sup>、埃伦费尔斯<sup>③</sup>以及冯·霍

---

① 格式塔心理学是20世纪初期在德国兴起的心理学派，也称完形心理学。它的创始人W. 韦特海默尔、K. 考夫卡和W. 克勒自1910年起密切合作，称为格式塔学派的核心。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整体总是多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德语中Gestalt的意思是整体或完整的图形。

恩伯斯特尔),开始把实体而不是感觉作为经验知识的来源。对新心理学的批评中有一个分支发展成为格式塔心理学,另一个分支则发展成胡塞尔的现象学。整个的这些发展过程隶属于20世纪早期思想史,这里我只能简要地说一下现象学是如何在反对心理主义的过程中崛起的,现象学是(符号逻辑之外)第二种主要的哲学中的新方法论。

斯通普夫像他的朋友詹姆士和他的老师布伦塔诺一样批评新心理学。在《空间想像力的心理起源》(*Über den psychologischen Ursprung der Raumvorstellungen*, 1873)一书中,他指责冯特和赫尔姆霍茨的以无意识推理为基础的知觉理论。他尤其批评了新心理学家提出的感觉原子论,并且提出一种思考经验元素的新方法。斯通普夫把经验作为整体来分析,经验是由内容(*Inhalten*)组成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用的内容一词的含义与弗雷格所说的内容的含义是不同的。斯通普夫认为,经验的一些内容是独立的,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单独被体验,而且独立于经验的其他方面之外。然而,经验的多数方面不是独立的,但却构成了斯通普夫所谓的部分内容(*Theilinhalt*)。无论在真实的或是想像的经验中,部分内容都不能完全靠自己表现出来。例如,没有关于延展的经验就不可能有关于颜色的经验,反过来也是一样。人们甚至无法想见不具有任何延展性的色彩。然而,斯通普夫对哪些东西是部分内容所进行的解释中,许多是不正确的;尽管如此,他

---

② 迈农, A. (1853—1920年), 奥地利哲学家、心理学家。他创立了奥地利第一家实验心理研究所。著有《论假定》、《对象说的探索》、《论对象说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一般价值论的基础》等。

③ 埃伦费尔斯, C. V. (1859—1932年), 奥地利哲学家、心理学家。

所进行的这种区分还是很有用的。例如，斯通普夫相信视觉运动是一种部分内容，因为人们总是要注意某个运动着的物体。迈克斯·韦特海默尔<sup>①</sup>，一位早期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就通过实验反驳了这一论断，他发现在特定的存在明显运动的情况下，存在着独立于所有其他元素的纯粹的视觉运动知觉。这样看来，尽管斯通普夫在细节问题上发生了错误，当他寻找经验的独立元素的想法却带来了累累成果，事实上，这些成果足以用来反驳他有关视觉运动独立性的理论。

斯通普夫的分析表明，新心理学家所说的基本感觉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不以冯特等人所提出的原子形式而存在的。经验可能具有独立内容，但这些内容不是新心理学家所想像的像颜色或声音那样的感觉元素。12年之后，马赫在他的《感觉的分析》中从整体的角度对感觉重新进行了定义；本质上与斯通普夫所说的内容是对应的。斯通普夫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曾在维尔茨堡和布拉格担任心理学教授（后来又到了哈勒和慕尼黑，最后到了柏林），而马赫在1893年到维也纳之前也在布拉格任物理学教授。布伦塔诺则在维也纳教哲学，非常清楚奥匈人（主要是德国北部）开展的对新心理学的批评。结果，布伦塔诺的两个学生，克里斯蒂尔·冯·埃伦费尔斯（1859—1932年）和A. 迈农（1853—1920年），进一步对感觉主义进行批驳。

埃伦费尔斯注意到一些方面的经验内容似乎与特定的感觉变量联在一起，而另一些方面则不是这样。经典的例子是

---

<sup>①</sup> 韦特海默尔，M.（1880—1943年），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他曾任柏林和法兰克福大学教授，1933年纳粹上台后去了美国。

曲调。曲调的一个一个的元素是音符——一个特定的耳朵的感觉。但是作为经验的曲调不是耳朵的感觉，甚至也不与特定的一组感觉相联系。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曲调可以用不同的键来表现——即完全不同的一系列音符——却仍很容易被辨认为同一曲调。埃伦费尔斯把曲调看成是时间的一种形式(form)，一种通过听觉获得的一种关系。埃伦费尔斯还认为不仅存在着时间形式，还存在空间形式：四边形之所以是四边形是由于它包含了4条线段；即便这些线段以多种方式发生变化(颜色、大小、旋转)，四边形还是四边形。

埃伦费尔斯所谓的形质(Gestaltqualitäten)与斯通普夫对独立内容的界定是一致的，但它们的确不是感觉。这样，尽管感觉主义者假定基本的独立内容是感觉，但是斯通普夫和布伦塔诺的学生们却在使用现象分析的方法以发现一些其他种类的独立内容。埃伦费尔斯认为形质是通过与感知觉不同的特殊心理活动来领会的。

在奥地利的格拉茨，迈农把埃伦费尔斯的分析方法作为他工作的出发点，对斯通普夫所进行的区分进行了补充。迈农认为，除了独立内容与局部内容之外，内容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创立内容(founding contents)与基础内容(founded contents)。创立内容与马赫所说的感觉(而不是冯特所谓的感原子)相似，它们都以感觉性质为基础。基础内容来自于感觉性质的形式或模式。因此，几个系列非常不同的创立内容可能具有同样的基础内容——例如当人们听到用黑管的E调演奏的曲子之后，又听钢琴用C调演奏同一曲子时。(曲调是惟一的基础内容；两个系列的音符——由于所演奏的乐器不同，每个系列都会产生所独有的听觉感受——则是创立

内容。)

斯通普夫于 1884 年到达哈勒之后的第一位学生就是年轻的数学家 E. 胡塞尔，布伦塔诺推荐胡塞尔到斯通普夫的门下。从大约 1885 年开始直至世纪之交，胡塞尔一直在研究数学问题，并试图将“奥地利人”对新心理学的批评吸收到对逻辑学和数学基础的批评中。已有的既反对经验主义又反对心理主义的论断通常的基础是心理逻辑学家所提出的所有逻辑数学知识都来自感觉的假设，这里的感觉是指感觉原子。但是，数学的经验主义基础可能并不是感觉，而是格式塔和基础内容——相对复杂的模式，它们使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具有个性的特性。胡塞尔早期工作在《逻辑研究》一书中达到顶峰，在书中他激烈地反驳了心理学中的感觉原子论，认为取而代之的应是人类能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认识世界中各种格式塔。

在胡塞尔看来，逻辑判断和推理的发生不依赖心理过程。有关内容与创立的新观点似乎对胡塞尔的论述有很大帮助。如果心理内容并不总是直接与感觉原子联在一起——用迈农的术语来说，如果基础内容对思维很重要的话，那么对这些内容的处理就能够并且应该与对简单感觉元素的理解区分开来。心理学家提出的有关思维和经验的规律本该涉及到 199 到什么使得某些内容成为独立的而另一些内容却成为部分的，或者说在创立的过程中包括了些什么。胡塞尔认为这些过程与心理学家所说的简单的联想过程不同。他指出逻辑学的规律应被理解为与基础内容相联系的抽象模式，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该与任何感觉过程的特殊的细节过程联系在一起。



1900年以后，胡塞尔在他的逻辑学著作和教科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方法论，这些书对人们的观念（*Ideen*）影响很大，这种新的方法论不仅适用于逻辑学，而且适用于所有哲学。他将新方法命名为现象学，这种对经验进行“加括弧”的方法是哲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该方法把思维的基础内容可以看成是哲学分析的对象，基础内容不依赖于它们与日常生活中或科学中的“客体”的关系。胡塞尔把现象学看成是一门科学，而且把对加了括弧的经验进行研究置于本体论或心理学问题之前。胡塞尔承认心理学和本体论的问题是合理的，但是却不必要放在哲学的基本范围中。在胡塞尔看来，哲学应成为一门对内容世界进行分析的科学，这种内容世界独立于因果关系，也独立于任何日常的或科学的本体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胡塞尔正试图建立一种适合研究“意识流”的哲学方法，而威廉·詹姆士早已将意识流这个概念置于心理学的核心。在胡塞尔看来，詹姆士的心理学与新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是相矛盾的，但几乎很少有自称为心理学家的人这么看。

#### 第四节 哲学从心理学中分离出去

200

尽管人们常常可以读到有关心理学如何从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文章，但却极少能读到有关现代哲学如何从心理学中产生出来的文章。然而，现代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可以证明这些方法界定了20世纪哲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回应有目共睹的新心理学的成就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如果

没有像冯特和 T. 李普斯<sup>①</sup>那样的“心理逻辑学家”以及其在认识论中的像赫尔姆霍茨那样的同盟，那么符号逻辑和现象学的发展将会完全不同。现代哲学通过创造一个能将从康德和休谟到笛卡儿和科学革命中的其他人的研究领域统一起来的原则，从而使它的历史变得模糊不清了。可是，心理学家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原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原则。

现代心理学与现代哲学——作为拥有专职科学家或学者的学科——都是在 19 世纪末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至少要比哲学早上十年，尽管心理学当时还在哲学系里。显然，当时发生了许多争夺职位、权利、名誉和影响的斗争。在美国，19 世纪 90 年代，哲学家们才建立专门的杂志并开始设想建立专业的学会（直到 1901 年，这个学会才开始运作）。但在这些活动中，哲学家们比心理学家们至少晚上了几年，而且许多有关“严格哲学意义上的”学术制度的奠基性文件显然借鉴了心理学的成功经验，这也是建立起与之不同的哲学实体的原因之一。难怪新的专业哲学家采用了可利用的最具有反心理学色彩的方法论——现象学和符号逻辑——来限定新学科的成员的研究活动。

---

① 李普斯，T.（1851—1914 年），德国心理学家和美学家。在心理学上，他与冯特和艾宾浩斯同被认为是 19 世纪末德国心理学的主要代表。在美学上，他是移情说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心理学入门》、《心理活动的基本事实》、《美学》、《论移情作用、内模仿和器官感觉》等。

## 威廉·詹姆士：作为 经验科学的心理学

威廉·詹姆士不仅是美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而且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通常，人们把他看成是第一位一流的美国哲学家，还是美国心理学之父。然而，尽管詹姆士被称作两门学科之父，但他却对学科分化感到痛惜，在他重要的论文“章鱼博士”（*The Ph. D. Octopus*）中，他清楚地提到了这一点。而且，他花费努力最多的工作——意识流心理学、对心理动力学的研究以及对宗教经验和习俗的分析——也没有得到遍布美国的自称为他的哲学和心理学的继承者们认真注意。

尤其在心理学方面，詹姆士宝塔般的形象，存在古怪的污点，甚至令人质疑。一方面，人们认为是他将新的实验心理学引入美国；因为他于19世纪70年代在哈佛建立了心理实验室，他的确为这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詹姆士从未觉得新心理学看起来很顺眼，并且总是在理智上与它保持着距离。

因而，尽管现代心理学家公认詹姆士是一位能给人灵感的创始人，但他自己却可以否认与任何类似于现代实验心理学的东西有着“父子”关系。詹姆士最优秀的心理学工作是对

202 早期的思想和结论进行了非凡地综合,这项工作花费了19世纪最后的25年时间;然而他却对19世纪心理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主题提出了质疑。他以多种方式试图通过新的形式来复兴雪莱的自然超自然主义心理学——一种“范围广泛”的心理学。但是,他的努力最终却很少得到理解或赏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许多现代学派和学科坚持把他看成是创始人。

## 第一节 詹姆士对新心理学的批评

詹姆士之所以被看成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是因为恰好这时新心理学及其在欧洲的实验室来到了美国。詹姆士最初的主要文章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许多这些早期的文章都是围绕着这种心理学展开批评,尤其是很有影响的欧洲心理学,即以斯宾塞的带有进化论思想的联想主义为基础的欧洲心理学。詹姆士将这些批评文章收集、组织、修改并增补,形成了《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然而这里,我将重点简介的是他的那些在原文中出现过的、但大家有些生疏的思想。

詹姆士和新心理学家们至少在五个问题上存有争议。第一,新心理学只吸收了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而没有考虑查理斯·达尔文的随机变异和生存竞争导致自然选择的理论。第二,新心理学倾向于那种修正过的联想主义思想,关注假定的像元素一样的感觉状态——即感觉原子——而忽略了詹姆士所说的心理中过渡性的、关系性的和流动性的元素。第三,正

是出自心理原子论的必然结果，新心理学家们迫不得已提出了无意识心理过程。詹姆士根本不相信存在这种心理过程，为了进行验证，他经过长期努力提出了一个关于空间知觉的理论，该理论避开了无意识推理过程。（尽管詹姆士坚信不存在新心理学家们所谓的逻辑无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相信存在边缘无意识或下意识现象，他对这两种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第四，新心理学中所假定的反对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形而上学，詹姆士认为，这种发生了偏离的形而上学支持了某种认知原子论。詹姆士则对心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最后一点，詹姆士相信新心理学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经典基督教的一神论：它提出的统一的灵魂反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神的存在。在詹姆士看来，这种看法是对宗教经验现象学的极度扭曲。对最后这个问题，詹姆士非常有创见——有谁还会选择挑战与宗教经验相比，经验很不充分的新心理学呢？

新心理学很大程度忽略了知识界对进化论的争论。对于那些忙着测心理反应时的学生来说，神经系统是否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关系不大。但是，由于斯宾塞的著作非常盛行，因而在说英语的国家中，新心理学就通常被看成是由新的进化论与联想规律整合而成的。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斯宾塞所提出的心理所建构的内部世界必须适应外部世界的规则很时髦。毫无疑问，这个规则如此盛行的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基本点的模糊性——什么事实在不能被看成是动物“适应”环境的例子？斯宾塞的规则如此流行，也可以看成是从洛克到两位穆勒的英国经典认识论的延续。斯宾塞把适应主要看成是（通过联想）对观念进行塑

造,从而反映外部世界。结果,斯宾塞的规则成为了孟德斯鸠曾经流行的教条——气候塑造性格的新形式。人们甚至可以为所假定的气候和地理塑造心理的机械过程提出一个大致的进化时间表。

詹姆士对达尔文的思想把握准确,不允许斯宾塞的这种思想被当成“进化论”方法溜到心理学中。詹姆士是当时唯一研究过比较解剖学的杰出的心理学家,19世纪70年代他曾在哈佛跟随杰弗里司·威曼(Jeffries Wyman)和路易斯·阿格塞兹(Louis Agassiz)学习,当时他们正处在对达尔文主义的如火如荼的争论中。威曼是美国紧居A.格雷之后的第二重要的达尔文主义者,格雷当时也在哈佛,也部分参与了那场热闹的知识界的论战。阿格塞兹有可能是美国最出色的自然主义者,但他肯定是美国最激烈的反达尔文主义者。1865年至1866年期间,詹姆士参加了阿格塞兹在巴西的收集资料的远征(主要是为了证明阿格塞兹提出的与达尔文相反鱼类分类法——这个目的不可能达到,也确实没有达到),阿格塞兹不肯考虑达尔文观点的态度使詹姆士很不愉快。30年之后,他仍记得23岁的胆敢维护达尔文的他与这位出色的教授之间的唇舌之战。

“对斯宾塞将心理定义为对应的评论”(Remarks on Spencer's Definition of Mind as Correspondence)(1878)是詹姆士第一批重要的文章之一,充满了达尔文主义者对斯宾塞的批评。在这篇文章中,詹姆士提出了常常遭到误解的观点“认识者”(knower)并不仅仅是一面可以到处走动的镜子,被动地反映他所遇到的并发现存在着的有秩序的世界。认识者是一位行动者,他一方面创造一部分真理,另一方面他可以记录那些

他帮助创造的真理。”詹姆士有关认识者的这段话如果没有达尔文主义的背景，就会很容易被误解为理想主义的一种形式，与冯特把心理看成是在无意识地创造现实模型的观点很相像。但是，詹姆士批评斯宾塞的目的并不是要投入冯特的怀抱。詹姆士说认识者是一位行动者时，他所指的是生命活动，而不是康德主义的心理“香肠工厂”（詹姆士在反对各种积极的理想主义时最喜欢用的绰号）。

在詹姆士看来，此处的关键点在于认识者是处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在充满竞争的自然界中艰难谋生。与斯宾塞所说的认识者不同，他们不仅在认识世界，而且在感受世界；他们与斯宾塞所说的认识者的另一点不同在于他们每人都是生来就具有一套独有的能力和爱好的生物。变异是基础性的，它无处不在并随机出现。因此，心理中某些最重要的方面可能是由遗传来的倾向塑造成的，而不是环境引发的。詹姆士在另一篇批评斯宾塞及其追随者的文章“伟大的人类和环境”（*Great Men and Their Environment*）（1880）中写道：“地理环境不能产生出特定的心理类型。它只对偶然产生的特定类型加以强化和深化，而对其他类型进行妨碍和阻挠。”

詹姆士认为这些基本的、遗传来的心理变异不是在认知能力上存在差异，它们的差异是在选择能力上。他发现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动物是仅仅在反映世界。活着的生物必须选择周围环境中的某些方面来进行注意，对其采取行动甚至进行改造。那种认为生物是在反映所有现实的观点，或者甚至这种观点的一部分，都是不合乎事实的。詹姆士甚至在他早期“评论”斯宾塞的文章中就曾强调过认识者不是被动反映世界而是在主动选择。詹姆士提到，环境的作用是

“唤醒每个认识者的兴趣”。但是斯宾塞主义者所了解的惟一的兴趣是生存,或者说是自我兴趣(self-interest)。因此,他们相信“心理发展最理想的完善性体现在一个生物具有完美的认知机能,它的知觉很敏锐,无论多小或多远的东西都能感知到;它包容万象的预见能力使得没有什么事情能处于预料之外……然而,所有这些才能却由于热爱生命这惟一的冲动,即不惜任何代价来生存的冲动,而受到动摇。”

詹姆士采用意义更宽泛的理想来代替斯宾塞所说的兴趣——雪莱勾画的那种直径在缩小的树木的景象——生存仅仅是这种理想所包含的众多兴趣中的一种。在詹姆士的达尔文主义心理学中,认识者不是无所不知的。每个认识和动作活动都涉及相对应的忽略过程,通过对部分世界的认识进行封闭以更好地处理感兴趣的事物。詹姆士提到,动物的兴趣是由遗传和环境共同造成的,如果兴趣过于狭窄或不恰当就会导致它们的活动“处处碰壁”。

在詹姆士至今仍很著名的写于1879年的论文“我们是自动机吗?”(Are We Automata?)中,他进一步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讨论。詹姆士在文中提出了很有争议性的学说,认为意识既然是进化而来的,那它一定有用。如果这个学说如此表述的话——通常就是如此表述的,那么它就是关于适应主义者所犯错误的一个例证。照此推理,人们可以很轻易地说因为阑尾(或耳垂、不断生长的指甲)是进化而来的,因此也是有用的。但现在看来,阑尾除了会引起阑尾炎之外没什么其他用处,它的“用途”令人怀疑。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詹姆士对意识进化的论断并不是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种典型的适应主义者的说法,对其真实含义的理解则必须以他对斯宾塞的批



评为基础。

在“我们是自动机吗？”这篇文章里，詹姆士在批评斯宾塞的字里行间中提出了他对基于兴趣的选择(interest - based selection)的解释。詹姆士认为根据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兴趣——一种心理状态——必须被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回顾了新心理学家们对皮层或意识引导下单纯反射式反应的延迟在进化中的价值的标准论述。新心理学家在对高级心理过程与低级心理过程进行区分时使用的恰恰是像“有用的[神经]放电、恰当的方向、正确反应之类”的概念。<sup>207</sup>但是，詹姆士提到，所有这些概念都“预示着动物具有某种利益、目标或兴趣”。这种兴趣是动物自身具有的而不是观察者的兴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进行任何选择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动物选择了哪些更好、更感兴趣、更恰当、更需要的东西。而这些兴趣“不可能以纯粹物理的形式存在。物质是没有理想的……好这个观念中包含有不大好的观念，这里面必须有比较，例如对于一滴水来说，要么将它的现状与它不存在的情况进行比较，或者将它与一滴葡萄酒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过程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物理过程。”如果达尔文主义的宇宙中有一样东西不属于通常所说的机械的、物理的宇宙的一部分，那么这种东西就是——个体的兴趣。

此处，詹姆士提出他关于兴趣的达尔文主义心理学将心理状态置于自然界中，这一观点斯宾塞及实证主义新心理学从未提到过。正如詹姆士在《对斯宾塞将心理定义为对应的评论》写道的那样：“根据[斯宾塞]哲学，心理应是与非心理绝对分离的纯粹产物。当心理处于命令状态时，独立的兴趣就可能决定我们将什么东西看成是对应的，将什么东西看成是

不对应的，”而这违背了斯宾塞主义的理论。詹姆士谈道，每个基于兴趣的比较行为“被认作是一种意识”——意识不仅仅是感觉或感受，而是选择。

可见，詹姆士所说的心理是主动的并能帮助创造真理，指的不是自然之外的活动——通常意识被看成是这样的活动——而是自然活动，是基于兴趣的心理选择过程。心理世界并不是心理或精神甚至观念所构成的新世界，而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界中特定因素常常以崭新的方式进行分离、比较和组合的结果。

## 第二节 詹姆士反对原子论者和心理刺激论者

1882年，詹姆士到布拉格拜访了马赫和斯通普夫，与他们分别讨论了各自对新心理学中以原子论为基础的感觉主义的批评。詹姆士认真地考虑了他们提出的两种批评意见，自己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对心理原子论的批评可能更为有力些。布拉格之行之后的1883年冬天，詹姆士写了“关于内省心理学的一些疏漏”（*On Some Omissions of Introspective Psychology*）一文，这篇文章不仅包含了他对感觉原子论批评的概要，而且还是他自己的意识流心理学的开端。

在这篇文章中，詹姆士将意识流划分为实质（substantive）部分和过渡（transitive）部分。（尽管他在写作中常把这两部分写成好像互相对立的两个范畴，但是实际上他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维量的两端。）实质部分就是心理学家们所说的“感觉”——或者更确切些，就是马赫所说的感觉以及斯通普夫所说

的内容。而过渡部分则从未被心理学家提及。过渡部分是指对于组成我们大部分思想流的关系和过程的经验。“我们应该谈论和 (*and*) 的感受、如果 (*if*) 的感受、但是 (*but*) 的感受、通过 (*by*) 的感受,就像我们谈论蓝色的感受、冷的感受一样自然,然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做的。”在詹姆士看来,内省心理学无法认识这些对于关系和过程的感受是新心理学中最糟糕的问题。“上帝把事物联在一起,他们却决然地将其分割开来。”

如果真正存在着对关系的感受,那么许多假定通过联想建立起来的心理实体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它们可能仅仅是经验元素(关系元素)。而且相似地,一些最终被称为格式塔或被奥地利学派称为基础内容的心理实体,如果看成是对关系的感受也可能更容易得到理解。“感受原子应该是真正的组成单位,然而,寻找感受原子似乎是一种古怪的行为,是一种不合理的比喻。从理性上看,我们会发现它带来了一连串的混乱;从经验上看,没有事实能说明我们心理的实际内容总是以某种大合唱的形式来进行表征的。”

新心理学家不同意詹姆士的说法,认为自己有关联想和无意识推理的理论是有很多神经生理学和内省证据做基础的。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对于没有得到注意的感觉及类似东西的解释,显然只能通过这样的观点来得到支持。如果眼睛和大脑的构造决定了在知觉过程中必须能产生出原子式的感觉,那么詹姆士从内省方面对新心理学中的内省方法进行的批评就是不合理的了。

詹姆士预料到会有这种反应,早在 1883 年就写好了反驳文章。他认为神经生理学中出现的共识也是反对原子论的。“目前大脑研究的整体方向正朝着将大脑视为一个整体的观

念转变，大脑中任何一个部位的电发放都必须伴随着所有其他部位紧张度的变化。”简而言之，大脑研究反驳了新心理学家们的观点，支持了詹姆士的观点：我们认识的基础是复杂的意识流，它的元素处于微妙的、连续的变化中，这种意识流（以某种我们还不知道的方式）伴随有神经系统的整体活动。

早在几年前，詹姆士就已开始了对空间知觉本质的研究，以验证他的关系理论。在“空间特质”（The Spatial Quale）（1879）一文中，他首次从经验上对新心理学提出了批评，这种  
210 批评方式最终成为了《心理学原理》一书的主旨。如果我们空间认识的元素是感觉原子——即意识流中的实质元素而不是关系元素，为什么这些原子在我们的空间经验中没有反映出来？“我一眼所能看到的空间是作为一个不可分的充满物质的空间映入我的眼帘的；如果这种知觉是由许许多多对位置的知觉混合……而成的，那么我只能看到这些组成成分的仓促的、颗粒状的特性。我们的确是通过将相关位置联在一起在构筑空间的——这些位置数目巨大，不可能一眼就全部看到——事实上，在匆忙中映入到意识中的只能是这些位置的关系。”

詹姆士写道，想一想你是如何认识你面前的空间的：例如，从你坐着的地方到墙这块空间——一眼看去，没有什么阻碍。再想一想你是如何认识你与旧金山之间的空间的：这中间肯定会有间隔，包含许多独立的场景和情境。把这两种对立的经验放在一起考察，詹姆士提出了我们每种感觉都具有特定的先天的空间特质（是过渡特质而不是实质特质）。“我认为身体任何一个伸展的部位受到激活都会引起伸展的感受。”从传统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这是一种认为灵魂是广泛

的异端学说（罗伯特·惠特和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学说被指控为异端学说）。从新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这是一种把心理和思想活动看成是身体和感受的异端学说。

根据詹姆士的观点，关于空间认识可能有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根本没有真正的空间知觉，空间仅仅是表示着特定感觉连续出现的符号。贝克莱大概就持这种观点，我们还曾提到过，这正是布朗的学说，当时非常有影响，尤其在英国影响很大——两位穆勒和贝恩都赞同这种观点。第二种理论——詹姆士自己的观点——（至少）有（一些）感觉具有空间特质（特性），通过这些感觉我们可以了解空间构成。第三种理论认为空间特质是在心理之外产生的，再被加到特定感觉上。詹姆士写道：“最后这种理论是康德主义的观点，斯通普夫尊敬地称之为‘心理刺激’理论。”詹姆士心理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反对这些心理刺激论者，尽管当时他们在新心理学中仍占据统治地位。此时，詹姆士本该还可以提出，在意识流中就能够发现那些心理刺激论者们所说的空间认识，并不是直接的认识，而仅仅是由感觉事件从心理中激发出来的认识。

### 第三节 反形而上学(antimetaphysics) 和形而上学

新心理学家将自己的心理学称为“实证主义”心理学并且嘲笑形而上学，从詹姆士与新心理学家在哲学问题上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詹姆士为什么对此感到气愤。詹姆士直截

了当地指出这种实证主义仅仅是一般的原子论世界观的烟幕。与费希纳的整体原子主义(詹姆士赞同这种观点)不同,新心理学的主流思想完全是还原论的思想。

作为新心理学同盟的19世纪实证主义,事实上也是充满着原子论思想的——或者用詹姆士的语言说,像冯特那样的思想家倾向于强调实质元素而排除过渡元素,从而取消意识流。他们愿意承认对颜色、强度或者重量的感觉,而不肯承认运动或形状感觉。詹姆士不是采用空间知觉理论来验证这一实证主义分支的,他采用的是分析信念或者说分析“对现实的知觉”来进行验证的(正如他后来提到的那样)。詹姆士在他  
212 首次对意志的分析中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见“努力感”(The Sense of Effort)(1880)那篇文章,在“信念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Belief)(1889)一文中他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在《心理学原理》中以“对现实的知觉”(The Perception of Reality)为题目重印了一次。

此处,詹姆士发现了经典的联想主义思想中的不同寻常的缺憾。从詹姆斯·穆勒的《对人类心理现象的分析》(1829)开始,19世纪的联想主义者们就曾试图把意志与所有其他心理事件等同起来——就是说,把打算做某事与具有关于此事的某种观念等同在一起。今天看来,我们一般认为当我们接受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相信这个观念了;但是只有一种情况,我们对一个观念的接受需要世界发生了某种事情——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主动地要去做某事。而在联想主义者的分析中,所有观念对心理来说是同样真实的,还有一点,意志观念如果实施出来,对身体以及世界来说也都是真实的。

然而,在信念这个问题上——或者更恰当地说,在对现实

的知觉中——一个观念(我们继续沿用联想主义者的术语)不仅从心理上看应是正确的,而且应该真实地反映世界。但是拥有一个观念是一个方面(例如,今天晴天),而相信这个观念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联想主义理论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写在他编辑的他父亲的《对人类心理现象的分析》(1869)一书的注释中,这段话詹姆士在“努力感”和“信念心理学”两篇文章中都曾引用过。穆勒问道:

对现实进行思考与给自己展示想像中的图画,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心理会有什么不同呢?我承认无法避开那种认为二者存在着根本差别的看法……因此,我禁不住想,不同于对思想的回忆的、对真实事件的回忆中,会有这样一种元素,这种元素不包含……在两种情况下心理所呈现的纯粹观念上的差异。无论我们如何进行定义这种元素,信念都是由它构成的,它正是记忆与幻觉的差异之所在。 213

詹姆士就是从穆勒所说的这种元素开始对意志力进行分析的。

根据詹姆士的观点,意志就是在观念中进行选择的过程,他在“努力感”一文中阐述得很清楚。我们要从中进行选择的概念是詹姆士的非联想主义意义上的观念,因而它们大都是有关关系的观念,包括了有关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观念。深思熟虑或者思索都是“多种有关可能性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在该冲突正在发生的那段时间里,各种观念只能被看成

是各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当现实感回来的时候，[观念]冲突就过去了，就像回火钢一样，经过在不确定的冰冷的水中浸泡过，它的价值增加了十倍，更加无可匹敌。”

现实感为什么还会回来呢？是我们的意志努力在支持一个或另一个观念时破坏了竞争中的平衡导致的吗？还是最强大的观念仅仅以机械的方式胜出了呢？这里出现了一种宿命论与对意志效果的信念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詹姆士所要面对的基本哲学问题。他采用了有关兴趣的自然现实的心理学说来回答这个问题：个体的兴趣会对观念冲突发生部分影响，就像在他或她的生活中所展现的那样——而且，如果这些兴趣起了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心理和意志对选择会有些影响。

詹姆士以他的自然主义心理理论为基础，巧妙地以辩证的方式将他对信念的分析应用到宿命论问题中。此外，我们面对的是自由意志的观念与意志是先天决定的观念之间在观念上的竞争（这种竞争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詹姆士认为，<sup>214</sup>通过意志的努力，他将选择相信“自由选择”（*alternative of freedom*）——因为他的兴趣驱使他如此。于是，他通过提出意志是否是自由的这个问题来部分地说明了自由意志的效能。

当然，实证主义者（还有其他人）在辩证讨论中违反了规则。如果自由意志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证实——实证主义者认为没有得到证实——那么，它只能是不确定的了。然而，让这个问题处于不确定中是否表示允许一系列与众不同的兴趣也处于不确定中呢？这些兴趣可能就是那些被实证主义者称为经验选择或理智选择的东西，然而兴趣就是兴趣。可是，詹姆士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不单单是搞辩证的把戏。詹姆士坚持



反对实证主义,假使我们拥有关系观念,我们怎么会没有有关我们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呢?事实上,整个19世纪80年代,詹姆士都在支持这样一个论断,即我们的运动观念以及意志、功效和动作观念都是来自对我们动作的知觉(通过肌肉与骨骼的感觉,或者说肌肉运动知觉来进行的)。冯特及其追随者否认这种论断,认为努力感不是关系性的,而是实质性的,是以我们大脑对肌肉的命令为基础的。

詹姆士第二次使用了辩证的方法。他把实证主义的方法加到讨论中来(至少表现在《心理学原理》中)。他用自己的关系感、复杂感以及观念替代了他们所说的感觉原子和观念,但他仍称之为感觉和观念。他用自己的整体的自然历史替代了实证主义的原子论,但他仍使用联想主义这个词汇。他甚至声明他的书是一本“实证主义”著作,因为他强调经验(詹姆士意义上的经验)现象并且他所说的心理学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他通过对特定的形而上学分支(原子论和物理论 215 (physicalism))进行赞扬来抨击实证主义,并且他把自己放到一个高高的中立立场上,尽管他一定会暗示出自己所喜好的形而上学。然而,这种过于微妙的伎俩是错误的。的确,如果读者弄清了詹姆士是如何玩弄词句的,他或她可能会同意詹姆士的观点。但是极少有读者真正理解了詹姆士语言和逻辑上的微妙之处。无数的读者把《心理学原理》一书(误)认作是一本提倡新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某种变式的书,而实际上,这本书是在全方位地抨击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心理学的转变。

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避免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决策导致不幸的后果,在公众的心中他的哲学观点与他的心

理学工作被分隔开了。(的确,事实上他的一些著作常常由于贴上了哲学或者心理学的标签而强化了大家的这种观点,而《威廉·詹姆士著作集》的编辑将他所谓的心理学文章与哲学文章分开来编辑更加剧了这个问题。)在詹姆士提出有关信念和意志的论断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心理关系状态的理论。在“反射动作和一神论”(Reflex Action and Theism)一文中——这是他1881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神教派牧师学院(Unitarian Minister's Institute)进行的演讲,后来在他1897年的文集《相信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中重印了——詹姆士基于自己的心理学提出了泛神论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非基督教的(甚至是非西方的宗教的),它是詹姆士与其他新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最为不同之处。因为詹姆士的这些论断没有写在《心理学原理》这本书里,所以该论断与詹姆士的心理学工作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关注。

从詹姆士的演讲的题目“反射动作与一神论”就可以看出,他头脑中针对的是新心理学家们,这个题目看上去就像是在 G. S. 霍尔<sup>①</sup>、J. M. 鲍德温、约翰·杜威(第一章曾讨论过)时代写的有关新心理学的文章。詹姆士以一个笑话作为开场白,试图改变新教徒们对新心理学的虔诚,他说:“现今,如果演讲者引用的是达尔文和赫尔姆霍茨的话而不是施莱尔马赫或柯勒律治的话,那么他就会有机会赢得更多的听众。此时此刻,我几乎觉得自己想要生出一只青蛙来,让它在你们大家的面前展示精巧的行为,这样我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竖起

---

<sup>①</sup> 霍尔, G. S. (1844—1924年), 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887年创办《美国心理学杂志》, 促进了美国教育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发展。

耳朵来听我演讲了。”最后,他总结道:“没有必要把最近生理学上的小成果看成是最重要的成就。”

詹姆士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关于意志的自然主义理论,他告诉这些牧师,对于像我们自己这样的进化来的生物来说,动作支配了认知:“自然界中充满愿望的那部分……支配着思考的那部分和感受的那部分。”尽管我们的感觉器官和大脑在理解方面是非常好的工具,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理解”世界“[整个]已有的状态”。心理不是斯宾塞所说的反映外部现实的内部现实;而是像达尔文所强调的那样是活生生的机体的一部分,帮助机体完成选择过程。我们被迫选择做什么事情、注意什么东西,而这种选择主要是通过行动联在一起的兴趣和需要来实现的。

可是,兴趣和需要是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中产生的——而实证主义心理学家们却把这样的实体漏在了他们的宇宙之外。詹姆士特意用了很形象的手法来表达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对实证主义的批驳:

自然界中所有积极的力量都在等候着,不耐烦地等待着命令来告诉它们如何对生命来说最彻底最有价值地释放出来。它们喊道:“好吧,我们该干什么了?”不可知论者说:“无知的家伙,无知的家伙!”唯物主义者说:“根据原子及其意识作出反应!”这是多可怕的失败呀!心理这217列火车失火了,中间部分烧毁了,却把尾部点燃了,这列火车毁掉了……而积极的力量由于没有可以发挥能量的恰当对象而被搁置在一边,它们只能或者变得萎缩……或者[释放]引起大的动荡。

在詹姆士看来，原子论者和持不可知论的实证主义者提倡的是另一种形而上学。他们那种形而上学的缺点在于否认了对现实的信念，而詹姆士认为这些信念对于所有能够体验的生物来说是明显的和基本的：需要、兴趣以及各种各样的力量。

#### 第四节 心理学中的灵魂

经典的联想主义之所以需要谈到灵魂，是因为他们需要这种东西将所有感觉和观念统一起来。但新心理学家和实证主义者却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集合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而且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灵魂是否存在，因为没有哪个感觉原子能告诉我们灵魂是否存在。

詹姆士也拒绝承认这种意义上的灵魂的存在性——但却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詹姆士提出的意识的关系元素为联想主义者提供了像灵魂一样起整合作用的“胶水”。但詹姆士主义者的新宇宙中还包含着其他的关系和力量。就像詹姆士在《英格索尔论不朽》(*Ingersoll Lectures on Immortality*) (1898) 以及后来的《宗教经验之种种》(1902) 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经验不能为力量和行动甚至仁慈提供各自的来源，而只有一个包含着这些来源的总来源。詹姆士本可以赞同新心理学家所说的灵魂不存在的观点——至少还没有人能证明灵魂存在——他也可以赞同他们有关上帝的类似观点，但他根

218 本不可能同意那种认为人类没有任何类似于灵魂的动力的观

点,尽管这种动力常常是弥漫的和分散的。同样地,他不同意宇宙中没有全能的力量的观点。实际上,他觉得在自己的经验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外部力量的作用与所体现出他自己意志的效能是同样的。与现代心理学的其他奠基人不同,詹姆士在灵魂和上帝的问题上是一位多元论者。可能这就是他为什么仍能给读者一种新鲜感的原因。

威廉·詹姆士小的时候,他的弟弟亨利<sup>①</sup>就抱怨很难跟上那个喜欢到处乱跑的威利<sup>②</sup>。在长大成人的威利看来,上帝总是在四处乱跑:它可能就在我们经验的边缘上,但无论在哪儿都是同样可信的和真实的。

## 第五节 一门关于灵魂的科学

詹姆士有关经验的看法是他各种观点的核心,但从未得到认同。哲学家们为了支持联想主义的感觉元素的看法而拒绝接受詹姆士的观点,而到了这个世纪,哲学家们为了维护分析哲学家们有关逻辑元素的假设也拒绝接受这种观点。心理学家们开始也拒绝接受詹姆士有关经验的看法,因为联想主义的观点更为基本、更为稳定;后来,心理学理论根据行为主义原则用刺激和反应取代了经验。可见,詹姆士对新心理学

---

① 詹姆士,H.(1843—1916年),美国小说家。著有《罗德里克·赫德森》、《贵妇人的画像》、《波士顿人》、《悲惨的缪斯》、《梅西所知道的》、《鸽翼》、《专使》等。

② 威廉的昵称。

的基本批评恰好体现在他对经验的激进的看法中，这些批评却因此而不为人所知了。詹姆士像一些浪漫主义者，特别是雪莱那样，鼓励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包括那些神秘的、边缘的和半成形的经验——詹姆士常称之为“边缘”（fringe）。后来的思想家拒绝接受他这种很宽泛的心理学，  
219 结果现代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为了保持科学的目标而越来越难以把握平常百姓的经验的意义。

在工业革命刚开始时，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相信科学最有希望帮助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如今，在 21 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极少有思想家——非科学家就更少了——到科学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像华兹华斯、济慈和雪莱那些诗人都拥护伊拉斯马斯·达尔文的观点，认为科学给人类带来了福音，科学不仅是满足物质欲望也是满足精神欲望的手段。那种认为浪漫主义者拒绝接受科学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相反，他们大都对科学寄予厚望，我们这些生活在广岛战争之后的世界中的人们很难理解他们的那种厚望。

浪漫主义者对科学的期望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消沉了，其中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因素，工业革命所创造的不是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而是狄更斯、左拉等人笔下生动描绘出的肮脏、压抑的城市工业中心。然而至少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科学自身无法满足浪漫主义者对生命有新的理解的欲望：随着 19 世纪末新心理学的崛起，把灵魂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心理科学则取得了成功。

新心理学把以往称作灵魂的东西分成了三个部分：心理、无意识和身体。虽然这门新科学无法很好地将这三个部分联

系在一起,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以克服的:至少我们与动物相似的身体和无意识自我的活动仍可以与我们的心理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恰好迎合了世纪之交的欧美精英们所持的自由新教的观点,而且自由新教的观点正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

220  
这门关于心理的科学为 20 世纪留下的是一门自身不断分化的学科,分化成了众多的子学科。一些子学科关注心理方面的问题,例如认知或情绪;其他一些则关注身体方面的问题,例如神经传导或反射;还有一些关注的是无意识,例如心理分析。从詹姆士的观点来看,他们关注的所有问题都同样使研究工作远离了充满生命、呼吸、活动和经验的现实世界。

詹姆士所提倡的科学是以具体的、活生生的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显而易见,始终还没有这样的科学。在 20 世纪,由于缺乏这样的科学而导致的真空被填满了各种偏见和缺乏系统性的信念、宗教、精神、种族和伦理观念。由于科学家们从詹姆士所说的广阔的经验领域撤退到很狭隘的范围里,因而他们只能不断放弃许多能够将富有意义的自己才能理解的日常经验与常常充满煽动性的宗教、民族和平民领袖联系在一起的重要领域。

我相信浪漫主义者呼唤一门关于灵魂的科学是正确的,詹姆士通过他的经验科学来补充这种观点也是正确的。一旦心理科学敢于跳出个人经验内容之外——因为这些内容太不完整、太神秘了,或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它就不可能再讨论经验的意义了。心理学处在目前这种分化的状态下,只能间断地、不完整地适用于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我希望本书通

过追溯心理学如何将这些限制加到自己身上的过程，能够开创一个重新评估心理学的使命的时期，甚至导致浪漫主义所梦想的一门有关灵魂的科学获得再生。



本书是一部评论文集，而不是一部内容全面的历史。之所以写成这样，是因为我相信心理学史需要更多的评论文章但需要更少的历史书——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哪些问题可以看成是重要问题，还需要搞清楚激发我们研究和写作的有关历史的假设。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尽可能以第一手资料作为思想基础。至少在心理学领域中，大部分第二手资料是不全面的，并且具有误导性，这是令人悲哀的事实。尤其在英语世界中，哲学史家和心理学史家眼光非常狭窄，只盯着相当少的一部分人物和事件。例如，尽管通常认为费希纳是心理物理学的重要奠基人，然而在第二手资料中几乎无法找到有关他的泛神论是否与他的心理物理学有联系的讨论。

当然，我不会完全抛开第二手资料。我受到的最大的恩典来自那些以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我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例如 M. H. Abrams, Henri Ellenberger, Eric Hobsbawn 以及 Maurice Mandelbaum。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人 (Ellenberger 有些例外) 都不把自己看成是心理学史家，而且心理学史和哲学史的专业教材中通常也没有引用他们的论断。我还努力去寻找那些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我所讨论的思想家和观点的 19 世纪的第二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提出了一

些关于历史的重要假设。例如,我可以肯定地说,20世纪历史学家之所以通常把赫胥黎和廷德耳假定为“唯物主义者”完全是由于受到了当时人们对他们批评的误导。现代历史研究中此类误传之所以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常常对原始资料不够熟悉。

我还要说明一下哪些资料我没有采用。我决定不用那些有关19世纪但在当时却没有出版的档案资料或其他资料。毫无疑问,从这些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许多新的发现,但我认为我们在研究私下发生的事件及动因之前应对重要出版物的倾向性有更充分的认识 and 了解。假使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说我们还没有搞清楚1800年之后公众对灵魂看法的变化。总而言之,我的主要目标是更清楚地描绘出知识界发生的事件及其背后潜在的压力。

我没有采用档案资料的第二点原因是实效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在目前这个有限的范围里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即便不看任何档案材料,大家也可以发现目前对心理学史的理解有许多重要的缺陷。实际上,任何曾系统读过19世纪心理学或心理哲学著作的人都会发现,即使穷尽一个人的生命也不够他来读完所有正式出版的原始资料!尽管我已经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阅读有关资料,但坦白地说,除了在追踪有关特定历史时期或人物的情况时,我也只是对这些期刊文献进行粗略浏览。而且,我也没有很好地阅读德国期刊,我知道这个缺憾会限制我去得出一些结论。不管怎样,正如下面的书目提要所显示的那样,我曾广泛地阅读了英文、法文和德文资料。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更好地理解欧洲思想的发展趋向,而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发展情况。

## 总体研究

读者在将 19 世纪的历史与 19 世纪的哲学史或心理学史进行比较时，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心理学史或哲学史很少提到该时期历史上发生的至关重要的事件。拿破仑和俾斯麦在大多数心理学史或哲学史中甚至没有露面的机会；大多数心理学史或哲学史也没有提到 19 世纪中期整个欧洲通信业和运输业发生的巨大变革，而仅仅关注这场变革所带来的科学学会、科学会议以及科学期刊的发展。最后一点，没有一个心理学史家认真地讨论过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历程。我希望在这里通过我的努力做到这一点：为矫正这种缺乏整合的历史认识迈出小小的第一步。

对 19 世纪的研究最好从阅读 Eric Hobsbawm 的三部优秀著作开始：*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9)；*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9)；以及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Vintage, 1989)。Hobsbawm 不仅介绍了这个时期的总体情况，而且还对特定的文化和科学发展提出了许多相当有见地的假设。我觉得还应该提醒大家读一下 Paul Johnson 的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society, 1815—183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因为这本概要式的书很受欢迎。由于 Johnson 在整本书中都把拿破仑看成是斯大林 224 的某种原型，结果破坏了他对文化和政治事件的判断力。读者应将 Johnson 的观点与其他作者的观点进行一下比较。

M. Mandelbaum 的 *History, man, and reas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从哲学角度颇有洞察力地提出了对 19 世纪发展趋向的总体看法。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书是一部完整的心理学史,但实际上他很恰当、很细致地介绍了叔本华、孔德、马克思以及其他“历史人物”。然而 Mandelbaum 对 1830 年之前在官方学院中教授的那种经典形而上学却不是非常了解。因而, E. Bréhier 的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vol. 3, XIX - XXe siècles (Paris: PUF, 1932) 以及 J. McCosh 的 *The Scottish philosophy* (Hildesheim: G. Olms, 1966 [1875]) 是对 Mandelbaum 的著作的很好补充。H. W. Schneider 的 *History of American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是这样一部书:它对知识活动内容和风格的变化提出了清楚、简明并且有根据的解释。例如,书中的一些部分谈到了苏格兰学派在美国的影响以及 1900 年前后实用主义的新现实主义(pragmatist - neo - Realist)的发展。A. A. Roback 的 *History of American psychology*, 修订版, (New York: Collier, 1964) 也是一本很有用的书,特别是有关 19 世纪上半叶的那些内容。

毫无疑问, E. G. 波林的书尽管有许多问题,但仍是心理学史经典的教材。他的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ew York: Century, 1929) 在 1950 年出的第二版引起了很大反响,认真的学生可以把两个版本都看一下。波林的 *History of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ew York: Appleton - Century - Crofts, 1942) 也很重要,因为早期实验心理学史的许多内容都是围绕着心理物理学和感官生理学展开的。波林著作的主要局限性在于他存有两大偏见:

一是假设心理学起源于德国科学；二是假设冯特是某种实证主义者(继承了波林的老师铁钦纳的观点)。我们将看到,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做了很多工作来扭转这些偏见,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以波林那样的广度和分量对整个心理学史进行创造性的综合。 225

E. S. Clarke 和 L.S. Jacyna 共著的 *Nineteenth - century origins of neuroscientific concep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可能最有助于我们了解 19 世纪研究神经系统的生理学家们的活动情况。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书没有包括有关生理研究与哲学及文化问题的讨论。在一些方面, F. Fearing 的 *Reflex actio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Hafner, 1964 [1930]) 对那些想知道 19 世纪神经生理学与心理学如何相互影响的读者们来说是最好的入门书。Fearing 的著作再补充上 R. Leys 的研究就更有价值了, Leys 曾对 19 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医学学派及其对脊髓反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过细致的研究, 见他的著作 *From sympathy to reflex: Marshall Hall and his opponents* (New York: Garland, 1990)。Leys 表明现代的有关反射的理论大都来自于惠特和卡伦有关“同情”(sympathy)的理论——惠特和卡伦认为同情是脊神经所表示出的一种特殊的灵魂。

Henry Ellenberger 的权威著作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在麦斯美术、医学以及心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上的见地是无法超越的。大多数动力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研究那些个体拥有着的而自己却无法知道的动机、情感和思维的心理——的根源不是主流的哲学、医学或科学,而是来自与催眠术、唯灵论以及其他 226

一些至今仍不大了解的现象有密切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团体。

A. Gauld 的 *History of hypnot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是一本内容全面的纵览性的书。G. F. Drinka 的 *The birth of neurosi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也有助于我们了解 19 世纪后期精神分析如何与唯灵论、非正统的电磁理论以及催眠术紧紧地交缠在一起。

19 世纪的欧洲处在重大民主变革时期。在中欧,许多说德语的公国被合并到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南欧,意大利于 19 世纪 70 年代成为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国家。工业革命使大批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大城市在迅速膨胀——城市成为了国家政权及其海外经济活动的中心。大城市成为了文化活动的中心,在这些城市里或其周边地区出现了现代化的科研机构。这些科研机构不仅包括大学和实验室,还包括各种医学和科学学会、学术会议及各种学术期刊。对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城市是柏林、伦敦和维也纳。两个小一点的城市,爱丁堡和莱比锡,也几乎同等重要,甚至有些令人惊讶,这两个小城比巴黎更为重要。霍布斯鲍姆对民主发展过程进行了极好的概述,很有煽动性,读者如果了解更多的内容还可参考一下 N. J. G. Pounds 的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180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我采用了许多同时代的二手资料,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想引导我去思考哪些问题 227 在 19 世纪当时的思想家们看来是重要的问题。我参考的最一般性的研究是: R. Blakey 的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mind: Embracing the opinions of all writers on mental science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Longmans, 1850), 第四卷。

Blakey 属于苏格兰学派的一个小分支，他在贝尔法斯特教书。此书实质上是由对许多作者写的简短注释构成的大纲，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材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1850 年当时的思想家把哪些东西看成是重要的（哪些东西他们认为不重要！），还可以帮我们想起那些已经被忘却了的思想家。J. T. Merz 的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76[1903—1912])，共 4 卷，或多或少地从实证主义角度对欧洲思想进行了总结。还有一本类似的概要性的书，因为其中有很大篇幅谈到了如今不大为人所知的经典形而上学，所以非常有价值，这本书就是 C.S. Henry 的 *An epitome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Being the work adop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France for instruction in the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New York, Harper, 1842)，共 2 卷。

J. M. 鲍德温的 *History of psychology: A sketch and an interpretation* (London: Watts, 1913) 虽算不上是一本很有学识的书，但是它记录着北美最机敏的“新心理学家”之一的观点。G. H. 刘易斯的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Manchester, Eng.: Routledge, 1893) 从 1845—1846 年出的第一版开始，就被广泛使用。（我参考的是第八版。）刘易斯的声望，再加上他对孔德和实证主义颇高的评价，至少在英国引发了对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激烈的批评。Elie Halévy 的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 radicalism* (Boston: Beacon, 1960) 第一版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出来，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从早期的联想主义到功利主义和“激进主义”对进化论的看法。Halévy 是一位很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他的这本书至今仍很有价值，那些想了解穆勒父子的思想来源的人实在是应该

读一读这本书。

## 228 第一章 探索心理学

J. B. Dods(道兹)的 *Electr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Fowler & Wells, 1850), 第2版, 在许多公立图书馆里仍能找到, 至少在美国东北部是这样的。Fowler & Wells 可能是颅相学和麦斯美术方面最大的出版商; 研究这家出版社所出的书可以帮我们渐渐了解 19 世纪后期美国广为传播着的有关心理的看法。我引用的洛采的那段话出自他的《微观宇宙学》(p. xv.) 的引言。值得注意的是, 这本书的英译本是由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女儿翻译的: *Microcosmos: An essay concerning man and his relation to the world* (New York: Scribners, 1887), 第二版。

Peter Bowler 的 *The eclipse of Darwinism: Anti - Darwinian theories in the decades around 19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书, 它对 19 世纪后期反达尔文主义倾向的科学和哲学思想进行了学术研究, 是如今很少能见到的这类书之一。我之所以说这本书“令人惊奇”, 是因为在 1890 至 1930 年期间几乎所有以英文出版的书在精神上、内容上或者同时在这两方面上都是反达尔文主义的。而在德国或意大利的著作中这种反达尔文的倾向要少些, 但法国的情况却更糟。

同样地, 经常光顾图书馆医学区和旧书区的人会发现, 19 世纪后期出版的大多数“医学”书是由那些后来被称为“怪人”的人出版的。然而, 在历史学家的眼里, 这些文献大都似乎不存在。D. & E. Armstrong 的 *The great American medicine show*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是一本介绍医学领域中所谓的可供选择的理论的纲要。(但是,有什么好选择呢?现代以对抗疗法为基础的医学是到了本世纪才成为主流的。)但这本书只是非常简要地提了一下麦斯美术者、心理医治者、电治疗师等人。作者对这些从业者冷嘲热讽的态度阻碍了他对其观点去做认真分析;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将众多很分散的与心理和健康有关的思想集中到了一起。

说德语的地区在 19 世纪 50 年代出现了针对唯物主义的冲突,结果引起了大量的误解。要了解这个时期的情况最好读一下 F. Gregory 的 *Scientific materialism in nineteenth - century Germany* (Boston: North Holland Publishers, 1977)。如果把后来有关达尔文的争论也考虑进来,就会发现令人好奇的一点——那些引起最多反对意见的观点似乎是来自于人类的“自然化”研究的倾向,而是否恰恰在哲学的意义上被称为唯物主义者则无关紧要。

Hobsbawm 的 *Age of revolution* 是了解拿破仑时代政治情况以及维也纳议会的压制政策的很好的入门书,但这本书谈完了这些问题也就结束了。R. R. Palmer 的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共 2 卷,至今仍是有关欧洲及其殖民地的政治事件的最可读的和最可信赖的研究。H. Nicolson 的 *The concert of Vienna* (London: Macmillan, 1946) 有些过时了,但还值得一读。如果想细致地了解早期现代化的警察制度的手段和习性,可以看一下 D. Emerson 的 *Metternich and the secret police: Security and subversion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The Hague: M. Nijhoff, 1968)。E. Halévy 的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1)可能也有些过时了,但是我觉得第2卷和第4卷中对英国政府在法国大革命及随后的镇压行动中的反应介绍得最为清晰,尤其是1815至1819年这至关重要的几年。这一段历史在E. P. Thompson的*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8)一书中是按照“自下而上”  
230 的顺序来讲述的。我引用的James Sheehan的话是摘自他不朽的巨著*German history: 1770—186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第555页。

G. S. 霍尔的“The new psychology”一文发表在*Andover Review*, 1885, 3, 120—135, 239—249;约翰·杜威的“The new psychology”一文则是1884年在*Andover Review*上刊登出来的,后来在*John Dewey, the early works* (Edwardsvill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1989)的第1卷中重印了。詹姆斯·马克·鲍德温的“The postulat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发表在*The Presbyterian Review*, 1887,而他有关灵魂的文章也发表在这本杂志上,只是杂志的名称有所改动,见*The Presbyterian & Reformed Review*, 1890;这两篇文章都在鲍德温的*Fragments in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New York: Scribners, 1902)一书中重印了。G. M. Marsden的*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unbelief* (New York: Oxford, 1994)非常有助于广泛深入地了解19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学术界中的自由新教神学思想。Marsden认为自由新教放弃基督教教义中的特别成分是一次世俗化运动,而我则认为霍尔、杜威等人事实上是在试图用自然主义形式把他们对基督教的诠释统一起来。

了解威廉·詹姆士的生活和事业最好的资料是R. B.

Perry 的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35)。Jean Strouse 的 *Alice Ja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0) 对詹姆士与他妹妹的关系进行了最有启发性的研究。

R. K. French 的 *Robert Whytt, the soul, and medicine* (London: Wellcome, 1969) 是有关惠特这位苏格兰启蒙运动重要人物的惟一的传记, 但这本书在评价惠特时欠缺公正。是惠特而不是别人提出了有关躯体运动过程的科学心理学基本假设, 他还提出了刺激学说和无意识感觉学说。若要了解惠特在心理学的“史前”阶段所占据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请读一下 E. S. Reed(里德) 的 “The corporeal ideas hypothesis and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82, 35, 731—753, 以及我的另一篇文章 “Theory, concept, and experiment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The older tradition behind a ‘young science’”, *History of Human Science*, 1989, 2, 333—357。K. Figlio 的 “Theories of perception and the physiology of min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History of Science*, 1975, 12, 177—212, 也是有用的参考资料。

若要了解刘易斯请参见第八章的书目提要。若要了解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和雪莱请参见第三章的书目提要。若要了解李德和康德则请参见第二章的书目提要。

F. A. 朗格的 *History of materialism and criticism of its present importa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81), 共 3 卷, 1869 年开始在德国出版, 是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唯物主义危机”中很少的几部著作之一, 至今偶尔还会有人读读这本书。朗格所谈的问题很简单: 康德已经指出唯物主义为什么是站不住

脚的，但后来的唯物主义者却没有理解康德的意思。幸好赫尔姆霍茨及他的学派吸取了康德的思想，并且表明了新心理学是如何反对唯物主义的。尽管这本书在欧洲广为流传，但许多反对新心理学的人们（甚至包括威廉·詹姆士）却认为这是一本唯物主义的著作，看来当时的心理学史家仍没有理解到德国新心理学的成功主要是基于它成功地回击了唯物主义。L. Büchner(毕希纳)的 *Force and matter* (London: Trübner, 1870), 英文第2版, 译自德文版的第10版, 它是19世纪印刷量最大、读者最广泛的科学书籍, 但今天大家却极少谈到它了。<sup>232</sup> 尽管毕希纳是德国“庸俗的唯物主义者”, 但他身上似乎有些现象学家和实证主义者的特点, 他的研究思路在 H. 赫兹和 E. 马赫的努力下有了很显著的发展。

J. 缪勒的 *Elements of physiology* (London: Murray, 1838), 第2卷, 是关于19世纪科学的经典之作。在许多方面, 它标志着描述式的解剖生理学正向着缪勒的学生们, 例如赫尔姆霍茨和杜布瓦-雷蒙, 所进行的更多的实验性工作转变。

尽管我不想在本书中大篇幅地讨论 S. 弗洛伊德, 但读者一定很想弄清楚他在我这本新心理学史中所占的地位。那么, 最好先读一下 Ellenberger 的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前面曾引用过) 中有关弗洛伊德的那一章。F. Sulloway 的 *Freud: Biologist of the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详尽地介绍了弗洛伊德早期的事业发展以及他所受过的科学训练。Peter Gay 的 *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 (London: Dent, 1988) 是已有传记中最好的一本, 尽管 Gay 敏锐的批评偶尔会掩盖了他对主人公的敬意。弗洛伊德自己对于他的理论与新心理学的关系的看法可参见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New York: Avon,

1965[1900]), 第七章, 以及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69[1927])。

## 第二章 不可能的科学

经典形而上学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这个说法是我杜撰出来的, 因而历史上也就不可能有基于这种说法的研究了。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经典的思想家在大多数哲学史的教科书中总是被轻描淡写地带过——毫无疑问, 这种做法是源自黑格尔主义对于现代哲学史的许多假设。黑格尔的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3 [1827]), 共 3 卷, 这套书的“中心线索”被广泛沿用: 将康德之 233 前的欧洲哲学分成“理性主义的”(主要指欧洲大陆的哲学)和“经验主义的”(主要指英国哲学), 然后由康德将这两种经典思想整合了起来并最终超越了这两种思想。这种做法非常缺乏根据。例如, 它没有考虑到 1730 年之后的大多数法国哲学家受到了洛克思想的影响, 或者说至少受到了伏尔泰对洛克的介绍的影响。(这种做法常常把某些人排除在哲学家之外, 例如爱尔维修、孔迪拉克、狄德罗和德·阿朗贝尔通常在非法国哲学史中只能占据很小的篇幅。) 这种做法还很容易就忽略了一些有影响的事件, 例如马勒伯朗士对休谟的影响、或皮埃尔·培尔的普遍影响。L. Loeb 的 *From Descartes to Hume: Continental metaphys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hilosoph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能有助于纠正有关 18 世纪早期的上述误解。还可以看一下 C. McCracken 的 *Malebranche and British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1983)。我

建议大家也读一下 Peter Gay 的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Norton, 1969), 共 2 卷, 因为书中对所谓哲学中的相当多的各种各样观点做了认真的考察。

我们的确需要更为全面和现代地来理解“苏格兰哲学”, 尤其不能仅仅简单假定后李德主义者 (post-Reidians) 都真正读了李德的书或赞同他的观点。已有的书都不够全面或精密。这些书包括: D. S. Robinson 的 *The story of Scottish philosophy*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61); James McCosh 的 *The Scottish philosophy* (Hildesheim: Olms, 1966[1875])。D. Robinson 的“Thomas Reid's critique of Dugald Stewar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989, 28, 405—422, 是研究苏格兰学派很好的切入点, 因为这本书很简洁地阐明了斯图亚特与李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托马斯·布朗与斯图亚特的分歧更大, 他和汉密尔顿的分歧还要大)。

在写本章的过程中, 我所采用的一些苏格兰的第一手资料包括: Jacob Abbott 编辑的 J. 阿伯克龙比的 *Inquiries concerning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ruth* (New York: Collins & Brother, n.d.[1840?]); 匿名作者所写的文章“Reid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mmon sense: An essay - review of William Hamilton's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Thomas Reid*”,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1847, 239—258; C. 贝尔的 *The hand: Its mechanism and vital endowments* (Philadelphia: Cary, Lea, & Blanchard, 1835); T. 布朗的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tendency of the doctrine of Mr. Hum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Edinburgh: Mundell & Sons, 1806), 第 2 版; W. 汉密尔顿的 *Lectures on logic and metaphysics* (Boston: Gould

& Lincoln, 1865), 共 2 卷; J. Haven 的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 (Boston, Gould & Lincoln, 1873); T. 李德的 *The works of Thomas Reid, now fully collected, 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unpublished letters* (Edinburgh: Maclachlan & Stewart, 1872), 第 7 版, 共 2 卷(这是威廉·汉密尔顿爵士所编辑的李德作品中出版范围比较广泛的版本); P. M. Roget 的 *Treatises on physiology and phrenology* (Edinburgh: Black, 1838); D. 斯图亚特的 *The works of Dugald Stewart* (Cambridge: Hilliard & Brown, 1829), 共 7 卷; F. Wayland 的 *The elements of moral science* (Boston: Gould, Kendall, & Lincoln, 1839), 第 11 版; O. Wight 的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 (New York: Appleton, 1857); H. Winslow 的 *Intellectual philosophy: Analytical, synthetical, and practical* (Boston: Brewer & Tileston, 1864), 第八版。

当时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苏格兰哲学的前哨, H. Schneider 的 *History of American philosophy* (参见前面“总体研究”标题下的书目提要) 对此介绍得很清楚。还可以参考 D. W. Howe 的 *The unitarian conscience: Harvard moral philosophy, 1805—1861*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这本书说明了哈佛如何和为什么没有完全像大多数美国大学那样采纳苏格兰的思想。

我所采用的有关法国的第一手资料是 V. 库赞的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Ladrangé, 1953—1955), 共 16 卷。我采用了他的美国版本的 *Element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Gould & Newman, 1838)。有关直觉真理的引文出自 V. 库赞的 *Du Vrai, du Beau, et du Bien* (Paris: Didier, 1867), 第 38 页。曼

- 德 - 比朗的 *Oeuvres* 是由 P. Tisserand 编辑的 (Paris: PUF, 1920), 共 14 卷; 我还采用了 Destutt de Tracy 的 *Elémens d'idéologie* (Paris: Charles M. Levi, 1824), 共 3 卷。

我还参考了 E. Kennedy 的 *Destutt de Tracy and the origins of "ideology"*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8); M. Henry 的 *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aris: PUF, 1965); F.C.T. Moore 的 *The psychology of Maine de Biran* (New York: Oxford, 1970); 以及 Emile Bréhier 的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PUF, 1932) 中的相关章节。

德国经典形而上学由于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而显得颇为复杂。虽然库赞和一些右翼的黑格尔主义者试图将黑格尔的思想与苏格兰学派“综合起来”, 但是大部分德国哲学却不具有这种特点。若要了解这个时期, 特别是苏格兰学派对黑格尔的影响, 可以看一下 L. Dickey 的 *Hegel: Religi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770—180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以及 S. Hook 的 *From Hegel to Marx*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D. Leary 的文章 “The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psychology in Germany, 1780—185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78, 14, 113—121, 是一篇有关身心问题的很有利用价值的综述。尽管黑格尔影响很大, 但是许多与医学、生物学有关系的思想家以及那些可以看成是心理学家的前驱的哲学家们却提出了与经典形而上学有密切关系的自然哲学 (*Naturphilosophie*)。这方面的经典著作有: J. F. Blumenbach 的 *The elements of physiology* (London: Longman, Rees, Orme,



Brown, and Green, 1828); J. G. 费希特的 *The vocation of man* 236 (Indianapolis: Bobbs - Merrill, 1956); 以及 F. W.J. 谢林的 *Ideas for a philosophy of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第 2 版。T. Lenoir 在 *The strategy of life: Teleology and mechanism in nineteenth - century Germany* (Boston: North Holland Publishers, 1982) 一书中着手将德国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哲学联系在一起。F. Beiser 的文章 “Introduction: Hegel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收在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g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一书中, 这篇文章同样表明了黑格尔比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更具有自然主义色彩。

有关康德的文章实在是太多了, 今天人们仍在写着这类文章, 通常的读者是不可能都读完的。本章所讨论的问题主要与康德著名的第一部批判和第三部批判有关:《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是由 N. K. Smith 译成英文的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而《判断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judgement*) 则是由 W. S. Pluhar 翻译的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9)。若要了解苏格兰学派对康德的影响, 可以读一下 M. Kuehn 的 *Scottish common sense in Germany, 1768—1800* (Montreal: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7)。若要细致地了解康德的批评哲学在英语国家中的早期传播情况, 可以看一下 G. Micheli 的文章 “The early reception of Kant's thought in England”, 这篇文章收在 G. M. Ross 和 T. McWalter 编辑的 *Kant and his influence* (Bristol, Eng.: Thoemmes, 1991) 一书中。

尽管已经有不少阐释康德哲学的书籍, 但目前我们讨论

的问题往往不是康德自己表达了什么意思，而是康德的读者们认为他表达了什么意思。在这个课题上惟一的起点是 F. Beiser 的 *The fate of rea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该书极具可读性, 有助于我们了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 1800 年以前德国哲学的影响。Beiser 把对康德体系的多种角度的解释联系起来, 而这些解释没有一个完全支持康德对先验的理想主义和经验的现实主义进行的结合。

雪莱的关于形而上学的引言来自他的“*Treatise on morals*” (1812—1815), 重印在由 D. L. Clark 编辑的 *Shelley's prose: Or, 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New York: New Amsterdam, 1988), p. 185。雪莱对康德的暗讽来自对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的调侃之作: “*Peter Bell the Third*”:

此情此景之下彼得只好  
涂抹些伤感的文字聊抒胸臆。  
诗人假若吐露批评和不满  
就是多管闲事, 后果堪虞; 他们的职责  
本是令人愉快, 不是装腔作势。

魔王于是差人前往莱比锡集市,  
取来康德的大作, 已由伯恩译毕;  
密密麻麻的字, 个个头朝下,  
对、错、真、假——公正和无耻  
仿佛抽彩时被摇了个颠三倒四。

五千页码满字的八开纸,

谈论的是德国人的心理学——  
谁要能读着它平息心中怒气  
就理当领取比我这一辈子  
可能的所得再多七个月的工资。

这首诗引自由 D. Reiman 和 S. Powers 主编的 *Shelley's poetry and prose* (New York: Norton, 1977), p. 340。(Born 曾将把康德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

J. Mackintosh 关于形而上学的讨论可以从他的 *Dissertation on the progress of ethical philosophy chiefly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prefixed to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一文中找到，该文重印于 *Miscellaneous works of Sir James Mackintosh* 238 (Philadelphia: Hart, 1853), p. 95。查尔斯·达尔文的笔记“Mind, metaphysics, and morals”来自 Howard Gruber 编辑的 *Darwin on man* (New York: Norton, 1974)。

詹姆斯·斯特林是英国最早研究黑格尔的学者之一。他同时也是汉密尔顿及其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心理的学说的尖锐批评者。尽管斯特林的 *Sir William Hamilton: Being the philosophy of perception, an analysis* (London: Longmans, 1865) 的光芒被与其同年出版的穆勒的巨著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 所掩盖；但从斯特林略显单薄却不乏深刻的文章中我们仍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我所知道的关于颅相学的惟一的通史是 G. Lanteri - Laura 的 *Histoire de la phrénologie* (Paris: PUF, 1970)。Roger Cooter 的 *The culture of popular science: Phre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nsent in nineteenth - century Brita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一书对知识界的公共关系和颅相学给予同样的关注, 结果因关注的问题过于分散而深受其害。我相信 Geoffrey Cantor 反对那种认为颅相学多多少少地与 1815 至 1848 年期间的激进运动有关联的假设; 参见 G. N. Cantor 的 “A critique of Shapin’s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dinburgh phrenology debate” 和 “The Edinburgh phrenology debate: 1803—1828,” *Annals of Science*, 1975, 33, 245—256, 195—218。关于颅相学的“社会性”论题的最佳综述请参见 S. Shapin 的 “Phrenological knowledg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dinburgh,” *Annals of Science*, 1975, 33, 219—243(该文是对 Cantor 上文的一个回应)。

239 对颅相学运动的领导人们进行区分是重要的, 尤其要注意到 Spurzheim(斯帕兹海姆) 在与加尔决裂之后更倾向于把颅相学与经典形而上学而不是加尔的学说相结合。苏格兰的乔治·库姆和安德鲁·库姆兄弟以及美国的 Orson Fowler 等人走得更远(就像道兹那样), 他们认为颅相学应该成为基督教教义的支柱。没有哪个教堂会接受他们的观点, 尽管库姆兄弟, Fowler 等所持的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 仍不可能被主流的宗教组织广泛接受。我采用的第一手资料是乔治·库姆的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external objects* (New York: Samuel Wells, 1869), 第 20 版(!)。该书是 19 世纪美国所出版的最流行的非小说类图书之一。库姆这本虔诚的小册子是美国粹主义思想的杰作; 对于库姆来说, 颅相学是最新的科学, 它表明圣经(代表公认的基督教教义)是道德的最佳指南。对于库姆观点的广泛兴趣表明在 19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经典形而上学的基础是何等广泛。在我所拥有的

道兹和库姆的著作的封底上有几十个关于颅相学和催眠术书籍的广告，其中还包括一些大众心理学著作（如关于个性形成，婚姻的维持等方面的著作）以及那些声称可以使科学进展与基督教教义相一致的作品。

我还用到了加尔作品的美国版本：F. J. Gall,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brain and each of its parts* (Boston: Marsh, Capen, & Lyon, 1835, 共六卷)，以及他的早期作品 *Philosophisch – medizin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Natur und Kunst im kranken und gesunden Zustande des Menschen* (Vienna: R. Grasser, 1791)。T. L. Hoff 的出色短文：“Gall’s psychophysiological concept of functi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internal essence’”, *Brain and Cognition*, 1992, 20, 378—398，表明对加尔著作的历史性讨论是怎样受窘于他的中心概念“功能”的。对于所有对颅相学感兴趣的人来说，这篇文章是必读的，同时它也用实例说明了为什么说研究心理学史的过程有助于学习了解心理学知识。240

我还使用了斯帕兹海姆在美国出版的著作：J. G. Spurzheim, *Phrenolog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tudy of physiognomy* (Boston: Marsh, Capen, & Lyon, 1834); *Phrenology, or the doctrine of mental phenomena* (Boston: Marsh, Capen, & Lyon, 1835); 以及 *The natural laws of man* (New York: Fowler & Wells, n.d. [1846?])。最后这篇文献中，斯帕兹海姆在观点和过程上都和乔治·库姆非常接近。

### 第三章 弗兰肯斯坦的科学

关于伊拉斯马斯·达尔文最好的第二手资料是 *Desmond*

King-Hele 写的传记：*Doctor of revolu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77), 以及他编辑的 *Darwin's correspond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达尔文的作品以可读性著称而且很值得细读，尽管他的诗作偶尔读起来需要一定耐心。达尔文的 *Zoonomia* 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于 1794—1796 (London: J. Johnson) 以两卷本第一次出版，并且在英国和美国多次重印。我们需要研究该作品在欧洲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意大利和德国。在 *The temple of nature: Being the origin of society* (London: J. Johnson, 1803) 中，老达尔文提出了他的革命性的观点。*The botanic garden* (London: J. Johnson, 1789—1791, 共二卷) 也许是他最流行的著作。

托马斯·布朗的 *Observations on the Zoonomia of Erasmus Darwin* (Edinburgh: Mundell & Sons, 1798) 写于布朗 18 岁时，但包含了他以后的许多观点。他以休谟对于因果概念的批判为起点对达尔文进行攻击 (参见 p. xvi)。1805 年布朗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一书的第一版出版 (我使  
241 用的是 1822 年的美国版，由 M. Newman 在马萨诸塞州的 Andover 出版)，在书中布朗反驳了休谟所受到的无神论的指责。布朗利用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无神论理论来证明达尔文的理论既是无神论的又是错误的。由于这些努力，布朗被选为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在那里他发表的讲演后来出版为著作：*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 (Philadelphia: J. Griggs, 1824)，共 3 卷。在这期间他还写作了 *The Paradise of coquettes* (Philadelphia: M. Carey, 1816) 和 *Bower of spring, with other poems* (Philadelphia: M. Thomas, 1817)，还有一些诗集。

康德对普里斯特利的批判可以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

找到 (Kemp - Smith 译本的第 592 页, 在第二章中曾引用过)。普里斯特利的观点可以参见 J. Priestley 的 *An examination of Dr. Reid's 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sense* (London: J. Johnson, 1774), 以及 *Disquisitions relating to matter and spirit* (London: J. Johnson, 1777)。普里斯特利的例证来自 J. A. Passmore 编辑的 *Priestley's writings on philosophy, science, and politics* (New York: Collier, 1965)。

为阐释布莱克观点而进行的引证来自 D. Erdman 的 *Th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5) 和 *Prophet against the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以及 E. P. Thompson 的 *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 (New York: New Press, 1994)。我引用海涅的《赛拉芬》(*Seraphine*) 是出自 Hal Draper 的精致译本: *The complete poems of Heinrich Heine* (Boston: Suhrkamp/Insel, 1982), p. 332。关于霍夫曼的内容引自 R. Robertson 翻译的 *The golden pot and other ta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对于雪莱我使用的是 P. B. Shelley 的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1); 以及 D. H. Reiman 和 S. Powers 编辑的 *Shelley's Poetry and Prose* (New York: Norton, 1977); 以及 D. L. Clark 编辑的 *Shelley's prose: 242 Or, 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New York: New Amsterdam 1988)。

有关威廉·劳伦斯的情况的最佳著作是 A. Desmond 的 *The politics of evolution: Morphology, medicine, and reform in radical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还可参见 P. G. Mudford 的文章 “William Lawrence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68, 29, 430—436。对于欧洲的政治背景可以参见 R. R. Palmer 的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共 2 卷, 以及 D. Emerson 的 *Metternich and the political police: Security and subversion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The Hague: M. Nijhoff, 1968[参见前面的“总体研究”部分的书目提要])。至于重要的激进派出版家里查德·卡利尔可以参见 J. H. Wiener 的 *Radicalism and free thought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The life of Richard Carlile* (Westport: Greenwood, 1983)。

假如要我指出一本最准确描述雪莱的著作, 那么我要说那就是 Richard Holmes 的 *Shelley: The pursuit*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1974)。更痴迷的雪莱爱好者可以看看 K. N. Cameron 不朽的两卷本传记 *The young Shelley* (New York: Macmillan, 1950) 和 *Shelley: The golden yea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Desmond King - Hele 一直很重视两个问题: 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对雪莱的影响以及雪莱通过诗歌传播其科学观念的途径。我非常钦佩他在这个问题上深刻的洞察力。但他自己的著作: *Shelley: His life and work* (Teaneck, N. J.: Farleigh -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第 2 版, 却由于过多赋予雪莱思想以理智的色彩而大打折扣。特别是 King - Hele 似乎有一种轻视那些与雪莱作品中的科学思想同时同地出现的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观念的倾向。不过 243 在探寻雪莱作品的科学性方面, King - Hele 关于这个课题的所有作品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 D. King - Hele 的 *Erasmus Darwin and the Romantic poets* (New York: St. Martin's



1986), 以及他的题为“Shelley and Erasmus Darwin”的文章, 这篇文章收在 K. Everest 所编辑的 *Shelley revalued: Essays from the Gregynog conference* (Totowa, N. J.: Barnes & Noble Books, 1983) 一书中。

若要了解波西·雪莱和玛丽·雪莱的背景材料以及哈特利、普里斯特利等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 20 年间对英国思想的影响, 可以看一下 William St. Clair 的 *The Godwins and the Shelley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有关玛丽·雪莱的杰作的最好版本是由 J. Rieger 编辑的 M. Shelley,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我引用了 pp. 47, 98, 103—104, 107。有关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士的第二手资料也非常多。我发现 A. K. Mellor 的 *Mary Shelley: Her life, her fiction, her monsters*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在了解《弗兰肯斯坦》的科学背景方面是最有用的一本书。Mellor 尤其擅长说明玛丽·雪莱思想的老达尔文主义背景。E. W. Sunstein 的 *Mary Shelley: Romance and real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是一本内容更为广泛的传记, 但这本书却似乎没有像大家希望的那样把玛丽·雪莱看成一位思想家。尽管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弗兰肯斯坦》所带来的性别问题(这需要对科学家的子宫嫉妒[womb envy]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但我还是禁不住提一下 Brian Easlea 的佳作 *Fathering the unthinkable* (London: Pluto, 1983),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弗兰肯斯坦》来批评家长制科学。

M. H. 艾布拉姆斯的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New York: Norton, 1971) 对整个这一章都有重要影响。F. Ewen 的 *Heroic*

*imagination: The creative genius of Europe, 1815 — 1848* (Secaucus, N. J.: Citadel Press, 1980)也是很有帮助意义的一  
244 本书,值得再好好读一下。Ewen 尤其擅长揭示巴尔扎克、海涅  
以及霍夫曼这些作家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文学与科学的相互  
结合。

## 第四章 欧洲思想阵营的瓦解

杜伽尔德·斯图亚特的 *Dissertation, exhibiting a general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metaphysical, ethic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since the revival of letters in Europe, part I* 在他的 6 卷本的 *Collected works* (Cambridge: Hilliard & Brown, 1829) 重印了出来。这篇文章是 1819 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的前言。罗伯特·惠特的 *Works* (Edinburgh: Hamilton, 1768) 是由他的儿子收集整理才得到重印。F. Fearing 的 *Reflex action* 以及 Ruth Leys 的 *From sympathy to reflex* 有助于我们了解“苏格兰学派”的背景(这两篇文章在“总体研究”部分的书目提要中都引用过)。

托马斯·布朗的 *Observations on the zoonomia of Erasmus Darwin* (Edinburgh: Mundell, 1798) 在第三章的书目提要中曾引用过。他的另一篇著作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tendency of the doctrine of Mr. Hum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Edinburgh: Mundell, 1805) 开始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在第 2 版时扩充成一本书(1806),后来又被扩充了一次并改换了题目再次出版,即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of cause and effect* (Edinburgh: Tait, 1818)。正如我在前面曾提到过的那样,

我使用的是根据这本书的 1820 年版出版的美国版,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 (Philadelphia: J. Grigg, 1824), 共 3 卷。我引用的部分是出自 Lectures 11, 20, 22 和 25。还可以看一下 D. Welsh 的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omas Brown, M. D.* (Edinburgh: Tait, 1825), 以及 J. A. Mills 的 “Thomas Brown on th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of percep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 1987, 23, 37—49 和 “Thomas Brown’s theory of caus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984, <sup>245</sup> 22, 207—229。詹姆斯·穆勒有关体验不到的感受的论述以及约翰·穆勒的注释都引自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参见其中第七章的注释), p. 42。

有关曼-德-比朗的参考文献在第二章已经列过了。叔本华的主要著作, 由 E. F. J. Payne 翻译的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Dover, 1964[1819]) 是一本非凡的作品, 它是所有形而上学作品中最具有活力的一本, 我极力推荐此书。这本书的前言 *The fourfold root of 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 (E. F. J. Payne 译) (LaSalle, Ill.: Open Court, 1974 [1813]) 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叔本华有关知觉的理论, 即知觉是大脑或心理推论感觉效果背后的原因所导致的结果。这个理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 尽管有的形式在叔本华的著作中也无法找到, 但是这个理论从此支配了人们对知觉的看法; 参见 N. Pastore 的 *Selective history of theories of visual perception, 1650—19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以及 E. S. Reed (里德) 的 *James J. Gibs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percep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叔本华的 “On the will in nature” 在 K. Hillebrand 翻译的 *Two essays by Arthur*

Schopenhauer (London: Bell, 1907)一书中可以找到。B. Magee 的 *The Philosophy of Schopenhau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有助于将叔本华的各种著作联系在一起。但叔本华是思路最清晰、最有组织的哲学家之一,所以他的著作很容易直接读懂。而读者希望了解的是叔本华所处的 1810 至 1830 年期间的自然科学发展的背景资料。Magee 和其他评论家却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246 亚历山大·贝恩的两部巨著 *The senses and the intellect* (New York: Appleton, 1860) 和 *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 (New York: Appleton, 1888), 都分别有好几个版本,而且做过较大改动。(这里所引用的分别是第 2 版和第 3 版。)W. B. 卡彭特的 *Mental Physiology* (New York: Appleton, 1891[1874]) 是在 *Principles of human physiology* (我使用的是由费城的 Lea Blanchard 出的 1847 年美国版)一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使用的 1847 年版的书中就已经有了两个附录:一个攻击颅相学是缺乏根据的,而另一个则是试图了解“麦斯美现象”的意义。卡彭特的著作,包括他对各种自然力之间的关系思考,都可以在他儿子所编辑的 *Nature and man* (London: Kegan, Paul, & Trench, 1888) 一书中见到。威廉·詹姆士使许多卡彭特有关动作的观点重新引起注意,尤其是有关“自动动作”的观点(换句话说,“自动动作”就是那些不需要我们投入很多注意就可以发生的动作),结果使得许多这些观点进一步流行起来。有趣的是,1857 年的圣诞节,亨利·詹姆士爵士(小说家亨利·詹姆士的父亲——编者注)曾为了给他的长孙威廉买一个望远镜的问题而征求过威廉·卡彭特的意见。

卡彭特观点以及他的著作的流行体现在他的 *Physiology* 中的一段话对 W. 柯林斯的非常流行的神秘小说《月亮宝石》有重要影响(*The moonstone*) (New York: Collier, 1958[1868]), p. 382。柯林斯还引用了埃利奥特森和库姆的话来帮助人们理解小说中的主角所出现的恍惚状态。柯林斯像他的朋友狄更斯一样,对心理科学中的问题有着极大的兴趣,狄更斯曾向埃利奥特森学习过催眠术。柯林斯 1872 年的作品 *Poor Miss Fin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是围绕着贝克莱的视觉理论展开的,表现了那些几乎一生失明的人重见光明时要面对的问题(根据贝克莱的理论)。

## 第五章 短命的自然形而上学

247

J. 缪勒的 *Handbuch*——J. Baly 将这本书译为 *The elements of physiology* (London: Murray, 1838; 引文出自 pp. 1073, 3n)——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在欧洲的发行量始终都非常大。用英文写成的对缪勒进行研究的学术报告只有一篇,即 W. Bernard 的“Spinoza's influence on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A neglected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72, 8, 208—215, 这篇文章更正了那种通常认为缪勒是某种康德主义者的误解。

关于伽伐尼和伏特的讨论参见 M. Pera 的 *The ambiguous fro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J. Heilbron 的 *Electricit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是追踪电磁学的各种早期理

论的变迁方面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尽管赫尔巴特在 19 世纪对西方学者有重要影响,但现代却很少有人研究他。我参考了 J. F. 赫尔巴特的 *Lehrbuch zur Psychologie* (Königsberg, East Prussia: Unzer, 1834) 和 C. De Garmo 的 *Herbart and the Herbartians* (New York: Scribners, 1895)。

在上一章的书目提要中已经列过有关叔本华的参考文献。一个匿名作者的文章使叔本华在欧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篇文章是“Iconoclasm in German philosophy”, *Westminster Review*, 1853, 59, 202—212。James Sully 的 *Pessimism* (London: Kegan Paul, 1877) 反映了叔本华同时代人对他的自然悲观主义的看法, Charles Renouvier 的文章“Schopenhauer et la metaphysique du pessimisme”也是如此,这篇文章在 S. Donailier, R. - P. Droit 和 P. Vermeren 编辑的 *Philosophie, France, XIXe siècle* (Paris: Livre de Poche, 1994) 重印出来了。

248 费希纳是一位著作丰富而且兴趣异常广泛的学者。他用 Dr. Von Mises 为笔名写作讽刺文章,而使用费希纳这个本名来写作科学文章,例如他的著作 *Fechner Elemente der Psychophysik* (Leipzig: Voss, 1860) 和形而上学方面的文章,他还使用费希纳这个本名写一些兼具讽刺文章和科学文章特点的作品,例如 G. T. 费希纳的 *Zend - Avesta, oder Über die Dinge des Himmels und des Jenseits* (Leipzig, Voss, 1851), 其中一些文章被选编成 *Life after death* (New York: Pantheon, 1943) 一书。有关费希纳晚期的心理物理学观点的一篇很有用的综述文章是他的“My own viewpoint on mental measuremen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1987[1877], 49, 213—219。费希纳的每个学生都会

读一下他的 *Nanna, oder Über das Seelenleben der Pflanzen*。这本书在 1848 年出了第一版,就是这本书使得费希纳从可怕的抑郁症和心因性失明中“活了过来”。将他从这场病魔中拯救出来的医生正是洛采。我参考的是这本书的第 3 版,其中有持原子论观点的历史学家 Kurt Lasswitz 写的序言 (Hamburg: Voss, 1903)。W. Woodward 的“Fechner's panpsychism: A scientific solution to the mind - body proble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72, 8, 367—386, 是惟一的一篇探讨费希纳的“科学”与他的“哲学”之间关系的现代研究。

洛采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是哲学和心理学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现代人却像忽略赫尔巴特和缪勒那样也忽略了洛采。洛采的主要著作有 R. H. Lotze, *Medicinische psychologie, oder Physiologie der Seele* (Leipzig: Weidmann, 1852); *Microcosmos: An essay concerning man and his relation to the world* (New York: Scirbners, 1887), 第 2 版; 以及 *Metaphys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7), 第 2 版。有关洛采的比较好的第二手资料包括 O. Kraushaar 的两篇文章:“Lotze's influence on the psychology of William Jam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936, 43, 235—257, 和“Lotze's influence on the pragmatism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William Jam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0, 1, 439—458; 还包括 T. M. Lindsay 的“Rudolf Hermann Lotze”, *Mind*, 1876, 1, 363—381; 以及 G. Santayana 的博士论文 *Lotze's system of philoso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1)。W. R. Woodward 的“From association to Gestalt: The fate of Hermann Lotze's theory of spatial perception, 1846—1920”, *Isis*, 1978, 69, 572—582, 在某种程度上将洛采的部

位记号理论中所涉及的复杂的心理学和形而上学问题过于简化了。部位记号理论在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争论中被经验主义者所采纳,然而洛采提出这个理论的本意却与这场争论无关,Woodward 的这篇文章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洛采对缪勒将皮层对运动的控制比喻成“琴键”的批评,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前苏联的生理学家尼古拉·伯恩斯坦的工作才引起大家的注意。尽管现在看来伯恩斯坦的工作是一项重大突破,但由于前苏联的压制,他的工作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才被西方人了解。M. Latash 和 M. Turvey 编辑的 *Bernstein on dexterity* (Mahwah, N. J. : Erlbaum, 1996) 是一本关于伯恩斯坦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的好书。这本书中有一篇我和 Blandine Brill 共著的文章,说明了伯恩斯坦是如何反驳动作学习的“皮层习惯”理论的。

## 第六章 1848:转折之年

J. 布鲁姆死后出版的 *In the beginning: The advent of the modern age. Europe in the 1840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一书非常好地综述了 19 世纪 40 年代所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Herbert Schnädelbach 的 *Philosophy in Germany, 1831—193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提出了那种认为 19 世纪 40 年代的许多哲学著作和思想是来自大学之外的观点。相似地, William Johnston 的 *The*  
250 *Austria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1848—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一书所追踪的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中只有很少几个是来自奥地利的大学。



在探讨大学课程的变化以及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早期专业化过程时，我使用了以下书籍和文章：J. Ben - David 的“Social factors in the origins of a new science”和“University and academic systems in modern societies”，这两篇文章收在他的文集 *Scientific growth: Essays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ethos of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中；L. S. Jacyna 的“Medical science and moral science: The cultural relations of physiology in restoration France”，*History of Science*, 1987, 25, 111—146；J. E. Lesch 的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France: The emergence of experimental physi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J. Schiller 的“Physiology’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History of Science*, 1968, 7, 64—89；J. S. Jacyna 的“Principles of general physiology: The comparative dimension of British neuroscience in the 1830s and 1840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Biology*, 1984, 7, 47—92。非学术的科学研究在当时已经很少了，有关这个问题 S. Sheets - Pyenson 的文章“Popular science periodicals in Paris and London, 1820—1875”，*Annals of science*, 1985, 42, 549—572，提供了很丰富的信息。

令人感兴趣的是，19 世纪中期的一些神经生理学家们有意识地重新回到 18 世纪末有关心理与大脑关系的理论中去了。该倾向可以从当时重印了惠特同时代的两篇重要文章中反映出来，这两篇文章中的观点与惠特的观点很相似，它们是 G. Prochaska 的“A dissertation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nervous system”以及 J. A. Unzer 的“The principles of physiology”，它们都是在 T. Laycock 编辑的 *Unzer and Prochaska on the nervous system* (London: Sydenham Society, 1851) 一书中重

印的。

Adam Crabtree 的 *From Mesmer to Freud* (New Haven: Yale  
251 University Press, 1993) 详细介绍了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麦斯美  
主义医学理论遭到的破坏。还可以看一下 A. E. Waite 编辑的  
詹姆斯·布雷德文集 *Braid on hypnotism: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hypnosis* (New York: Julian Press, 1960)。Ann Braude 的  
*Radical spirits: Spiritualism and women's right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oston: Beacon, 1989) 至今仍是研究唯灵论历史的最好  
的入门书。令人吃惊的是还没有人将美国 19 世纪唯灵论、  
颅相学以及信仰疗法上的成就与 20 世纪心理学作为学术制  
度的成就进行比较。若要了解心理学与其他学科分离的开端,  
可以看一下 T. Leahey 和 G. Leahey 的 *Psychology and its  
occult doubles: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s of pseudoscience*  
(Chicago: Nelson Hall, 1983), 以及 D. J. Coon 的 “Testing the  
limits of sense and science: American 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s  
combat spiritualism, 1880—1920”,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47, 143—151。

若要了解赫尔姆霍茨在心理学学术制度发展中的作用,  
可以看一下 R. S. Turner 的 “Hermholtz, sensory physiology, and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German physiology”, 这篇文章收在  
W. Woodward 和 M. Ash 编辑的 *The problematic science: Psy-  
chology in nineteenth - century thought* (New York, Praeger, 1982)  
一书中, 还可以看一下 Turner 的 *In the eye's mi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A. W. Brown 的 *The Metaphysical Society: Victorian minds in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7) 讲述了伦敦

形而上学学会的历史。这个学会成员的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和巡回演讲有：W. K. Clifford(克利福德)的 *Lectures and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879), 共 2 卷；F. Pollock 的 *Spinoza: His life and philosophy* (London: Kegan Paul, 1880)；J. Tyndall(廷德耳)的 *Fragments of science* (New York: D. Appleton, 1898), 共 2 卷；A. Bain(贝恩)的“The intellect, viewed physiologically”和“The feelings and the will, viewed physiologically”，*Fortnightly Review* 1865, 3, 575—588, 735—748；还可以看一下贝恩的 *Mind and body: The theories of their relation* (London: Henry King, 1873), 第 2 版。这些不同的著作令人惊讶地一致赞同身心关系的两方面理论，其作者们相信——常常并没有清楚地说出来——这种两方面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宗教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C. D. Cashdollar 的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ology, 1830—1890: Positivism and Protestant thought in Britain and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说明了自由新教神学与 19 世纪后期松散的所谓实证主义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互联系。Paul Carter 的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the gilded ag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追踪了美国人对实证主义的反应，这种反应与形而上学学会成员的反应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

最好的有关欧洲 19 世纪中期的实证主义倾向的综述是 Mandelbaum 的 *History, man, and reason* (见“总体研究”部分书目提要)。还可以读一读 W. M. Simon 的 *European positiv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若要了解 19 世纪 50 年代年轻的非孔德实证主义者们 (non-Comtean) 的世界观，最好读读这一派别两位最清晰的发言人

的作品: H. Taine(泰纳)的 *Les philosophe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Paris: Hachette, 1857) 以及 H. T. Buckle 的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New York: D. Appleton - Century, 1939), 第2版, 共2卷, 最初出版于1859至1861年期间。尽管还没有对德语世界中出现的 *materialismus - streit* (唯物主义冲突) 的系统综述, 但仔细读一下朗格的 *History of materialism and criticism of its present importance*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新一代的持两  
253 方面理论的实证主义者是如何认为自己的观点将宗教从唯物主义的冲击中拯救出来的。F. Gregory 的 *Scientific materialism in 19th - century Germany* (前文提过) 很好地研究了所谓庸俗的唯物主义者。若要了解当时人们的看法, 可以看一下 M. J. Schleiden 的小册子 *Über den Materialismus der neueren deutschen Naturwissenschaft* (Leipzig: Egelmann, 1863)。

F. Wilson 对小穆勒的研究侧重于他与孔德等实证主义者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分歧。参见 “Mill and Comte on the method of introspec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91, 27, 107—129 以及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 philosophy of John Stuart Mil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冯特可能是心理学史中得到研究最多的人物。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在冯特的美国学生 E. B. 铁钦纳的影响下许多美国心理学家错误地把冯特与那些反对自然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者列在了一起。最近的研究不仅表明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而且追踪到了错误的根源: A. Blumenthal 的 “A reappraisal of Wilhelm Wundt”,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5, 30, 1081—1088 和 “Wilhelm Wundt: Psychology as a propaedeutic science”, 见

C. Buxon 编辑的 *Points of view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5); K. Danziger 的 “The positivist repudiation of Wund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79, 15, 205—230 和 “The history of introspection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 1989, 16, 241—262 以及 “Wundt and the two traditions of psychology”, 见 R. Rieber 编辑的 *Wilhelm Wundt and 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New York: Plenum)。冯特自己的著作很杂而且有多个版本。我使用的是 W. Wundt, *Beiträge zur Theorie der Sinneswahrnehmung* (Leipzig: Winter, 1862); *Vorlesungen über die Menschen - und Thierseele* (Leipzig: Voss, 1863), 共 2 卷; *Grundzüge der physiologischen Psychologie* (Leipzig: Englemann, 1874); 以及 “Über psychologische Methoden”, *Philosophische Studien*, 1883, 1, 1—40。<sup>254</sup>

若要了解新康德主义的整个状况，可以看一下 T. E. Willey 的 *Back to Kant: The revival of Kantianism in Germ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thought*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以及朗格的《唯物主义史》。有关朗格的引文来自 K. Kuhnke 的 *The rise of neo - Kantian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51。Kuhnke 特别擅长阐述新康德主义者(而不是实证主义者)在提出哲学(特别在方法论方面)或者应该是某种“有关科学的科学”的观点中起了重要作用。

到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唯物主义的争论在整个欧洲成了常识。下面这段选自 *Anna Karenina* (《安娜·卡列尼娜》)(首次出版于 1877 年)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列文去拜访他的兄弟，结果发现“一位有名的哲学教授同他在一道，

这位教授是特地从哈特夫赶来解决他们间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的争论的，教授正在对唯物论者做猛烈的论战。赛尔吉·柯兹尼雪夫很有兴味地注意这场论战，读了教授的论文之后，就写信给他，表示反对，他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太让步了；因此教授马上来解释这件事情。争论的是一个时髦的问题：人类的生理现象和生理现象之间有没有界限可分；假如有，那么在什么地方。”（英文引自 L. Maude 和 A. Maude 翻译的 *Anna Karen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第 23 页）<sup>①</sup>

## 255 第七章 三种无意识及其发展历程

Ellenberger 的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前面曾引用过）提供了研究无意识的最基本的背景知识。L. L. Whyte 的 *The unconscious before Freud*（New York: Basic Books, 1960）将莱布尼兹、惠特及后来的学者联系在一起，此书在这方面有借鉴的价值。就我所知，除了 K. Danziger 之外还没有别人注意过 1848 年之后的 10 年间人们对无意识的兴趣的激增，他的文章“Mid - nineteenth - century British psycho - physiology: A neglected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收在 W. Woodward 和 M. Ash 编辑的 *The problematic science: Psychology in nineteenth - century thought*（New York: Praeger, 1982）一书中。

有 4 本 19 世纪 60 年代的教科书关注了无意识心理过程

---

<sup>①</sup> 中文翻译引自周扬译《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35—36 页。

在塑造人心理上的重要作用。若要了解 19 世纪 60 年代各种无意识心理理论百花齐放的背景可以看一下 E. S. Reed(里德)的“Theory, concept, and experiment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 1989, 2, 333—352。4 本重要的教科书其中的第一本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 *An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 R. Kegan Paul, 1979[1865]), 这本联想主义者的著作最清楚地阐明了为保持联想主义心理学的连贯性就必须提出无意识心理过程。在这本书里以及对詹姆斯·穆勒的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 Dyer, 1869, 共 2 卷)一书所附加的评论中, 他提出了所谓的一些或所有无意识过程都是与推理过程类似的假设。第二本重要的教科书是 Hippolyte Taine(泰恩)的 *De l'intelligence* (Paris: Vrin, 1869), 这本书也将无意识过程的观点与联想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它对自我形成进行了更广泛的关注, 认为个体文化以某种方式在自我形成中鼓励以不同的特殊模式产生观念的联想。第三本重要的教科书是 E. S. Dallas(达拉斯)的 *The gay science* (London: Chapman & Hall, 1866), 共 2 卷, 这本书值得单独研究。达拉斯将主流哲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与心理学对睡眠、梦、醉酒状态以及麦斯美术的早期研究结合到一起。他将这些复杂的无意识活动与对文学和艺术的分析联系起来, 这本书超前了整整一个世纪。最后, 第四本有关 19 世纪 60 年代无意识研究的重要的教科书是 Eduard von Hartmann(哈特曼)的 *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1[1869]), 共 3 卷。冯·哈特曼以自然形而上学为工具(对生物学和生理学、逻辑—数

256

学中的争议等进行了广泛讨论)把无意识描绘成我们生活的全部,而我们只能通过日常心理活动来瞥见其中的一点点。

美国在无意识研究方面也不甘落后。Oliver Wendell Holmes 爵士的精彩文章预见到了威廉·詹姆士和无意识的英国学派的观点,这篇文章是“Mechanism in thought and morals: Address to the Phi Beta Kappa Society at Harvard College, June, 1870”,收在 *Pages from an old volume of lif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1857—1881*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899)中。Holmes 认为我们一生中部分时间是处在主要由无意识控制的习惯或自动化活动中。因而,假使我们能使这些“机械化”行为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它们起作用。

贝利与约翰·斯托特·穆勒的争论是由贝利引发的,参见 S. Bailey, *A review of Berkeley's theory of vision, designed to show the unsoundness of that celebrated speculation* (London: James  
257 Ridgeway, 1842)。穆勒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过这本著作,穆勒文章的题目是“Bailey on Berkeley's theory of vision”,收在 J. Robson 编辑的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the class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1842])。将穆勒对贝利的批评与他对贝克莱本人的评论“Berkeley's life and writing”进行一下对比是很有价值的,这两篇文章都收在他的 *Collected works* 第2卷中,他有关逻辑的论述 *A system of logic* 收在了第6—7卷中。贝利最系统的著作是 *Letters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 (London: Longman, Rees, Orme, Brown, and Green, 1855, 1858, 1863)。在这部著作中,他清晰地指出了汉密尔顿思想的不一致性以及他对苏格兰“现实主



义”立场产生的负面影响。(看来,穆勒本人在批评汉密尔顿时竟没有足够重视这部著作,是一件颇为惭愧的事情。)不幸的是,贝利相当赞同杜伽尔德·斯图亚特、托马斯·布朗和威廉·汉密尔顿对李德的看法以证明李德不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从李德在 *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1764]中所采取的准贝克莱主义(quasi-Berkeleian)的立场是可以提出这种解释的,但这部著作与他在18世纪80年代所写的激进文章不同。)然而,贝利对他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自知之明却令人佩服,他不断指出联想主义所需要的一些假定的心理实体是不存在的。作为无意识推理的知觉与作为对世界直接观察的知觉之间的对比问题是在 Richard Gregory 和 E. Gibson(吉布森)、J. Gibson(吉布森)之间的交流文章中提出来的。Gregory 的“Seeing as thinking”以及吉布森夫妇的“The senses as information-seeking systems”都出现在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972,并在吉布森夫妇的 *An odyssey in learning and percep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中重印。

有关 C. S. 谢灵顿对肌肉感觉的评论见 E. A. Schafer 的 *Textbook of physiology* (Edinburgh: Pentland, 1900),共2卷,这本书是该问题最好的入门书。肌肉可能有“感觉”的观点是从一种很古老的观点逐渐演化成现代的肌肉可能是具有神经基础的感 258 觉系统的观点——尽管那个系统没有有意识的感觉。有关这些观点的争论常常会使更深层的有关感知觉、心身关系(以及心理与动作之间的关系)和方法论问题(我们如何能够了解那个感觉系统)的假设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值得更细致地加以注意,我在此只能一带而过。K. Figlio 的“Theories of perception and the physiology of mind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History of Science*, 12, 1975, 177—212 和 K. Danziger 的“Origins of the schema of stimulated motion: Towards a pre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History of Science*, 21, 183—210, 谈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 第八章 对实证主义的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常的英国哲学史中很难看见刘易斯的名字。刘易斯在将欧洲思想介绍到英国的过程中做的工作甚至比柯勒律治或卡莱尔还要多，他还使维多利亚晚期的人们又一次对斯宾诺莎及其两方面理论产生兴趣，因此刘易斯这个人物肯定是值得做一些研讨的。然而 John Passmore 在其令人钦佩的著作 *A hundred years of philosophy* 中，例如 London: Duckworth, 1957 出的版本中，只有 3 处马马虎虎地引用了刘易斯，并且没有对刘易斯的贡献进行任何讨论。

R. Ashton 的 *G. H. Lewes: A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是目前有关这位重要思想家生平的最好的介绍。Ashton 主要着眼于刘易斯的传记特别是他与玛丽安·埃文斯(乔治·艾略特)之间的关系，但她也对刘易斯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概要介绍。她惟一没有提到的就是刘易斯在英国生理学和心理学发展中实际发挥的中心作用——像 Ashton 那  
259 样学英国文学的人应该能理解到这一点。令人费解的是科学史家和哲学史家竟然不能像乔治·艾略特的学生那样注意到刘易斯这位令人尊敬的人物！还有一些重要文章探讨了科学观点以及刘易斯观点在乔治·艾略特的著作中的作用：R. Greenberg 的“Plexuses and ganglia: Scientific allusion in *Middlemarch*”，

*Nineteenth - Century Fiction*, 1976, 30, 33—52; M. Mason 的“*Middlemarch* and science: Problems of life and mind”,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971, 22, 151—169; 以及 S. Shuttleworth 的很有趣的著作 *George Eliot and nineteenth - century science: The make - believe of a beginn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Shuttleworth 是现代少有的参考 Dallas 的 *Gay science* 的作者(见 p.21)。

刘易斯著作的数量非常大 (Ashton 提供的书目清单是最完整的)。我参考了美国版的他的多卷本著作 *Problems of life and mind: First series, Foundations of a creed; Second series, The physical basis of mind; Third series, The study of psychology* (Boston: 1874—1879)。James Osgood 出版社出了前面两个系列,而第三个系列则是由 Houghton - Mifflin 出版的。刘易斯的 *Life and works of Goethe* 可以看一下 Everyman 出版社出的版本。刘易斯的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在许多版本中称作 *History of philosophy*)在大西洋两岸得到广泛出版,至少有 6 个差别显著的版本。我还看了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Manchester, Eng.: Routledge, 1893), 第 8 版。这本书后来的版本改动很大,而刘易斯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来重写一部分内容,尤其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忠诚于孔德的思想,而是阐明了自己的非孔德的实证主义观点。这种庸俗的实证主义 (secular positivism), 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这种观点,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整个欧洲影响巨大。刘易斯不仅仅是这种观点的惟一代言人,而且是这场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刘易斯对斯宾诺莎研究俱乐部的介绍值得大篇幅引用: 260

大约 30 年前，由学生组成的一个小俱乐部每周在霍尔本的红狮子广场 (Red Lion Square) 的酒吧里聚会，他们富有热情又不乏深刻地讨论复杂的哲学问题。这个俱乐部的规矩极其简单，活动也非常不正式。俱乐部的成员只是在周六才聚在一起，他们的目的是对充满挑战性的观点进行友好的辩论，他们的主题则时不时很复杂并且激发所有人去思考。而一周的其他时间，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有人是旧书店的老板，富有包含自由思想的文献；有人在为旅行者制造手表；有人靠中等水平的收入度日；有人是鞋匠；有人是“全神贯注时，就写上一节”的作家；还有一位对解剖学等研究投入了极大热情，却没有固定工作。尽管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但每个周六他们都到红狮子广场的这间小酒吧聚会，辩论声和笑声淹没了午夜的钟声：争论有时也会很喧闹、很生气，但是这些偶然情况总是被笑声打断了，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随即缓解下来。这些人围火而坐，抽着雪茄或烟斗，喝着咖啡、烈酒或啤酒，没有主席也没有主持人，也没有固定的辩论形式，但大家在生动的讨论中都想畅所欲言，这些哲学家真正产生了活力，鼓舞了彼此的心理……

[参与这些争论的] 一个名叫 Cohn 或 Kohn 的德国犹太人，我们都很佩服他那令人惊讶的精明和逻辑能力，而不是他的个人财产。在我的记忆中他属于那种哲学贵人的类型。他是一位平静的、爱思考的、可爱的人，他的职业是为旅行者制作手表，他非常穷，眼睛和胸部都不大好；但他在举止上很深沉和慷慨；即使在虚荣的诱惑下也会保持清廉；我习惯性地把他和斯宾诺莎连在一起，这不仅

是因为他们在个性上很相像，而且因为他是我所熟悉的  
第一位希伯来思想家（引自 G. H. Lewes 的 “Spinoza”，  
*Fortnightly Review*, 1866, 4, No.22, 385—406）。

我想知道 25 年之后当 William Morris 住到了红狮子广场时，  
Kohn 是否仍频繁地去那儿。

有关实证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参见 Mandelbaum 的 *History, man, and reason*（见“总体研究”部分）以及 W. M. Simon 的 *European positiv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第六章讨论过的那些与形而上学学会有密切联系的科学家更明确地深化和扩展了刘易斯的“庸俗的实证主义”。F. Pollock 的 *Spinoza: His life and philosophy*（London: Kegan Paul, 1880）不仅是第一本有关斯宾诺莎的英文书，而且在本质上体现出刘易斯把斯宾诺莎当作实证主义者的原型(proto-positivist)的新观点。

孔德的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出版于 1830 年，在随后的 20 年中畅销不衰。我用的是他死后由巴黎的实证主义学会出版的第 6 版，1896。这本书的精编本在刘易斯的部分支持下由 Harriet Martineau 译成英文出版，*The positive philosophy of August Comte*（London, J. Chapman, 1853）。Chapman 是刘易斯的出版商之一，也是刘易斯、斯宾塞、玛丽安·埃文斯（乔治·艾略特）的密友。有关斯宾塞的引文出自 D. Duncan 编辑的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Herbert Spencer*（London: William and Norgate, 1911），p.81。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有关两方面理论的最有影响的说法见他 1872 年对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

ence 所做的演讲“On the hypothesis that animals are automata”,印在 *Methods and results* (New York: Appleton, 1896) 一书中;还可以看一下他的另一本书 *Hume: With helps to the study of Berkeley* (New York: Appleton, 1902[1879])。这两本书详细地论证了赫胥黎的现象主义和反唯物主义,也反映出他对当时人们的批评。

有关刘易斯在剑桥大学设立的生理学奖学金,参见 E. M. Tansey 的“‘The science least adequately studied in England’: Physiology and the G. H. Lewes studentship”,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1992, 47, 163—186。詹姆士对刘易斯的 *Physical basis of mind* 的评论见 *Nation*, 1877, 25。

## 第九章 另一个达尔文

A. Desmond 和 J. Moore 所著的 *Darwin*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1) 是到目前为止最权威的传记, D. Kohn 编辑的 *The Darwinian herit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对有关达尔文的大量二手资料进行了总结,用起来很方便。然而,我的观点与众不同,我认为研究达尔文最好从另外两本书入手: M. Ghiselin 的 *Triumph of the Darwinian method*<sup>263</su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1969]), 和 Mea Allan 的 *Darwin and his flowers: The key to natural selection* (New York: Taplinger, 1977)。这两本书最大的优点是对达尔文所有工作,尤其是他在 1859 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的工作,进行了清晰而全面的总结。而许多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关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的那段时间,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有趣的是,从

人类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可能会毁掉达尔文的非凡成就:他在广度和深度上对进化论的巨大贡献。我曾试图对达尔文的成就进行一点点很概要的历史评述,见 E. S. Reed, “Darwin’s worms: A case study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Behaviorism*, 1982, 10, 165—185;以及我的著作 *Encountering the world: Toward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2章。达尔文的著作由英国的 John Murray 和美国的 D. Appleton 两家出版社在 19 世纪出版,最近伦敦的 Pickering & Chatto (1986)重出了 29 卷本。

达尔文有关遗传、人类进化和行为的著作对心理学史来说尤为重要。这些材料可以在最近 Chatt 和 Windus 重新发行的图书中找到,但我参考的是: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New York: Appleton, 1896[1868]),共 2 卷;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New York: Appleton, 1902[1871]),第 2 版;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1872]); *The formation of vegetable mould through the action of earthworms* (New York: D. Appleton, 1904[1881])。

Robert Boakes 的 *From Darwin to behaviorism: Psychology and the minds of animal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是了解动物行为研究的历史的最好的入门书。这本书对斯鲍尔丁的工作进行了很好的回顾,其中有斯鲍尔丁的研究助手安伯利夫人的照片。斯鲍尔丁重要的心理学论文有: 264  
“Instinct: With original observations on young animals”, *Macmillan’s*, 1873, 27, 282—293; J. B. S. Haldane(霍尔丹)在自己的文章中以注释的形式重印了这篇论文,见 *British Journal of*

*Animal Behavior*, 1954, 2, 2—11(我引用的那段话出自霍尔丹的文章); “Instinct and acquisition”, *Nature*, 1875, 12, 507—508; “The relation of mind and body (Review of Bain’s *Mind and Body*)”, *Nature*, 1873, 7, 178—179; 对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的评论见 *Nature*, 1873, 7, 198—200, 356—369; 对刘易斯的《生活和心理问题》的评论见 *Nature*, 1874, 10, 212—213。

霍尔丹——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正式将斯鲍尔丁“重新发现”出来，并在1954年将其主要著作出版，而P. Gray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发现了”斯鲍尔丁的工作的价值——见“Douglas Spalding, the first experimental behaviorist”,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62, 67, 299—307——而又是20年之后，Boakes在前面提到的那本著作中又再一次将斯鲍尔丁发现出来。因为威廉·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中有一章曾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本能的问题，所以对斯鲍尔丁的这种忽视看来有些奇怪。有证据表明斯鲍尔丁的两大发现——印记(imprinting)和关键期——位居心理学史的最重要发现之列，他的实验方法至今仍在沿用。看来需要对斯鲍尔丁在行为发展科学中的工作缺乏影响的原因进行系统研究。

## 第十章 1879年：哲学如何从心理学中产生出来

1879年这个年份通常被用来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诞生”，这主要是受到了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见“总体研究”部分)的影响。波林作为铁钦纳的学生和冯特的实证主义信徒，强调了冯特的实验室以及实验室所做的研究工作，却贬低了冯特的其他兴趣。重新纠正波林的偏见及其对后来心理学



史工作者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最佳切入点是 K. Danziger 的 “The history of introspection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1980, 16, 241—262。Danziger 的著作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Historical origin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细致地综述了冯特心理学的社会背景及形成过程，特别是它在美国的发展过程。R. O'Donnell 的 *The origin of behaviorism, 1880—1920* (New York: NYU Press, 1985) 整本书关注的都是“新心理学”到了美国之后所发生的变化。

读一些当时宣传新心理学的材料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知识界对心理实验——将实验的方法引入到哲学家和道德学者的保护区中——的讨论是如何引发的。这方面最有趣的一些文献包括：G. S. Hall 的 *Aspects of German culture* (Boston: James R. Osgood, 1881)；以及 Cardinal Mercier 的非凡著作 *The relation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to philosophy* (New York: Benziger Brothers, Printers to the Holy Apostolic See, 1902) 试图以托马斯主义世界观使实验方法适用于心理学；法国人 Théodule Ribot (李播) 的 *English Psychology* (London: Henry King, 1873) 和 *German psychology today* (New York: Scribners, 1886) 对他所见到的法国心理学的半死不活的状态进行了批评，两本书都果断地支持实证主义和早期实验心理学。

有关弗雷格的介绍，我主要依据的是 W. Carl 的 *Frege's theory of sense and reference: Its origins and sc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因为这本书在我看来最完善地展示出弗雷格的难于理解的有关命题所指客体的本质的观点。G. P. Baker 和 P. M. S. Hacker 的 *Frege: Logical excava-* 266

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使弗雷格看起来不像现实主义者而像是柏拉图主义者。我觉得这种看法过于偏激,但这本书在说明从这一立场出发可以提出什么样的激烈观点方面还是有借鉴的价值。我还用了弗雷格著作的现代英译本: *The basic laws of arithmetic* (M. Fruth 译)(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J. Austin 译)(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nceptual notation and related articles*, (J. Bynum 编辑)(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Logical investigations* (P. Geach 和 R. Stoothoff 编辑)(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有趣的是,第一本完全刊载我们今天所称为哲学的内容的英文杂志是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这本杂志是由 William Torrey Harris 和其他所谓的圣路易斯的黑格尔主义者(St. Louis Hegelians)创办的。这样看来,在美国西南地区的中部,在内战之后的艰苦岁月中,一群非专业学者创办了第一本美国的哲学杂志,比文明水平更高的英国所创办的 *Mind* (1876)早了近十年。(若要更多地了解这些思想家的情况,读一读 W. H. Goetzmann 的 *The American Hegelians: An intellectual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973]。)*Mind* 这本杂志的首任编辑是 G. C. Robertson,他所刊登的哲学文章与心理学文章各半。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大概是英语世界中学术杂志的全盛时期。一流的学术杂志在世界各处出版,美国的 *The Atlantic* 和 *Harpers*; 英国的 *The Fortnightly Review*, *Macmillan's* 和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还有法国<sup>267</sup> 的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然而,哲学史家和心理学史家对这里提到的材料都没有进行系统分析,甚至没有提出一个很

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对哲学和科学问题很专业的讨论能够受到大众的欢迎并在传媒中占据显著地位。

有关逻辑史的最好综述是 W. Kneale 和 M. Kneale 所著的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我还使用了 Hilary Putnam 在 C. S. Peirce(皮尔斯)1898 年的演讲重新出版时写的序言来说明皮尔斯在符号逻辑中的历史地位, 见 *Reason and the logic of th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所有有关皮尔斯的引文都来自 N. Houser 和 C. Kloesel 编辑的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 1, 1867—1893*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92)。有关三段论的引文来自其中的文章“Grounds of validity of the laws of logic”, p. 63(首次发表在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869, 2, 193—208)。有关逻辑学家的信念的引文来自“On the Algebra of Logic”, p. 202。

B. 罗素有关逻辑学对哲学的重要性的早期观点收集在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Norton, 1938[1903]) 一书中。若要了解罗素思想的背景以及他把逻辑看成是一种新哲学(最终被称为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观点, 可以读一下 N. Griffith 的 *Russell's idealist apprenticeship* (New York: Clarendon, 1991) 以及 P. Hylton 的 *Russell, ide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若要了解奥地利学派, Barry Smith 的出色著作 *Austrian philosophy: The legacy of Franz Brentano* (Chicago: Open Court, 1994) 是权威的英文教材。还可以看一下 J. MacNamara 和 G. -J. Boudewijnse 合写的文章“Brentano's influence on Ehrenfels's

theory of perceptual gestalt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1995, 25, 401—418。B. Smith 和 D. W. Smith 的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sser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也是一本很有用的书。我觉得 R. Tieszen 的著作中有关胡塞尔在数学方面的贡献那一章对我帮助特别大。M. Farber 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著作进行了细致地研究, 见他的著作 *The foundations of phenomenology* (New York: Paine - Whitman, 1962), 这本书在了解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方面也特别有用。胡塞尔的 *Logical investigations* 在 1897 年至 1913 年期间写成并重写了一次。John Findlay 根据修订后的版本译成了英文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在修订 *Logical investigations* 这本书的过程中, 胡塞尔深化了思想并明确提出了作为他哲学的基础的“新科学”。他把这种新科学称为现象学。参见他的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1913, 1, 1—323。这篇文章能作为一本新杂志的头一篇文章发表不是偶然的, 这本杂志在名称中对现象学研究加以强调也不是偶然的。

Daniel Wilson 的 *Science, commun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hilosophy, 1860—193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介绍了那个世纪之交时许多思想家所面对的专业化的压力, 这本书也很有用。例如, 作者提到在 1876 年 G. Stanley Hall (霍尔) 与威廉·詹姆士在 *Nation* 上进行的一次很重要的交流, 霍尔指责美国的哲学教育受到了来自宗教限制的不应有的阻碍, 詹姆士则指出科学是摆脱这种限制的一种可能的方法 (pp. 40—41)。Wilson 叙述了 1892 年康奈尔

大学创办 *Philosophical Review* 时的许多详细情况 (pp. 53—55, 104), 以及 1901 年美国哲学学会产生时的情况, 这个学会的建立比心理学会要晚近 10 年 (pp. 99, 109)。(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霍尔所创办的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始于 1887 年, 比 *Philosophical Review* 要早 5 年。) 尽管心理学在学术制度的建立上明显领先, 但是 Wilson 仍旧采纳那种认为心理学是从哲学的阴影里产生出来的错误说法! 那么, Arthur Lovejoy 在美国哲学学会上发表的主席讲话中, 鼓励哲学要像心理学曾成功地做到的那样变得更具有科学性 (pp. 143—145), 我们能从这一事件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 269

## 第十一章 威廉·詹姆士: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

詹姆士模棱两可的地位只得到了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勉强承认。哲学家曾试图贬低詹姆士对自然主义和科学的贡献。心理学则试图贬低这些贡献背后包含了詹姆士的多神论和唯灵论思想。(附带提一下, 詹姆士强烈反对泛神论, 尤其反对许多实证主义者所玩弄的那种泛神论。) 尽管第二手材料数量庞大, 但是却几乎没有人注意过激励詹姆士大部分工作的多神论动机。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 这就是 A. Funkenstein 的 “The polytheism of William Jam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94, 55, 99—111, 但却过于粗略。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曾经出版了 *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 这套书是现今最居权威性的学术版本。其中的大部分文章在 Library of America 编辑的詹姆士著作中重印过, 而这种版本更容易找到。我引用的文字就出自这套书的第 1 卷, 见

William James, *Writings: 1878—1899*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4),除了“Are we automata?”和“The spatial quale”两篇文章这个版本里没有之外,其他所有相关引文都出自这卷书。而那两篇文章则可以在 W. James, *Essays in psychology* 2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找到。“The Ph. D. octopus”这篇文章可以在 Library of America 版的第 2 卷中找到 (William James, *Writings: 1902—1910*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F. M. Turner 的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reaction to scientific naturalism in late Victoria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表明了在那个世纪之交英国科学发展中明显交杂着宗教和神学的影响。这本书中有关 A. R. Wallace(华莱士)、F. W. H. Myers 和 James Ward 的章节很好地阐述了 19 世纪后期心理学(还有精神分析)在协调许多人的科学观点与宗教观点中所起的作用。詹姆士的许多著作也写于类似的背景之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詹姆士非常赞成 Myers 的工作,但 Myers 对神秘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研究却常常被心理学史家或哲学史家忽略了。

有关詹姆士及其家庭的二手资料数量巨大,但不幸的是,其中极少关注他与心理学家以及刚刚产生的心理科学之间的关系。惟一的例外是 D. Bjork 的 *The compromised scientist: William Jam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syc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书中描述了詹姆士与刚刚建立的美国心理学会及其主要支持者之间的不很明确的关系。R. B. Perry 的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见第一章的书目提要)仍是有关詹姆士观点的最可靠的综述。在

“The psychologist’s fallacy as a persistent framework in William James’s psychological theorizing”,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95, 8, 61—73 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对詹姆士的心理学工作做一下简要的介绍。G. Myers 的 *William Jam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在参考时应小心谨慎。E. Taylor 的 *William James on exceptional mental states* (New York: Scribners, 1983) 是有关詹姆士对精神现象的最好的综述。现在还可以看一看 Taylor 的 *William James: On consciousness beyond the margi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在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era of William James: The eclipse of uncertainty, 1820—188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一书中，P. J. Croce 过于强调了不谈确定性就无法把握詹姆士的思想，但詹姆士却从未对确定性及怀疑主义的问题特别关注。F. O. Matthiessen 的 *The James Family* (New York: Knopf, 1947) 仍值得一读，G. W. Allen 的 *William James* (New York: Viking, 1967) 仍是第一流的传记。有关亨利·詹姆士的引文出自他的 *Autobiography* (《自传》)，由 F. Dupee 编辑 (London: W. H. Allen, 1956), p. 147。





# 索引

- Abercrombie, John, 阿伯克龙比, 36-37, 60, 234
- Abrams, M.H., 艾布拉姆斯, 16, 54
- Action, 动作: 作为意志的辅助, 116; 贝恩的知觉理论中的~, 76-77
- “Active powers of the mind”, 心理活动力, 22
- Agape, 邻人爱, 55。参见“Eros”; “Love”
- Amberley, Lady, 安伯利夫人, 179-180
- Amberley, Lord, 安伯利伯爵, 179-180
- Ampère, André-Marie, 安培, 83
- Animal electricity, 动物电, xi, 4
- Animal magnetism, 动物磁性, xi, 4, 120; ~对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38, 82-83; 无意识理论中的~, 127, 129; ~的心理学基础, 113-115
- Apperception, 统觉: 冯特的知觉理论, 123
- Associationism, 联想主义: 感觉在~中的作用, 29-30, 72, 75, 76, 133-135; 观念的联想学说, 38-39;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的~, 52; 人类心理的规律和倾向, 60-61; 意志的作用, 76, 77, 116, 212; 对~的批评, 81; 与洛采的部位记号理论的比较, 104; 逻辑无意识, 131-135。参见“Association of ideas”; “Bain, Alexander”; “Brown, Thomas”; “Condillac, Etienne de”; “Hartley, David”; “Hume, David”; “Mill, James”; “Mill, John Stuart”; “Priestley, Joseph”; “Principles of association”
- Association of ideas, 观念的联想, 29, 31, 38-39, 41; ~学说, 29-30, 39
- Atheism, 无神论: ~与科学心理学, 9
- Atomism, 原子论, 98; 对~的批评, 208-209
- Attention, 注意: 心理理论中的~,

- Bailey, Samuel, 贝利, 135 - 141
- Bain, Alexander, 贝恩, 145, 148, 150; 关于知觉的运动理论, 76 - 77, 78; 关于信念, 77; 关于努力感, 86; 关于随意运动, 93, 94, 104; 关于意志, 116, 118; 与斯鲍尔丁的关系, 179, 182
- Baldwin, James Mark, 鲍德温, 6 - 7, 216, 227, 230
- Balzac, Honoré de, 巴尔扎克, ix, 11, 58
- Bell, Charles, 贝尔, 17, 234
- Bell - Magendie law, 贝尔 - 马让迪律, 17
- Bentham, Jeremy, 边沁, 12
- Berkeleian philosophy, 贝克莱哲学, 33, 37
- Berkeley, George, 贝克莱, 62, 63 - 64, 67, 71, 133, 135, 139
- Bichat, F. X. J., 比夏, 44
- Binet, Alfred, 比奈, 80, 184
- Blake, William, 布莱克, 41 - 42, 241
- Blum, Jerome, 布卢姆, 109
- Boring, E. G., 波林, 146, 172, 224 - 225
- Boscovic, Rudiger, 博斯科维克, 36 - 37
- Bouterwek, Frederic, 布特韦克, 111
- Braid, James, 布雷德, 79, 114
- Brentano, Franz, 布伦塔诺, 186, 198; 对心理科学的批评, 99, 158; 对心理状态从现象上上进行描述, 153, 154, 195, 196 - 197
- British Idealism, 英国理想主义, 112
- Brown, Thomas, 布朗: ~ 的联想主义, 30, 65 - 66, 72 - 74, 79, 104, 134, 139; 对流动唯物主义的批评, 40 - 41, 65; 职业生涯, 64 - 65; 关于肌肉感觉, 64 - 74, 86, 116; 关于心理的空间定位, 93; 关于意志, 116
- Büchner, Ludwig, 毕希纳, 8, 9, 149, 231 - 232
- Byron, George Gordon, Lord, 拜伦, 50
- Career psychology, 职业心理学, xi
- Carlile, Richard, 卡利尔, 48
- Carlyle, T., 卡莱尔, 12
- Carpenter, William B., 卡彭特, 77 - 80, 120 - 121, 139, 150
- Cartesian philosophy, 笛卡儿哲学, 6, 32, 36, 118 - 119, 194
- Cause and effect, 原因与结果: 心理学中的因果律, 45
- Censorship, 审查制度: 对早期唯物主义心理学的~, 43 - 45, 47 - 48

- Cerebral reflex, 大脑反射, 79
- Charcot, Jean - Martin, 夏尔科, 80
- Cheyne, George, 切恩, 61
- Clifford, William K., 克利福德, 120, 160, 161
- Cohn (G. H. 刘易斯的朋友) 科恩, 147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柯勒律治, 11, 12, 15, 27, 149
- Collins, Wilkie, 柯林斯, 80
- Combe, Andrew, 库姆, xi, 239
- Combe, George, 库姆, xi, 77, 114, 239, 240
- Comte, Auguste, 孔德, 8, 145, 148, 158, 224
- Condillac, Etienne de, 孔迪拉克, 31, 32, 133, 136, 233
- Congress of Vienna, 维也纳议会, 14
- Conscience, 良心, 121
- Consciousness, 意识, 意识理论, 31, 36, 152
- Continental rationalists, 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者, 32
- Cousin, Victor, 库赞: 职业生涯, 30 - 32, 111, 147, 235; 关于折衷主义, 32, 35; 关于直觉主义, 33 - 36, 52, 99, 120; ~ 的著作, 234 - 235
- Cullen, W., 卡仑, 225
- Cullen family, 卡仑家族, xiii
-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文化转形: 对科学心理学产生的影响, 109 - 111
- Dallas, Eneas S., 达拉斯, 142
-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 对以神为中心的科学的批评, 2 - 3, 100 - 101, 159, 173 - 176; 心理学著作, 23, 167, 170, 176 - 178; 自然选择理论, 100 - 101, 169, 170, 172 - 176, 177; 职业生涯, 168 - 172; 实验, 171 - 172, 177 - 179; 人和动物的表情, 176 - 178; 与斯鲍尔丁的比较, 179 - 183
- Darwin, Erasmas, 达尔文, xi - xii, xv, 173; 职业生涯, 14 - 16, 48, 49; 诗歌, 14, 15, 39, 58, 70, 174; 唯物主义, 18, 19, 27, 39 - 43, 44, 49 - 51, 54, 57, 65, 83 - 84, 98, 151; 关于饮食, 40, 47; 对雪莱的影响, 45; 联想主义者的观念, 51, 52, 77, 93; 关于性爱, 55, 56, 57; 关于知觉, 70; 关于努力感, 86 - 87
- Davy, Humphrey, 戴维, 15
- Descartes, René, 笛卡儿, 25, 91, 200
- De Vaux, Clotilde, 德沃, 148
- Developmental critical period, 发展的关键期(斯鲍尔丁), 181
- Deviance, 行为偏离: 联想主义的解

释, 17

Dewey, John, 杜威, 216, 230

D' Holbach, Baron, 霍尔巴赫, 33, 48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 113, 163, 219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33, 233

Diet, 饮食: 与心理健康, 47

Disease, 疾病: 电力的不平衡, 4; 受心理因素影响, 39

*Dr. Jekyll and Mr. Hyde*, 杰凯尔医生与海德先生, 164 - 166

Dods, John Bovee, 道兹, 1 - 2, 3 - 4, 7, 10, 111

Donders, Franciscus, 唐德斯, 108

Dostoevsky, Fyodor, 陀思妥耶夫斯基, ix, 163

Doyle, Sir Arthur Conan, 柯南道尔, 115

Dreaming, 梦: 意志分散, 80; 无意识心理, 119, 120

Dual aspect theory of mind and body, 心身两方面理论; 心理和身体两方面理论, 95, 98, 155, 156 - 157

Dualism, 二元论: 意识和无意识心理, 7, 118 - 119, 164; 笛卡儿的~, 6, 19

Du Bois Reymond, Emil, 杜布瓦 - 雷蒙, 89, 98, 160, 232

Durham, W., 德拉姆, 89

Ehrenfels, Christian von, 埃伦费尔斯, 195, 197

Electrical psychology, 电心理学, 1 - 2, 3 - 4。参见“Dods, John Bovee”

Electrical stimulation, 电刺激: 对疾病的治疗, 4

Eliot, George, 艾略特。见“Evans, Marian”

Elliotson, John, 埃利奥特森, 113

Empirical realism, 经验现实主义: 康德的~, 63

Empiricist psychology, 经验主义心理学: 与先天论心理学相对的~, 52。参见“Empiricism”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111, 185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31。参见“Condillac, Etienne de”; “Maine de Biran, François - Pierre”

Enthusiastic intuition, 狂热的知觉, 34

*Erkenntnislehre* (“science of science”), 科学哲学 (“有关科学的科学”), 124 - 126, 159 - 160, 161, 186

Eros, 本能爱, 15, 56 - 57; 与邻人爱相对立, 55

Erotic experience, 性爱体验: ~ 在进化上的意义, 55 - 58, 120

Erotic view of the world, 有关世界的

- 性爱的观点：雪莱的诗歌中～，55-58
- Evans, Marian(George Eliot), 埃文斯(乔治·艾略特), 49, 88, 149, 152
- Evil, 罪恶：核心自我之外的～，6, 7；《弗兰肯斯坦》中～的相对性，53。参见“Deviance”
- Evolutionary theory, 进化论，169, 172, 175, 176。参见“Natural selection”
-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实验心理学：～的建立，5, 144, 184-186, 201；～中的形而上学问题，117；目标，122-124, 143, 144-145, 154-155, 184-186。参见“New psychology”；“Psychophysics”；“Reaction-time studies”
- Externalism, historical, 历史中的外在主义, xii-xiii
- Faculty psychology, 官能心理学，27-28, 34。参见“Metaphysics: traditional”
- Faraday, M., 法拉第, 83
- Fechner, Gustav, 费希纳, xv, 86；心身两方面理论，95, 98；有关“世界灵魂”的观点，97-98；心理物理学，96-98, 102, 107, 117, 123, 129, 153
- Ferrier, D., 费里尔, 4
- Feuerbach, Ludwig, 费尔巴哈, 47, 48, 111
- Fichte, Immanuel, 费希特, 34, 111, 112, 127
- Fiction, 故事：潜在心理学的媒介，49。参见“*Dr. Jekyll and Mr. Hyde*”；“*Frankenstein*”；“*Master Flea*”
- Fluid materialism, 流动唯物主义，14；意义，16, 41-42, 43；审查制度，16, 43-44；对～的介绍，38-42, 43-44；在文学著作中表达出的～，51, 57, 58
- Fluid theory of electricity, 电的流动理论，14
- Force, 力：概念, xi。参见“Vital force”
- Frankenstein*, 《弗兰肯斯坦》：～中的唯物主义心理学, 45, 50-56, 58
- Franklin, Benjamin, 富兰克林, 14, 38, 83
- Free action(卡彭特), 自由动作, 78
- Free will, 自由意志：叔本华, 88；作为内省现象, 121
- Frege, Gottlob, 弗雷格, 126, 153, 185, 189-195
-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对新心理学的批评, 20；有关无意识, 120, 127, 142, 166-167；实证主义, 156, 159

- Fritsch, Gustav, 弗里奇, 4
- Functional psychology, 机能心理学, 177
- Fused sensation, 感觉融合, 74
- Gall, Franz Josef, 加尔, 28, 77
- Galton, Francis, 高尔顿, 184
- Galvani, Luigi, 伽伐尼, x - xi, 38
- German idealism, 德国理想主义, 31。参见“Transcendental idealism”以及有关哲学家
- Gestalt psychology, 格式塔心理学, 195 - 197, 198
- Gibson, Eleanor, 吉布森, 135
- Gibson, James J., 吉布森, 135, 137
- Goethe, J. W. von, 歌德, 145, 149
- Gray, Asa, 格雷, 101, 176, 204
- Greaves, James Pierrepont, 格里弗斯, 147
- Gregory, John, 格雷戈里, 61
- Habitual action, 习惯动作, 93 - 94
- Haldane, J. B. S., 霍尔丹, 182
- Hales, Steven, 黑尔斯, 61
- Hall, G. Stanley, 霍尔, 216
- Hall, Marshall, 霍尔, 123
- Haller, Albrecht von, 哈勒尔, xv
- Hamilton, William, 汉密尔顿, 33, 35, 111, 134, 233, 234, 238
- Hartley, David, 哈特利: 联想主义, 38 - 39, 51, 52, 77, 93, 133; 生理学理论, 61, 93, 98; 关于意志和道德判断, 77
- Hartmann, Eduard von, 哈特曼, 123, 141, 142, 162
- Hegel, G. W. F., 黑格尔: 职业生涯, 31 - 32, 111, 112; 刘易斯对 ~ 的讨论, 145, 147, 148
- Hegelian philosophy, 黑格尔哲学, 35, 88
- Heine, Heinrich, 海涅, 46 - 47
- Helmholtz, Herman von, 赫尔姆霍茨: 关于缪勒, 84, 89, 91; 实证主义, 98; 心理物理学, 107 - 108, 117 - 118, 200; 无意识推理学说, 118, 132, 135, 140, 142, 143, 162, 188, 189, 195
- Herbart, Johann Friedrich, 赫尔巴特, 84, 85, 98, 102, 129
- Hering, Ewald, 黑林, 143, 161, 189
- Hertz, Heinrich, 赫兹, 98, 100, 161
- Hitzig, Edward, 希齐格, 4
- Hobbes, Thomas, 霍布斯, 185
- Hobsbawm, Eric, 霍布斯鲍姆, 110
- Hodgson, Shadworth, 霍奇森, 157
- Hoffman, E. T. A., 霍夫曼, 16, 49 - 50
- Hume, David, 休谟, 11, 62, 64 - 65,

- 157, 158, 200
- Humean philosophy, 休谟哲学, 33, 88
- Hunt, Leigh, 亨特, 49, 147
- Husserl, Edmund, 胡塞尔, 156, 187, 189 - 190, 195, 198 - 199
- Huxley, T. H., 赫胥黎, 33, 120, 150; 现象主义, 33, 121, 158, 160 - 161, 162; 自动作用, 151, 152, 156, 157, 178, 181; 有关进化论, 169
- Hypnotism, 催眠术, 79 - 80, 114, 115, 120, 128。参见“Animal magnetism”; “Suggestibility”
- Ideas, 观念; 观点: 达尔文有关 ~ 的理论, 39 - 41; 与 ~ 相联的感受, 51。参见“Association of ideas”
- Ideologues, 意念学派, 31。参见“Condillac, Etienne de”
- Ideomotor action, doctrine of (詹姆士), 念动学说, 105
- Illuminism, 先觉主义, 75
- Illusory perception, 错觉, 188 - 189
- Indirect perception, 间接知觉, 41
- Inebriation, 醉酒状态: 意志分散, 80; 无意识在 ~ 中的作用, 128
- Insanity, 精神错乱; 疯狂: 生理紊乱, 44; 无意识在 ~ 中的作用, 128
- Internalism, historical, 历史中的内在主义, xii
- Introspection, 内省: 局限性, 19, 80, 85, 104, 117 - 118, 138, 140, 187 - 188; 自然形而上学, 85; 与生理分析相对的 ~, 121, 122; 在经典形而上学中的作用, 127, 128; 通过 ~ 推理出的无意识观念, 129, 131, 138; 在实验心理学中的应用, 143
- Intuition, 直觉: 与推理相对的 ~, 133 - 134, 162; 道德判断中的 ~, 35, 52 - 53
- Intuitionism, 直觉主义。参见“Cousin, Victor 中的直觉主义”
- Irrationality, 非理性: 处于核心自我之外, 7
- Irrational unconscious, 非理性的意识。参见“Unconscious mind”
- James, Henry, 詹姆士, 218
- James, William, 詹姆士, 120, 142, 182; 有关电疗, 4; 对新心理学的批评, 20, 21, 26, 195, 202 - 203, 209 - 210, 214 - 215, 219; 关于习惯动作, 94; 念动动作学说, 105; 精神研究, 119, 201; 实验, 154; 对心身关系的看法, 155 - 156, 158, 177; 对实证主义的批评, 158, 160; 关于感觉, 161; 关于无意识, 166 - 167; 机能心理学, 177; 职业生涯, 184 - 185, 201;

- 对无意识推理理论的抨击, 189; 意识流, 199, 201, 208 - 209, 211; 知觉理论, 202 - 203, 210 - 211; 关于有意识心理的理论, 204 - 208, 216; 关于意志, 213 - 215
-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 52
- Johnson, Samuel, 约翰逊, 64
- Jouffroy, Theodore, 茹弗鲁瓦, 111
- Jung, Carl Gustav, 荣格, 167
- Jung - Stilling, Johann, 容 - 施蒂林, 113
- Just - noticeable difference (jnd), 最小可觉差, 96 - 97
- Kant, Immanuel, 康德, 37, 72, 93, 112; 关于对灵魂进行科学研究, 10, 13 - 14, 24 - 29, 45, 82; ~ 的心理学, 22 - 24, 35, 38, 90 - 91; 对曼 - 德 - 比朗的影响, 31, 34; 关于人类自由, 45; 反对心理唯物主义, 54, 82; 关于无法证实外部世界的存在, 62 - 64, 66, 70; 先验的理想主义, 63, 69; 关于本体, 86, 128; 关于科学, 124 - 126; 刘易斯对 ~ 的讨论, 148; 认识论, 153; 本体与现象的区分, 163; 对现代心理学的影响, 200
- Kierkegaard, Søren, 克尔凯戈尔, xi, 111, 163
- King - Hele, Desmond, 金 - 海莱, 42, 55
- Knowledge, 知识, 116; 逻辑数学 ~ 与经验 ~, 195
- Lange, Friedrich. A., 朗格, 7, 125 - 126, 160
- Lavoisier, Antoine, 拉瓦锡, xii
- Lawrence, William, 劳伦斯, 44 - 45, 48, 50
- Laycock, Thomas, 莱科克, 79, 150
- Lewes, George Henry, 刘易斯, 6, 13, 49, 107; 职业生涯, 11, 145 - 157; 关于斯宾诺莎, 147; 实证主义, 148 - 149, 155, 156; 关于心理和身体的两方面理论, 149 - 150, 162, 151, 155, 156, 157; 关于脊髓反射, 151, 154; 自动作用, 152, 154; 关于感觉分析, 161; 关于斯鲍尔丁, 182
- Liebig, Justus, 李比希, 146
- Linnaeus, C., 林奈, 14
- Lipps, Theodore, 李普斯, 200
- Local signs, doctrine of (洛采), 部位记号学说, 104 - 106
- Locke, John, 洛克, 22, 25, 33, 34, 62
- Lockean philosophy, 洛克哲学: ~ 与启蒙运动, 31, 32, 33, 34; 联想主义, 38
- Logic, 逻辑: ~ 与心理主义, 186 -



- 194
- Logical unconscious, 逻辑无意识, 131 - 132, 141, 162
- London Metaphysical Society(1869 - 1880), 伦敦形而上学学会, 120
- Lotze, Rudolf Hermann, 洛采, 2, 78, 86, 98, 106, 107, 116, 123, 152, 154; 职业生涯, 102; 对活力论的批评, 102 - 103; 部位记号理论, 103 - 106
- Love, 爱, 56 - 57。参见“Agape”; “Erotic experience”
- Löwenheim, Leopold, 勒温海姆, 191
- Mach, Ernst, 马赫, 100, 143, 158, 161, 195, 196, 197
- Mackintosh, James, 麦金托什, 23
- Magendie, François, 马让迪, 17
- Magnetism, 磁性: 用磁来影响灵魂, 16; 磁危机, 83; 磁睡眠, 83, 114; 心理学基础, 113
- Maine de Biran, François - Pierre, 曼 - 德 - 比朗, 31, 34, 52, 75 - 76, 84, 116
- Manning, Archbishop, 曼宁大主教, 120 - 121
-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The* (布莱克), 《天堂与地狱的婚姻》: 唯物主义心理学, 41 - 42
- Martineau, Harriet, 马蒂诺, 148
- Marx, Karl, 马克思, 111, 185
- Master Flea* (霍夫曼), 《跳蚤师傅》: 唯物主义心理学, 49 - 50
-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8, 9, 32 - 33, 37, 62, 65, 125, 174。参见“Fluid materialism”; “Materialist psychology”
- Materialism pshchology, 唯物主义心理学, 16, 19, 38, 39, 40 - 41, 52, 53, 58。参见“*Frankenstein*”;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The*”; “*Master Flea*”
- Meinong, Alexius, 迈农, 195, 197, 198
- Mental philosophy, 心理哲学: 关于心理的科学, 35; 英国的 ~, 82
- Mental states, 心理状态: 作为自然实体的 ~, 176; 简单动物和植物的 ~, 177。参见“Mind - body relationship”
- Mercier, Cardinal, D., 麦西埃, 185
- Mesmer, Franz Anton, 麦斯美, 16, 38, 44, 82 - 83
- Mesmerism, 麦斯美术, xi, 1, 3, 44, 112, 127, 128, 142; ~ 的心理基础, 113 - 114
-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22 - 23; 经典 ~, 27 - 29, 34 - 36, 60 - 61, 80, 81 - 82, 84, 99, 111; 自然 ~, 107, 108。参见“Faculty psychology”

- Metternich, K., 梅特涅, 38
- Mill, James, 穆勒, 12, 60, 74, 76, 77, 116, 133, 139, 210, 212 - 213
-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12, 75, 76, 179, 182, 210, 212; 关于科学, 124, 148; 逻辑无意识理论, 131 - 134, 162, 164, 179, 182, 187
- Mind, 心理: 孔迪雅克论~, 31; 达尔文论~, 40; ~理论, 36 - 37。参见“Mind - body relationship”
- Mind - body relationship, 心身关系: 19世纪有关~的观点, 3 - 5, 29; 有关~的泛神论观点, 48; ~作为相互影响, 61; 洛采论~, 103; 泰恩论斯宾诺莎有关~的观点, 100 - 111; 有关~的实证主义观点, 157, 160 - 161
- Moral philosophy, 道德哲学: 作为心理学, 3, 22, 35; 直觉主义, 36; 与自然哲学相对的~, 82; 内省在~中的作用, 127
- Moral sense, 道德感, 52 - 53
- Motor theory of perception, 知觉的运动理论: 布朗的~, 72 - 74; 贝恩的~, 76 - 77; 卡彭特的~, 77, 78
- Müller, Johannes, 缪勒, 17, 18, 98; 关于生命力, 17, 84, 91 - 92, 102; 关于特殊神经能力学说, 84, 90 - 91, 94, 101 - 102, 103 - 105, 107 - 108; ~的形而上学, 86, 89 - 95; 关于习惯动作, 94; 反射功能, 122 - 123
- Muscle sense, 肌肉感觉: 布朗发明的~, 66 - 67, 70 - 72, 74, 80, 81, 86
- Nativism, 先天论: 知觉的~, 135; 康德的认识论, 153
- Natural metaphysics, 自然形而上学, 81 - 85, 122, 123, 126, 141, 144。参见“Fechner, Gustav”; “Lotze, Rudolf Hermann”; “Schopenhauer”
- Natural philosophy, 自然哲学: 审查制度, 14; 作为自然科学的~, 22
- Natural selection, 自然选择: 达尔文的~理论, 100 - 101, 169, 170, 172 - 176, 177; 华莱士的~理论, 172
-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自然的超自然主义, 16, 54, 55 - 56
- Natural unconscious, 自然无意识。见“Unconscious: 自然 - 理论”
- Necessity, doctrine of (雪莱), 必然性学说, 45
- Neo - Kantianism, 新康德主义, 112, 124, 125 - 126。参见“Erkenntnislehre”
- Neurophysiology, 神经生理学, 13
- “New psychology”, 新心理学: 产生, 5, 8, 13, 185; 实证主义的~, 19; 维护间接知觉, 41; 范围, 122, 123,

- 144 - 145。参见“Experimental psychology”
- Newtonian science, 牛顿式科学, 24, 25, 36 - 37
-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111, 142, 163, 185
- Noumenal world, 本体世界, 85, 86, 87, 88, 92, 128, 129, 163
- Novel, 小说: 作为心理学理论的媒介, ix, 58
- Obsessive thinking, 强迫思维, 114。  
参见“Suggestibility”
- Organic happiness, 器官快乐, 55, 56。参见“Erotic experience”
- Oxygen, theory of, 氧气理论, xii, 13
- Paley, W., 佩利, 89
- Panphenomenalism, 泛现象主义, 121, 161。参见“Positivism”
- Panreflex theory of mind, 心理的泛反射理论, 150
- Pantheism, 泛神论, 48
- Pavlov, Ivan, 巴甫洛夫, 145
- Pierce, Charles, 皮尔斯, 126, 154, 185, 186, 189 - 195
- Pflüger, Eduard, 普夫吕格尔, 107
- Phenomenalism, 现象主义; 现象论, 33, 121, 141
- Phenomenal world, 现象世界, 85, 87, 129, 163
- Phenomenology, 现象学, 195, 197, 199, 200
- Phrenology, 颅相学, xi, 1, 3, 4, 28 - 29, 44, 65, 112, 113 - 114, 148
-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生理心理学, 4
- Piaget, Jean, 皮亚杰, 94
- Plato, 柏拉图, 65
- Platonism, 柏拉图哲学, 56, 88
- Pneumatology, 物灵学, 22; 与自然科学相区别, 82
- Poe, Edgar Allan, 坡, 16
- Poetry, 诗歌, 57 - 58
- Porterfield, William, 波特菲尔德, 61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03, 108; 产生, 8, 23, 85, 156; 新心理学中的 ~, 19, 98, 111, 124; 科学的 ~, 99 - 100; 孔德的 ~, 99, 148 - 149, 158; 斯宾塞的 ~, 99; 泛现象主义, 121 - 122, 161; 与自然形而上学相对立, 126, 141; ~ 与无意识, 151 - 152, 164, 167; 两个方面理论, 155, 156 - 160; 感觉主义与 ~, 162; ~ 与进化论心理学, 167, 175 - 176
-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77, 112
- Precognition, 先知, 119
- Pre-established harmony(莱布尼兹),

- 预定和谐, 105
- Presentism, 现实性, xii
- Priestley, Joseph, 普里斯特利, xii, 38, 39, 41, 54
- Principle of association, 联想规律, 65, 74
- Psychic research, 精神研究, 119
- Psychoanalysis, 心理分析, 80
- Psychologism, 心理主义, 187 - 200
- Psychophysics, 心理物理学, 96 - 97, 100, 107, 117, 122, 123
- Psychosis, 精神; 精神症, 150。参见“Dual aspect theory of mind and body”
- Puységur, A. M. J., 皮塞居, 83
- Queen Mab*, 《麦布女王》, 45 - 48
- Reaction - time studies, 反应时实验, 122 - 123, 143
- Reflex theory, 反射理论, xiv。参见“Sherrington, Charles”
- Reid, Thomas, 李德: 关于对灵魂进行科学研究, 10, 13 - 14, 23 - 29, 34, 36, 45, 62 - 63, 82; ~ 的心理学, 26 - 27, 33 - 35, 37, 38, 41, 65 - 66, 72 - 74, 90, 93, 134, 135 - 136, 138; 对联想主义的批评, 29 - 30; 对洛克的认识论的批评, 31 - 34, 35; ~ 的经验的伦理学, 52 - 53
- Religion, 宗教: ~ 与心理学的发展, 1 - 4, 5 - 11, 12, 13 - 17, 217 - 220
- Ribot, Théodule, 李播, 156, 185
- Robertson, Croom, 罗伯逊, 185
- Romanes, George, J., 罗马尼斯, 170
- Royer - Collard, Paul, 鲁瓦耶 - 科拉尔, 31, 34
- Russell, Bertrand, 罗素, 180, 187, 191
- Schelling, Friedrich, 谢林, 31, 83, 102, 112, 127
- Schopenhauer, Arthur, 叔本华: 关于意志, 75 - 76, 84, 86 - 88, 91, 116, 127, 142; 生平, 86, 88 - 89, 94 - 95, 111, 115, 141, 142; 关于美学, 87 - 88
- Science of the mind, 心理科学, 35。参见“Mental philosophy”; “Moral philosophy”
- Scientific psychology, 科学心理学: 对 ~ 的批评, 10, 13 - 14, 23 - 29, 34, 36, 45, 62 - 63, 82; 产生, 112, 186 - 187。参见“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ew psychology”
- Sechenov, Ivan, 谢切诺夫, 145
- Sensationalism, 感觉主义; 感觉论,

- 63, 71, 72, 141, 164
- Sensation and perception, 感觉和知觉, 29 - 30, 65 - 66, 72 - 76; 二者的区别, 26 - 27, 33, 133 - 140; 主动注意的作用, 31
- Sensory isolation experiment(斯鲍尔丁), 感觉剥夺实验, 181
- Sensory threshold, 感觉阈限。见“Fechner, Gustav: 心理物理学”
- Sentient principle, 有感觉原理。参见“Whytt, Robert: 有感觉原理”
- Seraphine(海涅), 赛拉芬, 46 - 47
- Sexual love, 性爱, 55 - 56
- Sexual selection, 性别选择, 170, 175, 177
- Sheehan, James, 希恩, 12
- Shelley, Mary, 雪莱, 15, 16, 27, 45, 50 - 54, 57 - 58, 83, 202, 218
- Shelley, Percy Bysshe, 雪莱, ix, 15, 19, 49, 50, 107, 144, 147; 关于《麦布女王》中表达的科学观点, 15, 47 - 48; 关于世界的性爱观点, 15, 55 - 59, 120; 关于形而上学, 22 - 23, 27, 90; 关于必然性的学说, 45; ~ 的唯物主义心理学, 45 - 46, 50; 关于饮食, 47
- Sherrington, Charles, 谢灵顿, xiv - xv, 155
- Sin, 原罪, 6
- Skinner, B. F., 斯金纳, 94
- Soul, 灵魂: 不灭的 ~, 4, 113; 位置, 5 - 6, 18; 唯物主义对 ~ 的看法, 16, 41 - 42, 54, 174, 183; ~ 与意志, 78; 有关 ~ 的自然科学, 82, 83, 85, 86, 107; ~ 的部位记号理论, 103, 104 - 106; 作为无意识心理的 ~, 119, 121, 143; ~ 的弱点, 128, 143; ~ 与心身两方面理论, 147, 183
- Soul psychology, 灵魂心理学, 119 - 120
- Spalding, Douglas, 斯鲍尔丁, 179 - 183
- Specific nerve energies, doctrine of, 特殊神经能力学说, 84, 90 - 91, 93 - 94
-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 实证主义, 8, 9, 99, 159; 关于意志, 116, 118; 职业生涯, 146, 150; ~ 的泛现象主义, 161, 162; 关于进化的理论, 169, 172, 173, 176, 181 - 182
- Spinal reflex, 脊髓反射。见“Lewes, George Henry: 关于脊髓反射”; “Whytt, Robert: 脊髓反射的发现”
- Spinoza, Baruch, 斯宾诺莎, 48, 49, 89 - 91, 95, 111, 120, 147, 148, 162
- Spiritualism, 唯灵论, 3, 7, 9, 16, 34, 74, 79, 114, 120, 141, 142
- Stendhal, 司汤达, 58

- Stevenson, Robert Louis, 斯蒂文森, 164 - 166
- Stewart, Dugald, 斯图亚特, 30, 31, 32, 34, 36, 37, 52, 60 - 61, 64, 99, 125
- Stimulus, 刺激, xiii, 26
- Stimulus threshold(费希纳), 刺激阈限, 96 - 97
- Stirling, James, 斯特林, 26
- Strauss, D., 斯特劳斯, 48
-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意识流, 199
- Studies of reflex function, 对反射机能的研究, 122 - 123
- Stumpf, Karl, 斯通普夫, 161, 195 - 198
- Subthreshold phenomena, 阈下现象, 18, 19
- Suggestibility, 受暗示性, 79 - 80, 83, 114, 119; ~ 与无意识心理, 128
- Sully, James, 萨利, 185
- Supernatural unconscious, 超自然无意识, 128 - 129, 141
- Swedenborg, Emanuel, 斯韦登博格, 75
- Symbolic logic, 符号逻辑, 195, 200
- Taine, Hippolyte, 泰纳, 110 - 111, 142, 161
- Telepathy, 传心术, 119
- Titchener, Edward B., 铁钦纳, 124
- Trances, 精神恍惚, 119, 129
-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先验的理想主义, 63。参见“German idealism”; “Kant, Immanuel”
- Trialism, 三元论, 118 - 119
- Tyndall, John, 廷德耳, 150, 156, 161, 179
- Unconscious cerebration, 无意识大脑活动, 79, 139
- Unconscious inference, 无意识推理, 118, 132, 187 - 189
- Unconscious mind, 无意识心理: 意识心理与~ 的二元论, 7, 19, 20, 118; 流动唯物主义对~ 的看法, 43; 作为灵魂的~, 119, 120; 通过内省进行的研究, 122; 有关~ 的理论, 127, 128 - 129, 130 - 143 其中各处; ~ 的超自然理论, 128 - 129, 141, 142; ~ 的自然理论, 128, 129, 142; 逻辑无意识, 131 - 143; 非理性的~, 164 - 167
- “Underground psychology”, 潜在心理学, 14, 18, 51
- Universals, 普遍性, 33 - 34
- Vision, 视觉, 138
- Vital force, 生命力, x - xi, 17, 78; 作

- 为意志的~, 84。参见“Vital principle”
- Vital principle, 生命原理: 活生生的物质的~(缪勒), 91-92
- Volition, 意志: 作为无意识的~, 31; 作为自由动作的~, 78; ~的分散, 79-80; ~与心理学理论, 115-117, 118。参见“Will”
- Volta, Alessandro, 伏特, x-xi, 38
- Voltaire, 伏尔泰, 48
- Wallace, Alfred Russel, 华莱士, 115, 172, 175
- Weber, Ernst H., 韦伯, 96, 102, 107
- Weber fraction, 韦伯分数, 96, 100
- Wedgewood, Josiah, 韦奇伍德, xii
- Wertheimer, Max, 韦特海默尔, 196
- Whewell, William, 休厄尔, 35, 111, 124
- Whytt, Robert, 惠特: 职业生涯, xiii-xv, 61; 创立刺激概念, xiii; 发现脊髓反射, xiii, xv, 5-6, 130, 151; 有感觉原理, xiii, xiv; 关于分布式的灵魂, 6, 15; 关于心身关系, 61-62; 关于运动, xiv, 76; 关于无意识感受的存在, 130, 131, 151
- Will, 意志: 作为心理力量的~, 84, 85, 92-93; 叔本华哲学中的~, 86-88; 对~的意识, 115-117, 123。参见“Volition”
- Woehler, Friedrich, 韦勒, 91
- Wordsworth, William, 华兹华斯, ix, 12, 15
- World soul(费希纳), 世界灵魂, 97-98, 129
- Wundt, Wilhelm, 冯特: 关于努力感, 86-87; 职业生涯, 89, 144-145, 154, 156, 184, 185; 形而上学观点, 98; 实验研究, 117, 122, 123-124, 143; 关于意志, 116-117, 123; 关于无意识推理, 118, 119, 132, 142, 143, 195; 关于统觉, 123-124; 关于感觉规律, 153; 关于感觉, 161, 196, 197